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美的寻求者



《听笛人手记》后记

这本小册子中的短文，都是关于外国文艺作品的读后感。其中《在大海面前》虽主要是谈我国青年作家邓刚的《迷人的海》的，因为也联系谈到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以也收进来了。

写得最早的一篇是《阴影中的凯旋门》，在1974年。十年浩劫中期，我因有病，得以走出了“牛棚”，摆脱了劳役，在家里休养。我的书是早已被抄得一干二净了。病中寂寞，也由于积习，很想读一点什么，就向几个还敢于和我交往的年轻的友人求助，他们是还有办法弄到一些书的。在借来的书中，就有雷马克的《凯旋门》。这本书我早在解放前就读过，也就是一般地看看，觉得写得不错，但内容早已忘记了。这次仔细地重读了一遍，引起了许多感触，就在激动的心情中写下了那篇读后感，其中是寄托着自己的某些情怀，融合着自己的某些心情的。当时当然完全没有想到发表，只是和另外写下的几篇短文以及一些诗，悄悄地在几个接近的人中传看过而已。

没有想到，5年以后，在1979年的4月，正在筹办的《外国文学研究》来约稿，我就带着试一试的心情将这一篇送了去，后来就在该刊的第一期上发表了。当时我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因而，我不能不感激该刊主编徐迟同志和其他几位编者的好意和感佩于他们的勇气。在被迫离开了20多年后，我是带着这一篇文章重新走向文坛的（那以后不久，《诗刊》也发表了诗）。

这篇东西在读者中引起了一些反响，有几位我所尊敬的友人也表示了兴趣。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后来，《文汇月刊》的主编梅朵、谢蔚明同志约我辟一个专栏，我冒昧地答应了。专栏定名为《听笛人手记》。那是因为我在写《阴影中的凯旋门》的前后，我还写过一篇短文，介绍了柯罗连科的中篇小说《盲音乐家》，用意在于表达我对当时虚伪的创作倾向的厌恶，那收尾是这样的：“我多么希望，在我的窗口也能听到那样动人的笛声，有着特别真挚的感情、有着纯洁诗意的笛声……”。我想在《听笛人手记》的总题下，写一点有关外国文艺作品的读后感。

开始，我还能坚持一两个月写一篇，后来就时断时续，几乎停顿了。

这是由于我还有一些别的杂务，当然也是由于我的懈怠。但也还有一个原因：写这样的东西，我感到很吃力，而且并不是随便选一篇作品，就可以提笔写的。我不是作一般的作品分析，而是想写出自己的感受，并寄托自己的情怀，通过对作品的解释，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生活、对艺术的某些追求。甚至有时只是借题发挥，介绍作品倒是在其次的。

因而，我只能评介使我激动，并引起了我的深思的作品，它可能并不是长篇巨著。

所以，我是毫无计划性的。我写《海的沉默》，是想探讨一下“人”的问题；写《悲剧与赞歌》是关于人生与艺术的思索。我想到要谈一谈《沉重的时刻》，则是因为有时候我也经历着对自己失望、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刻，想通过托马斯·曼笔下的席勒的奋起来鞭策自己。谈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文章有好几篇。他作为一个有独特风格的作家，是值得注意的，而我对他确实也有所偏爱。

考虑到我所介绍的作品未必都是读者读过的，而且，也为了写得较为生动，我对作品都作了简短的复述。这是一项看来容易而在我是异常费神的事。我不仅要表达出那主要情节，而且想传达气氛和情调。在情节的复述中，也

就夹杂着我的议论和感想。总之，我试图不要写得那么干燥和枯涩，不要败坏了读者对原作的印象。

我不知道我的努力收到了怎样的效果。当一位前辈友人告诉我，他看了我的介绍以后，又重读了一遍《海的沉默》时，我感到欣慰了。我也很感激一些友人的鼓励，使我有勇气将这本单薄的集子奉献给读者。

曾卓

1984年12月15日

母亲

当我为了练练笔，立意写几篇往事回忆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个题目是：《母亲》。在同样的题目下，我已经先后写过两首较长的诗，一次是在 1941 年，一次是在 1945 年。但我还是想再写下一点什么。回顾幼年的生活，母亲当然是常萦绕在我心间的一个人。母亲去世已经整整 30 年了。这 30 年来，特别是近 20 年中，我的生活充满了变幻和波折，我也常在不同的情景中想起她。——好多年了，我不大写什么，近几年来甚至完全抛开了笔，因而受到了亲近的人的不满和指责。这一次想写几篇往事的回忆，是对于关心我的人的一种回报，而在我自己，这也是艰难地再探步的尝试。那么，让我把首篇奉献给母亲吧。

在题名《母亲》的第二首诗的开头，我说过：

我的母亲，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

坐在阴暗的小窗前的

中国的可怜的母亲们

是没有名字的。

……

我的确不知道母亲的名字。我问过我的长辈们，他们也都不知道。父亲是应该知道的，如果母亲真的有名字的话。似我没有好问他。在过去的苦难的中国，在重重压迫下的广大的劳动妇女们，名字对她们也是奢侈品。她们还未成年时，大都叫什么妹、什么娃，或大丫头、二丫头之类，这不过是为了呼唤。当她们嫁出去以后，就变成了“孩子他娘”，在某种比较正规的情况下，就是××氏。如果她们有一个名字，也很难用上，等于没有。我的母亲，是这样广大的妇女中的一个。

我也不清楚母亲在来我们家之前的生活。只听说她是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大概父母很早就去世了。由“媒妁之言”嫁到我们家里，那时还不到 20 岁。我的祖父原也是乡下的贫农，因为天灾人祸，实在生活不下去，逃荒到汉口来，做过苦力，当过菜贩，摆过烟摊，后来家境稍好一些了，开了一家小小的百货店，也不算是怎么宽裕。所以三个儿子中，只有我父亲（他是长子）得到了在正规学校里读书的机会。由于他勤奋用功，在祖母的支持下，一直读到了大学。另外两个儿子就只不过在私塾混了几年。母亲嫁过来的时候，父亲是大学生。那正是“五四”运动时期，像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父亲是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的，对于这种包办的婚姻，当然不会满意，母亲受到了冷淡、鄙夷，她当然也不会感到幸福。但她默默地承担起她的命运。后来，大约当我 4 岁的时候，父亲遗弃了我的母亲，离家出走了。这对于母亲是致命的一击。她也还是只能默默地承担起她的命运。她还年轻，不到 25 岁，带着流血的心，低着头站在阴暗的漫漫的岁月面前……

父亲另外成了家，也住在汉口。母亲带着我跟随祖父祖母生活，一直到死，母亲再也没有和父亲见过面。我的继母有时倒来看看祖父祖母。母亲对她是亲切的。继母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孩，她后来有了一个职业，就将女孩送过来由母亲抚育。母亲接受了，而且对女孩异常慈爱，如同自己的孩子。我的三婶（她和母亲感情最好）感到很不平，我好几次听到她埋怨母亲说：“你这是为什么呵，还为她带小孩？！你怕她还不享福！”母亲总是即刻打断她

的话：“莫这样说……”接着就凄凉地笑笑。

由于父亲的出走，祖父祖母对母亲有一种歉疚的心情，对待她比对待另外两个儿媳要照顾些。家里的别的人，对母亲也是尊重的。母亲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而她是极好强的，一言一行都非常注意。除了和两个儿媳外，在人前很少说话。在我的记忆中，她几乎很少走出大门，我不记得她进过戏院和电影院。她和两个儿媳轮流做饭，洗衣，或是低着头静静地坐在窗前做针线。窗外是大街，喧腾着市声。在这个繁嚣的大城市中，她的天地只是污黑的厨房和破旧的小楼。她唯一的消遣就是一字一字地低声地念着质地恶劣的石印的《珍珠塔》一类的弹词书。——母亲没有上过学，不知道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依靠自学，能够认识一点字。那些古老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显然深深地感动了她，有时候，我听到她低低地哼唱了起来，声调是那样地悲凉。

当我七八岁时，已经略略地知事，三儿媳和别的人，又不时在我面前责难我父亲，这使我同情母亲，而对父亲有着反感。有时在三儿媳或别的人半开玩笑的鼓动下，我就说出一些对父亲不敬的话，如果母亲听到了，她总是用眼神或一个手势阻止我，事后就背着人责备我：“这些话是你能说的？！你……”她的声音哽塞了。当我不用心做课时，母亲常常说到父亲过去是怎样勤奋地读书，深夜还坐在灯前。有一次，我匆匆地跑进房里，母亲正坐在打开的箱前收拾着衣物。她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当她发觉我跑近时，急忙地将照片塞进了箱底，但我已看到了那照片是父亲的。——那么，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中间，或者，正由于是在那样的处境中间，母亲对父亲也还是有着感情，有着怀念……

母亲还有一个姐姐，年龄比她大不了两三岁。她的婚姻也是不幸的，她的丈夫是农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吧，不劳动，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而且常常虐待她。我的姨母往往穷困得无法开锅。她有时就投奔到我家来，小住几天。母亲和她见面，两人都异常欢喜和亲热。姨妈、母亲和我都挤睡在一张大床上。一个深夜，我醒来，听到她们在各自诉说着自己的遭遇。这一对不幸的姐妹都在呜咽着，而又相互安慰。我紧闭着眼，不敢动弹，唯恐她们知道我是醒着。我已不记得她们说了一些什么，但我将永远不能忘记她们的谈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所留下的对于人世的凄凉而沉重的感觉。姨妈常常拉着我的手，轻言细语地叮咛：“冠，你要好好读书呵。你妈就只有指望你，你要替你妈争一口气呵。冠，你将来做了大事，我做姨妈的也光彩呵……”我总是默默地点着头，而且暗地立誓要在将来做“大事”，为母亲，也为姨妈。姨妈终于要回乡下去了，两姐妹都恋恋不舍，母亲从箱底掏出一个小纸包，我知道那是母亲积存下来的几块银元，她塞到姨妈手里。姨妈很不安地推辞着说：“你也难。”母亲说：“我有吃有穿，你比我要难得多……”于是她俩都低声地哭了起来，我站在一旁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像那些在悲惨的命运前感到痛苦、绝望的妇女一样，母亲是信佛的，从宗教里面去寻找对自己不幸的解释，而且寻求慰藉和渺茫的希望。母亲在阴历的初一、十五和春节期间，都吃斋。对于穷苦的人们，只要做得到，她从不吝啬一点帮助。她这样做，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修来生”。这里有一颗善良的心在跳动：正因为自己的不幸，因而同情别人的不幸。

我当然是母亲唯一的安慰和希望。我4岁时，一个春天的黄昏，跑着穿越马路，被一辆急驶来的汽车撞倒，卷入了车下。坐在路旁乘凉的人很多，掀起了一阵惊呼声。母亲正在厨房里，一听到这消息就昏倒了。那次我侥幸

只受了一点外伤。但母亲从那以后就容易心悸、惊惶，精神上的创伤久久不能平复。当我在病中，特别容易感受到母亲对我的温暖的爱抚。但平时，母亲对我的爱往往是无言的，有时甚至是以严厉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少年时是贪玩、顽皮的，有时母亲忍不住责打我。但往往流泪的不是倔强的我，而是母亲自己。母亲常常含泪说：“娘是苦命人，只指望你成人争一口气，而你……”母亲的眼泪比她的责打更能触动我的心，我仍倔强地沉默着，但对母亲的怜爱，对自己过失的自责，由于伤了母亲的心而引起的愧疚，这种种感情从我的心中升腾起来，我真想扑在母亲怀里大哭一场。但也许我在幼小时就“不堪改造”吧，我的种种过失总还是一犯再犯。母亲还常以“甘罗 12 岁为丞相”一类故事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类的古训教育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我在一家报社的儿童副刊上登了两篇稿件，得到了一个烧有我的名字的小茶壶作为奖品；读初中时，我被学校选派参加全市讲演比赛，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支带有黑色剑鞘的七星剑。那个小茶壶被祖父常常捧在手中，而那支七星剑则由母亲悬挂在床头。当我将那两件奖品带回家时，母亲没有说什么，只是微笑地看着，而她眼中有着泪光闪耀。可以想象，在母亲喜悦的泪光中，是浮现着我的灿烂的前程，是梦想着有一天我真能成为“人上人”，同时也为她带来一个幸福的暮年。

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是深爱着母亲，朦胧地意识到母亲的不幸和屈辱，这使我在有人谈到母亲时特别敏感、易怒。有一次，当我 11 岁时，为什么事和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少年争闹了起来。他鄙夷地说：“你爸爸不要你妈妈嘛！”我奋力打了他一耳光，接着就拚命地和他扭打起来，闻声而来的大人们费了好大的劲将我们拉开了。我带着流血的嘴唇和被扯破的上衣回到家去。这场生死的决斗就发生在我家后门口不远，母亲立即知道了。我一拉开门，她正在门边守候着。她的脸色苍白，一言不发。我也咬着嘴唇沉默着。母亲俯下身来查看我的伤口，通过她扶着我的肩的手，我感到她全身都在战栗……

我进入初中以后，使母亲失望的不仅是我依然还是那样贪玩，大部分时间都奔跑在小足球场上，而且，渐渐地又有一种新的阴影蒙上她的心头：那正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夕，由于几个高年级同学的影响，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接着又卷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中。学校当局向家长发出了警告。我的一些狂放的言论也使大人们惊骇。母亲为我很担心，她好多次劝说我，要我少和“坏人”来往，要我专心读书，都被我极不耐烦地用几句简短的话顶回去了：真是，怎么能跟你说得清楚呢，最好别管这些事。危险么？危险就是考验，爱国无罪！母亲往往只是深深叹一口气。有两次她似乎要发火了，但终于克制着自己：儿子已经是一个中学生，是不能随便责骂的。

1937 年的春天，我的三个友人被捕了。那年暑假开始时，我接到了学校“黜退”的通知单。我气愤，而又不安：怎么向家里，特别是向母亲交代呢？我知道，这会很伤她的心。通知单在我手中压了三四天，母亲从我的神态中感觉到出了什么事，几次询问我。实在拖不下去了，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将通知单拿给母亲看，准备接受责备，或者，更糟的是，母亲会大哭一场。但意外地，母亲反复地看了通知单后，只是自言自语地说：“那下学期怎么办呢？”她甚至连望都没有望我一眼。而且，那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她对我比平时更亲切，在生活上对我照顾得更细心。但我发觉，她是突然憔悴了，话更少了，而且常常在做活当中停歇下来，失神地想着什么。

那年秋季，我被祖父强迫送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的中学去继续念书。离开武汉，离开我的友人们，离开家，离开母亲，这使我很难过。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了，古老的中国显得年轻了起来。我所在的那个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那种闲逸和沉寂，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震荡着雄壮的歌声，小街上常常走过举着救亡团体旗帜的队伍……我被弥漫在全国的那种巨大的热情所感染，所鼓舞，所振奋，卷入到了那浪潮中，兴奋地忙碌着。这虽是我初次离家，但很少有时间想到母亲。只是当我偶尔回到武汉，因为可以很快就见到母亲而引起的喜悦总还是充满了我的心胸，快到家时，就不自觉地半跑起来。

战火逐渐地逼近了武汉，父亲一家已经迁到四川的一个小县里。为了让我能够继续求学，祖父决定让我到四川去找父亲。1938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后，只身登上了西上的轮船。送我上船的是祖父。母亲一连几天忙着为我收拾行装，缝补衣服，反反复复地叮咛，要我好好听父亲的话，不要惹父亲生气，要我用功读书，也要我好好注意身体，千万不要和“坏人”来往……她的神情显得凄伤、黯然，但没有眼泪。她为我将行李提下楼，和家人一齐送我到门口，看我坐上人力车。我走了好远后，回头看到她还站在门边。我的心情沉重、纷乱，但没有想到，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

武汉沦陷的前夕，祖父祖母和母亲、叔婶们逃难到广西的一个小县里。我则在重庆念书。祖父每个月总要托人写一封信来，有时寄给我一双布鞋或是一件毛线衣，我知道那是母亲亲手做的，一股暖流漫过我的心。有时还寄给我一点钱，我知道逃难在异地，祖父维持一家的生活已经很艰难，我感到了那少数一点钱的重量。在每封信中，祖父总会谈到母亲的情况，说她很好，要我不要挂念。每次家信的到来，总是使我喜悦而又有点哀伤。但我很少及时复信，有时甚至两三个月不给家里一点消息。我正是在青春的激情中，我有许多友人；我有虽然穷困但是欢乐的生活；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写诗、演戏、开会、办墙报……我往往决定当晚要为家里写一封信，却又因为一点什么事情耽误了。

但我还是有时怀念母亲。1941年的秋天，我住在重庆近郊的乡间，在一个落着细雨的夜里，我写了一首题名《母亲》的诗，后来发表在和几个友人合编的诗刊《诗垦地》的第一辑上。现在我已经找不到这首诗稿了，但还大致记得那后面的两段：

母亲，
只是因为深深地爱你，
深深地爱着这一代
像你一样的
被时代的车轮轧伤了的母亲们，
为了给你们带来幸福的暮年，
为了后来的母亲们
不再有像你们一样悲惨的岁月，
我，无数的你们的孩子，
都在用如石工一样的手，
一凿一锤地敲打着
通向光明自由世界的路。

因而，我不能回到你的怀抱
不能走上你希望我走的道路，
不能戴上奴隶者的王冠
而又将那光荣分给你，
我不能呵！

母亲
请信我：
当祖国的大地
挣断了几千年的锁链，
当故乡的林间，
不再拴有敌人的战马，
当你又跋涉着迢迢的路
回到故居时，
我一定要随着黎明的光
去叩开故居的门，
我一定要跪倒在你的脚前
求你：即使是一点头的宽恕……

1944年的冬季，日寇向湘、桂发动了一场攻势，国民党军队毫未进行抵抗就一泻千里地败退了。我接到信，知道祖父已带着母亲、叔婶等从广西逃了出来，计划到贵州找我父亲。我一面注意报纸上关于战局的报道，一面期待着祖父、母亲等的平安音讯。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十天、半个月都过去了，我没有得到一点消息，而关于湘桂撤退中的混乱、悲惨的情况却不时传来。一个多月以后，我才接到祖父的信，他们丢掉了一切衣物，一直步行逃难，在半途，和母亲、叔婶等失散了，祖父历尽千辛万苦到贵州毕节找到了父亲。他在信中问我母亲是不是到了重庆，或是不是接到母亲的信。但我哪里知道母亲的消息呢？我非常焦虑，但一筹莫展。

后来，和母亲同行的叔婶等也到了父亲处。至于母亲的下落，他们是这样说的：在途中，母亲就决定不去父亲家，而要到重庆找我。母亲的身体原来就虚弱，在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她得了重病，但每天还是挣扎着和叔父、婶娘一同步行。几天以后，她终于支持不下去了，而当时又风传敌人即将到达。母亲不愿拖累叔父和婶娘，要他们先走。她摸出了一个金戒指要叔父带给我。母亲身边留下的唯一的東西就是我中学讲演得到的那件奖品：七星剑。她倚坐在一座破屋的墙边，扶着七星剑，望着叔父、婶娘等人在人群的洪流中渐渐走远。那地点，是在贵州都匀附近。

竟是这样的！

在异乡的土地上，没有一片遮蔽风雨的屋檐，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甚至没有一张熟识的脸，眼前流过的是惊慌的逃难的人群，耳边响着的是凄惨的呼喊声，而敌人的铁蹄随时可到……我不能想象孤独地倚坐在墙边、扶着儿子的一件纪念品的病危的母亲有着怎样的心情；我不能想象那以后母亲的遭遇。我的心沉重、悲痛，却又暗暗地期待着，也许，母亲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1945年的春天，因为一点事，我短暂地停留在长江上游的一个小城里。

8月13号的晚上，传来了敌人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顷刻间，全城一片欢腾，到处是鞭炮声、欢呼声、锣鼓声，我怀着狂热的喜悦挤在人的洪流中走遍了全城。深夜，回到借住的友人家中，已经很疲累了，却毫无睡意。8年！血与火，斗争与牺牲。我想到祖国的前途，想到很多人，很多事，也想到母亲，呵，如果她还活着……在激动的心情中，我开始动笔写第二首题名《母亲》的长诗。我想通过母亲的遭遇去暴露那个黑暗的旧社会，并寄托对光明的未来的追求。

后来，在1946年的春天，我回到了孕育了我的童年的故乡。我去看了已经成为废墟的故居的遗址，我在童年时嬉戏的大街上徘徊。对于过去，我引起了一些回忆，但无所留恋。

不久，一场新的战争又在这片国土上进行了。我的故乡也就是我的生死场。武汉解放前夕，每夜都实行戒严。我常在深夜，站在小楼的窗前，凝望着在幽暗中的大城：空阔的大街，暗淡的路灯，沉重的黑影，一片寂静。但有时走过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有时传来一声尖厉的“口令！”的喊声，说明这座大城正在恐惧地战栗。战争在百十里外进行，在这里，在表面的硬壳下面，地下火正在运行，燃烧……这座大城正急待毁灭也即将新生。我想到母亲，我想，这是她过去所不能理解，不敢想象，但终究应该是她所期待的。从小楼的窗口，我守望着故乡的土地，我感到母亲与我同在，在沉寂和黑暗中，渴望着霹雳的春雷和壮丽的黎明……

现在，又过去了20多年，我自己也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没有想到又会写一篇有关母亲的文章。在执笔时，一些久已淡忘的往事又涌上了心头。我哀悼着母亲，也追念着逝去的青春。我想，这将是我在文字上最后一次纪念母亲了。我决不应该仅只是回顾过去。我还不是那样苍老，也并没有失去希望。无论怎样艰难，我是生活了过来；不管前程是怎样的坎坷，我将一步一步走去，一如生我育我，在我身上寄托过深爱热望的死者。那么，你将永远与我同在，母亲！

1974年初稿 1979年12月改

那簇淡蓝色的小花

这 10 年来，我的凉台、窗前和书桌上，总是放着一些花木和盆景。原先只有几盆，后来，通过移栽、分枝和好心友人的赠送，发展到几十盆了。每一天都要花一点时间去照看、经营它们。这在我算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休息。

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并不是那样特别嗜花，但对花还是有着感情。我喜爱它们的美丽，它们各自的丰姿，它们所显示的生机和象征着青春的绿色。每当一盆花由于我的经营不善而枯萎，而死亡时，心里就滋生起惆怅和惋惜之情。在这里面，还有这样一个原因——

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有一段时期我是被关在“单人牛棚”（这四个字联在一起显然有语病）里。那是一间堆放杂物的板壁房。门是从外锁着的。由一个负责监管我的“小将”每天为我送饭来。说真的，每当接过他板着脸送来的半凉不热的饭时，我是有点愧疚不安的，因为这真是“有劳大驾”。他有一次冷笑着说：“饭来伸手，我看你倒蛮享福咧！”不过，如果他忘了或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我就只有饿一顿——而这种情况是常有的。这倒没有什么，只是整天被关着，又没有什么书报可看，甚至被剥夺了和其他“牛鬼蛇神”一道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权利，实在感到很寂寞。我对自己的命运倒没有什么特别担忧，因为，反正早已有一顶巨大的帽子在头上了，再严重也不过就是如此吧。我只是感到寂寞。一天，忽然放我出去劳动，这使我感到意外地惊喜。因为，平时只有被审问、被批斗或陪斗时，才准许我走出那间板壁房的。是挖防空洞。别的一些“牛鬼蛇神”已经先在那里了。看见我去，他们大概也感到有点意外，都不理我，只有几个过去与我较熟的，暗暗地做了做眼色，算是打个招呼。我知趣，就到一旁独自挖土了。阳光很好，舒展着酸痛的筋骨，活也不算重，这样的劳动实在是一种享受。有一锄下去，我发觉一簇淡蓝色的小朵的野花被挖了出来，就俯下身去看了看，随手将它扔在一边。当时并没有什么存心——不，也许下意识里我是想着什么。因为，后来我就小心地不让挖出的土将它掩盖住。当收工时，悄悄地将它放进我带在身边的茶杯里，而且还顺便撮了半杯土，蒙在脱下的外衣里面，带回“牛棚”了。

当门被锁上后，我就急忙地将花栽在一个漏底的漱口杯里。花已经有些枯萎了。我在晕黄的灯光下久久地看着它，如同欣赏一件艺术品。我想，我能将它救活的。我一定要救活它！

第二天的黎明，一醒来，我就想到要做一件什么事。但究竟是什么事呢？……呵，是的，花！我赶紧披衣起床到桌前看看，花还是蔫蔫的。漱口时，我又向它喷了些水。

那两天我无数次地看着它，希望看到它的复苏，它的变化，它的生长，我祈求有什么奇迹会突然发生……但它还是那样蔫蔫的。我感到很失望，感到很痛苦，似乎是面对着一个垂危的亲人。而且，我感到有些负疚：是我伤害了它的。

但是，几天以后，我看到，它渐渐恢复生气了，花枝慢慢挺直了，小小的叶子伸展了开来，一朵朵小花绽开了笑容。我感到了发自内心的喜悦，久久地凝视着它，泪水蒙住了我的眼睛。呵，复活了，受摧残的小花！又回来了，生命的绿色！

我觉得，那间破陋、杂乱的小板壁房有了生气。这一簇小花抚慰了我的

寂寞，带来了光辉、温暖。我觉得，它是一首诗，一支歌。

虽然，那只是一簇小小的不知名的淡蓝色的野花。

后来有那么一天——

监管我的“小将”因一点什么事走进了我的小房。当他对我“训话”时，突然打住了。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果然，他是盯在桌上的那一簇小花上。平时，我总是注意将花藏在杂物堆中的，这一天疏忽了。

“呵，”他笑了笑，“你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呀！”他迅速地伸过手去，当我不顾一切地去阻拦时，他已将花扯了起来，扔在了地上，而且狠狠地踩了几脚……

“你，你……”我简直说不出话来了，不知是由于惊恐还是由于愤怒。

当那位“小将”留下了一串夹着咒骂的“革命语言”，并带着威胁地吼叫“你等着看”走出去以后，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环顾四周，我感到那小壁房是更荒凉了，我被更难以忍受的寂寞包围着。当时，我下了决心（我甚至是通过发誓来表示我的决心的），总有一天，我可以自由地养花，我要养许许多多的花。

是的，现在我已养了许多的花。

但我还是深深地怀念那一簇不知名的淡蓝色的小花。

1990年除夕改旧稿

暗夜中的歌声

我来到嘉陵江边，寻找当年的一个古旧的渡口。

我是被一个记忆牵引来的。

38年前的一个落雪的冬夜，我提着一个小包到这里，要过彼岸去。我是急急忙忙地从风雪中赶来的，却还是太迟了。暮色笼罩着大地，渡口已经没有船。飘雪的江上静静的，只听到轻微的汨汨的江水声。

我拍了拍身上的雪花，在一块冰凉的大石上坐了下来。

天更黑了。我感到了一阵深深的凉意。那不仅是因为夜寒。我已不能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我是被迫离开的。附近又没有什么可以落脚的处所。那么，我将怎样熬过这个长夜呢，而且还落着雪。

我感到焦灼而又有些凄凉。

风吹着，雪落着，轻微的汨汨的江水声。

突然，一个女子的嘹亮的歌声在黑夜的寂静的江面上升腾了起来，唱的是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夜莺曲》。

我赶紧站了起来，望向江面，雪花在暗空中闪烁。看不到船影，但歌声渐渐向着这边飘浮。

河边林中夜莺在歌唱，
为什么歌声充满忧伤？
可爱的人儿最难忘，
勇敢进取莫再忧伤！

我从来没有在歌声中感到这样大的喜悦和感动，有如这个冬夜在这个荒凉的渡口所感到的。

在渐渐飘浮过来的歌声中，我终于看到了一只船影，近了，更近了……

小船停靠在渡口边，歌声停止，一个少女从船上跳了下来，一闪就从我身边跑了过去，我没有看清她的脸。

我上了船。

不久，歌声又在那边河坡上响了起来。船到了江心，听着少女的歌，我望着彼岸的灯火……

——我永远记住了在这个落雪的冬夜，黑暗的江面上的青春的歌声。

38年后，我又来到了嘉陵江边，想寻找当年那个渡口。我没有能找到，我只揣测着大约是这个地方。一切都变了。

我站在夏日的阳光下，望着流淌着的绿色的嘉陵江。

当年载过我的那只小船呢？那个歌唱的少女呢？……

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那个老者的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而且，我似乎还听到了那江上的歌声：

唱吧，唱吧，尽情地唱吧，
……
勇敢进取莫再忧伤……

1980年

新的歌

人们说，记忆是有选择的。那么，我相信：我将永远记得我所听到的一个“家庭小合唱”，和他们所唱的新的歌。

我从厦门过海到鼓浪屿，去看望两个老朋友：白文和他的妻子舒波。我们已30多年没见了。原来还保持着断断续续的通信，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断绝了消息。一年前，白文通过一家登载了我的作品的刊物转了一封信给我，这才恢复了联系。

鼓浪屿是一个美丽的小岛，到处是高大的榕树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树木、花朵。顺着山坡矗立着形形色色的、已经显得有些古旧的西式楼房。当我转入铺着青石板路的安静的小巷时，不知哪一家窗口传来了小提琴演奏的舒曼的《梦幻曲》，我真像是走在一个梦境里面。

按照他给我的地址，我找到一幢石砌的、古老的三层楼房，上了二楼。敲门，应声而出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舒波，虽然她的发式变了，而且添了一些银丝；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也“发福”了，体态不像当年那样轻盈……

她愣愣地望着我，接着，惊喜地喊出了我的名字。她知道我最近会来厦门，否则她是根本不会认出我的，我的变化比她要大得多。

她领我穿过仅有一张大床的房子，走向里间。那里也只是一张大床，一个小圆桌，一架堆放着书籍和曲谱的缝纫机，两张凳子和一张藤圈椅。这样几件简单的家具，使这不算太小的房间显得有些空落。

她让我坐在藤圈椅上，而自己坐在床边。她笑嘻嘻地告诉我，搬家到这里来还不久。又说，原来的住处是多么阴暗、狭窄，找到这么一个新居是多么不容易。看得出，她很满意这两间现在还显得空落的房子。“而且，这里可以看到海。”我向窗外望去，是的，不远就是大海，现在它正在夕阳的余晖里闪烁着彩色的光芒。

当我简单地谈了我的情况以后，她也说到了他们一家这些年来的遭遇，那是白文在信中曾简略地告诉了我的。他们在30年前来到厦门，都在一个专科学校里教音乐。在那场浩劫中，白文被判了20年徒刑，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事实是，白文因为有一点历史问题曾受过审查，“文革”中又因为几件小事被无限上纲成“恶毒攻击”。白文当年50岁，他坐了10年牢，去年复查，这桩冤案平反了，才回到原校继续教书。那些年，舒波作为“反革命家属”，下放到一个山区的中学，工资也降了两级。四个孩子都分别被下放到“广阔天地”去，一家六口人分散在六个不同的地方，依靠着她的一点微薄的收入，度过了那漫长的艰难的岁月。“四人帮”垮台以后，她才回到了厦门，现在已经退休，但还在从事业余的音乐活动。——她平静地，而且常常是微笑着叙述着这一切，还告诉我，孩子们也都先后有了工作岗位。

我无言地听着，心情却不能平静。她的安详和微笑使我不能够深入地看到她的内心。在年轻时，她是活泼、开朗，而又有一点娇弱的。我很难想象，她怎么能够面对那些灾难的岁月，在生活上，而且，在感情上，肩负起那样沉重的担子。

白文回来了。见到我，他没有流露出强烈的喜悦。但我从他的手的紧握中，从他的眼睛的闪光中，理解了他的感情。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总还是又见面了。”

我仔细地端详着他：头发已经花白了，黑瘦的方型的脸，一副宽边眼镜，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话语平静，舒缓，还是有着艺术家的风度。我在他身上只看到了岁月的磨损，而没有感觉到风雨的摧折，这真是有一点令人惊异的。

他又简略地说到了他的情况。说着说着，他的舒缓的语调中渐渐有了一种迫人心弦的感情。

他是在一次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捕的。在这个中等城市中，这当是轰动全城的大事。

“我也被命令去参加了那次公审大会，就坐在台前面。我简直不敢抬头看他。”舒波微笑着说。

我问到白文当时的心情。

“我完全没有想到对我会采取那样大规模的方式。当我被拉到台上时，简直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好像是在做一场恶梦。只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只希望舒波和孩子们没有来参加这次审判大会。我被架着坐‘飞机’，头俯向地面，看着那一滩从我的鼻子和口中流出的血。除了对我的判决书外，我连那样震天的口号似乎都没有听清楚，似乎只是什么遥远的地方有人在呼喊……我回到拘留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一个同监的悄悄地问我判了多少年。我伸出两个指头。那个人说：‘两年？那不算重，你该快出去了，恭喜你呀！’我这才放声哭了。

“在劳改场中，我总怀着一个希望：会突然宣布我是无罪的。我知道这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但又无端相信这是可能的。这一点渺茫的希望帮助我活了下来。另外，我觉得我必须坚持，不应该再为舒波和孩子们增添任何痛苦……在那十年中，像攀登高山一样，我不仰望前面，而只让自己看到面前的那几级石阶，一步一步跨着。跨一步，是一步，过一天，算一天，就这样熬过了三千多天……”

他的声音有一点颤抖，爱笑的舒波也低头沉默着，玩弄着桌上的一根火柴。我看看窗外，暮色已落了下来。我听到了轻微的涛声，忽然想到了少年时读过的一本小说的第一句话：“外面该是海和夜。”

他们的四个孩子都先后回来了。——说是孩子，其实，两个姑娘都已结婚，自己的家也就在这附近；两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了，大的也结了婚，小的也有了对象。大的女儿怀中还抱着一个不到1岁的婴儿。那显然是这一家的宠儿，大家都抢着抱他。

在年轻人到来后产生的那种欢快的气氛中，我们转换了话题，我问到了那几个青年的情况。他们谈到了他们的苦恼、打算和追求。当我回头看看白文时，他说：“我想好好写几支曲子。”沉吟了一会，他又加上一句：“我想我会比过去写得好一些。”我相信他的话。

很自然的，我们谈到了年轻的时候。他们从音乐学院毕业不久，刚刚结婚，来到四川东部的一座山城，参加了一个小小的演剧队。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他们的。他们演戏（舒波往往是女主角，白文是导演），唱歌（舒波是女高声，白文是指挥），过着动荡、艰苦的生活，密切地注视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并经常梦想着将来，以诗的口吻谈论着将来……

30多年过去了，我们又相聚在一起。即使不说是老人，也已经历了生命中的大部分途程——并不是很平坦的途程。我们也谈到了一些友人的遭遇：死者和疯者。比起来，我们要算是幸运儿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也许只有那些真正经历了动乱，而又偶然相聚在一起的老朋友，才能深切体会到这两句诗的涵义吧。

舒波偶尔谈起，在今年春天，他们全家曾在一次晚会上演出过一个节目：《家庭小合唱》。由于白文和舒波都是学音乐的，他们的几个孩子也都爱好音乐，而且有着相当好的音乐修养。我提出，希望他们全家为我唱几支歌。于是，开始了表演：白文、舒波、两个女儿和大儿子合唱，小儿子拉手风琴伴奏。

这一对经历了长久苦难的伴侣和这几个在动荡中成长的孩子，他们唱着。我凝视着那白发、那刻满了皱纹的脸，和那有着青春光辉的脸。我想起了30多年前在重庆那一场大雷雨中的合唱。我去看望他们，在临江的一座竹屋里谈天时，突然来了暴风雨。舒波走向小窗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在豪放的大雨中，响起了她的嘹亮的歌声。接着，我们，和邻屋中的那些演剧队员，也先后应和着唱了起来。哗哗的雨声和轰响的雷鸣似乎是这青春的歌声的最协调的伴奏。多么遥远了，当年的年轻的大雷雨中的歌手，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劫难后，还是在歌唱着。新一代又成长了起来，也在歌唱，他们在歌声中付与了全部激情，投入了整个生命……

他们唱的是几支我也熟悉的歌曲，然而，我却感到那是新的歌。不，那的确是新的歌，而且，那是一个启示和一个象征。

我听着，在我面前，流逝着岁月的河流，展现着坎坷的人生道路，闪耀着希望的光辉……在歌声中，我经验了少有的激动。而且，不自觉地，也参与了他们的合唱。

外面该是海和——美丽的晨曦……

1981年3月广州

海滨

我要写的只是在海滩上的一点遐想。

今年7月到青岛去旅游——这是我第一次到青岛。在这座三面环海的城市里，我当然要到海边散步。正是夏季，几个浴场中都浸泡着人，闪耀着各种花色的游泳服，岸上也是如织的游客。我很难以宁静的心情去面对海，而我以为，正是要在这种心情中才能领略海的神韵的。到崂山去参观，汽车中途休息。一下车就面对辽阔的大海。海滩上只有几个赤裸着身子在奔跑的小孩。我向海走去。后来脱了鞋袜走在湿润的沙滩上，海浪一阵一阵有节奏地涌来，一直扑向我的双腿。蔚蓝的天空，辉煌的阳光，深绿色的大海，远方有几只小渔船……如此庄严而和谐。回头看看，一个孩子用枯枝在沙滩上画着什么，忽然想到上初中时读过的沈从文的一篇小说《八骏图》，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一位每天到海边散步的女郎用木条在沙滩上写了一句话：“这世界有人不了解海，不知爱海；也有人了解海，不敢爱海。”这是有意留给也是每天黄昏来这里散步的一位年轻的教授看的。所谈的海，其实是指她自己。这是一位淑女对一位绅士的爱情的暗示。当时我不大明了了这句话的真正涵义，只是从字面看去觉得话说得很俏皮，而且产生了一种对海的神秘感，一种梦幻的向往。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现在面对大海想到这句话时，我淡淡地笑了。作为一种爱情的暗示，这句话是颇有一点浪漫气息的，但对于真正的人与海的关系来说，它并不是准确的。不了解海，不知爱海的人是有的吧，而一个真正了解海的人，却不会不敢爱海的，虽然海上多雷雨，多风浪，吞噬过许许多多的人。一个爱海的人，不仅是爱海的辽阔，海上壮丽的日出，海上多彩的黄昏……也爱海上的雷雨和风浪，也许正是在雷雨和风浪中，他们才更体会到海的庄严的；而且，他们也是在同雷雨与风浪的搏斗中，体会到自己的力量。

所以，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一篇文章中说到，在波罗的海旁的一个渔村里，渔夫们在海岛上的一块巨大的圆花岗石上刻上了一行题词：“纪念那些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一位拉脱维亚作家是这样解释这行题词的：“纪念那些征服了海和即将征服海的人。”

当我年少时，曾经很欣赏沈从文书中那位女郎的话，而现在，当我已涉老境，面对大海沉思，我却更能体会渔夫们那一行题词的分量。

老年

一

对于年龄的观念和感受不是那么固定的，甚至是有些奇妙的。至少在我是如此。当我在六七岁时，15岁的少年我觉得已是很大的人了。当我十七八岁时，我把30岁的人看作已进入老年。而现在，我觉得50岁的人是多么年轻，因为我自己已过60岁了。

人当然是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活过来的。但是，当我60岁生日的那一天，我的确有一种惊异之感：我真的已经60岁了吗？怎么会这样快，这样突然呢？曹丕有云：“四十之年，忽焉已至。”过去读这句话只是轻飘飘地带过去了。现在才对“忽焉已至”的含意深有体会，而且还颇有一点感慨，意识到自己已进入老年了。

前两年，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丁玲同志说：“如果我再年轻10岁该多好！”说这话时，她是76岁。我又在另一篇文章里看到，一个80多岁的有名的演员，当他听说另一个演员是60多岁时，就赞叹地说：“一个幸福的年龄！”

那么，当我以羡慕的眼光看着那些比我年轻的人时，还有人正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现在的年龄，在他们眼中，那还是“幸福的年龄”。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又感到欣慰。英国作家萨·毛姆说：“不想过去，更重要的是永恒的现在。”完全不想过去是不可能的吧？！但是，更要珍惜的应该是现在——永远在你面前的现在，永恒的现在。而且，要像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的：“抓住那似水年华，抓住！抓住！”

二

而且，我想到，“老”的概念是不能仅仅从生理学上去看的。

曹禺的剧本《蜕变》，反映的是抗战时期内地某小城中一个医院的情况。那里面作者所歌颂的一个人物梁公仰是正直、果断、生气勃勃的。有一个老年的小公务员问他的年龄，当他得知梁公仰比他更大时，大吃了一惊。梁公仰告知了他一个“不老”的秘密：“当你自己不觉得老的时候，你就不会老！”

“年龄不饶人”当然是一句真理。人进60岁以后，体力、脑力往往就不大如前了，容易得各种老年疾病。所以应该注意保养和锻炼自己的身体。但是，更重要的是精神。一个三四十岁的人，有着好的体质，却可能充满了暮气；有的六七十岁的人，身体可能已不那么健康，精神却还非常年轻。关键在于你的心情，你的思想感情。当你常常感叹自己的老，而避开一些世事一心养老，你就会渐渐真的老了。而当你心中还保留着年轻时的火焰时，你就会永远年轻，即使你已满头白发，步履蹒跚。

有一位有名的老画师在他的画的题款上写着：“年方80”。他的不服老的气概，他的向前看的精神，他的继续前进的雄心，都蕴藏在这“方”字中。这“方”字有千钧之力。

三

因而，我不太喜欢屠格涅夫的题名为《老人》的散文诗，虽然那像他别的散文诗一样，是写得很美的。

我不喜欢的是那里面流露出的沉重凄凉的情绪。他说：

黑暗、沉重的日子到来了……

你自己的疾病，亲人们的痛苦，老年的凄凉和悲哀……

你曾献身过的一切。都一去不复返地在消灭和毁灭了。走的是一条下坡路。

在他眼中的老年是多么暗淡、无望。于是，他说：

那么，你感到憋闷时，请追溯往事。回到自己的记忆中去吧，——在那儿，深深地、深深地，在百思交集的心灵深处，你往日可以理解的生活会重现在你眼前，为你闪耀着光辉，发出自己的芬芳，依然饱孕着新绿和春天的妩媚与力量！

而最后他提出这样的劝告：“但你得小心……可不要朝前看呵，可怜的老人！”

这首散文诗是感人的，因为它是屠格涅夫内心的真诚的表白。屠格涅夫大半生都是在异国度过的，现在自己老了，又多病，而且他的自由主义的幻想也已经破灭。所以他的心情才那样悲凉而沉重。

在我们今天，我想，是应该在精神上比屠格涅夫站得更高的。因为，时代不同，社会也不同了。

当然，一个人年岁大了，他有时不免有为疾病所纠缠的痛苦，有时不免有“来日苦少”的那种悲哀。有时不免容易感觉到精神上的某种寂寞，因而沉缅于青春时期的欢乐的时光，或是回顾自己生命的道路……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就应该提醒自己，不要沉沦于其中而不能自拔。就是屠格涅夫，由于他究竟是一个向往真理、追求真理的人（姑无论他是否找到了真理），在他的晚年，在写《老人》的同一时期，也还写了一些富有生气、对人生充满了向往的散文诗，如我们所熟悉的、歌颂俄国女革命家苏菲娅的《门槛》。

我常常想，对待生命，要有一种哲人的明智：顺乎自然，也就得到了自由，原不必在衰老面前伤感，哀歌。诚然，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即使理智上有所认识，在感情上未必能达到。但是，我们应该争取做到！

梅林在《马克思传》中，是这样说到晚年时的恩格斯的：“他不是那种在温室里很快地开花结果而后再更快地凋谢的早熟的天才，他的青年人的热情，是发自崇高思想的真正不熄的火焰，这火焰温暖着他的老年，正如它曾经燃烧着他的青春一样！”我们当然不是恩格斯那样“早熟的天才”，但是也曾经为“崇高的思想”所鼓舞，并在那样的指引下进行过斗争，因而，我希望那曾经燃烧过我们青春的火焰，还能温暖而且照亮我们的老年。

1983年8月

马背上的水手

有这样一幅照片：我披着风衣，骑在一匹高大的白马上，背景是苍茫的天空和奔流的黄河，显得颇有气势。这是今年4月去郑州黄河游览区旅游时，画家张善平为我拍摄的。当时我就说，要写一篇小文《放马黄河边》。同游的人都笑了。因为我只是租了一匹小马，在黄河的沙滩上小跑了一圈而已。

《三次在马上》，这是几年以前我写的一首小诗的题目。那么，这是第四次在马上了。

第一次是1940年在重庆南岸，当时我是个中学生。在一个星期天，和几个同学各租了一匹马。川马一般都很矮小，不会大跑，但善于爬山路。我们嘻嘻哈哈地沿着南岸的崎岖的山路走了一段。第一次骑马当然很兴奋。我想象着在希腊战场上手执长剑的拜伦，而且默念着他的诗：“在光荣与至善中，我将勇往直前，一无所惧，直到我被阻挡——而没有什么能将我阻挡。”

第二次是1951年春，我作为第一届赴朝鲜慰问团的一名成员到了朝鲜战场上。我和慰问团的另一名成员劳动模范李德心，被派到三八线以南的前沿阵地去。一个夜间（当时我们的行动都只能在夜间），来接我们的战士为我们牵来了一匹马——当然是真正的战马。当时志愿军中的马很少，我感到是太受到照顾了，不大好意思骑。而且，老实说，我也不大敢骑。那匹马就一直由那名战士牵着走。后来来到了一条小河边的开阔地，我忍不住骑上去试了试。战马显然感到驮负在它身上的是一个生手，猛烈地蹦跳了几下。由于我抓紧了缰绳，没有能将我摔下，于是它狂奔而去。来接我们的战士的吆喝没有能止住它。呼呼的风声在我耳边流过。我紧紧地伏在马背上，感到一种飞腾的欢乐，但更多的却是紧张。不仅是怕摔下来——那是碎石地，摔下来是够受的；更怕的是不知道马将把我带入什么地方去，我将脱离了来接我们的战士，迷失在战斗激烈的异国的战场上。来接我们的战士和李德心的惊呼声已听不见了。马还在流星般地奔跑……幸好小河边还有一些运粮的战士，将马拦住了。

第三次是30多年以后，我参加了一个诗人访问团，沿着大兴安岭跑了一些地方，并在黑龙江上航行了3天，又去访问呼伦贝尔草原。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神往已久的大草原，当然是喜悦和兴奋的。当地的牧民们是好客的，除了请我们在帐篷中喝羊奶、吃大块的羊肉外，还将他们放牧的马让我们骑着在辽阔的草原上自由地驰骋。牧民们在一旁照料，马很驯良，而且似乎也是好客的，不紧不慢地奔跑着，使我真正享受到骑马的乐趣。

这三次在马上，加起来也不过一个多小时，真是令人发笑的。但我却为之写了一首诗，那是因为这对于我颇有一点象征意义：第一次在马上时是一个中学生，满怀朝气和向往；第二次在马上，我已是一个青年，而且是在战场上——对于我，那更意味着是人生的战场；第三次在马上，是在我经历了坎坷的险道、绝望的深渊，穿越了20多年的艰难的岁月以后，终于面对在阳光下的浩瀚的大草原。

而这一次在黄河游览区骑马，已是在我逐渐进入老境之时，说是豪情不减当年未免浮夸，说“老夫聊作少年狂”当是可以的吧。

今年秋季，我去岳阳旅游，带着两岁多的小孙子浩浩又骑了一次马，开始他很紧张、害怕，但跑了两圈后他就乐得大叫了。我想，以后我骑马的机会恐怕很少了。让他成长以后放马驰骋吧。

美国作家欧文·斯通写有一本杰克·伦敦的传记，书名是《马背上的水

手》，有的朋友称我为“老水手”，那么，我借用这本书名作为本文的题目。

1992年7月10日改旧稿

七星剑

今年夏天到西安，随朋友逛旅游商店，看到有宝剑出售。怦然心动，想买一支。店员取了几支来看，都不满意。然而，从此要买一支宝剑的念头就常常在我心中浮起。

我要买这样一支剑：剑长3尺有余，剑柄是古铜色，挂着一缕红色的丝须，黑色剑鞘上直缀着七颗闪闪发亮的星星。拔剑出来，寒光逼人——我想的是近60年前曾有过的那一支“七星剑”。

在汉口市一中念一年级时，经过了几次选拔，学校派我参加全市中学演讲比赛，居然得了第一名。所得的奖品就是这样的一支七星剑。在大会上为我授奖者名叫陈泮岭。不记得他当时是一位什么官员，但记得他是国术的热心的倡导者。

我洋洋得意地背着宝剑回家。全家人当然欢喜不尽。传观一过后，那支宝剑就由母亲悬挂在床前。她再三告诫不准我动它。虽然那剑并未开口，她还是怕我不小心伤了别人或伤了自己。但我有时还是偷偷地站在椅子上取将下来把玩、舞弄一番。在闪闪的剑光中有过少年人的一些遐想：仗剑远游，闯荡江湖，路遇不平，拔刀相助……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沦陷前，为了继续求学，我只身去了重庆。母亲则随祖父祖母及二叔三叔等逃难到广西的灵川县。在母亲携带的少量衣物中，就有这支七星剑。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在国民党军队湘桂大撤退中，祖父带着家人又一次仓皇逃难。搭不上车（也搭不起车吧），一路都是步行。在惊慌、混乱的气氛中，在如潮的人流中，一家人被冲散了。母亲还幸得和二叔、二婶在一起。她原来身体就不好，途中风餐露宿，再加之焦虑不安，终于病倒了。她原是想到重庆找我的。我也一直焦虑地期望着她的到来。但她拖到了贵州省都匀境内，实在无力走动了。当时又风传敌骑即至。她不愿拖累二叔、二婶，就让他们先走，并拿出一只戒指让他们转交我。她一个人倚坐在一面破墙边，以后就没有了下落，当时母亲留在身边的就只有这支七星剑。

母亲是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到我家的，几年以后就被我的父亲遗弃，跟着祖父生活。她当时还不过二五六岁。我是她唯一的寄托和安慰，我16岁时就与她辞别。阔别六年后，在那样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她凭着那一双包过的小脚想跋涉千里来到我身边，却未能如愿。在那样一种悲惨的情况下，从人间消失，只有那一支七星剑——儿子的一件奖品陪伴她。母亲远去，我不知那支七星剑流落何方。我写过一篇长文和两首诗纪念母亲。而想买一支七星剑也用以来悬挂在床前的念头是最近才偶然引起的，却久久浮沉在心间。母亲逝去将近50年了。我知道她姓段，却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也许我真的逐渐进入老境了，所以有时难免有怀旧之情，我当是想通过一件实物来寄寓我的怀念。而且，那也会引起我对如梦的少年时代的一些回忆。只是，岁月如流，万事皆变，我能在哪里买到一支像当年那样的七星剑呢？！

南斯拉夫散记 在斯特鲁卡国际诗会上

斯特鲁卡国际诗会是在一个美好的季节：每年夏末秋初，在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一个美丽的小城斯特鲁卡举行。

这个一年一度的诗会是从 1961 年开始的，为的是纪念马其顿爱国诗人康士坦丁·米勒丁诺夫和迪米塔尔·米勒丁诺夫兄弟逝世 100 周年。他们为了使祖国从异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曾经英勇地战斗，后来在监狱里慷慨就义。在诗会上，每一年都要朗诵他们的诗。浩淼的蓝色的奥赫里德湖，在他们的歌声中轻轻波动，如同跳动着的心。而斯特鲁卡，这个诗人怀念着的小城，是早已在灿烂的阳光的照耀下了。

为人民而歌唱、为自由而战斗、为理想而献身的诗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们活在人民的心中，活在他们自己的歌中。

“桥上诗会”是斯特鲁卡诗会的一个主要项目。

德里姆河穿过斯特鲁卡，河身不宽，大约 20 米的样子。一座朗诵台就搭在德里姆河桥上。夜色降临了，远远看去，在强烈的聚光灯的照耀下的朗诵台，像一颗巨大的闪光的神珠。河两岸的树丛中，闪烁着彩色的小灯。

首先是放花炮，五颜六色的火焰的花朵在深蓝色的夜空开放。那是象征着诗：诗像火焰那样灼人，那样美丽，那样燃烧着人的心。那也是诗人的象征：诗人的心中永远燃烧着火焰，诗人是人类的花朵。

于是，朗诵开始了。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诗人们，来自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诗人们，各自朗诵着自己最心爱的作品。他们用的语言是各异的，然而那都是心中的歌。诗的内容是各异的，然而共同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将来的向往。

沿着河的两岸，挤满了听众。这个小城的两万居民：那些青年，那些老人和那些孩子，似乎都拥到这里来了。他们安静地倾听着。这个国际诗歌节也是他们的节日。他们在这个小城里倾听着世界各地的歌声。

诗会每一年都有一个讨论的中心题目。前两次是：“诗能做什么？”，“诗人先锋队”。今年的题目是：“梦幻与现实之间”。

这是自古以来为许许多多理论家和诗人探讨过的题目，牵涉到诗的作用与意义，也牵涉到诗歌艺术的奥秘。

我听了来自各个国家的诗人的发言。他们从不同角度热情地阐述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我发言的题目是：《诗人的两翼》。

我说：一个从来也没有梦想过、并承担过梦想的痛苦和欢乐的人，不是诗人，也不可能成为诗人。

诗人应该有两翼：一翼紧紧依傍着大地，另一翼伸向高远的青空。诗人凭着这两翼在生活的国土也在艺术的国土飞翔。

梦幻不应该是逃避现实的麻醉剂，不应该是缥缈的乌托邦，它应该通向理想，上升到理想。

在诗会上，结识了许多友人：东道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和来自世界其他各国的。诗会提供了各国诗人结交的机会。在鸡尾酒会上，在大交通车上，在休息厅里，在奥赫里德湖边……相互微笑，就随便地交谈起来了。有时候，有人特地走了过来，问：“你们是来自中国的吗？”于是紧紧地握手。他们

有的是到中国访问过的，诉说着中国留给他们的深刻印象。有的没有到过中国，诉说着他们的向往。我发觉，无论是东道主还是来自其他各国的诗人，对我们的态度都是异常热情的，原因只是在于我们是来自中国。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表达了我们的友谊，了解了他们国家诗歌创作的情况和别的情况。诗人们大都是热情、坦率的，谈话很少那种不必要的客套。仅仅相处几天，仅仅几次谈话，我们已成为朋友了。我们相信，友谊的种子是会开出花朵的。

一个星期的诗会结束了。

人们各自散去，回到黄河边，回到尼罗河边，回到恒河边，回到密西西比河边，回到莱茵河、多瑙河边……

而当然，这些世界上的河都是要汇合到大的海洋中去的。

桥上诗会

不是在沙龙里，不是在大厅里，不是在剧场里，甚至，也不是在广场中，这座歌台是搭在德里姆河桥上——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最大的一项活动“桥上诗会”，就将在这里举行。

斯特鲁卡是座安详的、美丽的小城，面临奥赫里德湖，德里姆河从城中穿过。它是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有名的风景区。对于这座小城的居民们，这个诗会也是他们的节日。几天来，小城的街上就显得热闹、活跃极了。在青石板铺成的两岸沿河大道上，可以看见来自40多个国家的诗人们，三三两两的在初秋的阳光下游步。他们从黄河来，从恒河来，从刚果河来，从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来，从莱茵河来，从多瑙河来……现在他们在德里姆河边走着，兴高采烈地交谈，选择各个风景点照相。在行道树旁，高高飘扬着几十面诗歌节参加国的国旗。

在举行诗会的那天黄昏，在沿河大道上就渐渐聚满了这座城的居民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些妇女还抱着孩子。他们坐在青石的河岸上，坐在河坡的绿草上，后来的就站在岸边，一直顺着河的两岸排过去，排过去……邻近河岸的那些楼房的窗口，也都挤满了人。这座小城的居民们似乎全都参加到这个诗会来了。是的，这也正是他们的节日，一个诗的节日。

夜色缓缓降落。我有意走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去眺望桥上的歌台。在闪烁着繁星的深蓝色的夜幕前，它在聚光灯的照明下显得分外耀眼。河两岸的树丛中闪耀着一颗一颗小小的彩灯。河水潺潺。一切像是在幻梦中。

诗会开始前，放起了焰火。各种色彩的火花伴着一阵阵的欢呼声在夜空开放，组成各种各样流动的图案。

朗诵开始了。坐在台上的来自世界各国的诗人们，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诗人们，一个一个在掌声中走到台前。古代一位罗马的演说家面对咆哮的大海练习演说，而这些诗人们面对奔流的河水朗读自己的诗。通过扩音器，他们的声音在夜空中震荡着，播送到很远，很远。我想，奔流的河水将把他们的声音带到更远，更远，带到全世界的河流汇集的海洋中去。

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从他们饱含激情的声调中，从他们燃烧着的面容上，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心跳。而且，我自以为理解了他们各自的诗的内容：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大地的歌颂；对于自由和独立的渴望；对于美好的将来的追求……

我听到了喊中国和我的名字。一阵掌声将我推到台前。由于我的名字是和我的祖国联在一起，一种庄严的感情从我心中升腾起来，一股暖流涌向我

的全身。在掌声停止后，在深沉的寂静中，面对河水，面对黑魆魆的人群，我朗读着歌唱祖国的诗，用我的全部激情，用我的心。我觉得我是在朗诵给世界听，也是在朗诵给远在万里外的祖国听。

诗会结束了，聚光灯熄灭了，人们渐渐离去了。

我还在沿河大道上徘徊。多么安静的夜，德里姆河潺潺地流着。

我想着一百多年前的马其顿爱国诗人康士坦丁·米勒丁诺夫和迪米塔尔·米勒丁诺夫兄弟。在故国的受难的土地上，他们英勇地战斗着，反抗异族的统治。后来被投进监狱，受尽折磨，从容就义。——一年一度的斯特鲁卡诗会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举行的。迪米塔尔·米勒丁诺夫在铁窗下曾经这样歌唱：

多么希望长起强劲的翅膀，
从这个罪恶的牢居，
飞向祖国南方，
让斯特鲁卡搂着我，
让奥赫里德湖把我的歌声震荡。
灿烂的太阳
可还抚问着我的家乡？

今天，照耀着斯特鲁卡，照耀着马其顿共和国的正是他们所向往的灿烂的太阳。而且，这一对既是诗人又是战士——或者说，正因为他们是诗人，所以他们也是战士——的兄弟，也正以他们的精神的光芒照耀着斯特鲁卡和他们的祖国。在今天的诗会上，就朗读了他们的诗。他们的歌声将永远在奥赫里德湖上震荡……我想，诗人们应该是可以从这中间得到启示，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职责、自己的道路的。

我又想着这个诗会在桥上举行是一个多么好的象征。诗，正是友谊的桥，是人与人的桥，是心与心的桥。要将更多更多的人吸引到诗的身边来，要将更多更多的诗溶化到人的心中去。我要写一首美丽的诗来歌颂“桥上诗会”，而我又想到“桥上诗会”本身就是一首美丽的诗。

奥赫里德城

奥赫里德城当然是因奥赫里德湖而得名的，这座小城就在那片大湖的旁边。这两个奥赫里德都是美丽的。

我们在进入城中心之前，先来到城边的一座不太高的山上，参观一个15世纪的古堡。主楼有10多丈高，环绕着它的是厚厚的城墙，都是用石块垒建起来的。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使它残破了，但还是显得威武而庄严。穿越过古堡的拱门，是一个广场，荒草丛中有一些断垣残垒。没有别的游人。我们的到来使几棵参天老树上的一群乌鸦惊飞起来，在天空盘旋，鼓噪。

从山上的一面望下去，是奥赫里德湖。好一片辽阔的蓝粼粼的水在夕阳下闪动，一直延向地平线。有几座远山隐隐约约地在云雾中。湖上飞着一群水鸟。远处还有几支帆船，似乎静止不动地浮在那里。从眺望的第一眼，我的心就得到了澄清，进入到一幅淡远的图画中，沉浸在一种静穆的境界里……

而从山的另一面望下去，就是奥赫里德城了。丛丛绿树中，一排排造型不同的红瓦白墙的楼房，还有一座古老的教堂。站在古堡前的荒草边向下俯瞰，那里显得多么温暖、安详。

我们来到了小城中，一条主要的小街不过两丈多宽。像我们国家的那些古老的县城、小镇一样，街面是用青石板铺成的。没有车辆行驶。虽然正是黄昏，行人也并不拥挤，他们从容地走着。街两旁的楼房都不过是两三层，下面是商店，在出售一些现代化的商品外，还有好多是经营手饰、工艺品和当地的风景照的。街旁有几个带着小炉子的卖烤包谷的小贩。我很有兴趣地发现，还有一个转糖的小摊，和我小时候在家乡经常去照顾的转糖的小摊差不多。

到这里来过的中国人很少吧，我们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好奇。但他们唯恐我们发现他们是在打量我们，只是悄悄地一瞥。有的人向我们微笑点头。

走了不到 10 分钟，就到了小街的尽头了。我在一棵古老的大树下的石沿上坐下。那里先坐着一位戴着小花帽的黝黑的中年人，在抽着烟。他笑着用简单的英语问我是中国人吗？得到我的答复后，他扔掉了烟，拉起我的手，俯下身来热情地吻着，我还不大会习惯于这样的礼节，而且是这样突然，有些张皇。旁边站着的人都笑了。那个人从口袋里摸出了几张钞票，一手抚胸，说着不清楚的英语，意思是要请我们去喝冷饮。我们当然笑着谢绝了。我给了他一张名片，他珍藏了起来。当我向他告别的时候，他又热情地吻我的手。走开后，同行的莉里娅娜告诉我，他是吉卜赛人。啊，阿乐哥和卡尔曼的后代，我立即想到许多富于浪漫情调的故事。我回头再看看，他还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

小街的另一头是一个广场，中心是一个大的花圃，开满了形形色色的花。广场过去，就是奥赫里德湖了。湖边有几个钓鱼的少年，湖上有几艘游艇。

我站在湖边的矮矮的石墙边，回过身来望着那个在晚照中的小城。这时，响起了晚祷的悠远的钟声，它也在我心中轻轻回荡……

使我心醉的不仅仅是这里的美丽，而且还有那样一种和平、宁静、安详的气氛。我欣赏它，如同欣赏一首古朴的牧歌。

我离开了奥赫里德，那座小小的、美丽的、安详的城，在那里留下了我的一个缥缈的梦……

莉里娅娜

“我是中国人！”一位南斯拉夫诗人带着她来了，她笑着对我们说。

当时，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正在德里姆河边的诗歌宫前一个不太大的广场上举行开幕式。高台上的火炬已经点燃了，火焰在蓝色的夜空中飞腾着。大会的主持人在致词。他说的是马其顿语，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我们站在人群中，周围是来自各国的诗人们，还有很多斯特鲁卡的居民。我们是昨天才飞离北京，在斯科普里过了一夜，今天下午赶到这里的。我有着初次到异国的那种兴奋和激动。但由于语言的隔阂（我们只带了一位英语翻译），也感到了一点落寞，一点茫然。

而这时候，她来了。她笑着说：“我是中国人！”是地道的北京话。她有着黑色的头发，披在娇小的身上的是一件蓝底白花的中国式缎袄（后来她还特地让我们看她穿着的中国布鞋，有一只上面已破了一个小洞）。但是，在朦胧的夜色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外国姑娘的脸。大概是看到了我们困惑的神情，她又笑了。她说她是南斯拉夫人，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了两年，还没有毕业，是放暑假回国的。她的家在马其顿共和国的首府斯科普里，听说有中国代表团参加诗会，特地赶来看看我们的。

“我叫莉里娅娜。”

我感到分外的喜悦和亲切，忽然想到了那句旧诗：“他乡遇故知。”虽然这完全不贴切，她并不是我们的“故知”。但是，我们是在远离祖国两万里外遇到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外国姑娘，而且，她又是这样的热情。

我和我的三个同伴与她交谈了起来。她也显得喜悦、兴奋，完全没有初次相识（而且，我们究竟是不同国籍的人）的那种客套和矜持，立刻就成了我们的朋友。开幕式结束以后，我们一道走进诗歌宫参加诗会的第一次文学晚会。她很自然地成了我们中间的一员，除了她回家的4天以外，陪伴着我们参加了一切活动，担当我们的翻译和联络员，一直到最后，和我们同机回国。因为，暑假已经结束，北京语言学院秋季开学了。

几天以后，她告诉我们，她原准备只看看我们，玩一两天就回家的。但是，“一和你们说话，我就喜欢你们了，真的，我太喜欢你们了，所以我不走了。”

她还是一个20岁的姑娘，就是我们中间最小的小王，也比她大6岁。而我、流沙河、江承栋，都是她父辈的人。我们对她很热情，很诚恳，这当是她喜欢我们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出之于她对中国的感情吧。她不是诗会的工作人员，在开诗会的那几天中，她不能在我国的饭店里住宿，而是借住在朋友家，深夜去，早晨来；也不能和我们一道吃饭，而是到外面的小餐馆会随便吃一点什么。有时无暇出去，就饿一顿。她的更大的牺牲，是她不能回家陪伴父母。在中国学习，她只能在暑假中回家一次。她是独生女，父母苦苦地盼望了一年，当然是希望她留在身边的，而她自己又何尝不依恋父母呢！但是，她却将一段宝贵的假日花在我们身上了，只是每天晚上和家里通一次长途电话。她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陪伴我们、为我们工作，看作是她的义务。当我们有几次向她表示感激时，她说：“何必说这些，我也是中国人啦！”

像她喜欢我们那样，我们也很喜欢她，不，应该是更喜欢她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需要她，通过她的翻译，解决了我们许多交往上的困难，也由于她的性格：热情、坦率、朝气蓬勃，是一个有头脑、有抱负的姑娘。我们平常大都是随随便便地交谈，有时彼此开开玩笑。但也有过两次严肃的谈话，谈到南斯拉夫在风暴和斗争中度过的岁月和它的现实，谈到南斯拉夫青年们的思想和生活，谈到她对中国的观感……大都是我们提出问题，她回答。她的回答是坦率、诚恳的，而且是那样的激动，强烈地流露出感情。她还年轻，一直还没有走出学校的大门。然而，她的知识相当丰富，她的理解力敏锐，有时是深刻的，使我不能不带着惊异的眼光看她。她似乎已经成熟，就她的年龄说，是过于成熟了。她告诉我，她不喜欢那些只讲究化妆、衣着，只关心自己的幸福的姑娘们。但我为她过早地跨越过少女的单纯、美丽、带着梦幻色彩的心境而感到……怎么说呢，感到有点惋惜吧。她说，她理解我的意思，然而，她愿意如此。她谈到理想，谈到她自己的前途，她要为她的祖国、为这个世界、为人类的幸福，奉献自己的力量——一只小鹰望着辽阔的天空在拍击着翅膀，她会飞得很高的，她会飞的。

她是有语言天才的。她是马其顿人，也会说塞尔维亚语（那和马其顿语很有差异）。在中学里学会了英语，能流利地会话。她在中国留学两年，学会了两种语言。中国话说得很不错，包括一些土话。她说她不喜欢抽中国烟：

“太冲了。”她形容一个人的风度：“他很帅。”当我们称赞她美丽的时候，她说：“不要阿谀奉承我。”有一次，她笑着问小王：“你也得了‘气管炎’（妻管严）吧。”她在中国的同学中，有一个是墨西哥人，他们经常在一起，她从他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

大会原指定了一位会说英语的南斯拉夫的女同志照料我们的，她出现后，就代替了那位女同志，经常陪伴着我们。但那些来自南美洲的诗人们，来自西班牙的诗人们，以及来自其他各国的诗人们，也常常要请她帮忙翻译或为别的事麻烦她。当她走动时，常常被某个代表拦住。有时她正在与人谈话，有人就在旁边守候着。而她看到某个代表需要翻译上的帮助，也会主动地跑过去。她几乎成为大会中最忙碌的工作人员之一了。她不得不经常对我们说：“对不起，请等一会儿。”就匆匆忙忙走了。有几天，她伤风感冒，头痛，但她还是忙着，唱着，笑着。

她喜欢唱中国的民歌，口中常常哼着“半个月亮爬上来……”、“跑马溜溜的山上……”。她还会唱两句京戏：“苏三离了洪洞县……”，居然还有那么一点韵味，使我们大笑着拍手叫好。不过，她就会那两句。她也喜欢跳舞。有一天，我们住宿在德多夫城附近的一座高山上的饭店中。山上居民很少。由于这是欧洲著名的滑雪胜地之一，那饭店的规模不小，设备现代化，建筑格式却又带一点乡村风味。晚上刮起了大风，落着雨。从窗口望出去，夜色茫茫，这就更显得室内的温暖。餐厅里坐满了客人，喝着啤酒和冷饮。一个男歌手在5个人的乐队的伴奏下放声唱着马其顿民歌，歌声高亢，欢乐而又略带苍凉。有几位南斯拉夫客人跳起了民间舞，后来更多的人（包括外国客人）都参与了进去。莉里娅娜正患感冒，她站起来走了。我以为她回房休息。不一会，她穿了一套漂亮的连衣裙，笑嘻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好看吗？”一转身，她也卷入到舞蹈的行列中去了。她跳着，笑着，唱着，于是，我看到了一个快乐的小姑娘莉里娅娜。后来，我也被她拉进了舞蹈的人群中，我觉得，我也年轻了。但是，我常常没有能够合上节拍，不得不退了出来。

在离开南斯拉夫的前两天，她说：“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你们的。”她说：“这次认识你们，会影响我一生。”她要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她认为我们可以给她具体的帮助。她说：“如果回到中国以后，你们不理我，我，我……就要天天骂死你们。”

而我们当然也会记得她的。在南斯拉夫的两个星期是难忘的，而她的出现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回国的前夜，在为我们举办的一个文学晚会上，我向热情的主人们告别，最后我说：“没有莉里娅娜，在许多场合，我们就将是聋子和哑巴。”事实上的确如此。而且，她也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带来了温暖和增加了色彩。——是的，我们会永远记住她的。只要她需要，我们也会帮助她的，一如她帮助我们那样。

她和我们同机回国了。南斯拉夫作家协会委托她和一些中国作家联系。她将作为中国作家和南斯拉夫作家之间的一座桥。

她也将是南斯拉夫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一座桥吧。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当她与我们分手半天或一天后再见时，她就笑着这样说。这句话，她是从我们这里学去的。而现在，我已整整一个月没有见到她了。

波芭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机场下飞机后，我对来迎接的一位南斯拉夫的女同志说：“你是波芭吧？”她微笑着点点头，同时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那意思是：“你怎么知道的？”

在这次出国前，近几年访问过南斯拉夫的几位友人向我介绍情况时，都用赞扬的语气谈到了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波芭，说她对中国客人是非常热情的。

现在她就站在我们面前，美丽而端庄。后来我才知道，她已是两个女孩的母亲，大女孩已有15岁了，而她依然显得那么年轻。她的明亮的蓝色的眼睛含着笑意。

在走出机场的路上，她向我们问到了邹荻帆、邵燕祥、骆文这些她接待过的中国诗人的近况。她的询问并不是礼节性的，而是出于一种真实的关切。

她送我们到塞尔维亚饭店，陪我们喝下一点冷饮，安排了我们活动的日程。为了要赶上第二天就要举行的斯特鲁卡诗歌节的开幕式，我们当晚就要赶到斯科比，她又送我们到机场。和她只相处了两三个小时，她已留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虽然接待过许许多多外国客人，而她的热情里却一点没有矫揉，她是诚恳、亲切的。而且我感到，在她的西方的外表下面，有着一一种东方人的气质：文静、含蓄。

几天后，我们再返贝尔格莱德时，又是她到机场来接我们。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为我们举行的两次座谈会和一次宴会，她都参加了。她微笑地坐在那里，不大发言，有时用英语为我们翻译。只是在她陪我们参观贝尔格莱德市容的那一天，我们才得到了从容谈天的机会。

那是一个阴天。她带着10岁的小女儿伊琳娜到我们住的饭店来了。一见面，那女孩用中国话对我们说“你们好！”当我们送了她一点从北京带去的小礼物时，她又用中国话说：“谢谢！”我们都高兴地笑了。波芭要我们注意，那女孩有一双中国式的黑色眼睛。她告诉我们，那女孩喜欢中国人，正在学说中国话，所以带她来看看我们。

波芭没有开车来，我们是步行出去的。中途落起了雨。她犹豫了一下后提出，她父亲的家就在附近，问我们愿不愿意去稍坐。在与她父亲的交谈中，我们得知他是老游击队员，曾经担任过南斯拉夫共和国的教育、文化部长。那么，用我们的话来说，波芭也是“高干”子女了。雨住后，她领我们参观了贝尔格莱德最大的公园、古堡和一座古老的教堂。这些地方，她当然不知来过多少次，不知为外国客人作过多少次介绍的。但她还是耐心地、细致地解答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而且经常主动地为我们讲解。同时，我们也像朋友式地交谈。小伊琳娜还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什么果子送给我。波芭说，南斯拉夫人认为，将这样的果子放在枕头下面，睡觉就可以香甜。小伊琳娜有两颗这样的果子，一颗送给祖母了，她希望这另一颗也能为我带来香甜的梦。我要波芭转告小伊琳娜，我相信那果子的神妙的作用，而我在香甜的梦中会梦见她的。当波芭俯下身子翻译我的话时，我看到小伊琳娜那双中国式的黑色的眼睛亮了起来，她转过身来牵着我的手笑着说什么。波芭转告我，她说她也会在梦中梦见你的。

走得很累，也有些饿了。波芭引我们到一家饭店去吃午饭。那饭店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是一座有乡村风味的古老平房。店堂不大，只放了六七张餐桌。店子的招牌上只有一个大的“？”号。我问波芭，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店名。她说，这家饭店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是作家们经常喜

欢光顾的地方。店名用了一个“？”号，恐怕是想表明作家对于人生的探索精神吧。不过，当初为饭店命名的主人也许另有他的深意。对于我们，这也只能是一个大的“？”号，说着我们都笑起来了。

我们边吃边谈，接触到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她的话不多，但说得很中肯。她也不满意一些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的轻率态度，她说应该有真挚的感情，应该有“人情味”。她说，人的美，主要是在内心，而不是衣着；当然，衣着也不应该太随便。我注意到，她的衣服是很普通的料子，但整洁，大方。她谈了一些过去的经历，说她在大学是学美术的，现在从事外事工作，是学非所用。我说，这也是用她的另一面的所长吧。她能流利地说英语、法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我问她：“想不想学中文？”她说：“当然想。但中文很难，要学好，必须集中好几年的时间。而现在很忙，不可能。”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只有她一个人，来访的外国客人很多，接待工作是够繁重的。而且她还在自修，准备攻考“美术史”的硕士学位。她说，很想到中国去旅行，那已是多年的愿望了。不仅因为她知道中国是古老的、美丽的国家，是在斗争的风暴中成长起来的走着自己的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因为那里有着敦煌、龙门石窟、兵马俑……这许许多多的文化遗迹，都是与她的专业有关的。我说，中国作家协会已经向她发出邀请。她说，是的，现在正在积蓄路费，那要好大一笔钱呢。我冒昧地问，不能要她的父亲给予帮助么？她微笑着说：“父亲是可以也愿意帮助我的，但我觉得主要应该靠自己。我现在尽可能节省地生活。”

我们是在一个深夜离开贝尔格莱德的。她来送行。仅仅几天的相处，我们已经是真正的朋友了。她忙碌地为我们张罗着一些出境的事务，后来安静地在我们身边坐着，明亮的蓝色眼睛中含着笑意。是不是也感到有一些黯然呢，临上飞机前，她握着我的手轻声地说：“我好多次在这里送别中国的朋友，你们每一个人走，都带走我的心的一部分。”

我说：“那么你的心差不多已整个在中国了。我们等着你的人来。”

是的，我们——到南斯拉夫去访问过的中国作家们，都等着你来，波芭。我们会像你接待我们那样热情地接待你，我们将像你引导我们参观你们的河山那样，引导你来参观我们的大地，你所向往的大地。

一个老游击队员

那一次的拜访完全是意外的。

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波芭陪着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游览。飘起了雨，而且愈落愈大了。我们没有乘车出来，不得不在商店的走廊下暂避。看来，雨一时还不会停。波芭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我们，愿不愿意到她父亲家去坐坐，就在附近。她又加了一句：“他是老游击队员。”

老游击队员？那太好了。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岁月里，我们就听到过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许多传奇般的故事。我们也知道，现在还健在的老战士已经不多了，他们是很受南斯拉夫人民尊敬的。我们当然很高兴有机会和一位老游击队员谈一谈。冒着雨走过一条街，走上了一座公寓大楼的第三层。为我们开门的是一位头发已经花白、胖胖的老妇人。她开始是惊讶地看着我们。当波芭向她说了几句后，她张开了双臂，笑容满面地请我们进房。

我们在客厅里围着长桌坐下。当那位老妇人——波芭的母亲进厨房去为我们张罗着什么的时候，我打量着并不太大的房间。壁上挂着几幅油画。家

具并不很多，都是乌木色的，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大的玻璃橱柜，里面放满了式样不一、风格各异的工艺品，显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整个房间显得典雅、庄重，使我能想象主人的性格。

波芭的父亲从另一间房中出来了。身材高大、挺直，穿着米黄色的毛衣，也是花白的头发，红光满面，两眼有神。他微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说着欢迎的话。

谈话从一般的相互问候开始，渐渐就转入生动、热烈了。波芭的父亲说塞尔维亚语，由波芭翻译成英语，再由我们的翻译小王同志翻译成汉语。双重翻译并没有妨碍我们感情的交流。有时候，塞尔维亚语、英语、汉语同时在进行，反而显得更热闹一些。初次见面，而且我们是来自遥远的另一个国家，这也并没有影响我们以诚相见。主人倒正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特别热情。在谈话中，我们时而大笑，时而叹息，时而沉思……完全忘记了我们不过是闯进来躲雨的，没有注意到窗外哗哗的雨声。

那个老游击队员向我们谈到他是在农村度过贫困的童年的。当法西斯的铁蹄踏入国土后，他就参加了铁托领导的游击队，从一个普通的战士逐步成长为一名指挥员，经历过许许多多艰苦的战斗。他说，当年一些战斗的场面，一些牺牲了的同志的面影，还常常浮现在眼前。

波芭的母亲几次为我们送来了咖啡和冷饮。她还再三向我们道歉，说不知道我们要来，没有能好好招待远道的客人。波芭的父亲对我们说，她当年也是游击队员，他们就是在游击队中相识、相爱、结婚的。他们并肩作战，而当他们有了孩子以后，她还要从事繁忙的家务。他们共同生活 40 多年了，从来没有过争吵。他显然深爱他的妻子，并以有这样一个终生伴侣而自豪。我以尊敬的眼光看着这位笑嘻嘻地站在我们面前的和蔼、慈祥的老妇人，我没有想到，她当年也是活跃于山林、在炮火中出生入死的战士。

而我也没有想到，波芭的父亲是南斯拉夫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任教育、文化部长。波芭事先没有向我们谈起，他也只是谈话中不经意在顺便谈到的。他说，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用 40 年的时间，完成了过去要两三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这是值得自豪的。但是，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他特别着重地谈到国家如何为消除官僚主义危害所作的努力。他说，当年自己担任教育、文化部长时还年轻，只有 25 岁。手中有了权力，生活条件优越了，经常可以听到一些阿谀奉承的话，这样就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逐渐地，他对这一点有了深切的体会。他说，像金钱一样，权力也是可以腐蚀人的。作为一个领导人，必须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要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说，目前南斯拉夫正在采取各种方法克服和改善某些不合理、不健康的现象。在这当中，文学艺术也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说，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伟大的也是艰难的任务，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奉献自己的力量。现在，他 67 岁，已退休好几年了。但并没有闲着。他经常到工厂、农村、学校去为青年们作报告。他还积极从事写作，已出版了 12 本书。说着，他走进另一间房里去，取了一本他的著作送给我，书名是《这一代的信息》。叙述的是老游击队员们当年的战斗生活，他们的信念和理想。他希望将他们一代的信息传达到年轻一代中去。

这位老战士的某些话，是发人深省的。而他在简短的谈话中，几乎回顾了他的一生：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游击战士，一个政府的高级领导人，而现在，他又是一位作家。他永远在他的岗位上。他是和他的祖国一道受难，

一道斗争，一道成长的。他已老了，但是，社会主义的祖国还年轻；他已老了，但是，他还在勤恳地工作，为社会主义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而且，他还把期望的目光投向年轻的一代，通过他们遥望祖国的将来。

坐在这间庄重、典雅的房间里，面对着这位在精神上还显得年轻的老战士，听着他的恳切的谈话，我想得很多。我又一次认识到，在生活中，斗争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有着不同的方式。而人的自我要求是永远也不应该停止的，应该达到每一个时期所能达到的高度。我看看同在座的流沙河、汪承栋、王宏杰，他们也都在沉思。波芭是为我们担当翻译的，她讲话也有一点激动。而坐在一旁的波芭的母亲，不断地点着头，有一次，我看到她悄悄地揩了揩眼角。这位老战士显然也回想起了那些火热的斗争岁月。

波芭的父亲似乎感到气氛太严肃了，他转换了话题，邀请我们参观了他的书房，又和我们一道照了几张相。我和他们夫妇合照了一张相。他笑着说：“不行，我吃亏了。明年，要把你的夫人也请到我们国家来，我也要和你合照一张相。”他还说了几句打趣的话，我们都大笑了。

看看表，我才发觉已经坐了两个多小时，而窗外，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住了。

印度诗人“阿盖”

神来了
在这呼啸的风中。

谢谢你，神，
感谢你的来访不拘礼节：
非常欢迎你。

有朝一日，
我也将来访，
同样不期而至：
甚至是
默默无声地来临。

这首诗的题目是：《上帝，谢谢你》。作者是当代印度诗人萨琪达南德·希拉南德·瓦茨雅彦“阿盖”（Sachchidanand Hiranand Watsyayan ‘Agyey’），他是这一届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金环奖”的获得者，是诗歌节的各种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穿着印度式的灰色的长袍，身材高大，挺直，银白的头发已经稀疏了，沿着下颚，有着半环白须。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在银边的眼镜后面，是一双智慧和慈祥的眼睛。看到他，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泰戈尔。

颁发“金环奖”的仪式在奥赫里德城的圣·索菲教堂里举行。教堂并不大，古色斑斓，保持着几百年以前的那种风格。在这座古老的教堂里举行颁奖仪式，是有着一种特别庄严的气氛，而且，与那位得奖的老诗人的风貌和气质是和谐的。诗人作了诚挚的激情的发言，并朗读了自己的诗。另外，由演员朗读了他的诗和演唱了为他的诗所谱写的歌曲。

在诗会开幕第一天的鸡尾酒会上，我就和他进行了交谈。我问到他的年

龄。“您看呢？”他带着幽默的微笑反问我，接着说：“我已经过了70了。”但他的精力是旺盛的，诗会的各种活动他都出席了，而且必须接待许多来访的人。他的态度总是那样诚恳、彬彬有礼的。我说不清他的身上是什么吸引了我：是他的东方人的气质？是诗人的风度？是哲人的深沉？我很想和他谈谈，但又感到不便打扰他。后来有了这样一次机会：在贝尔格莱德，诗人彼得洛夫请我们到他家去作客。我们去了以后，看到阿盖也是被邀请的客人。另外，还有几个南斯拉夫的诗人、编辑、出版家。我们都挤坐在别有风味的阁楼上，那是彼得洛夫的书房也是接待室，大家谈笑风生，我和阿盖虽然是促膝而坐，却很难进行个别的交谈。他只是告诉我，明天就要到英国去，几周以后，还要到西德，一时不可能返回印度。他说，他到过许多国家，却没有到过中国，而那是他久已向往的。

根据文字介绍，我知道他已出版了10本诗选和关于诗的书。他还是小说、散文作家，也是出版家、编辑和翻译家。半个世纪以来，阿盖已成为印地诗歌最重要、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但是，在我国似乎还没有介绍过，至少，我没有看到。

“阿盖”的原文含意是“不可理解的人”、“不可捉摸的人”，那是带着一点神秘性的。有一篇评论文字，说他是“一个不安的灵魂，一个火热的开拓者，一个坚定的创新者，一位不断接触新的事物的作家，他一只耳朵倾听着来自未知王国的呼声，另一只耳朵倾听着他自己的话语——或者更准确地说——倾听着他自己的无语的沉默”。我手头有他的一本诗选集，其中绝大部分是印地语，只有14首诗是用英语写的。从这14篇中，大致可以看出他的风格。他的诗带着一点“纯诗”的倾向，带着一种哲学式的沉思，带着一点朦朦胧胧的美。然而，仔细地读一下，就可以看出，诗人并不是那样宁静的，在表面的淡泊下，跳动着一颗挚爱生活的心。在前面，我们引了他的一首诗，表达了他的超然的生死观，和与大自然溶合为一的胸襟，下面我们再引一首诗，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态度：

宣言

爱这朵花吧，
但它要枯萎时就让它枯萎；
对你生活中的一切，
用你整个生命来品尝，
但要死去的，就让它死去。
年龄是游泳者的手臂；
任何要活下去的人游过去。
鲜花盛开时充满的只是喜悦，而不是欲望；我，一个走向湮灭的人愿把这一点宣讲。

1983年

杜伊斯堡印象

我是在早晨 8 点半钟到达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城的。这里在冬季经常是灰濛濛的天气。但这个早晨却有着淡淡的阳光。

从香港起飞，在曼谷转机，前后经过了 16 个小时的飞行。在 300 多旅客中，我是唯一的中国人。我有些劳累，也有着一个人在旅途上的那种紧张和陌生感。所以，当我提着行李走出机场，看到来迎接我的联邦德国友人克拉特先生时，我感到了轻松和欢欣。他也满面笑容。我们欢呼着拥抱了。

他自己驾车接我到他家去。他住在杜伊斯堡市。那是武汉市的友好城市。

在高速公路上跑了不过 20 分钟，克拉特先生告诉我，已经进入杜伊斯堡了。我一面和他简短地交谈，一面望向车外。马路并不十分宽阔，在两旁高大的行道树后面，闪过了一座又一座两层楼、三层楼的小洋房，式样和色彩都是不相同的。大街上奔驰着车辆，却几乎看不到行人。电车和公共汽车上，乘客也稀稀落落。我知道杜伊斯堡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我看到的是一个宁静安详的城，甚至近乎田园风光。

当我到达克拉特先生的家时，就更加深了我的这一感觉。

克拉特先生的家在六湖公园旁边。他新建的宽大的玻璃温室里布满了鲜花和盆景。一张小圆桌的桌面当中挖了一个洞，插着一把直径有一米半的中国式黄纸伞。我们就坐在纸伞下的圆桌旁进早餐。天已大亮了，还点着两支红烛。在烛光的摇曳中，我望向室外那一片静谧的深蓝色的湖水，和在湖上安详地游着的几只白天鹅，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和旅途的劳顿。

后来，我也参观了杜伊斯堡的工业区：一个又一个高矗入云的烟囱，一排又一排巨大的厂房。这里是欧洲钢铁产量最大的地区。我也参观了码头，鲁尔河和莱茵河在这里汇合，如同武汉的长江和汉水；一条又一条人工河道，一艘又一艘巨大的船舶。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口——它们显示了这个城市雄伟的一面。

但我总还是不能摆脱我最初的印象：这是一座安详美丽的城。很少高层的建筑，没有我惯见的城市的喧闹，大街上的行人远不及汽车多。式样和色彩各异的住房的大玻璃窗的窗口，都布置着鲜花。后来，我发觉，我所到过的每一个人家中，都是装饰着鲜花的。鲜花商店即使在较僻静的街道都可以看到。

当然，这里也有热闹的市中心区，那在火车站附近，集中着各种规模宏大的商店。我是在圣诞前几天到达的，那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人行道的两旁布满了临时搭起来的小售货亭，出售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玩具，色彩斑斓。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吃，飘荡着诱人的香味。拥挤的人流，一片嗡嗡声中夹杂着儿童的笑叫声。在人群中，还有一个化好妆的圣诞老人。当他知道我是来自友好城市武汉时，高兴得叫了一声，紧紧地抱住了我。

在克利斯市长接见我时，在答谢致词中，我说：“我看见了在圣诞树的华灯照耀下的杜伊斯堡，我看见了在圣诞树下欢笑的杜伊斯堡人民。”我说的是真实的感受。而从克利斯市长，从那个圣诞老人，也从新结识的朋友们（我曾到十几家做客，其中有工程师、教员、大学校长，也有火车司机、女清洁工）对我的热情接待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人民、对友好城市武汉的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诚挚的情谊。

我离开杜伊斯堡的那一天，是一个难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乘坐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急驰。我想，大概很难有机会再来了，但这个安详美丽的城

市和主人情的情谊，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1989年2月16日晨

梦的巴黎

—

巴黎在我是一个梦。

——一个遥远的梦。一个缥缈的梦。一个色彩斑斓的梦。

二

像许多人一样，我是从历史书籍和文学艺术作品中认识巴黎和爱上巴黎的。

从少年时起，一些有关巴黎的史实和以巴黎为场景的各类艺术创作就逐渐吸引了我。我也读过一些巴黎游记。

1789年在巴黎爆发的大革命，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使世界开始了新的行程。它的光华一直照耀到现在。两百年来，在巴黎曾发生过多少壮丽的事件，多少传奇般惊心动魄或是悲欢离合的故事，涌现过多少名人！而多少文学艺术家又从中吸取了素材，激发了灵感！

从历史和艺术中，也从游记中，我感到巴黎像是一个多棱角的水晶体，每一个人从每一个侧面和每一个角度来看她都是不同的：庄严而又轻佻，辉煌而又阴暗，欢乐而又忧郁，是花都也是渊薮……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比她更神秘，更富于浪漫色彩，有着更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了。

各种事件、各种人物、各种印象逐渐聚集起来，溶合在一起，我甚至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这形成了一种神秘感，一种魅力，激发了我的好奇和向往之情。

三

关于巴黎，有过一次难忘的谈话。

那是在“浩劫”时期，我的住所当然是在“牛棚”里。有一天，我发现老诗人徐迟也被关到我所在的单位来了。不过没有和这里的“牛鬼蛇神”关在一起，而是在一个单间中。我有时在走道上碰到他，相互只能暗暗地点点头，做一个眼色而已。

有一个下午，我们却谈了一次天，而且谈了两个多小时。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我已回想不起怎么可能有了那样的机会。也许是由于斗争高潮已过，所以看管放松了一些。谈话是在一间空阔的大房进行的。旁边还坐着一位监管我们的“小将”。当然不可能敞开心来谈。但是，从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所涉及的内容已大大“越线”了。

我表示很喜欢他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那在当时是当作“毒草”的。谈到了我们未可乐观的将来，他说了一句使我敬佩的话：“我准备过任何生活。我能够过任何生活。”谈到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而谈得最多的是巴黎。那时他也没有去过巴黎，却熟悉巴黎的种种，甚至可以画出这座城市的地图。

我们谈到了有关巴黎的历史和有关的文学作品，愈谈愈高兴。我有时瞟眼看看那位“小将”，他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毫无干涉的意思。

最后，我问了徐迟一句：“你喜欢的是巴尔扎克、雨果、波特莱尔的巴黎么？”

“不！”他说：“我喜欢的是建立了第一个公社的巴黎。”

我们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最痛苦难堪的处境下面，却怀着激情谈到一座遥远的城市。

10年后，徐迟终于有机会到那座城市去了，回国后，写下了一本美丽的书：《法国——一个春天的旅行》。

而巴黎在我仍是一个遥远缥缈的梦。

四

没有想到，在将近又一个10年后，我也到了巴黎，虽然只停留了两三天。

我是乘到联邦德国访问之便，抽空去巴黎的。梦想将变成现实，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当旅游车穿过比利时进入法国后，我有如童年时第一次去参加夏令营那样兴奋、喜悦。呵，巴黎，终于要看到你了。旅游车上的收音机播放着轻快的音乐，司机笑着大声说：“巴黎到了！”我惊喜地望向车窗外，看两旁的高楼，五光十色的橱窗，熙攘的人群……一到旅社，放下简单的行包后，不顾坐长途车后的疲劳，我和陪伴我的大儿子小丹就拿着地图，摸索着到了凯旋门。虽然正在修复，难以看清它的真实的面目，但还是可以感受到它的气魄和雄伟，而且浮现出当年拿破仑的大军，在响亮的号角、激越的鼓声，和两旁人群的欢呼中从这里走过的情景。当然，我们在亮着彩灯和探照灯的游艇上漫游了塞纳河，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上议院、市政厅、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在深蓝天空的衬托下，在闪烁的灯火中缓缓飘过。

回到旅社，已是深夜了，困倦而又难以入睡。第二天又一早出去，登上了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俯瞰在我脚下的巴黎。走进了庄严、肃穆的巴黎圣母院，在钟楼上，已不见那个撞钟的善良的怪人。爬了几百级台阶，观光了建筑在巴黎最高点上的白教堂，在层层台阶上，聚集着不少弹琴欢唱的青年男女。在教堂下面的一个广场上，则是一个卖画的集市，画家们还当场为游客们画像，我不知道那中间是不是有当代的梵高和雷诺阿。也走进了似乎毫无美感但又有着一种异样美的蓬皮杜文化中心大厦，这原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却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游客，来参观的人似乎比坐下看书的人还要多……我从这一个名胜点跑到那一个名胜点。在每一个点上都只是浮光掠影，匆匆而过。而还有更多我向往的地方没有能够去。

当我们从一个名胜点转到另一个名胜点时，路远就坐地铁，那是像蜘蛛网一样通向全城的。乘客很多，但并不拥挤。其余的时间我们就在大街上奔波。巴黎很少几十层的高楼建筑，大多数房屋还保留着古典的风格，连色调都是略带陈旧的。我在世界著名的跳蚤市场走了一圈，在塞纳河边那一排长长的旧书亭前随意浏览了一遍，我在蓬皮杜文化中心前的广场上看了看江湖艺人的表演；我穿越了红灯区，看到了那些在寒风中倚立在门前的卖春女郎；我在街头看到了艾吕雅诗中歌唱过的卖糖炒栗子的摊贩……我不知疲倦地奔跑着，而我所到的只是巴黎的一个小小的角落。

有人说，没有到巴黎，就不算到了法国；没有到罗浮宫，就不算到了巴黎。又有人说，不参观红磨房的大剧院，就只算到了半个巴黎。——而罗浮宫我只是一闪而过，不仅没有看遍其中全部的艺术珍品，也没有仔细体会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我无福走进红磨房的大剧院。何况所涉足的少数名胜古迹也都没有能够容我从容地留连，品味。对整个巴黎的市容，也只看到了一个角的浮面而已，那么，我来了也等于没有来。

值得一记的是，我在巴黎迎接了1989年的元旦。除夕晚上，我在大学城和几个中国留学生共进晚餐。将到11时，我们一道坐地铁去香榭丽舍大街。他们告诉我，那里将是一片狂欢。果然，长长的香榭丽舍大街灯如海，人如潮，一阵阵欢笑、喧嚷和歌唱声。马路上一行一行地排满了汽车。一到12点钟，所有的汽车喇叭齐鸣，人群中爆发了震耳欲聋的欢呼，接着到处是“新年好！”的祝贺声，一群群的男女青年如痴如狂地载歌载舞。

1989年到来了。这一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

但我终究只是一个拿着地图探访巴黎的匆匆过客。我没有认识巴黎，没有窥见她的秘密，没有真正欣赏到她的情调。

陪伴了我两天，已经在这里度过了5年的中国留学生牟志坚安慰我说：“也许这样也有好处。住久了，巴黎可能就对你失去魅力了。”

临离开的那天清晨，我带着依恋的心情走上大街。过惯夜生活的巴黎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行人和车辆都很少。回顾这几天紧张的奔波，各种印象纷至沓来，恍如一梦。现在离开巴黎已三个月了，当我想写下一点什么时，我发觉，我完全不能描绘巴黎本身，而只能记述一点感觉，而这又是如此难以表达。

在我没有来之前，巴黎在我只是一个梦。

现在我来了，巴黎从我梦中走过。祖与孙

我很喜欢德国漫画家埃·奥·卜劳恩的无字连环漫画《父与子》，搜集到了我国出版的四种版本。正如一种版本的前言所说，它“无言地流泻出纯真的赤子之情与融融的天伦之乐”。那善良、慈爱而童心未泯的父亲和调皮、聪明的儿子的形象都是异常可爱的。而我的一位朋友，看到我常常抱着孙子在外面玩耍，他笑着说，大可为我们画一本《祖与孙》。

我也笑了，没有想到我们也够格入画。

我有四个第三代：孙女和孙子，外孙女和外孙，“品种齐全”，也都很可爱——这并不是作为祖父、外祖父的偏爱。孙子和我住在一起，所以接近的机会更多一些。陪着他一道玩耍，成为我的“日课”之一。因而他也特别亲我。

他1岁又3个多月，刚学会走路，两手平放在胸前蹒跚而行，有点像小熊猫。还在咿呀学语，只能用不同的声音和做一些动作表达他的意思。摇摇头是不要或不愿，点头是谢谢，飞一个吻是再见，讨好你时就笑笑，挨了批评就撇嘴，不如意就大叫甚至跺脚，即使大哭大闹，一说上街就安静了，脸上还挂着泪珠到处找帽帽往头上戴，却怎么也戴不上去。

我的笔他要抢，我的书他要翻，我的眼镜他要玩，我放食品的盒子无论藏到哪个角落他都能找到，不打开决不罢休，拿了一块巧克力或饼干就跑，爸爸要打他时就往我怀里钻。

从他还是婴儿时，我就常常唱着《宝贝》的歌催他入睡，一如当年我抱他的父亲。而当他稍长大后，就学会了咿咿呀呀的和我一道唱歌，并一边拍着手。带他上街去常常是我的任务，我家的旁边有一个小广场，他看到旁的小学生玩单杠就一定要试试，居然也可用小手吊半分钟，小脸挣得红红的，使我乐得大叫。让他去滑滑梯，开初，虽然扶着，他还是有点紧张，后来感到了乐趣就一次又一次地滑，累得我满头大汗。有几次我抱着他滑，溜下来后仰抱着他平躺在地上，要旁边的小学生拉一拉才能站起来。我有时将他放在童车中推他到邮局去发信或到商店购物，就让他坐在车中等在外面。他的

奶奶和妈妈知道了后总是提心吊胆，再三埋怨我：“要是坏人把浩浩推走了呢？”雨天，就只能抱着他在窗前望街，他安静地看着外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有一次，雨刚停，抱他到街上，他闹着要下来。我告诉他地上潮湿他也不听，就恐吓地要将他往一个小水洼放，而他突然用力一挣，双脚踏进了水洼中，溅得我满脸水珠。回家后，祖孙两人都受到了他奶奶的批评。还有一次，我让他坐在一个足球上，他洋洋自得，左顾右盼，谁知球一滑动，我抢抱不及，他跌了个手脚朝天！他妈妈不好说什么，我因而又受到他奶奶的指责。

我诚然在他身上花去了太多的时间，因为影响了工作而苦恼，而且抱他上楼下楼，陪他玩，也使我感到精力不济。但是，他常使我开怀大笑，带给我许多欢乐。我说我是“陪”他玩，那是表明，我也沉浸在一种情趣中，使我苍老并刻有斑斑伤痕的心还能生发出——唔，就算是“老天真”吧。

和他在一起，我有时就不免想起遥远的过去，回忆起儿时祖父带领我的种种情景。

面对他滚圆、晶莹、纯净的眼睛，我有时也想到未来——他的未来和祖国以至世界的未来。他会比我们生活得幸福的，但正如列宁所说，毕竟不必羡慕他们，我们曾经在狂风暴雨中经历过别一种幸福。

有些老朋友向我叫苦连天，说到为照料第三代所遇到的种种麻烦。他们虽然摇着头，但却是笑着向我说的，显然苦中有乐。从他们所说的种种可笑的事情中，可以看出孙子的活泼、天真，也显现出祖父的慈祥、眷恋。比起父与子来，祖与孙的年龄相差悬殊，夕阳与朝辉相映，那是更强烈的反差，但又都具有一种天真。在他们的相处中，有着另一种情怀，另一种情趣，可以令人大笑，也可以令人含泪。真的是可以入画，可以入诗的。卜劳恩在盛年就被纳粹迫害致死，要不然，当他进入老年后，通过自己的体会和观察，也许会画出一套足以与《父与子》媲美的《祖与孙》来的。

1991年我和酒

在日常生活中，我有几样憾事，其中之一就是不善饮酒。在酒席上，常有人向我劝酒，当我回答不善饮时，他们往往做出惊讶的模样，并说：斗酒诗百篇嘛，诗人哪有不会喝酒的？——我写过一些诗，这是事实，我不善饮酒，这也并非托词。

我却大醉过两次，一次是1939年在重庆读高中时，和几位同学到南温泉去秋游。住在小客舍里，大约是由于白天玩得大汗淋漓脱了衣服，夜半发起了高烧。口渴之极，昏昏沉沉地挣扎着坐了起来，顺手从床边的小桌子摸到一个有水的杯子就大喝起来。那其实是晚饭后剩下的白酒，至少有二两。顿时我腹中翻江倒海，头痛欲裂。听到我的呻吟声，同房的同学惊醒了，看到我的情况都有点紧张，而又束手无策，我折腾了一番后大吐，渐渐平息下来。奇怪的是，第二天清晨不仅完全清醒，连烧也退了。照样去爬山划船，但从此以后，对于酒就有点畏惧，虽然还是颇为欣赏某种饮酒的情调。另一次醉倒则是30多年后，在“文革”期中的1971年。我所在的单位要修猪圈，请了几位泥工师傅，我被从“牛棚”里放了出来当下手。领头的师傅名叫黄应海，原就听说过我，知道一点我的情况，不但没有歧视我，反而颇为照顾。有一个周末，几位师傅下工后去餐馆，一定要我也去。他们大杯豪饮，并不断向我劝酒，出于某种感触，也难却他们的好意，我破例喝了几杯。当时体质较差，不仅呕吐，而且几乎休克了。——这两次大醉给我留下了痛苦的体

验，所以对酒就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不，说是克制并不准确，因为我的确是不善于饮酒的。稍呷两小口，就有点醉意，不敢多喝。我知道文学史上有不少嗜酒若狂的诗人、名士，我很羡慕他们的豪放、洒脱，也很欣赏他们咏酒的诗篇，体会得到其中对人生、身世的感叹。那是一种境界。我虽不善饮，却也有我的酒的境界，我很怀念40年代初在四川北碚的一个小镇上，坐在一个临着嘉陵江的小酒店里，和几位诗友品酒的情景。酒是最便宜的劣酒，下酒的是花生米、干子之类的几个小碟，高谈阔论，意气风发，我们都不大善饮，酒未喝完，小碟已完，于是欢笑而去。我们都是穷学生，这样上小酒店的次数并不多。现在回想起来，却很有意味。当然，这与其说是对饮酒的回忆，倒不如说是对青春的回忆。这十多年来，倒是常有机会参加一些酒宴，但我大都只喝一点饮料，我喜爱的是和三两老友相聚小酌，各自就量。或回忆往事，或仰望将来，纵谈人生，偶发狂言。不知是酒醉我，还是友情醉我，还是沧桑之感醉我。我在微醺中有一点飘飘然，又有一种沉重感。而且真的有一种写诗的冲动。可惜的是，还健在的老友们都年事已高，各自天南海北，即使同在一地，能够相聚的机会也不多。“酒逢欢处更难忘”（元好问），所以每一次都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我在一首诗中说过：“一口酒就能使我醉了。”这说的是实情。但是对于另一种不是一般的酒，一种更烈更辣的酒，由于多次不得不“品尝”，倒是锻炼出了一点酒量。一如我在另一首小诗中所说的：

而我却从未醉倒
虽然有时不免步履踉跄
当我满饮
生活酿成的苦酒

遥远的问候，遥远的回忆

昨天下午，阳光很好，就骑车去附近一家书店看了看。回来，家里人说，有两个武汉大学的学生来看过我，因我不在，还要再来，我没有在意。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谈谈是有过的事，没有想到，这次见面却使我很激动。

当我翻着新买来的两本书时，那两位大学生来了。自报了姓名，高个子叫王哲，另一个较瘦小的叫张可时，都是武汉大学管理学院的学生。王哲说，他是受我的一位老熟人王少伯之托来看我的。我追忆了一下，想不起王少伯这个名字。王哲看出我有一点窘意，接着说，那是1951年，我作为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的成员，在朝鲜战场上与王少伯相识的，他当时是被称为“万岁部队”的那个军的一个营长。虽然只相处了两天，他对我却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志愿军出国作战，对每一个从祖国去的人都有异常的亲切感。而且我们的结识是在最前线。慰问团中被派往最前线的人是很少的。

接着，王哲又说，1955年，当我被卷入胡风集团的大案后，王少伯也受到了审查，当然查不出什么问题。后来，他当上了东北一个省的军区副司令员。几年前已经离休。去年，王哲到哈尔滨，见到了王少伯，王少伯谈起了一些往事。说他一生中有两个人是难忘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他说对我谈不上了解，但从当时短暂接触的印象中，不相信我是反革命分子，他不清楚我后来的情况。当他从王哲口中知道我还健在，并与王哲同在武汉，他就要王哲一定代表他来看看我。

王哲谈得有些激动。我也很感动。仅仅相处了两天的一位军官，几十年来他还记得我，并对我如此关切。说真的，我尽力追忆，只隐约记起了王少伯这个名字，而完全想不起他的面容。我是慰问团的成员，所以接触了不少指战员，时间又匆促，实在难以一一记住。另外，当王哲谈到1955年的那件大案时，我又不免有些感慨，当年对我的审查竟是如此细微，甚至不放过与我只有一面之缘的一位军官。

和这两位大学生谈了近两个小时。临别，我找出自己写的一本小书让王哲转送给王少伯，并转达我诚挚的问候。

他们走后，我独自坐在窗前，又认真回忆，似乎隐约地记起了王少伯的形象，但又难以确定。因为我当时接触到的一些军官，都穿着同样的军装，都同样年轻、豪迈、热情。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他们在我脑海中已浑为一体。由于王少伯提到我是在最前线与他相识的，那么，我倒可以提供我们相识的时间大致是1951年4月下旬到5月7日之间，因为我到前线进行慰问工作就是在这段日子里。和我同行的慰问团的另一位成员是解放战争时期海南岛战役中的战斗英雄李德心。当时的一些情景又浮现在眼前。我是第一次深入到战地，体验部队生活，和战士们通夜行军，有时冒着风雨，有时涉过寒冷的小河。在前线，倾听四五里外敌人的密集的枪声和大炮的轰击……我也记得在深夜听战士们谈他们的经历，和年轻的军官们虽是初识，却敞心交谈，其中就有营长王少伯……虽然时间短暂，这是我第一次受到战斗的洗礼，因而在我是难忘的。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竟也在一位年轻的军官心中留下了印象。几十年后，他还在关切着我，从遥远的地方带来了亲切的问候，温暖了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的心，并引起他许多回忆……

春天的喜悦

今年2月5日，收到周代同志托人带来的一封6页的长信，信封上没有写名字，只写了一句话：“春天的问候”。这封信后来在3月11日的长江日报《江花》版上发表了。

周代卧病15年，头些年，我有时去看他，有时书信来往。后来，我们都安了电话，经常通过电话联系，就极少写信，所以收到他这封长信时我感到意外的欢喜。

显然是一种遏制不住的激情使他提笔的。这两三年来，他曾经历精神上的危机，有时显得郁闷、烦躁，因而更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关怀他的友人都有些担心。我和他有两次长谈。近几个月来，他逐渐恢复了心情的平静。也许正是因为通过了精神上的自我斗争，他对人生有了更多的体会，显得比过去要开朗、超脱，并恢复了停顿过一个时期的写作，健康状况也比较平稳些。他又一次度过了对于他的病情最为不利的冬季。在立春的前一天，他提笔写了这样一封长信。所谈的虽然是一些杂事，却表达了他旺盛的心情，表达了他将迎接又一个春天的喜悦，所以他在信封上写了“春天的问候”那句话。应该说，那其中跃动着的也正是生命的喜悦。——想一想，他是一个卧病15年的人。除了进出医院，难得出门，参加过两三次集会，那对他就是欢乐的节日——就是这样一个长期与病魔搏斗的人，一个看来衰弱无力的人，却有着这样强烈的生的意志和生的活力，是不能不令人感动的。

我还感动于他将“春天的问候”带给了我。他对我说过，友情帮助他度过了漫长的病中岁月并抚慰了他寂寞的心。许多老朋友都一直关怀着他，常去看他。而他在病中又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他们或是钦慕他的毅力，或是由于文字之缘。这种友情是一笔财富，是千金难买权势难换的。人们以友情温暖他，正因为他是以诚挚的心待人的。只有付出真诚才能得到真诚。我和他是老朋友了。我们初识于武汉解放前夕。当时我在编《大刚报》副刊《大江》。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我从他寄来的一首题名《春天开始了》的诗中，感受到了一个青年学生对于解放的渴望和即将迎接祖国新的春天的欢乐心情，那也正表达了一般人民的心声，我很快加以按语发表了。从此开始了我们的交往。解放以后，我们曾在长江日报共过几年事。在1965年，“祸从天降”，我被迫离开报社，开始了我的劫难生涯，当时他受到我的牵累，日子也不好过。我们相隔长达20多年。70年代中期一位友人告诉我，周代激动地向他谈起对我的怀念，甚至说我是他文学创作的“引路人”。周代并不知道这位友人也有和我交往，而且当时我还是“待罪之身”。后来，当政治形势开始有所好转时，他就登上我的小阁楼来看我，并要了我的作品在长江日报发表。这很需要勇气，我从中体会到他的情谊的分量。——在20多年的艰难处境中，我是更深切地认识到友情的珍贵的，我也从他的这次长长的来信中感受到他的眷眷的心。

他在信中谈到了前些年我给他的100多封信，经过几次劫难，由于他的夫人王淑芳的细心，得以保存了下来，并退给了我。那是因为老友戴易山突发奇想，将我给他的70封信整理了出来，并着手收集我的书简。我深深感激他的好心，又惶惶不敢接受他的好意。我不是大家，信又写得潦草。对收信的友人和我自己，或有一点纪念意义，从中可以引起一些回忆，却并无保存价值。周代信中还谈及他青年时期收集、抄录绿原、艾青等人的著作的事，并惋惜它们后来丧失在浩劫中。但是，他也应该庆幸，在新时代里，这些著

作又以更完整的形式出版，重又为他所拥有。历史的大潮虽有回流，总是向前的。

我比周代还年长几岁，来日苦短，所以能够理解他面对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的喜悦心情。古罗马诗人贺拉斯高唱：“抓住那逝水年华！”那么，周代，珍重！老朋友们，珍重！

记荻帆

荻帆在送给我的他的两本诗选集（《布谷鸟和紫丁香》和《邹荻帆抒情诗选》）的扉页上，分别写了两句话：“这里面有我们友谊的回顾”，“它将唤起你青春的回忆”。当我翻读这两本诗集时，的确感到了亲切和温暖，回想起许多往事。

1940年，我在重庆南岸一所中学读书。放暑假了，无家可归，生活成了问题。老朋友朱文尧告诉我，田一文和邹荻帆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小镇上租了一间小屋，可以去找他们。田一文是我在武汉的老熟人。邹荻帆则不认识，但知道他是一位有名气的诗人。当时我正在诗坛上起步不久，能够结识他当然是很高兴的。复旦大学在北碚。我身上的钱不够买一张从重庆到北碚的轮船票，也出于一种浪漫的情绪，我决心沿着嘉陵江步行去。顶着烈日，太热了就跳到江中游游水，当天走了60里，到了土碛镇，已经疲累不堪。还剩下30里，我不能继续走了。我在搬迁到土碛的求精中学找到了一个过去的同学朱朝升（他现在是著名的电影剪辑师），他招待我吃了晚餐，留我在他宿舍里挤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朦朦亮，他送我去搭木船，当天早晨到了北碚，在一间只有两张窄床和一张破桌的小小的土屋里，找到了田一文。还有一个穿着已经泛白的黑衬衫的青年正埋头在破桌前写什么，我猜到那就是邹荻帆。田一文为我们作了介绍。邹荻帆走过来和我热情地握手。当他得知我还空着肚子时，立刻邀我到一家小店去吃油条、豆浆，掏空了他身上所有的钱。

我们一见面就熟悉了起来，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我就在他们的小土屋里用木板搭地铺。伙食则是在复旦大学的食堂里顶着暑假离校的同学的名额混饭吃。当时我们是那样穷困，而那又是怎样令人难忘的欢乐的日子啊。

一些爱好文学的复旦大学的学生常来找荻帆、一文谈天，渐渐熟悉了起来。在那间小土屋里的小油灯晕黄的微光下，举行过一次小型的诗歌朗诵会。十多个人将那间小房挤得满满的。荻帆用他那带着浓重天门腔的普通话（他一生都没有能改变他的乡音），朗诵了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会者中间有几位女同学，其中有一位使荻帆倾心，后来终于成了他终身的伴侣。我、荻帆和他的女友“小丝”常常在一起，在大石桥上，在通向北温泉的一片桑树林中，在嘉陵江边，我们谈诗、谈生活、谈自己的经历、谈理想……荻帆高兴起来就在石阶上大跳自编的黑人舞，我有时就高唱自编的“骑士歌”。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些美丽的时光。

抗战前，我在当时著名的刊物《文学》和《中流》上，就读到过他的诗。那时他还不满20岁。由于知道他也是湖北人，所以另有一番感情。我特别喜欢他抗战初期发表在《七月》创刊号上的一首小诗《江边》，充溢在那里面的对祖国深挚的感情使我感动。我认识他时，巴金先生已为他出版了三本诗集：《在天门》、《木厂》、《尘土集》，同时还有不少诗作在报刊上发表，是当时很活跃的青年诗人之一。《在天门》和《木厂》由于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一出版就受到反动派的查禁。他家乡的黑帮人物还扬言，他再返回天门就要打断他的腿。抗战开始后不久，他就参加了以臧克家为首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出入于烽火战地。后来又转到金山、王莹领导的第二演剧队。他演过《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青年，我简直怀疑他的天门腔的普通话，观众怎么能够听得懂。不过，他大概更多扮演的是日本鬼子和群众甲乙之类，那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1940年，他辗转来到了重庆，想奔赴延安，和我多次商量过这个问题，也找过一些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

治形势，没有能够如愿。为了找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他考进了复旦大学。

东北籍的诗人姚奔原就在复旦大学念书，冀沅、绿原、冯白鲁后来也先后进了这所学校。我则在这所大学当过几个月的小职员，被迫离开后，又在北碚一家小剧团里当过一阵子演员。这群年轻人都是流亡的学生，主要的收入就是靠一点微薄的稿费，但穷困丝毫没有损害他们欢乐的心情。他们经常相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们也常严肃地谈论时局，热烈地讨论诗。他们对诗的追求是在对理想的追求的光照下面。他们渴望有一片自己的园地，这样就靠募捐的方式筹集到了极少数一点经费，创办了《诗垦地》丛刊。后来，靳以先生又在他编的《文群》副刊上为《诗垦地》定期出专页。《诗垦地》当然是以荻帆为核心的，因为他的年纪较长，而且在诗坛上已有一定的影响。但每一期以致每一篇稿件，都通过了大家七嘴八舌的、有时是面红耳赤的争论，荻帆并不滥用他作为主编的权威，而是以他亲切、公正的态度和他的美学眼光来说服众人的。他也非常注意发现和团结更多的作者。这就使《诗垦地》不止是一个同人性质的刊物，而且扩大了队伍。《诗垦地》的创刊是在皖南事变后不久，进步文艺受到极大的摧残，由于它的政治倾向，也由于它具有一定的艺术风格上的特色，所以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可惜只出了六期，就被迫停刊了。

1943年的春天，我在重庆已无法立足，不得不远走贵州，在一个荒凉的小城中生活了一段时期。临行前，几个熟识的朋友都有诗送我，在《诗垦地》上出了一个专辑。荻帆写的是《给C·T》。在最后一段，他写道：

这边
将有旌旗举起
将有时代的声音澎湃
你将卷土重来

后来我的确又“卷土重去”了重庆，我与荻帆又长谈过几次。当时，他已不复有几年前的那种单纯的欢乐的心情，严峻的现实使他更加成熟了起来，他说我们都应该踏踏实实地生活，认真做一点事。不久，他就去了成都。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我们先后回到武汉，这才才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当时荃麟和他的夫人葛琴，肩负着党的使命，在武汉开辟工作。荻帆常邀我去看望他们，1946年的10月19日晚上，在荻帆工作单位的地下室里，秘密地进行了一个鲁迅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会。到会的人数不多，大都是可信任的文艺青年，而会议的气氛严肃，荃麟和荻帆都讲了话。在武汉，以荻帆为核心，又先后创办了《北辰诗丛》第一辑《沙漠的喧哗》和《荆棘文丛》第一辑《大江日夜流》。团结了不少本地的进步作者，并在荒凉的武汉文艺界吹起了一阵清新的风。这两个丛刊都只出了一期，就被反动派查禁了。

1948年的春天，荻帆被迫离开武汉，到了香港。从他来信中，知道他一直在为生计奔波。后来在一家飞机修理工厂做工，生活才比较安定，然而工作是够繁重的。但他一直没有放下他的笔。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自费印的诗集《恶梦备忘录》，都是时事讽刺诗。同时我也在报刊上读到了不少他抨击反动派黑暗的统治，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诗。

我和他再次见面，已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了。他在外事部门，工作异常繁忙。他说，现在应该认真写一点东西了。但我也感到了他在写作中的某种苦

闷的心情。他觉得应该唱出这个时代的壮丽的歌。

1953年，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我们几个老朋友又得以聚会了。那与当年我们在北碚时相聚的情况当然有所不同。这是我们所向往的新的中国。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工作岗位。而且，我们已都不复年轻了。但是，没有想到，在两年以后，我们都在一阵突起的巨大的波涛中沉没，彼此都失去了联系。只有荻帆，在经过了一年多单独隔离反省后，侥幸地得以恢复了工作的权利。我注意收集阅读他的作品，但无法写信给他，不了解他的具体情况。1962年的夏天，意外地，他出现在我面前。原来，他是陪外宾来武汉，打听到我的住所，抽空来看我的，并约我一道去了两处公开的场合。在我当时的处境下，他这样做是容易惹是非的，他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他一如既往那样亲切地对待我，只简单地问了问我这几年的生活状况，要我乘机多读一点书，也不要放下笔。他回北京后，又寄来了他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大风歌》。几年以后，就是那一场搅乱了全国的“大革命”。我在“牛棚”中，几次有人来向我调查他的材料。从外调者严厉的态度和偶尔吐露出的几句话中，我知道荻帆的日子也不好过。

阳光终于又照到祖国大地，1979年9月，我到北京去。这是我20多年后第一次又到北京。在荻帆家中，几个老朋友又得以聚在一起了。荻帆拿出了即将发表在《诗刊》上的我的几首诗的清样，那是他不久前来信要我寄他的。我拿着那一份清样，有着比几十年前第一次发表作品时更激动的心情，那是在艰难的岁月中唱给自己听的歌，决没有想到会有发表的可能的。而且，我的问题还没有处理，现在却将以一个“人”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

那以后不久，荻帆在一封来信中告诉我，他刚发表的一首长诗中，有我的影子。我将那首诗找来看了，那写的是另一个形象，但我深感到他的友情。后来我又读到他的三首《致诗友》的诗，是分别写给冀汭、绿原和我的。给我的那一首的题目是《拒绝》，那后两段是：

想江边不复是那样月色，
思念之树常青——

你还是那少年的影子？

我知道波浪已卷上你的头额，
浪花已溅上你的发丝。
但是波浪并没有吞没你，
胜利者的笑是把悲哀拒绝于门槛外，
江水有情，明月有意，
为我们歌难忘的真理之曲！

这里有怀念，也有期望。这几年来，每次见面时，荻帆总是劝我少搞一些杂务，多写一点东西，他总是以亲切的，有时是轻描淡写的语气谈的，唯恐伤害了我。我不仅感觉到故人的殷殷之情，也感到那含蓄的责备的分量。他本人的表现就是对我的最有力的批评。他一直担任着具体的工作（前年一场大病后才离休），写作都是业余进行的，他每天四时就起床写作。这10年来，大江南北，戈壁大海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歌声。他随身总是带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听到的、看到的和想到的，随时都记下来。这10年，也就是他进入老年以后，是他发表作品最多的时期。

两年多以前，我得到他患心脏病的消息。这使我很难过。几封从北京的来信都说他的情况不佳。1984年12月，我去北京开作协四次代表会。与会的许多朋友都想去看他，但唯恐有碍他的健康，被辞谢了。只有几个老朋友在1985年的元旦到他家又一次聚会。我们约好不在他面前谈他的病，只稍坐一会就出来。但荻帆不让我们走。他已过了危险期，只是还很虚弱，脸瘦削，说话的声音极其低微。我们要他到隔壁房去休息，他坚持要坐在那里听我们谈话，并提出要和我们一道照相，说是：“再……再留一个纪念吧……”

但奇迹的是，他几个月后就恢复了健康，到武汉参加了“黄鹤楼笔会”。日程安排得很紧，他还是黎明即起，埋头疾书，创作了许多作品，而且，他不听劝阻，不让人搀扶，去攀爬峭壁陡坡。那以后，他又多次在外奔跑。由于已经离休，他的写作时间更充裕了。除了写诗以外，他有一长篇小说已经完成了初稿。而今年，他已年届70了。

荻帆是我青年时代的友人，是我的兄长，在诗歌道路上，有好长一段时期是他携着我的手帮助我前进的。当我回顾这几十年来生活时，都会想到他，感觉到他友情的温暖。我没有敢展开我的记述，那将会太长了。但我还必须提到一点，就是他为人的朴质和真诚。他在大城市里生活了很久，又多次出国访问，但他的身上始终有着乡土的气息。不仅对老朋友，就是对一般的熟人，对年轻者，他都热情诚恳地相待。凡是接近过他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1987年5月27日

送荻帆

9月5日上午10点多钟，接到荻帆夫人高思永的长途电话，她啜泣着告知荻帆于当日凌晨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我连连大声追问，实在难以相信。我知道这半年来荻帆身体不好，最近又住进了医院，我们一直保持着电话或书信联系。前几天我还收到他8月26日的来信。他虽为病的折磨而苦恼，但对康复颇有信心。而且两天前我和在京的绿原通过电话，他说9月1日到医院去过，荻帆的腿肿正在慢慢消退，打算只住一个月就出院。荻帆还谈到他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谈到年内外出的计划……绿原说看来荻帆很正常，要我放心。我要他转告荻帆，10月份我将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还有几个老朋友也将去，我们又可聚一次。——怎么，怎么，怎么他竟突然离去了呢？！

我是1940年夏天认识荻帆的，到现在整整55年了。8年前，荻帆70岁时，我写过一篇《记荻帆》的长文，回忆了我们之间交往的情况。最后说：“我没有展开我的记述，那将是太长了。”此刻我更没有可能详细记述，但许多往事都浮现在眼前。从55年前在北碚嘉陵江畔的初遇，到去年9月几个老朋友的庐山之游，年底在深圳举行的“国际华文诗会”期间的几次深夜畅谈，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更显示了友情的珍贵和温暖，而且随着岁月的积累更为深挚，却又保持着当年青春时期的色调。一位青年曾笑着说，你们相处时完全不像是年过7旬的老人，那样亲密，玩玩笑笑，比我们青年朋友相处时显得还热烈。而我也一直怀着年轻时的心情，总以为来日方长。他的友情在我生活和内心中，都占着很重的分量，是我不能失去的，现在却失去了。

1984年秋，荻帆患了严重的心脏病。那年的岁尾，在京举行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个出席大会的友人于1985年元旦去看荻帆。他挣扎着从床上起来，要求和我们共同照一张相。他用低微暗哑的声音说，“留下一个纪念吧！”朋友们都感到凄然。可喜的是，不久后他终于从死亡的阴影下走了出来。这10年来，他又做了不少工作，写了不少作品，国内国外跑了不少地方。今年5月，他住过一次医院，病情较重，朋友们都有些担心。但他于6月份出院了。来信说，朋友们的关注使他很感动，即使为了友情，他也要好好活下去。他在家休养了一段时期，未有大的好转。在8月份又一次住进医院。他的病情和心情都不像10年前那样严重。他还在期待着一部已看过清样的长篇小说早日出版，他还在病床上继续着《新文学大系·1949—1976年诗选》的主编工作，朋友们也都盼着他早日康复，完成他自己的许多计划和心愿。没有想到，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却突然离去了。

每一次我到北京，即使再忙，再匆匆，也要去看荻帆。我们总有那么多谈不完的话，总是很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这一次，我于9月7日晚上赶到北京，为的是在他8日上午火化前见他一面。但我们不能交谈了。他安静地躺在那里。我没有勇气直视他。我向他鞠躬。我在他的亲人们的低泣声中缓慢地走过他的灵床。我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却还是忍不住眼泪。几十年来，我们曾多次分手又相聚。这一次，却是永别了。

是的，荻帆，永别了。“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正是一直以你为兄长的。你一走，不仅使我有难以承担的悲痛，而且我感到这样的寂寞，深深的难以承担的寂寞……

1995年9月14日凌晨4时

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

——记我与胡风的关系

谈到胡风先生与我的关系，如果仅仅限于交往，那是十分简单的，用不多的话就可以说清楚了。但如果从另一面看，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不仅是指我曾被定为所谓的“集团骨干分子”，因而长达近 25 年在一种险恶的处境中，而且也是指在文学思想上和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

1940 年的夏天，胡风当时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邹荻帆带我到他家去看他，那是离学校不远的农村的一间小土房。他一家人正围着一张低矮的小桌吃晚饭。他穿着背心和短裤。他赶快扒完几口饭，过来接待我们。那以后不久，也是荻帆带我到重庆张家花园中华文协去看艾青，他也正在那里。再就是 1947 年春在南京，剧专剧团公演路翎的话剧《云雀》，我在后台碰见了——他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看演出的。解放前我们就只见过这么三次面。在重庆一般的文学集会的场合，我还看到过他，那就谈不上什么了。就是这三次见面，时间也都很短暂，没有进行多的交谈。但每一次见面都还留下了一点印象。初次见面的那一回，他交了一叠稿纸给荻帆，出来后荻帆告诉我，那是他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部分原稿，要抄一份送往延安去。第二次见面的那一回，他和艾青正在对将要在《七月》上发表的吕荧写的《人的花朵》一文进行讨论。1947 年的那一次，有人谈到一位熟人被国民党逮捕的消息，他听后默然久之，但可以感到他心情的激动。

我没有在他编的《七月》、《希望》上发表过东西。1942 年，我听说他认为我的一篇受到有一些人赞扬的散文诗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他当时正在编《七月诗丛》，约了我的几个朋友编集，却撇下了我，这很使年少气盛的我感到难堪，而且颇为忿忿，就发誓不向他编的刊物投稿。

解放初期，我们通过两次信，一次是我请他对我发表的一个独幕剧提提意见，他回信倒是给予了鼓励的。另一次是，我认为他在一本文集的后记中，批评一位同志的态度和语气是过分了。他回了一封短信说：你不认为他写的那篇批评我的文章的态度和语气是更过分么？我把那篇文章找来看了，就再没有说什么。

从 1947 年夏到 1953 年春，绿原和我都在武汉。绿原和胡风保持着联系。有时他将胡风的来信给我看看，特别是解放以后的那几年间。1948 年在香港展开的对胡风的批评并没有能说服我，倒是后来胡风作为回答的那本《论现实主义的路》，我认为很有分量、很有水平的。对于解放以后他的处境我颇为同情。1953 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我和几个朋友一道去看过他几次，这才有机会听到他较多的谈话，直接对他有了一些了解。他对当时的文艺现状是不满的，对于那次文代会认为也难以解决问题，他也谈到了几年来自己的遭遇，我感到了他心情的苦闷、激动和焦躁。我后来和绿原谈到，他要冷静一点才好……绿原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路翎也有同感。绿原要我直接找胡风坦诚地谈一谈，说这是有必要的。但我感到，我和他不熟悉，又是后辈，不便谈，就罢了。一年多以后，胡风托绿原转告我，要我对他过去的理论工作谈一谈意见。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谈。而且，那正是 1955 年大风暴的前夕，根本不是谈理论问题的气候了。

我们过去的交往不过就是如此，有什么可多说呢？

然而，我年轻时在文艺思想上，特别是在对于诗的观点上，是深受他的

影响的。

我最初是由于对鲁迅先生的热爱而注意到他的。我将他看作是鲁迅的战友和学生，当时有这样看法的人是不不少的。他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林语堂论》和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张天翼论》（记得署名是胡丰），他和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战，我都认真阅读过。那一场由他的一篇文章（那是鲁迅和雪峰授意他写的）而引起的关于两个口号的大论战，是当时我和几个少年朋友们经常的话题。我们未必很了解问题的实质，但本能地是站在鲁迅这一边的。后来，他编的刊物（从《海燕》、《工作与学习丛刊》到《七月》、《希望》）、丛书，我大都看过。我认为他是一位严肃认真而且是有很高审美水平的编者。他陆续出版的几本论文集，我都反复读过。可以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在对文艺的基本理解上，我受他的影响最大，并培养了我对理论的兴趣。由于我写一点诗，我非常注意他的关于诗的理论。他强调“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认为真正的诗人必须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强调诗人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与人民共呼吸；强调诗人必须将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表现为对待生活的激情；强调诗人与诗的一致，诗的表现力与人的战斗力不可分；同时也强调诗必须是诗，对诗的艺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些都给了我以教益。我现在对诗的一点理解，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说的他对我的一首散文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评，也曾使我暗自反省，我后来在写诗的道路（也就是在做人的道路）上就有所警惕。而且，我感到可贵的还在于，他的理论文章洋溢着激情，不仅是以道理来说服读者，也是以他燃烧着的心来感染、鼓舞和激励读者的。

由于事态是逐步发展的，对1955年夏季的那一场大风暴，我不能说毫无思想准备，但问题提到了那样的高度，还是令我惊骇和悲痛，虽然我尽可能从大的方面（政治需要），从原则上去加以理解。我自认为虽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但和他并无什么关系，所以在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中，将我定为“骨干分子”，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那以后的20多年间，我就处在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对于受到牵连的友人们的消息，几乎一无所知，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一直到1979年的夏天，友人田一文从成都来，说在那边的一家招待所见到了胡风，才澄清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言。那么，他还活着！我为他去了一封问候的信。他很快回了我一封短信，谈了一点他的近况和心情，还对我的一首刚发表的诗提了一点修改意见。看来，他的思路清晰，字迹也还是有力的。不久后他到了北京。

1980年我在北京见到他，却是在一家精神病院的病房中。他是由于幻视、幻听被送进来的。那病房宽敞、整洁，而我在精神上总还是感到一种压抑。我是将近分手30年后第一次看到他，还可以认得出来，但显得虚弱而衰老。那一天，他的神智还算清醒，能谈谈天，话不多，而且只能用低微的沙哑的声音。他用喜悦的口吻谈到了前些天《光明日报》上登了一则有关他的消息，说那是25年来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前不带“形容词”。谈到了他被任命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顾问，也是25年来第一次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出现在艺术研究院张贴出的选民榜上。他指着桌上的一叠书给我们看，说：“那是我过去写的东西，是一位老朋友最近给我送来的，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自己的东西了……”他在喜悦中甚至流露出一种天真的神情。

他没有提到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只是叹息着说了一句：“我们过去犯了什么法呵！”而当谈到还活着的和已不幸去世的朋友时，他含着泪说：“这

些年，他们为我吃苦了……”他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怀着这样的希望生活好多年了——正是这样的希望支持我走到今天，支持我走下去。”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他的病态的一面：他还是有一些惶惑甚至惶恐，对有些事将信将疑。我和同去的一个年轻的同伴向他说明了新的大好的形势，尽可能地安慰他。他不断地点头，说：“是这样！是这样！”

第二年，我因工作去上海。他又正住在那里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是由于幻视、幻听比过去严重，从北京转移来的。一般不让人去探望，我设法去看了他一次。只坐了一会。他不大说话，而且露出一种不安的神情。我只好告辞走了。

看起来，他的病情比我在北京去探望他时更严重些，我很担心会恶化。但他终于渐渐好了起来，回到了北京。我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了不少文章，还看到他出席一些会议的报道。这位 80 高龄的老人，虽然带病，仍不肯好好休息。

这几年间，我到北京时，总要抽空去看看他。他静静地微笑着，不大说话。有时闭上眼睛，我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但可以感到他的思路已恢复正常，他的内在精神力量远比身体要强，这从他发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来。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 1985 年的元旦。我和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过去被指为“集团骨干分子”的几个朋友一道去看望他，还合照了几张相。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的纪念。

就在那一天，我劝他到湖北走一趟。他已多年没有重回故乡了。他摇摇头，微笑着低声说：“一动不如一静。”那以后不久，武汉将举行“黄鹤楼笔会”，因为他是湖北人，又是诗人，我提议邀请他，虽然我想他是不会来的。意外的，他却表示愿意来。但准备动身前到医院检查，却发现患了癌症，而且已到晚期。后来，一位参加了笔会的友人回到北京后来信说，到医院去看过他，告诉他我们是多么盼望他去。他摇摇头说：“我再也去不成了。”说时热泪盈眶。那么，对于故乡，对于生活，他还有着深深的眷恋。我不知道他临终前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时有着怎样的心情，是不是也热泪盈眶呢？如果是的，那不是伤心的眼泪，而是对生命、对斗争的执着——在他复出后的这五六年间，他是依然在继续为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追求而斗争着的。在什么地方他写过这样意思的话：如果不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几十年来他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我也亲自听他说过，是由于对党、对群众的信任，支持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他到了晚年，终于亲见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时代；他自己也得以摆脱了被投掷在身上的污秽，站在时代的阳光下面，而且，他也得以以一个真实的面目，站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中间。

我看到新文学史研究者，将我也看作是“七月派”的一个成员。我并没有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东西。但从诗的战斗方向上说，从诗的总的风格上说，是可以这样看的吧。至于就我个人说，我是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的，“七月派”诗人又大都是我尊敬的友人，我乐于和他们站在一起。

1992 年 4 月 23 日

附记：这是根据我在 1985 年所写的《我的悼念》一文改写的。

重读路翎

收到路翎寄来的新出版的《路翎小说选》，感到很喜悦，当即放下手头的事，原只想翻看一下，却情不自禁地读下去了。

这一本《路翎小说选》是由朱珩来编辑并写序，作家出版社出版的。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也曾经出版一本《路翎小说选》。现在新出的这一本，显然编者有意识地避免重复，在选目上仅有少数几篇雷同。这些小说我早就读过，而且不止读过一遍，但那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次重读，就感到新鲜而又熟悉，而且情绪激动，一如当年。于是把他这10年来重新出版的8部著作都取出来翻看了一下，并写信给路翎说我很想写一点什么。

是的，我很想写一点什么。不是评论和研究，只想谈一点心情，一点回忆。

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文学道路起步的时间上，路翎与我是同代人。1939年，他开始在胡风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小说。我首先认真阅读并引起我的注意的是1942年出版的他的中篇《饥饿的郭素娥》，胡风在序言中高度的评价当然是一个原因，小说本身也吸引并震撼了我。那以后，我就一直留意他的作品。他是多产的，不断有作品在胡风先后主编的《七月》、《希望》和少数别的报刊上发表。几年中，接连出版了短篇、中篇、长篇、剧本等多种集子。他的每一篇作品，只要能看到的我都阅读过，他所出版的集子我都收藏了。

我年轻时眼高手低却又骄傲自大，对于路翎却是钦佩的。他是最喜爱的作家之一。由于我知道他还小我1岁，这种喜爱中就还夹杂着羡慕甚至嫉妒的因素。

我惊异于他的作品涉及的生活面之广，对生活理解的深刻。各阶层的人物（其中主要的是劳动人民）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而且都能刻画得那么生动。没有曲折的情节，也不是仅仅描绘生活的画面。他所展现的是，在黑暗腐朽的旧社会里，在生活的波涛中浮沉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的心灵，他们复杂、细微的感情及其变化。而且，无论是他70万字的大长篇《财主的儿女们》，还是只有1000多字的短篇《滩上》；无论是对受难、挣扎、反抗着的劳动人民的歌颂，还是对统治者、剥削者、市侩们的辛辣的嘲讽，严厉的批判，都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炽烈的感情和对未来的信心。一如他当年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所说的：“无论怎样的苦难在这个时代都能达到光明，却正是光明，使将来充满希望。这就是我要说的。”（《路翎书信集》第87页）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融入作品中的激情，使他的作品闪现着一种异彩，洋溢着一种热力，那往往是能直迫你的内心，感人肺腑的。通过他的作品，使我深感到人生的痛苦与庄严，加强了对黑暗现实的憎恨而又激励着我对未来的希望和追求。在我的人生道路、艺术道路上，一些国内外文学大师和前辈给了我引导和鼓舞，而在同代人当中也有一个人——至少是我首先要提到的一个人，那就是路翎。我还在他们影响下，化名“柳红”、“马莱”写了十来篇小说，当时友人黄若海来信说，它们在创作风格上，是和路翎相近的。

抗战时期，我和路翎都在重庆。1946年至1947年夏，又同在南京。他有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但我和他没有交往。只是在1947年春，他的剧本《云雀》上演时，我去看戏时才认识了他。后来和冀汭一道到他家吃过一次饭。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我在胡风先生家碰见过他两次，都没有深谈。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观察他。他浓眉大眼，颇为英俊。我

想到绀弩的一句话：路翎是一个美男子。

在 1955 年夏季的大风暴中，他作为胡风最亲密的朋友和弟子，当然被卷进去了。我也未能幸免。1979 年 9 月，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已有所改变，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到北京去，见到了几个老朋友。我们相互谈了谈各自的经历。我向他们打听路翎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听说他被囚禁长达 20 年，其间还住过精神病院。几年前已刑满释放，在街道上做清洁工，住在芳草地，具体住址不详。我和我的同行者周翼南，第二天就赶到了芳草地，花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挨家挨户地询问，人们都不知道路翎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徐嗣兴（这是他的原名）其人。当我们已经绝望时，通过一个老人的指点，在一排简陋的平房中的一间小屋里，找到了他的妻子余明英，路翎因事出去了。余明英见到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她说已 20 多年没有见到一个老朋友，也不知他们的消息。她说路翎是 1975 年才释放的，在街道上扫地，开始每月 15 元，现已加到 20 多元。她自己在一家街办工厂做工，每月也可收入 20 多元，有一个女儿在一起，生活勉强可过。那房间里铺着两张大床，一张破旧的木方桌，桌上放着一份报纸，但没有看到一本书籍或刊物。余明英轻言细语地谈着，可能是由于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处境，只能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打击。但我的心情是沉重的，而且不能不深有感慨。等了好一会，不见路翎面，已是午饭的时间，我们就告辞走了。她也没有留我们，只约定星期日要我们一定再去。后来我们如约去了。路翎见到我丝毫没有激动，一如我们昨天才分手。问到他的情况，他三言两语就带过去了，只是向我打听胡风和别的几个朋友的消息，我告诉他胡风已出狱，现住在成都，并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朋友的情况告诉了他，说现在政治形势已好转，问题会得到公正的解决的。他也并没有表示出欣喜。他说话很有条理，看不出任何精神病兆。但他有时沉默不语，两眼茫然地凝望空间，无意识地移动着下颚的样子，却使我心酸直至心悸。他的冷漠和麻木，有如一座火山的死寂，而那火山曾沸腾着怎样灼人的浆液。经受了 20 多年严酷、残暴的打击没有能使他倒下，但却熄灭了他生命中最可宝贵的灵气和激情，也使当年那么英俊、潇洒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须发苍白、满脸皱纹的老头。他的手曾经握笔写出了几百万字震撼人心的作品，现在他却以手在清扫着小巷了。

我们告别时，他没有和我握手，转头就走了。我回头久久地凝望着他的有些佝偻的背影。我感到，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恐怕是很难写作了。没有想到两年以后，我就在《诗刊》和《青海湖》上读到了他的几首诗。我欣喜地写了一篇短文加以评介，并说“那么，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他就突破了由于深沉的痛苦而产生的迟钝和冷漠，恢复了生活的激情，生活的敏感——根源是对生活的爱。这是真正令人惊奇和欣喜的。一棵枯萎的树又发青了，在时代的阳光下。”对他关注和爱护的人还是不少的。我记得 1985 年，我和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任副主编的刘心武同桌吃饭，他告诉我路翎寄去了一篇小说，我问他写得怎样，他回答说还来不及看，“但无论如何，是要发表的”。后来果然发表了。

我知道，这些年来，路翎一直还在埋头写作，回忆录、小说、散文、诗，发表了一些。也还有一些是没有发表的，我手头就还有他的两份小说原稿。我不能不惋惜地说，要达到他当年的水平是不容易了。

好在他过去出版的主要著作，这 10 年来都得到了重新出版的机会。那是他从 17 岁到 32 岁这 15 年间的成果。每当收到他寄来的新书时，我都感到喜

悦而又不免抚卷叹息。当年他那么年轻却已奉献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而且正日益走向新的高峰。如果不是人为的摧残，他肯定会写出更多更光辉夺月的作品，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对文坛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在海内外注意到他的人还是有的，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总的来看，他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于他还是比较陌生的。每一次收到他的作品时，我都很想写一点什么。但要真正研究他，分析他的作品的内容，在创作方法上的特色，美学上的新的开拓，在现代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那是我无力做到的。这次收到他新出的《路翎小说选》忍不住提起了笔来，那是因为其中头两篇中篇小说《谷》和《青春的祝福》，都是他不满 20 岁时的作品，我是这一次才有机会重读的。我记得初读这两篇作品时的激动心情，现在我已年过 70 的老人了，历经沧桑，感情上已经受过血与火的磨炼，但在重读时，我的情绪也还是随之起伏。特别是其中分别写到两个倾向进步的青年，在时代的风雨中和反动政治的压迫下，过着贫困不安的生活，经历着苦难、搏击、反抗……使我回忆起朋友们的和我自己的青春岁月。在《青春的祝福》中的那位女主角，18 岁的单纯的姑娘章华云，在她的进步的哥哥的启发下，在严酷的生活的锻炼中渐渐觉醒，认识到生活的真理。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章华云认识到：“接触一切人们，为他们工作，多么好！她胸中充满了阳光和诗，充满了新生的祈祷。幸福又降下来了，这次是用了想象的形式。逾越过沉重的江波和层叠的峰峦，前面是无数的人，后面也是无数的人，她向前走，勇敢地向前走……”这也表达了当年许多进步青年的心情。而他们，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后来的岁月中，也要经受严酷的考验的，譬如路翎自己。我不能不深有感慨。而且，那位年轻姑娘的纯洁的祝福，现在听来也还是给人以振奋的呼唤。

路翎的作品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过去的许多批判却大都失之公允。跳动在他作品中的健旺的心和对人生追求的激情是十分可贵的。年轻的路翎通过他的作品给了我力量和鼓舞。现在我老了，那个年轻的路翎的作品还温暖着我的心，给我以热力。

1992 年 11 月 28 日

路翎纪念

2月14日早晨，接到一位朋友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路翎于2月12日去世，紧接着又收到两位朋友的信，告知同一消息。他去世的那天是阴历正月初三，还在节日的气氛中。

这几年来，有好几位老朋友先后去世，我都只是默默地承受死别的悲哀。对于路翎，却想来写几句。

我和他是1941年在重庆北碚相识的，至今已有50多年了，却来往很少。但是，在同辈作家中，他是我最为喜爱，最为钦佩，也是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因而在感情上，我是对他十分亲近的。

我不能，也不必在这里对他的文学事业作出评价，那是文学评论家的任务。我只想谈一点这样的感受：当他进行创作时，总是力图走进他所创造的世界，不仅描写出生活里的形形色色，而且通过体验去表达人物内心深处隐蔽的感情、情绪的激荡变化，并使读者感同身受地去体验人物的感情。他在创作过程中总是满怀激情，寄寓着他对人民的热爱，对黑暗势力的憎恨，对理想的追求，对明天的信心。由于他的这种激情，就使他的小说大都具有诗的素质，闪耀着光华，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是感人肺腑的。他的小说的题材主要是劳动人民，也写知识分子、商人、官吏、士兵、地主……我从中扩大了生活的视野，激扬了对生活的热爱，在艺术上也得到了启发。解放前我用另几个笔名写出的一些短篇小说，是很受他的影响的。

由于从事进步活动，他读到高中二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从此就先后在几个单位当小职员，并在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他是勤奋的，在解放前的10年中已有200多万字的作品问世。主要是写小说，也写文学评论、剧本、散文、诗歌，也都有其特色，真是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他初涉文坛时，只有17岁，即受到胡风先生的重视。他迅速地成长了起来，在20岁左右，即完成了被誉为“青春的诗”的长篇《财主的儿女们》。他受到了不少赞扬，也受到一些不公正的批评，而他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从他194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开始，到1953年他深入抗美援朝前线，写出了《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受到广泛注意的小说，可以看出，他在艺术上是逐渐走向成熟，肯定会攀登新的高峰，作出更大的贡献，而1955年在反胡风的那场大风暴中，他被吞没了，当时只有32岁。

我也受到牵连。在艰难的处境中，常常念及一些同命运的友人，其中也包括路翎。我在痛苦和困惑的心情中写过一篇短文，引用了他的两句话：“人不是神，不能承担这样严酷的考验；人应该成为神，必须承担这样严酷的考验。”我知道他受到的打击一定比我更沉重，他将怎样承担呢？1979年9月，我的问题还未解决，但总的政治形势已大有好转，我有机会到北京，见到绿原、牛汉，向他们打听路翎的消息。他们也多年没见到他了。只听说他已出狱，住在芳草地，具体地址不详。我决心去看看他，和同行的翼南到芳草地挨户挨家的探询，终于找到了他的住所。在这以前，我最后见到他是1953年秋季，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不久，是那样英俊洒脱。而现在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人了。而且神情淡漠，完全没有当年的热情和气概。看着他，看着他的贫民窑似的简陋、萧索，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没有一本书刊的家，我可以想象他身心所受到的巨大的摧残，可以想象他目前清苦的生活。他一点也没有谈及这20多年来的遭遇，只是询问了一些友人的情况。倒是他的妻子徐明英告诉我，他因受刺激过深，曾经住过精神病院。

这几年是在打扫街道，每月收入约 20 元。她自己则在街办工厂劳动，每月收入也不足 30 元。我无言，感到了沉重的悲凉。

第二年，胡风问题平反。他的处境和待遇得到了根本改善。他又埋头于写作，发表过一些诗、散文、小说，表达了他在新时期的感受和对新生活的热爱，但是，已缺少那种灵气和光华了。恐怕还有不少作品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我手头就有他的几篇原稿。他能够重新执笔总是一种可喜的事。我曾就他的作品写过三篇评介文字，希望他能因此感到一点温暖。我更希望时间和新的生活能治好他心灵上的创伤，重新燃起火焰，并融合这几十年来对人生的深刻感受，写出更为宏丽的作品。但是，现在我只能满足于在灯下翻读这 10 年来重新出版的他的旧作，好在那已包括了他的一些主要作品。我依然像当年那样心情激荡，并惋惜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作家的殒落，因而思索着一些问题。

1994 年 2 月 28 日

我的感激 ——悼艾青

5月8日清晨，接到一位友人的电话，告知诗人艾青逝世。当天，又从报纸上读到消息，心情怅怅久之。

他的离去，当然是中国诗坛的巨大损失，对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他的诗的时代意义和艺术特色，已有众多的理论文章和专著予以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相信，今后还会有更深入的探讨。我只想从自己青少年时学习写诗的过程中，从他的诗中所获得的启示和教益，谈一点切身的体会。

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的前夜，我开始对诗的写作有了兴趣，广泛地阅读了一些诗集。其中有一些诗在艺术上比较精致，却与当时国难的形势和人民的感情很不调和。另外有一些诗，在内容上与时代的步调合拍，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却又在艺术上比较粗糙，感情比较浮泛，难以有感染人的效果。我从两方面都汲取了一些东西，开始了在诗创作上的蹒跚学步，所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是十分幼稚的。一直到抗战初期，读到了艾青的诗集《北方》（初版）时，才真正受到了心灵的震撼，那诗集当是诗人自费印的，64开的横排本，6号字体，只收了8首诗，薄薄的一本小小的册子，但我却感到了它的分量。我在1976年3月写的《从诗想起的……》和在1983年5月写的《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两篇文章中，都着重地谈到了当时读到《北方》时的激动的心情。我说：“是艾青将我引进了一个新的诗的国土。……那样真挚、深沉的感情，那样朴素、纯净的语言，那样新颖的表现方式，和颤动在诗中的时代脉搏，使我深深地感动。”我还说到：“当读了艾青的诗以后，我对自己的诗就很不满了。……正是通过对于艾青的诗的学习，使我认识到真正的诗不是模仿，而必须是自己的心声的倾诉。当你倾诉自己的心声时，也就表现了你自己的个性、素养、感情和感受，因而也就自然而然慢慢地会产生自己的风格。”——我所说的，都只是当时的直接的感受。事实上，这里已接触到诗的本质、诗的美学如何和诗的战斗任务结合起来，诗品与人品的关系等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当时我没有能力将我的感受引申到理论的高度，是后来当我读了更多的中外诗人的优秀的诗篇，读了一些有关诗的论著，也从自己写诗的体会中，对这些问题才渐渐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正是艾青的诗，使我直接地感受到了这些问题，影响了我，有助于我在诗创作上的成长的。

不仅是我，可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新诗史上一个高潮期，很多年轻的诗人大都是受到他的影响的。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40年秋。他从湖南来到重庆不久，暂住在张家花园中国文协机关里。是获帆带我去看他的。适逢胡风也正在那里。第二年，皖南事变后他去了延安。解放后，他在北京，我在武汉。1955年反胡风，1957年反右派，我们先后落难。这几十年间当然没有见面的机会。1979年9月，我到北京，又是获帆陪我去看他。他暂住在北纬饭店。他当时已度过长期的放逐生涯，开始在读者欢呼声中唱起了“归来的歌”。20多年的摧残和北方的风沙没有磨损他洒脱、幽默的性格，我很感到欣慰。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则是在1991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艾青作品国际讨论会”上。他已年过8旬，讲话时精神仍旺，但已显苍老，行走不便，只能坐在轮椅上了。这又使我有些感叹。

写这篇短文前，我将他赠予的装帧印刷都很精美的五卷《艾青全集》取

出来又翻读了一遍，其中一些我早已熟读的名篇仍使我感动，而且其中有几篇，如《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我曾多次在各种场合朗诵，因而引起了许多回忆。人已远去，光辉的诗篇却将永存。而我每当想起他时，将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

怀靳以

1994年冬，在北京举行了“纪念靳以先生诞辰85周年暨逝世35周年座谈会”。朋友通知了我。我远在武汉，不可能参加，却引发了写一篇怀念靳以先生短文的念头，而这立意是多少年前就有的。

因为，靳以先生是我正式结识的第一位作家，也是引导我走进文坛的第一位编辑家。

当我还是初中学生，开始接近文艺时，就读过他的一些作品，现在记得起来的是，现代书局出版的小说集《圣型》，生活书店出版的小说集《春的花》，开明书店出版的散文集《猫与短筒》。后来，还读了开明书店出版的《靳以短篇小说集》。他编辑的杂志《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我都曾经收藏。我也知道，他和巴金、曹禺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对于他，我是怀着敬仰之情的。

1938年夏，抗日战争第二年，我从故乡武汉流亡到重庆，进了复旦中学高中部。这所中学的董事长康心之也是重庆《国民公报》的董事长，所以学校的阅览室和报栏上都陈列着这份报纸。我注意到这份报纸还有一个原因，它的文艺副刊《文群》的编辑是靳以先生。《文群》每周二、四、六刊出，篇幅不大，上面经常有名家的作品。在重庆各家报纸的副刊中，除《新华日报》的副刊外，它是比较突出的。

我是《文群》热心的读者。但没有想到要投稿。因为，我认为自己远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虽然，在武汉时，我已在一家名为《时代日报》的副刊《时代前》上发表过一些东西。但那家报纸发行量很小，编者又是我的朋友，所以那些幼稚的习作才得以刊出。而且，到重庆后，我课余时间都忙于参加同学们组织的“吼声剧团”的救亡宣传活动，完全放弃了写作。1939年的元月，期末考试的前夕，为了送一位名叫谭南的女同学去延安，我在激动的心情中写了一首题名《别》的小诗，想到不妨投寄到《文群》试试。我是没有抱什么希望的。没有想到不久后就刊出了，因而感到意外的惊喜和激动。从此诱发了我创作的激情。我又写了一首题名《元宵夜》的诗寄去，也很快就刊出了。以后，我就成了《文群》经常的投稿者，除诗以外，也还有一些散文。有的稿件，靳以先生作了修改和删节。他将《文群》的单页按期寄我，有时还寄我短信对我的作品诚恳地提出意见。

1939年的秋季开学后不久，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操场上打篮球。有一个同学赶来告知有一个人到宿舍里找我。我问那人姓什么？他说没有问，是一个“大人”。我急急忙忙向宿舍跑去。同时想着是哪一个“大人”来找我呢？到了宿舍，看到一位微胖、面色红润、戴着眼镜的先生坐在我的床边。是不认识的。他用普通话问：“你是曾卓？”我点点头，并打量着他。他说：“我是靳以。”这真使我大为惊喜，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再低头一看，背心短裤，浑身大汗，颇为窘迫。他当理解了我的不安，让我在他旁边坐下。告诉我他是到《国民公报》看总编辑姜公维，因复旦中学就在附近，顺便来找我的，他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当我零乱地答复时，他一直微笑地看着我。周围站着几个同学，不时插几句有关我的话，他坐了不久就走了。我在一些同学的注视下颇为得意地送他向校门口走去，回到宿舍后还一直在兴奋的心情中。

推算一下，那年靳以先生是30岁。

《文群》是我正式从事写作的起跑线。这个副刊上知名作家的作品很多。

而靳以先生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我这样一个中学生的习作，给予了扶植、鼓励和指导。如果不是这样一次机缘，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至少也会推迟几年吧。靳以先生也并不是对我一人如此，《文群》上面还出现过别的一些新的作者。靳以先生在我投稿后不久，还主动来看我，即使如他所说是顺便吧，那情谊也是令我终身难忘的，而且对我起到了强大的鼓舞作用。后来我们还有过一些来往，他也一直给我以指导和帮助。1955年，当我因胡风冤案受到牵连时，我看到了他写的有关我的简短的材料，没有任何不实之辞。他说我一直以师礼待他。是的，在我，他是一位永远值得纪念的敬可亲的老师，是为我打开文坛之门的老师。

1995年8月

布克和雪虎

这是两只狗，出现在杰克·伦敦的两部中篇小说中。《荒野的呼唤》描写的是家犬布克怎样通过各种遭遇逐步地变成了一只狼——它原来就是狼的后代。而另一部小说《雪虎》则描写一只狼怎样通过各种遭遇变成了一只家犬。

两个相反的题材，却同样令人惊心动魄。描写的是狼和狗，作者对它们的习性、生活是那样熟悉，而且对它们的性格、它们的内心世界刻画得那样细致入微，真实可信，一如描写人（作者正是以“他”和“她”，而不是以“它”来称谓他的主角的），正由于这样，而不是由于故事和情节的新奇，才紧紧地吸引和深深地感动了读者。

作为人，我们当然喜欢一只驯服的、忠实的狗，所以在小说中“雪虎”被称为“福狼”，为司各脱法官全家宠爱地接受了。但作为人，对于“雪虎”在棍棒的法则下和一点爱抚的熏陶中，不知不觉地变成一只奴才似的，而且甘于奴才地位的狗，又感到愤懑和悲哀。我同情常常倾听着荒野的呼唤而终于奔向自由的“布克”——那恢复了野性的狼。我似乎听到它和伙伴们在大森林中疾奔的步伐声，和它在黑夜中发出的长长的嚎啸……

“ 作为一个人！ ”

这是一个朋友向我说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被关在 A 市国民党的监狱里。有一个 20 多岁的青年比我晚一些也被送了进来。从他的谈话和表现中，可以判断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肯定是牵连到一个重大的案件中，经常被提去审讯，而且往往是遍体鳞伤地回监。后来，对他的审讯渐渐减少，以至完全终止了。他的伤势还没有完全养好，躺在一个角落里，常常低声地唱着歌，有时还说两句带有幽默情趣的话。看来，他是坚强、乐观的。

一个晚上，秘密地传来了消息：他将在次日清晨和另外两个同志一道被处决。

同号子的难友们都在沉重的心情中默无一言。他也知道了自己的命运。突然，在寂静中，他低声地说了：

“ 我多么想活下去！…… ”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不知道他还会说些什么。

接着，他说：

“ 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没有别的选择！ ”

第二天的黎明，他在难友们的悲愤的歌声中被带走了。

后来，我常常想到这个青年。当我遇到艰难、危险，因而犹豫、彷徨，考虑着怎么办的时刻，常常想到他最后的那句话：

“ 作为一个人！…… ”

我宁愿……

杰克·伦敦在他生命的晚年为自己修建了一所住宅。

耗费了好几年的精力和全部的财产，克服了层出不穷的困难，大厦终于修好了。而就在落成的那天晚上，一个对他心怀嫉妒的人放了一把火。

惊惶、痛心、焦急的杰克·伦敦久久地望着在烈火中的大楼。

他喃喃地说：

“我宁愿是这被烧毁的房子的主人，而不愿做那个放火烧房的人！”

是的，常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况：宁愿是一个无辜的被损害者，而不愿做那带着私心损害人的人！

激励

我和妻子到有名的风景区张家界旅游。平地的景点都游过了，那一天要攀登黄石寨，它在一座高山上。

上山的路铺有石阶，并不难走。山脚排列着几十乘用藤椅绑成的轿子。轿夫们拥挤上来要我们乘轿。我们谢绝了，觉得那样会减少旅游的情趣。慢慢向上爬着，开始还悠悠闲闲，渐渐就感到吃力了。有几处相当险峭，攀爬十分费劲。在可以清楚地望到山顶的一个长长的陡坡前，我浑身酸软地坐在一块岩石上，感到休息是这样幸福。抬头望望，真怀疑自己还有没有力量爬上去。

几位操着河南口音的妇女从下面爬上来了，气喘吁吁。她们在我身边歇住，仰头望着陡坡叫苦。其中有一位30多岁的胖胖的妇女大声嚷着：“我的妈！还有这么高呀！真要命。”她注意到了我，笑着打听我的年龄。得到答复后，她怔了一下。回头大声对同伴说：“连这位老先生都敢上去，我们要打退堂鼓就真该跳崖了！走！”她转过身大步走向陡坡，同伴们跟着她。

我微笑着看她。暗地高兴能以身作则给人一点激励。

我立即站了起来，和妻子一起也向陡坡走了过去。她的赞许也给予了我以激励。

看杂技

我是杂技的忠实的观众。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杂技表演只有在失手时才能吸引他。这是一句含义丰富的话。说此话的人必然曾经沧海，难以轻易动情。

我现在远比说此话时的纪伯伦要年长，生活也颇多波澜。但好的杂技表演总能吸引我，使我喜悦、惊叹、激动。当杂技演员失手时（这是难免的），我感同身受地分担着他的痛苦，为他不安。而当他终于成功后，我更为热烈地为他鼓掌、欢呼。少年时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我理解纪伯伦的心情。

而我乐于享有自己的心情。

当然，这不仅是指看杂技。

关于老年

关于老年的文章和诗，古今中外都不少，其中不乏精辟和富于哲理之作。最近我常常想起的是一首小诗和两句话。

诗是惠特曼的《给老年》。原诗就只有一句：“从你，我看到了那在入海处逐渐宏伟地扩大并展开的河口。”

一句话是冰心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的，不知原作者是谁，“要有更多的云霞造就一个美丽的黄昏。”

还有一句话是泰戈尔说的：“我和每一个相交的人都是同龄的。”

惠特曼的诗将老年提高到一个宏伟阔大的境界，几十年来的奔波，所经历的风雨、坎坷、磨练，所积累的经验 and 智慧……生命的河流终于奔向了生命的大海。还很少有人是以这样庄严、健旺的心清去描绘老年的。冰心引用的那句话是一声向所有老人们的呼唤；对每一个老人自己来说，则是自我要求和自我鼓舞：要用自己的努力，要用自己的余年，去完成生命的灿烂的画幅。泰戈尔的那句话表达了老人宽阔、博爱、永远保持纯真的心，他和每一个与他相交的人都没有距离，没有隔阂，而且能从对方汲取力量、欢乐，即使那是远比自己年轻的人，甚至是一个儿童。他因而永远年轻。

黑夜的眼泪

年轻的时候，我大都是在夜间写作。渐渐进入老境以后，熬一次夜几天精神都难以恢复，就不得不改掉了这个习惯。

前几天，为了赶写一篇急用的稿子，又一次在夜间伏案，停下笔来，已是夜半两点多钟，心情还在一种亢奋状态。不想上床，就又点了一支烟，去站在窗前眺望，深蓝的夜空中，闪烁着稀疏的星星。大地上是参差的大楼的剪影，只有少数的窗口亮着寂寞的灯光。在沉沉的夜色中，在两排乳白色的路灯照耀下，没有车流和人群，一直通向隐蔽的远方的马路，显得陌生而神秘。受到周围气氛的感染，我的心渐渐沉静了下来，而且达到了一种明彻的状态。在白天，我虽然有时也沉思，却难以达到这种状态。我似乎独自站在地球的中央。没有名利的骚扰，没有得失的顾虑，想着一些事，认真地审视自己，并审视这个世界。

是谁说过：“不曾在黑夜里哭泣的人就不懂得人生。”我少年时也曾在黑夜里哭泣过，因为痛苦，因为忏悔，因为思念，也因为渴求和欢乐。是的，我就在这中间体会着人生，思考着人生，这是有助于我的成长的。而此刻，我的眼睛又渐渐潮润了。这是一个老人的眼泪，其中饱含世事的沧桑，但也映照着渴求和希望。

而无论是少年时纯真的泪还是老年时沧桑的泪，都洗涤着我的灵魂。

胡子与微笑

今年8月，在艾青作品国际讨论会期间，诗人邹荻帆邀请了上10位与会的朋友在他家小聚。一位南斯拉夫诗人笑着问我：“你不记得我了吗？”我仔细地端详了他，最后还是带着歉意地摇了摇头。

“我是彼德洛夫”，他说，“那年你到南斯拉夫，我曾接待过你的。”

呵，记起来了。1984年我和流沙河到南斯拉夫参加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在返国的头一天晚上，在贝尔格莱德，曾应邀到他家作客。他当时是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主席。那天在座的还有那一届诗歌节金环奖获得者印度诗人阿盖，和好几位南斯拉夫文学艺术界的朋友。在他那富有艺术风味的宽大的阁楼上，喝着酒，谈谈笑笑，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主人的热情和豪爽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怎么竟没有认出他来呢？

“我剃掉了胡子，所以你难以认出我了。”是的，当年他是留着大胡子的。他接着说：“你也显老了些。但我记得你的微笑。我喜欢你的微笑，我从你的微笑认出了你，我的胡子可以刮去，你脸上的微笑却是刮不去的。”我又一次微笑——不，大笑着拥抱了他。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祝福和赞美呢？岁月流逝，风风雨雨，脸上的微笑却是刮不去的。

两本书名

一位朋友曾对我谈到一位德国作家，说他是很有名气的。但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却记住了他的两本书名：

《门渐渐地开了》

《永远不会过去的过去》

两者都给人丰富的想象，前者是动态的，门打开后将显现的是什么呢？一种惊疑的等候或一种惊喜的期盼。而后者引起的是难忘的回忆：它或是一次邂逅，或是一次冒险，或是决定一生命运的转折，或是一道刻在心上的血痕……；它或是个人的，也可以是民族的。那些是不能忘却的，而又形成一种力量、负担或心态，影响到今天，并联结到将来……

少年时的读物

少年时期，我珍藏有黎烈文翻译的两本法国小说：一是洛蒂的《冰岛渔夫》，一是儒勒·列那尔的《红萝卜须》。

前几天，《冰岛渔夫》重印出版了，我买到了一册。最近，一位朋友又送了我一本新版的《胡萝卜须》，但译者不是黎烈文而是徐知免，书名改译为《胡萝卜须》。黎烈文的译本附有大量生动幽默的插图，这一本却没有，但我还是很高兴，将它和《冰岛渔夫》放在一起。

这两本书都写得不坏。我是从《冰岛渔夫》开始认识海的性格和海的魅力的，从而引起了对海的向往。而《胡萝卜须》，我记得在黎烈文的译者前言中介绍，正像阿Q在中国一样，书中所描写的那个被称作“胡萝卜须”的小孩，在法国也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他受到父母的歧视，受到哥哥和姐姐的欺侮，引起我深厚的同情。

而我现在还很喜欢这两本书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当我重读少年时所热爱的读物时，总会引起一些遥远的温暖的回忆，而且我也想比较一下少年时和老年时读同一本书时的心情。相隔50多年了，其间多少风雨，多少坎坷，多少江水已经流逝，但一颗布满创痕的心和一颗纯真的心，却被同一本书激起了同样的波澜，两颗心似乎重叠了起来，似乎岁月在这中间停止了流逝。

热爱生命

怀着沉重的心情到医院去看望一位病重的朋友。我们相交多年，都已进入老年。常常收到一些共同熟人的讣告，感叹之余，有时就不免谈论到“死”，接触到一些哲学家的看法和一些名人泰然面对死神的例子。这位朋友说：顺其自然，也就是征服了死亡，从而得到了自由。

现在，在病房中，他的态度是安详的，平静地谈到自己的病情，自知不起，他说：“那一天终于要来到了。”我说不出任何宽慰的话，而且，我知道那是不必说的。沉默了一会后，他喃喃地说：“说真的，我无力做到那样超然，我还是有所挂牵，有所眷恋，我还有一些事要做，我还想看看世界……”一滴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沉重地滴到了我的心上。它照亮了他的心，或者说，我的心。我们终究是平平凡凡的人，对生命的热爱压倒了在理智中的哲学的思考。

节日的欢乐

1995年我们在家里第一次过“圣诞节”。

我们不信奉宗教，也没有“趋洋”的劲头。12月24日晚上，从国外归来的长子小丹在一家商店买回一株圣诞树，上面缀有一串小小的彩色电灯，挂满了形形色色的精巧玩具。同时，还买回一个一米高的塑料的圣诞老人。那天，孙女汶汶，孙子浩浩和外孙然然正巧都在我这里。他们感到很惊喜，在圣诞树前欢呼、拍手、跳跃。老伴如茵所上的中学是教会学校，参加过唱诗班。她笑着用英语唱起了《平安夜》——在歌声中是不是回想起了遥远的学生时代呢？我和孩子们也跟着轻轻地哼唱了起来。

闪光的彩色的圣诞树，慈祥的圣诞老人，天真的孩子们的欢笑，两个老人和全家的歌声。于是家里就真的有了一点节日的欢乐气氛。无意庆贺圣诞，但毕竟作为“神之子”的耶稣有值得敬佩的地方，这一点欢乐的气氛是可贵的。它将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美好的记忆，而为历尽沧桑的老人带来温暖。

小丹忙着为我们照相。可惜的是，那天外孙女越越没有来。

人生的追求和艺术的追求

歌德说：“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歌德的格言和讲演集》）

这一似乎矛盾的说法两面都有其真实性。

有的艺术家将艺术的创作作为逃避这个世界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他们在所谓“象牙之塔”里沉吟、留连、怀着飘渺的梦想。一般地说，他们大都也的确从中得到了一点温暖的慰藉。而且，他们当中有的人也的确创造出一些精微的艺术品。

有的艺术家——他们的人数是更多的，正是通过艺术与世界结合。他们在创作中反映了对现实的认识、感知，表达了他们的爱憎和追求。他们也有梦想的，但那是现实梦想和梦想的现实。

后一类作品的倾向性是明确的，前一类作品则标榜无倾向性。但许多理论家早已精辟地论证过：那无倾向性也正是一种倾向。那些企图躲进“象牙之塔”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所表达的精神现象和心态，也还是现实世界在他们身上所激起的一种反应，不过是消极的反应就是了。也还是歌德，他在自传《诗与真》的序言中就着重谈到过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他认为艺术家的传记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人与其时代的关系说明，指出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掀动他又到什么地步，他怎样从其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作为艺术家、诗人或著作家又怎样再把它们反映出来”。他甚至说：“一个人只要早生10年或晚生10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他对外界的影响来看，便变成完全另一个人了。”他以自己的自传印证了这一点。无数艺术家的传记都可以印证这一点。

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真正逃避这个世界，或者，与其说艺术家是否能逃避这个世界，不如把问题归结到艺术家对待世界（现实）的态度。

这在我们的艺术家们当然只是常识，因为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老问题。这里重新提起这个问题，并不是无所感触而发的。

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作了简单的狭隘的理解。这一偏向在近10年来正被力图克服，而且收到了实际的成效，产生了大批的真正掌握了艺术特点，真正发挥了艺术效能的作品。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似乎也是针对那一种偏向，有人发出了“远离现实”、“淡化现实”的论调，也出现了一些这一倾向的作品。它们在艺术上有不少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的，但现实的气息淡漠，有的甚至沉溺于个人的小天地中。

决不应强求艺术家去写他不能写、不愿写的题材。不能写——是由于他不熟悉对象；不愿写——是由于对象不能激发他创作的热情。自主是艺术的最高法则。但是，我们又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艺术家应该是和时代同步的人，应该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人。他应该看得更远，对人生有所追求。这样的艺术家，不会是对现实漠不关心或有意逃避的。他促进历史的进程，他分担人民的哀乐。他对艺术的追求应该是对人生追求的体现。

同样的，对于艺术家来说，他对人生的追求应该体现在他对艺术的追求中。作品的现实意义，不局限于题材，至少是，不仅在于题材，也不仅在于作品的表面倾向，而在于作者通过自己的认识、感知所反映出来的现实的深广度，和激发作者并贯穿在作品中的激情。艺术的效果只有通过真正艺术的道路才能达到，而不是简单的、肤浅的对现实的观照。

艺术的追求和人生的追求应相一致。

痛苦孕育辉煌

《艺术的辉煌和艺术家的痛苦》，是我近几年来所读到的文艺论文中颇为喜欢的一篇。全文近3万字，作者是孙子威同志。

首先，看到那题目时我就怦然心动。当有一些作家以“玩文学”自炫时，这里却谈到了艺术家的痛苦，并与艺术的辉煌联系起来。我认真读了全文。文章的中心点是说明辉煌的艺术是艺术家的痛苦的产物。

作者列举了中外一些伟大的艺术家的遭遇和他们的伟大的艺术品为例，并吸取了许多艺术家的创作经验和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在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上展开了他的探讨。作者不是冷静地议论，而是怀着一种迫人的激情。所以，那是雄辩并富有感染力的。——艺术理论，当然需要理智的思考，同时，所说的一切也应该通过自己的心，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枯涩的说教。

我不是要在这里评论这篇文章。我只是觉得这里是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诚然，这是一个不少理论家探讨过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老的话题。但是，看一看当今某些艺术家的精神状况，他们对待生活和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这个话题的重新提出又是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将艺术家的痛苦分为三个方面来谈。

一是生活上的痛苦。这不是指一般的穷困和不幸。主要的是，由于他们的性格和理想追求为自己所带来的悲剧性的命运。他们有强烈的爱憎之心，敢于作是非之辩，不愿随波逐流，不肯趋炎附势。因而容易遭受冷遇，招来迫害。有的穷愁潦倒，道路坎坷，郁郁以终。有的横遭诬陷，身陷囹圄，死于非命。

二是精神上的痛苦。主要的是由于自己的远见卓识不为世人所理解而造成的痛苦；由于追求品德的自我完善，维护人的价值准则与人格尊严而造成的痛苦；由于自己的社会理想不能实现而造成的痛苦。以及男女之恋，亲子之情，世事之飘忽，人生之无常，等等。

三是艺术上的痛苦，这种痛苦集中反映在艺术家能否按照自己的美学理想，进行个人的自我创造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的独创性往往是对既定艺术规范与传统美学的一种挑战，对公众审美趣味与审美习惯的公然亵渎，这就必然招致阻力，受到冷遇。因而这样的艺术家常有一种深深的寂寞感。——作者主要是从这一点上谈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上的痛苦的。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一点，即每一件艺术品的创作过程中，艺术家所经历痛苦。他要紧张起全部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象中去，与对象搏击，从中追求真实，升华自己……每一件辉煌的艺术品都有其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浸润着艺术家的心血，也即艺术家的生命。当然，创造过程中的痛苦也可以说是创造的欢乐。

具体到每一位艺术家身上，都有各自的个性，各自的经历，各自的遭遇。然而，从生活、精神，艺术创造上来概括艺术家的痛苦，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作者也指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

艺术家的痛苦有其社会原因。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他们当然不乏才智，也有普通人的对幸福和安定生活的渴望。然而，由于他们对人生的执著，对理想的追求，对艺术的忠贞，从而造成了自己的不幸，甚至是悲剧性的命运。

但正是从艺术家的种种痛苦中孕育出了丰硕的果实。坎坷的道路使他们得到较广阔的生活经验，较深刻的人生体验。这正是艺术创造的源泉。他们所热爱的艺术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的痛苦需要倾诉。他们要通过艺

术的创造去表达他们对生活、对人生的认识，并寄托对理想的追求。对人生的执著体现在对艺术的执著中。所以，他们的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他们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真诚的。这是创造一件好的艺术品必要的条件。而由于他们的崇高精神和激情又使作品闪现着一种光辉并照耀着他所描述的对象。——辉煌的艺术有如凤凰，从艺术家的痛苦的烈焰中飞腾而出。

如果没有辉煌的艺术，历史将多么暗淡，人类将多么寂寞。它们给世世代代的读者带来了愉悦、启示和希望。这是人类的幸福。对于艺术家本人来说，他们的生命得以在所创造的艺术中延续并活在读者心中，也将感到慰藉吧。

仅凭才气、智慧、学识，是创造不出辉煌的艺术的。至于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生活，以轻佻的态度对待艺术，更与辉煌的艺术无缘。能强烈地感染人、震撼人的艺术，不仅是由于其内容，也由于跳动在其中的艺术家燃烧的心。艺术与生活血肉相连，艺术家的人格和艺术浑为一体。伟大的贝多芬说：“以痛苦换来欢乐！”这对于当代艺术家还是一声响亮的呼唤！艺术魅力一例

偶然的的机会，看了一部美国电影《难忘的童年》。我从未听到和看到有人提到过这部电影。我看过后却很受感动，和我同看的妻子也说：“像一首小抒情诗！”

很简单的情节，主要表现的是一个老人和他的十岁的孙子之间的感情。退休下来的老人花了不少精力养鸽子。在他的影响下，孙子也欢喜鸽子。那天，他将一只最心爱的鸽子送去参加一次比赛。参赛的鸽子将被运到 600 公里以外放飞。他希望心爱的鸽子能够胜利，却又担心它能不能从这么远的地方飞回家。而就在这一天，老人突然中风倒下了，被送进医院抢救后，病情稍有好转，但还常在昏迷中。孙子常常瞒着严厉的父亲，不上学而到医院去陪伴祖父。祖父也因有他在身边而感到安慰，祖孙俩都很惦念那只在远方的鸽子的命运。那只鸽子有时在阳光下，有时在风雨中，飞越草原、森林、湖泊……起飞不久就被老鹰啄伤，在一次休憩时又受到猫的偷袭，快到家时又受到打猎少年的枪击。但它忍受着伤痛，以坚强的毅力向老家奋飞，奋飞……几天后，孙子听医生说祖父已经病危。他不愿意（而且他知道祖父也不愿意）让祖父死在陌生地方的陌生的床上。他在夜半偷偷地用祖父送给他的一部小拖车将垂危的祖父送回了家。那个黎明，孙子在门外的草地上站着休息，突然发现那只鸽子——已经受过重创。他为已失踪的鸽子终于飞回了家而狂喜地奔向卧房，想告诉祖父这个好消息，却发现祖父已经去世了——老人也已回到了他所来的地方。

影片是以已成长为一个中年人的孙子回到故乡开始的。显然，他外出已多年。他回来是为了出售旧居和这片土地的，由于近年来的开发，这片土地已很值钱，他在颓败的旧居和已摇摇欲坠的小鸽屋前徘徊。他 10 岁时让鸽子参加比赛的那一天的情景浮现在眼前。他说：就是在那一天结束了他的童年的。也许祖父的离去使他第一次体会到死别的悲哀，也许那只冒着艰险负伤奋飞的鸽子启发了他向一个目标顽强突进的意志。虽然遥远而又历历在目的往事使他又重温了宝贵的童年时光，祖父对他的感情和他对祖父的爱。他感觉到这座旧屋和这一片土地的纪念意义和在他生命中的意义，那是任何高价都不能换取的，所以他决定不予出售，影片的结尾是，若干年后，旧宅又恢复了当年的风貌。他自己也已成为祖父，牵着孙子的手在草地上散步，一如

当年祖父牵着他的手。世道沧桑，但人间的这种真情传了下来，而且还将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

平平淡淡的情节，平平凡凡的人物，一只小小的鸽子，但其中激荡着感情的波澜，牵引着并感染着观众的心，在我更是别有情怀。我想起了幼小时祖父牵着我的手在大街上散步的情景。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我又常常带着孙辈散步。影片中所表现的祖孙之间的感情，我在两方面都能有所体会。我也喜爱那只朝向一个目标奋飞的鸽子，它对我也有所鼓舞。

这部影片没有浓厚的社会内容和历史内容，它只是抒情性的小品。而在我看够了那些充斥市场的媚俗性的影视作品（也包括一些小说创作）后，它使我感到亲切和喜悦。影片的编导者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生活和对待艺术创造。作品质朴、清纯，富有生活实感，其中又浸润着脉脉情愫，因而使观众能渐渐进入到情境中，受到感染，受到心灵的净化，并得到审美的愉悦。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效果。这种效果是与“玩文学”的作品无缘的。

安娜是怎样进门的？

——谈作家的体验

列夫·托尔斯泰的次子伊·列·托尔斯泰在他的一篇回忆录中写着，当他7岁时，有一次和他父亲一道骑马，他父亲转过脸来向他说：

“你知道，伊留沙，我今天非常满意。我为她苦恼了三天，怎么也没法让她走到屋子里去。没法，就是没法。一切都不知为什么不是那么回事。今天我才想起来了，哪个穿堂里都有一面镜子，每个女子头上都有一顶帽子。我一想起这一点，她就活了，该做的事她就做了。看起来一顶帽子是小事，原来就在这顶帽子里包含着成败。”

这里，托尔斯泰说的显然是《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将要和她儿子见面的那回事。

这一则片断的回忆是发人深省的。

它说明了托尔斯泰对待创作是多么认真，当他突破了在创作中的一个障碍时是多么高兴，他甚至迫不及待地这样细微的艺术上的感受，说给一个在当时未必能和他抱同感的7岁的孩子听。

更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这里牵涉到的不是作品的总的构思，不是一个复杂的情节，而仅仅是一个细节，一点小事。安娜与渥伦斯基相爱后，和他的丈夫卡里宁决裂了，他们唯一的儿子谢辽沙留在父亲那里。在分开了一段时间以后，安娜异常想念她的孩子。她煞费苦心写了一封信给她丈夫，要求他的宽大，让母子能够一见。但丈夫冷酷地没有给她回信，她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和伤害。而对孩子的思念又是这样热切，于是，她决定冒着被丈夫碰着当面受辱的风险，偷偷地回到她从前的家去看看儿子。

作家在这里感到了困难：安娜将怎样进门呢？

对于某些作者来说可能是奇怪的：这怎么能算是一个难题呢。重要的是她怎样下决心看她的儿子，和她见到儿子的场面。至于如何走进去，那是一个无关宏旨的细节，她可以悄悄走进去或是径直闯进去。不是么？

然而托尔斯泰却为此足足苦恼了3天。他怎么也没法让安娜走进她从前的家里去。“没法，就是没法。”

为什么呢？显然地，那是作者在设身处地地想。像安娜那样性格的女子，在那样的情况下，她有着怎样的心情，在这种心情下她的行为将是怎样的。而托尔斯泰苦恼的是，他一时还没有能够体验到安娜当时的心情。

终于有了突破。他对儿子说：“今天我才想起来了，哪个穿堂里都有一面镜子，每个女子头上都有一顶帽子。我一想起这一点，她就活了。”他甚至说：“原来在这顶帽子里包含着成败。”他说得比较简略。我们也可以来设想一下，他的意思是，安娜激动而又慌乱地走到了穿堂，在一面大镜前站下来了，看了看镜中的自己，整理了一下头上的帽子，她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镇定下来，也为了希望自己在儿子眼中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不是那顶帽子有关系成败的重要性，而是由于想到了安娜头上的帽子，作者觉得自己体验到了她的心情，想象到了她将怎样做。所以他说，这样一来，“她就活了”。

但是，对照着小说来看，托尔斯泰却并没有采用帽子和镜子的细节。他是这样写的：

“第二天早晨8点钟，安娜从一辆出租马车里走出来，在她从前的家的大门按了铃……，一个安娜所不认识的小伙子，刚替她开开门，她就进来

了，在她的暖手筒里掏出一张 3 卢布的钞票，连忙放在他的手里。”接着，她说了她儿子的名字，于是向前走去，她没有听见那个小伙子对她的问话。“她怎么也没有预料到这幢她住了 9 年的房子的丝毫没有改变的厅的模样，会这样深深地打动了她。欢乐和痛苦的回忆接连地涌上了她的心头，她一刹那间竟忘了她是来做什么的了……”

托尔斯泰原来苦恼于他不能体验到安娜走进她以前的家时的心情。后来，他兴高采烈地感觉到了他可以通过镜子和帽子的细节描写她的心情。但是，当他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体验到安娜走进门以后，首先打动她的，应该是她在这里生活了 9 年中的一些欢乐和痛苦的回忆，这些突然涌现的回忆是这样强烈，以致在一刹那间使她忘记了来看儿子的事。在这样的心情中，帽子和镜子都用不上了。——这样写是更自然的，更合乎情理的。

就是这样一点细节，却有着这样多的周折，花费了作家这样多的精力和心血。

托尔斯泰的经验又一次告诉我们，作家笔下的人物决不是可以随便摆弄的木偶，那必须是有感情、有血肉的活的人。作家必须设身处地地想，按照人物的性格，在某种情况下，他应该有着怎样的心情和怎样的行动。作家必须和他的人物融合在一起，与人物共悲痛、欢欣、苦恼、忧虑……，一刻也不能失去和人物内心的联系。借用一个表演艺术的术语，那就是，作家必须“进入角色”。作家不能只是简单地、外在地描写他要创造的人物，而是要变成他的人物。作家的创造和演员的创造是有着共通的地方的。不过，作家比演员更困难的是，演员所要扮演的角色，是剧作家已经创造出来的，他只要设法进入到那角色中去，而作家却必须自己去创造人物。在一个剧本的演出中，演员所要体验的只是一个角色的心情，而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却要体验他所要创造的每一个人物的心情，在作品的每一个人物中，都有着作家的感情的烙印。甚至在描写动物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想一想，杰克·伦敦在《荒野的呼唤》和《雪虎》中是如何描写狗和狼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无所不在，一如人们所说的上帝在人间。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高里奥老头病危的时候，巴尔扎克脸色苍白，他说：“我要死了。”所以胖胖的福楼拜可以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所以屠格涅夫代他的人物巴扎洛夫写日记，用巴扎洛夫的眼去看世界，通过他的感受去观察世界。

当作家开始执笔的时候，他当然已有了一个大纲，一个初步设想。在创作过程中，他必须走进他所要创造的天地中去，置身于其间，同时他又必须让他所要创造的一切通过自己内心熔炉的冶炼。创作过程也就是紧张地再生活和再体验的过程。在这中间，作家往往不得不修改甚至推翻他原来的设计和安排。人物当然是作家创造的，但一当他被创造出来，他就应该取得他自己的性格，有他的个性、欲求，作家就再也没有权力随便摆弄他，人物只能依照他的性格活动，说他自己的话，做他需要做的事，有他自己的命运和结局。

正因为如此，所以普希金说，达吉雅娜真会和我开玩笑，她竟出嫁了。所以列夫·托尔斯泰说，没有想到安娜竟会死在火车轮下。所以阿·托尔斯泰惊奇而又饶有兴趣地注视着自己笔下的人物，不知他下一步将会做什么。

作家在创造过程中有时废寝忘食，如痴如狂，就正因为他是沉浸在他所创造的天地中，与他的人物紧紧融合在一起，体验着他的人物的感情，与他

的人物一道去经历各种各样的生活。在他的笔下产生的是有血肉的活人，涌现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创造的欢乐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人的心情是复杂、微妙、细致的，有时作家一时体验不到人物在某种情况下的心情，如托尔斯泰开初不能体验到安娜如何进门的心情，他就会产生苦恼，无法下笔，创造的艰苦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当作家与他的人物的心情交融在一起时，读者也就能与作品中人物的心情交融在一起。读者是通过作家的体验而体验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当然，这里面也有着读者自己的体验。当作家失去与人物的内心联系，而仅仅只作表面的描写时，那么，肯定的，读者也就会失去与人物的内心联系。当作家只是冷淡地想象时，那么，他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能吸引人的，即使他编造的是一个异常曲折的故事，那也只能引起读者的一点好奇心，而不能受到感染。

《红楼梦》描写的是 200 多年前的古代人物，《战争与和平》描写的是 100 多年前的外国人物，但那些人物于我们是如此熟悉，如此亲切，我们能理解他们的每一个细致、微妙的感情。但是，一些当代作家笔下的当代人物，我们却往往感到很隔膜，我们不能分担他们的感情，因为我们不能体验他们的感情。他们做一些看来是合乎他们性格的事，说一些听来似乎是合乎他们性格的话，在我们的感受上却是不真实的。因为作者只是在外在地叙述和描写，而没有进行体验。

作家所写的不仅应该是他在理性上认识到的东西，而且必须是他在感受上所体验到的东西，要求的是这两者的统一和融合。艺术的真实感是从这里产生的，艺术的感染力是从这里产生的。

为了去看望自己的儿子，设想安娜如何走进她从前的家里去，为这一细节也值得苦恼几天，而且一改再改吗？是的，托尔斯泰——正因为他是艺术大师，就是如此。绿原的一首佚诗

最近，绿原来武汉，我们相聚了 10 天。在他于 1953 年从武汉迁居北京后，我们有过一些见面的机会，只有这一次相聚的时间最长。在畅谈往事中，他提到了我 50 多年前写的一篇短文，问我是否还保留着。

当年我写的东西散失了不少，这篇短文却保留了下来。题名是《友情底路碑》，副题“赠 L·Y”，即是送给他的。文末标明的写作时间是 1942 年 4 月，地点是重庆北碚，发表在当年靳以先生主编的《现代文艺》的某一期上。

绿原提到这篇短文还有一个原因：那里面引用了他的一首诗。这首诗没有正式发表过，也从未收进集子。他已忘记写的是什么了。诗很短，且抄录在这里：

我骄傲
生活像风景

第一，行走在阳光的踪迹里
第二，高声说话
第三，写着诗

从空间走来
向时间走去

我死了
让人类底歌
抬起我的棺椁

这首小诗，他寄给胡风先生看过，绿原告诉我，胡风先生提了一点意见，我已记不清原话，主要是对将生活比作风景不大满意。我们知道，胡风先生一向是强调作家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的，当时正是浴血抗战的时期，而且我们生活在严酷的国统区，将生活比作风景是有些轻飘了。

我是最初读到这首小诗的朋友中的一个。我们相聚在北碚黄桷树镇。共同编辑《诗垦地》丛刊，朋友们写了诗，都要传看的，我颇喜欢这首诗，就在前面说到的纪念我们友情的短文中，分段加以引用了，并叙述了我的一些联想。

写这首诗时，绿原是 19 岁，他那一时期写的诗不少，后来结集名为《童话》出版，是胡风先生编的《七月诗丛》之一。十多年前，我曾经这样谈论过他当时的诗：“他是用少年人的眼睛去看世界。现实世界通过他纯真的心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变形成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那些诗，是一个还没有真正走进生活的少年对生活的憧憬和赞美。”因而，他在这首诗中说“生活像风景”，我认为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他是想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一如他热爱大自然的风景。所以，他接着表白，他要行走在阳光的踪迹里，要高声说话，要写着诗。最后一段，他说：“我死了/让人类底歌/抬起我的棺椁”，这表现了一个青少年的雄心，也表明了他是企图为人类工作，希望得到人类的承认和纪念。

诗写得简练，有点朦胧，浮浅了些。但我感到，还是有着某种魅力。他是不必让它埋没的。

去年编文集时，那篇短文是在手边的。我感到文字和感情都有些矫饰，就没有编入。其实，现在想来，还是有一点意义的。那不仅是我们友情的纪念，也可以看出我们当时的精神状态和向往。短文题名《友情底路碑》，而我们当时结识还不到半年。我们同岁，又是小同乡。初见面就亲热无比，坦诚相见。当时只能算是友情的起点，其后的 50 多年，在时代的风雨和各自的坎坷生涯中，一步一步印烙下了我们友情的足迹。这是很可珍惜的。特别是想到当年的老友还健在的已很少了。

翻看今年的《诗刊》第二期，发现有曹禺先生的四首新诗，感到意外的喜悦，当即阅读了两遍，受到了感动。

曹禺是很有才气的杰出的剧作家。从他的剧作中，我常常领略到浓郁的诗的境界。在《家》、《胆剑篇》、《王昭君》几部剧中，有些对话采用了诗的形式和诗的语言，那也的确是好的诗。他也可能写过一些新诗吧，但我正式读到他的新诗这是第一次。

这四首诗，两首写于 1988 年，一首写于 1989 年，一首写于 1995 年，都写于北京医院。可见他卧病已很长久了。写前三首诗时，他将近 80 高龄，写后一首诗时，已是 85 岁的老人了。诗都不长，但有其分量。特别是当我想到这是一个有成就的剧作家，一个长为病魔所困扰的老人所发自内心的沉吟，就更感到它们的价值。

《病中噩梦》有几句前记：“病中夜半，噩梦一个连一个，醒来，耳边留着薄暮遥远的钟声。我想起法国画家（Millet）的画有晚钟，想起在田地里虔诚的农妇的祈祷是多么朴实，多么安详。我借用钟声写了下面的诗。”

他写到古寺的晓钟幽幽传到他的心里，那静穆的钟声当给了他以圣洁感。他想写一点什么却又无力，于是，他只能祈祷。紧接着，情绪一转，出现了月夜闪着绿眼睛的狼的哀嚎，脚下湿漉漉踩着响尾蛇的嘶叫，没有脸的人把他乱舔，并对他说：“你没有舌头，没有手。”他恳求要一点空气，而只有地狱的风吹来天空低沉的乌云。于是，他说：“我不能祈祷，我怎能祈祷。”老人在他的晚年没有安详的心境，却频频为噩梦所扰，这首诗写的是他从噩梦中醒来的心情，我以为也反映了过去年代中积累下来的内心创伤的烙印。诗写得有些隐晦，我不想深究，也难以深究。《一片绿叶》写的则是在大树里深藏的一片绿叶在他心中引发的生命的喜悦，也是老人对新生一代的赞美和祝福。《老了》一诗则表现了他的老伴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深深感动和感激的心情。结尾说：“我们是黑夜的萤火/星星发亮的正是我们。”是的，这一对老人是萤火，他们并肩齐飞，相互照亮。这是一首满含至情的诗，温暖着读者的心。

我想着重谈一谈另一首诗《如果》，诗不长，抄录在下面：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能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敢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再不愿终身
这样存有戒心。

多么深沉的感慨！多么沉重的自疚！短短的六行诗，肯定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一定有许多令人叹息、令人愤懑的故事。我们都曾在某种不正常的气氛中生活，彼此怀着戒心，自己既不能对人敞开心怀，旁人对自己也不能以诚相待，因而就只能说一些空话、假话，违心的话，甚至不得不伤害友人。以此作为进身之阶的宵小之徒该受到诅咒。迫于形势，不得不尔，而内心痛苦的人，我们就原谅他吧。正如耶稣对一群准备以石头投掷一个被捉住的行淫的妇人时所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打她。”——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有“没有罪”的呢？！过去的已经过去，重要的是汲取教训，对自己要有一个作为人的要求和作为一个人的勇气，当然，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允许一个人作为人的宽松的环境。曹禺能够直率地以反省的心情写出这首诗是值得珍惜的，而且证明我们是处于一个新的时代。

我原还想联系这首小诗谈一谈他解放以后戏剧创作的情况，但那就太费篇幅了。我只想表达一点惋惜的心情。前八年出版的《曹禺选集》所选的三个剧本都是解放前写的。解放以后的几十年中，他也写了几个剧本，却没能达到过去的高度，虽然那时他正值盛年，应该有更辉煌的成就，那原因是值得想一想的。

曹禺是我敬爱的剧作家，少年时从《文学季刊》上读到他的《雷雨》一剧，就兴奋不已。当时和朋友们还排演过这个戏，我饰演周冲，导演是现在上海的殷振家。整整60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恍如隔世。

雪峰的评语

谈到作家对待生活和对待创作的态度，我想起了 50 多年前与自己有关的一点往事。

1944 年冬或 1945 年春，我将自己写的一个独幕剧的原稿请诗人伍禾转交给雪峰先生看看。那时伍禾刚从桂林来重庆不久，在经营由胡风先生主持的南天出版社，和雪峰有一些交往。不久，伍禾将原稿退还给了我，说雪峰认为作者有点“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为我辩解了一通，云云。我默默地收回了原稿，但心里受到了震动。

那剧本是 1943 年春在贵州省毕节县写的。那时我在川滇东路公路局当一名小职员，无多少公事办，我就在上班时间偷偷写东西。其中有两个独幕剧。因为要装作是在办公的样子，是用毛笔在公文纸上直写的。一个剧名是《同病相怜》，收入到徐昌霖编的《处女的心》独幕剧集中。另一个剧名《桃园记》，雪峰看的原稿就是这一个。写的是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想在重庆一条陋巷的一间小小的木板房里，甜甜蜜蜜地生活，建立起他们的桃花园。但邻居的挑衅，警察的查询，小学生来为前方战士募捐，飞涨的物价……使他们一刻也难以安宁。最后，他们自己也争吵起来了。——我是企图通过这一对小夫妻的遭遇表明，个人不能与社会隔绝，尤其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在反动政治统治下的这座腐烂的大都市里，任何想在小天地里安逸地生活都是绝不可能的。立意不算错。但对那一对年轻的夫妻——两个可怜的小人物，我采用的只是嘲弄的态度，而且为了追求廉价的喜剧效果，有一些手法用得也有一点流于庸俗，这当是雪峰批评我“玩世不恭”的原因。

我不认识雪峰，但他是我敬佩的理论家、诗人，我也从朋友处听说过他的一些情况，也很敬佩他的为人。所以，他的评语在我心中是有分量的。不久后，我又读到他的一篇文章，谈到他偶尔翻看了徐讷（也许是无名士，记不大清了）的一本小说，看了几页就放下了，他已谈出了作者的灵魂。我当即又联想到他对我的评语，心又颤动了一下。

1976 年 3 月，我写过回顾自己创作道路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我不必掩饰我在 20 岁前后的种种缺点：骄傲、虚浮、锋芒毕露，生活上的吊儿郎当，思想上在进步外衣下掩盖着的小资产阶级情怀。在沉重的民族灾难中，在抗日战争的浪潮中，在反动派的黑暗的统治下面，我却浮游在自得其乐的小天地中——这是指生活状况，也是指精神状况。我自以为反抗着什么，追求着什么，多次的政治迫害增加了我的骄傲的资本。不能说我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我只是这个大时代的可笑的‘骑士’而已。”当时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所以说得可能过分了一些，但大抵是如此的。我想，我的那个独幕剧多少反映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所以雪峰作出了那样的评语。

就在雪峰作出对我的评语前不久，也是伍禾转告我，说胡风认为我有几首诗，表达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这两位大家对我的批评，曾引起了我的反省，对我后来在创作上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桃园记》我没有找机会发表，但一直保留着，在 1955 年反胡风的风暴中被公安系统抄走了。在我的问题终于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后，经过了 25 年，又奇迹般地发还给了我。我将它珍藏了起来，无论对于雪峰当年所对我的启发还是对于后来的大劫难，这个剧本都是有纪念意义的。

读《诗人的送别》

这是一篇散文，也是一首诗。

说它是诗，是指在简短的篇幅中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在朴质的语言中融贯着深切的感情，因而引起读者心的颤动，产生了诗的魅力，达到了诗的效果。

记述的是一位诗人和他的终生伴侣死别的前后情景。作者没有采取平铺直叙的方式，他用了极为简练的笔触写意似地勾画了几个生活场景。那中间闪现着诗人的形象和心情，也折射出了离去者的面影和心情。而那中间也寄托着作者对离去者的悼念，对诗人的祝福。

文章是平稳地以低沉的音调开始的。诗人的生活乱套了。不知道换洗的衣服该放在什么地方。每天早晨再没有人将牛奶放在他桌上了。当他埋头在书案前时，似乎听到了他已习惯的轻手轻脚的声音。回头一看，却没有人。妻子已经进医院了。——这几个细节不仅写出了妻子不在时诗人失常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也侧写出了妻子一向对他的体贴和无微不至的照料。她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她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离不开她，他不能离开她。

通过这样的感情的铺垫以后，音调逐渐转入悲怆。

他是因她的病从国外赶回来的。她在病床上等待着他。为了等待他，她用尽了生命的最后的耐力。

他照料她，在她最后的日子。他感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她曾照料了他一生。

她在垂危中，既不喊叫，也不呻吟。是温柔的爱心使她坚毅地默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她不愿伤他的心，不愿他为她而难过。她的眼光甚至带着歉意。那闪耀着最后一点生命之火的眼光说：“你看，我不能再来陪伴你了，我不能再来照料你了。”

诗人怎么能不怀着沉重的感激的心呢？他的心怎么能不像琴弦一样颤动呢？

而且，读者的心怎么能不像琴弦一样颤动呢？通过以上两节，我们感觉到了他们是怎样相依为命的伴侣，他们之间的纯净的真挚的感情。读者的心沉下去了。乐曲逐渐推向了高潮。

她终于离他而去了。作者只用了这样一句话来表达诗人的心情。他喃喃自语：“她走了，我留不住她。她远行了。”这句朴素的话中蕴藏着多么深沉的悲痛，令人一哭。于是，我们完全可以体会紧接着的下句话：“前来慰问的人太多。——他想去寻找‘瓦尔登湖’。”诗人实在无力接待那些关切他的友人，虽然他当然是感激他们的。他要逃避，要静一静，以独自消化那难以消化的悲痛。他很自然地想到了“瓦尔登湖”，那是美国作家梭罗笔下的一个远离尘世的地方，诗人是这本书的中译者。

这一节是最简短的，只有两句话。然而达到了悲怆的高潮。

接着，我们听到了深沉的安魂曲。诗人在妻子的遗容前朗诵了一首诗。然后将花瓣洒在她身上。他凝视她安详的脸。他想，她当进入天国。他告诉孩子们，将来在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和她的骨灰掺和在一起，洒在长江口，流归大海……——呵，这样美丽而庄严的悼念，这样至死不渝的爱情！

曲调转入舒缓和哀婉。诗人清理妻子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40年前的照

片：他和妻子，还有许多朋友手挽手的照相。作者写了一句：“阳光在脸上跳跃。”这是纪实的。然而，也暗示着欢乐的青春。于是，诗人记起了一支歌：《那时我们还年轻》。这是施特劳斯有名的歌曲：“那时我们还年轻，在五月一个美妙的早晨……”诗人回忆起他们热恋的时光吗？诗人曾向她唱过这支歌吗？下面，作者写了一句：“可照片已发黄了。”岁月流逝，人已远去。我们似乎看到了诗人凝视照片时眼中的泪光。多少回忆，多少怀念，多少感叹……

然后，乐调从哀婉渐渐转向了高昂。

他喜欢诗和友谊。喜欢生活。喜欢幻想。喜欢未来。还有许多事情等待他去做。他以诗歌作为风帆，航行世界。——这每一个短句掀起一个比一个更高的激情的浪涛。我们似乎看到诗人从发黄的照片上仰起了头，望向前方。于是，乐曲终止在一个强音上：诗人永远不是孤独者！

这篇散文哀惋，但并不凄切，爱的光辉使沉痛升华为庄严。这是一曲挽歌，却给人以生命的希望。它告知我们——不，是诗人以他的榜样告知我们，应该怎样去爱。

这篇散文有些细节写得这样具体，而又写得这样简洁。作者善于选择细节，也深知如何运用艺术的含蓄。全篇融贯着感情，那感情是凝炼而真挚的，作者不让一点任何浮夸的语言去损害它。

我读这篇散文不止一次了，每读一次我的心也都像琴弦一样颤动。它就有着这样的感染力。

也许，还有这样一个原因：我认识诗人，也认识他的美丽、善良的妻子。当他的妻子弥留的前后，我都见到过诗人。我了解他当妻子住院后慌乱、焦虑的心情，也了解他在妻子离去后的哀伤的心情。在那几次见面中，我都只是讷讷地说了几句简短的话。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我乐于介绍羊翠的这篇短文，它表达了我感受到的东西，它表达了我也有的心意。

这位诗人是徐迟。时间又已过去一年多了。离去者当已进入天国。而诗人正在人生的海洋上继续扬起他的风帆！

1986年3月31日

喜读《天歌难再》

收到了范春歌新出的一本书《天歌难再》，随手翻开看看感到了兴趣，竟一口气读完了，引起了心的震动。

这是一本有特色的书，有个性的书。而且，是一本美丽的书。

它的特色，首先表现在内容上。书的副题是“独身中国陆疆万里行”。作者从丹东中朝界河鸭绿江入海口出发，逆时针方向沿边陲采访，终点是广西中越界河北仑河入海处。时间长达半年，行程两万多公里。她经历过一般旅游者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艰险，她看到过一般旅游者难以见到的景色，她享有一般旅游者难以碰到的奇遇。因而，这本书就不是一般的游记。在我的感受上，作者孤身一人在这漫漫旅程上的种种遭遇和种种感受，比她笔下的景色更能吸引我。

我说这是一本有个性的书，主要则是指活跃在书中的作者的性格。她不是没有估计到这次旅行的困难和艰险的。她知道，归期难测。她说：“没有人命令你走，申请报告是你自己写的，路线是你自己定的，那柄悬在头上的达摩克斯剑是你自己挂上的。”她向亲友告别，毅然上路。为什么？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朝圣。”用她一位朋友的话说，这是“体验生命”。

旅程路线是在祖国边疆，她所经过的大多是一些偏僻的小城、小镇。交通极为不便，主要是乘长途汽车，路况险恶。途中的种种困难、艰险当比她预料的还要严重。而且，好多次她与死神打了照面，后来擦身而过。她也感到过惊恐，也有几乎招架不住的时候。但她总还是不失人的尊严，在她，特别注意到女性的尊严，而闯过了重重关口。一位解放军军官说得好：“你的勇气就是你的通行证。”

在书中，除了可以看出她的倔强和勇气外，也可以感觉到她对人性的通达，她对那些在高原上筑路的工人，守卫边防的战士……以及那些普通的人民的诚挚的感情。而她也在感情上得到了回报。这就为她创造了一些机缘，使她得到了一些照顾和方便，而在心中感到了温暖。这种温暖一如她遇到的困难一样，一直贯穿她漫长的旅程。而且，她说：“那些看似平常却高尚的人，总是给我灵魂上的照射，在我迷惘之时，甚至挺不住的时刻，闪现圣洁的灯火。”

我说这是一本美丽的书，则是指洋溢在书中的那种追求的激情，那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以生命在汹涌的巨浪中横渡的意志。作者说：“只要世界上有路，就有上路的；有天职在，就有听从召唤的；有死神，就有敢去赴约的……与其说我们血液里有某种因子的注定，不如说是我们自己抉择了我们自己。”

这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她自己选定了旅程。她毅然上路。她经受了严酷的磨炼。她多次面对死神。她以自己的行动印证了自己的话。她配说这样的话。

也还是用她自己的话说，通过这次旅程，“用生命丈量了我深深热爱的幅员辽阔的祖国疆土，并从中汲取了受益终身的生命原汁。”

“天歌难再”，是的，她不可能再有机会去重复这次旅程了。然而，对于她来说，面前还有更漫长的人生旅程。我相信，她也会对未来的目的作出抉择，而在这次边疆旅行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意志，所汲取的“生命原汁”，去跋涉，去攀登，去克服重重困难险阻，去面对死神的阴影……朝向目的前进。她可能终身达不到目的，也可能达到了目的而非她原来所想象的。但她

可以在将来回首一望时自慰地说：“我在圣洁的神的感召下追求过，我没有虚度我的一生！”

我赞赏这本书，我是赞赏一种精神。很少在当代的中青年中，在当代的文艺作品中，感受到洋溢在这本书中的那种精神了。而我自己，作为在年轻时也有过梦想，也经历过坎坷和风雨的老人，读完这本书后，引起了许多回忆，并听到了青春的呼唤。

1996年6月14日晨

伦蒙的苦恼和喜悦

屠格涅夫在他的著名的长篇《贵族之家》里，描写了一个音乐家创作的三种情况。

一个流落在俄国的德国音乐家伦蒙，他善良、诚实，有着非凡的品质，也有着相当高深的艺术修养。然而，多年漂泊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几乎摧毁了他的灵魂。在他的潦倒暮年，孤零零地住在一间破败的小房中，依靠教几个学生餬口。

在一个春天的夜间，在一辆从乡村驶向城市的马车上，一向孤僻、沉默的老人为春天、静夜的一切魅力所感染，主动地和陪送他的一位正直的绅士谈起天来了。谈到音乐、爱情，谈到夜空中闪烁的星星，谈到他最喜欢的一个女学生……当夜，他在床边坐了很久，膝上摊开着一张誊写乐谱的稿纸。他好像感到了一个甜美的、从未听见过的旋律的临近；他的心在燃烧，在激动，他已感到了那神奇的临近所带来的愉快和慵倦……然而，他到底无法促住它……他颓然地倒在了床上。

有经验一点的诗人和艺术家大概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为外界的某种情景所打动，心里产生了激情，有了创作的欲望。然而，他的感受和感情还是朦胧的，飘忽不定的，他无法把它明确地表达出来。这种创作的欲望是可贵的，然而要使它更成熟起来，更升华一步，以进入真正的创作，有时也并不是那样容易，往往也就废然而止了。

如果一定要勉强自己写，那就会产生另一种情况。

伦蒙在那个春夜以后几天，依照一首德国古词谱写了一首罗曼曲，那首古词说的是天上的星星。这显然与他在那个春夜的感受有关。他最心爱的学生在钢琴上为他试弹了那支曲子。很不幸，那音乐好像有些混乱，并且因为刻意求工，反而显得拘谨。显然，他原来想表现一种深邃的热烈的热情，可是，却没有成功。努力，不过是努力而已。因为，他在感情上并没有达到那种高度。他想从技巧上去弥补，但任何刻意求工都不可能表达出内心所没有的东西，即使用了一些热情的语言，那表现出的也只能是一种浮夸的感情。

但是，伦蒙终于写了一首成功的曲子，那是他怀着祝福的心，为他最心爱的学生丽莎和她的初恋的情人拉夫列茨基写的。在一个深夜，他为拉夫列茨基弹奏了这支曲子。那优美的、热情的旋律，从第一个音节起就抓住了人的心弦，它充满着灿烂的光辉，充溢着幸福、美丽和灵感的火焰，它抑扬着，它申诉着大地上一切亲爱的、神秘的和圣洁的物事；它呼吸着那不死的悲哀——于是，飘逝了、死寂了在遥远的天际。在神奇的乐曲中，可怜的小房变得犹如圣殿。他的唯一的听众拉夫列茨基，因为出神，脸面变得冷而苍白，那乐声一直沁入了他的心灵深处。他刚刚与丽莎幽会后分手，第一次相互倾吐了爱情，他的心还在因强烈的爱情而震荡，而他听到的这支乐曲本身就是燃烧着爱情的。

屠格涅夫以诗意的笔触描写了那乐曲所达到的境界，其实，那也可以用来形容一切达到了诗的高度的艺术品。他也写到了艺术的真正的效果：一直沁入人的心灵深处。他没有直接写到伦蒙创作这支乐曲的情况，而只简单地说那乐曲是燃烧着爱情的。这也就够了，音乐家所谱写的一切都为作者内心爱的火焰所照耀，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如何如痴如狂地沉浸在他歌唱的对象中。

同一个作者，几种不同的创作情况，有时写不出来，有时写出的是失败

的作品，而有时写出的是优美的作品。这关键是作者对现实感受是否深刻，创作过程中感情是否真挚和饱满。

伦蒙在不同的创作情况下，有着不同的态度。当他只有朦胧的感受和感情，有创作的冲动却写不出作品时，他是苦恼的。他颓然地叹息：“我不是诗人，不是音乐家！”他勉强地写出一个作品后，一听旁人试奏，他就感受到了其中虚浮的东西，因而羞愧地低下了头来，挟着乐谱赶快跑掉了。这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音乐家的艺术良心。而当他怀着激情，创作出发自内心的作品时，他——一向谦卑的老人，潦倒的音乐家，两眼炯炯闪光了，他拍了拍自己的胸膛，一字一顿地说：“这是我自己的作品，因为，我是一个大音乐家！”——这不是老人因为有一点收获就骄傲、狂妄了，这是他意识到自己创造出的是真正的艺术品后，一时兴奋，出现一种情不自禁的喜悦。

如果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能经常体验到这种兴奋和喜悦，那该是多么好。

诗的真和美

屠格涅夫在一篇纪念普希金的文章中，说到法国作家梅里美几乎敢当着维克多·雨果的面，直截了当地把普希金称为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他对屠格涅夫说：“在普希金那儿，诗歌好像自然而然从冷静的散文中吐出灿烂的花朵。”他又说：“你们（指俄国）的诗歌，首先寻求着真，而美接着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反之，我们（指法国）的诗人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他们首先操心着效果，机智，光彩，如果在这之外，他们有可能不违背真实，那末也许附带着也会做到真实。”

梅里美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而他早期也写过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谣体的诗，这些诗受到了歌德和普希金的称赞。这里他对诗的一点意见，虽然只是出之于闲谈，而且是他对当时俄国和法国的诗的看法，但对我们也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他说普希金的诗好像是“自然而然从冷静的散文中吐出的灿烂的花朵”，那是说这些诗是朴实地表达了诗人的感情，表达了诗人在现实中的感受。他说诗人“寻求着真”，那指的当不仅是要反映生活的真，而且也是指诗人感情的真。在诗里面——应该说，在一切艺术里面，反映生活的真实是必须通过作者感情的真实的。寻求着这样的“真”，通过这样的“真”，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美。

相反的情况是，首先操心着“效果、机智、光彩”，这样的诗人是惯于用一些华丽的辞藻，运用一点精巧的构思，玩弄一点技巧；这样的诗可能使人眼花缭乱，以至使人惊叹作者的聪明——而这也就是作者所要求的“效果”了。在这之外，有可能不违背真实时才附带着做到真实，真实——生活的真实和感情的真实是被放到了次要的，以至是不必要的地位。这样的诗人似乎也是在寻求着美。然而，离开了真、轻视了真去寻求美，那就不过是舍本逐末，那美就是矫揉造作的，虚假的，华而不实，也就谈不上美了。火光中的

真诚

方敬同志在一篇题名《难忘的往事》的文章中，回忆了何其芳同志早年读诗写诗的情况，其中引了何其芳的一段话：“不但对于我们同时代的伴侣，就是翻开那些经过长长的时间啮损还是盛名未替的古人的著作，我们也会悲哀地喊道：“他们写了多少坏诗！”

对于何其芳的这一声叹息，许多读者是会有同感的，不但诗人在年轻时的作品难免稚拙（当然也有不少诗人是一出手就不凡的），即使是成名以后的作品，也未必首首皆佳，甚至有的大失水准。即使是那些大诗人也是如此。陆游的诗近万首。怎么可能篇篇皆是珠玉？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他的诗词，也不过就是那么几十首而已。

一首好诗可能只是一次灵感的爆发，是偶然的神来之笔，那当然表现了诗人的艺术素养和才华，但却必然是他长期的生活经验和感情积累的产物，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诗人并不是每一首诗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的。

对于大诗人（或大文学家、艺术学），由于他们的总的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由于人们对他们的热爱，所以新发现的他们集外的佚文、未发表的原稿，都感到是可贵的。这其中诚然也有值得珍惜的作品，但大多只有研究意义和纪念意义，而在诗人自己，编集时却不可不慎重。一个诗人的成就当然需要靠一定数量的作品，但更重要的却是质量。正如何其芳所说的，“一个诗人一生能有几首好诗可传，也就算没有白辛苦了”。唐代诗人王之

现存的诗不过 6 首，但他的《登鹳雀楼》和《凉州词》就可以使他不朽。所以，何其芳对自己的诗的取舍是严格的。方敬记述道：“他焚了的许多诗稿早已灰飞烟散，固不用说。就是这两年先后用笔名和真名在大小报刊上铅印出来的诗也剔出了不少。他要根本删掉不好的诗，不如意的习作或失败了诗作都弃之不惜。”

通过一些报刊的介绍，我知道不少青年诗作者在短短几年内就发表了几百首诗，他们的勤奋态度可嘉，创作激情可贵。但是其中未必篇篇都是佳作吧。因而，在正式结集时，希望他们学习何其芳严格对待自己诗作的精神，认真加以挑选，宁可失之于严，不要放之以滥。这里不妨说一点我自己的体会。我写诗的时间不算短，而发表的诗不多，收集时是剔出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的，但现在看来已收进集子的还有不少应该删去，留在那里只有使我的心不安，我似乎听到了读者说：“他写了多少坏诗！”

要认真地写诗，不要只图发表的数量，在结集时更要采取严肃的态度。这不仅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由于不满意而焚烧自己的原稿——那也正是自己的心血，的确是痛苦的，但那火光中照亮的是诗人的真诚的心！

我为什么常常写海

老水手坐在岩石上
敞开衣襟，像敞开他的心
面向大海
.....

青年诗人王家新写的一篇有关我的文章中，注意到我不是生在海边的人，一生中也很少到过海，却常常以大海作为诗的题材。他因而想到国外一位著名作家曾主张把“创作中的自我”与“生活中的自我”分离开来，并认为评论家的任务就在于寻找和发现一个作家的“内心的故乡”——后来他又当而问过我，希望我就这一情况作一点解释。

回想了一下，我的确写过一些关于海的诗，而且其中不少是写于我看到大海以前。我真正看到海时已进入老年，只在海边生活了十天，后来在海上航行了两天。我与大海的直接因缘不过就是如此。那是太短暂了。

然而，我对海的向往却是长远的，一直可以追溯到少年时期。在一首诗中，我写着：

我不是一个能够忍受寂寞的人，
当我还坐在人生的门槛上时，
我就向往着考验海燕的暴风雨，
向往着雄鹰的天空和海洋上水手的歌声。
——《凝望》

我对海的感情，主要是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培养的。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就使年少的我产生了许多关于海的遐想。十四五岁时，读到了黎烈文翻译的法国作家洛蒂的《冰岛渔夫》，那讲的是一位年轻的水手和一个纯朴的少女的悲惨的爱情故事，但我觉得小说中更重要的主角是大海：那在朝阳照耀下波动的迷人的海，那在暴风雨中咆哮的愤怒的海，那面对星空沉默的神秘的海.....

这以后，我又读到了英国作家康拉德的几部写海的小说，读到了普希金的《致大海》、莱蒙托夫的《帆》、高尔基的《海燕》这样一些关于海的诗篇，看到过一些关于海的艺术作品，就渐渐产生了对海的向往。我渴望去过一种不平凡的生活，去与恶人斗争，去经历风浪，去征服海洋.....我对海的向往带着浓厚的梦幻色彩，事实上，那是少年的心对自由、宽广、斗争生活的向往，而那又是与我还只是朦胧地理解的一个庄严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的。

我渐渐长大了
有一天，告别了家乡
去寻找梦中的海
我一面艰难地跋涉
一面欢乐地歌唱

——《海的梦》

当我逐渐成熟而且逐渐深入到生活中去以后，自然地，梦幻的色彩也就逐渐褪色。我不能不睁开眼睛面对严峻的现实，而且逐渐体会了人们常常说的“生活是海洋”这句话的丰富的含义。那不仅是指生活的辽阔、深沉，也是指生活像海洋一样充满了风浪。我在生活的波涛中浮沉起伏，从这当中受到了锻炼，得到了力量，加强了对现实的理解。我没有料到，一次大的风暴几乎使我葬身海底。像一个遇难的水手，我在茫茫的生活的海洋上长期地漂流。在巨大的痛苦中，我曾企求一座小岛让我得以栖息。但是，也正像一个离开海洋的水手那样，当我被迫卧在一间茅屋中时，却又感到深深的空虚和寂寞：

平静的日子使我烦忧
渴望着风暴和巨浪
我的心里充满了乡愁
——大海呵，我的故乡

——《海的向往》

这只是年轻时我读到过的莱蒙托夫的那句诗“只有在风暴中才能得到安详”的注释。不过，我是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去注释它的。在风暴中，我有时也不免痛苦，不免胆怯，甚至不免灰心和颓唐。但是，当我被抛置在沙滩上无所作为时，我却宁可再到海洋上去，再到风暴中去。

当我迈入老年时，才第一次走向了真正的海。我是怀着喜悦激动的心情走近它的。我最初看到它时，有一点失望，有一点怅惘。我想象中的海应该更壮丽，更宽阔，更迷人，更神秘……面向大海站了一会以后，我的感情逐渐起了变化。不，海应该就是我面前这样的海。而且，好像我一直就是在它身边，好像我是非常熟悉它的，如同面对一个老朋友。我亲切地吐露了我的情怀：

你用你的微风吹拂我的白发
你用你的温情抚慰着我的伤痕
你用你的肃穆澄清我的灵魂
你用你的永远不息的波动
向我启示了运动和永恒
在你的波涛和我心中的波涛
交流中，我更深刻地
理解了生命，人生
理解了您，和我自己
……

——《生命的激流》

我想起了少年时对海的幻梦，从而回顾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

看哪，波涛起伏，急浪汹涌
如此壮阔，如此美丽
原来那就是我梦中的海
原来我一直就在梦中的海上飘航

——《海的梦》

我终于体会到，少年时的单纯、热情的梦想是可贵的，然而梦中的海并不像幻想的那样飘渺。实际上，生活就是海，那是比幻梦中的海更深沉、更辽阔，有着更多的巨浪和风暴，因而是更美丽、更庄严的海。同时，我也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多的人在海上苦斗，这样多的人在海上沉没，而人们还是向往海，热爱海，奔向海，而在离开后怀念海呢？

谁能够，谁能够

回答这难解的谜

你就懂得了，懂得了

人生的奥秘

——《海之谜》

如上面所简单地谈到的，海在我有时是梦想的象征，有时是生活的象征，有时是生命的象征或人生的象征。我对海的赞颂，是与我在不同的时期对生活的理解，对生活的态度相联系着的。因而，并不是“创作中的自我”与“生活中的自我”不一致，而是要能从“生活中的自我”去理解“创作中的自我”，或者，从“创作中的自我”去理解“生活中的自我”。当然，那不应该从浮面上去看，而是要真正找到作者的“内心的故乡”。

“老水手的歌”，这是我的一首小诗的题目，后来又将它用作为一本诗集的书名。有人因而称我为“老水手”。是的，我在生活的海洋上已风风雨雨地飘航了几十年。现在还在飘航着。我的目标还在前面。

美国诗人休斯有一首题名《老海员之死》的诗，我很喜欢。而且它与我前面所说的一些意思是相通的，只是说得更为动人一些。诗很短，我现将它抄录在下面：

我们把他葬在多风的山顶，
他的灵魂却走向海洋。
我知道，因为我听到了，当一切都宁静，
他海一般的灵魂对我讲：
不要把墓碑放在我的头上，
因为我不打算在这儿安躺。
不要用鲜花点缀我的坟头，
因为我已回到浪尖风口。
请不要，不要为我啼哭，
因为回到大海我很幸福。

申奥译 1985 年 9 月

生命炼狱边的小花

有好几位友人问过我喜欢自己的哪些诗？这很难说：对每个时期所写的诗，都有一两首是自己喜爱的。而最能激发我的感情的是在经受厄难的那20多年中所写下的一些小诗，我将她们看作是“闪耀在生命炼狱中的光点，开在生命炼狱边的小花”。

1955年的一个深夜，家里的人都已入睡了，我刚赶写完一篇东西，坐在桌前默想。在寂静中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我习惯地起身走去，但到了门边时就有些迟疑，这么晚了，谁来呢？我打开了门，一伙人涌进了我的房中。从此黑色的命运就用它的利爪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怀着无望而且几乎是绝望的心情听任它的摆布，不知道它将飞向哪里。当它终于松开利爪时，我面对一个新的春天，但自己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我被卷入了一场风暴。它在我不是意外的，因为乌云早在几个月前就涌现而且愈来愈沉重。但是我又是意外的，没有料到它的来势是如此猛烈，震动了整个中国大地。更意外的是我竟也被卷入了风暴的中心。当我发现自己是在铁窗下时，我恍恍惚惚地以为是处于一场噩梦中。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难以接受强加于我的罪名，难以面对门上的小窗口狱卒窥探的目光，难以忍受孤独的煎熬……自己的前途莫测，又忧心于亲人们和友人们的命运……如果说在过去的年代里，解放前我也曾经历过一些风险的话，现在面对的是更严重也更严厉的局面。我力图使自己冷静并镇定下来。我自问是无辜的因而相信将会得到公平的解决。但还是无力从痛苦的重负下解脱。

而这时，诗神来到了——不，应该说，回到了我的生活中。我放下写诗的笔已将近10年了，原以为再难以接近她的。在那样的处境下，我有炽热的感情要倾吐，要发泄，于是就在让我写材料的纸上疾力写了几首诗，并感觉到这很有助于稳定我的情绪。只是，我没有经验，不懂“规矩”，那些诗在一次例行的检查中被没收了，纸笔也被拿走，而且受到了警告，如果再犯就要受到惩罚。

我很痛心和惋惜那些诗的失去，它们未必很好，但大都是直抒胸臆的自白，很能表达我当时的复杂的心情。

而这时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我从诗神身边拉开，我发觉唯一能安慰并给我以温暖的就只有她了。人们可以命令我闭上眼睛，但无法禁止我梦想；可以收去纸笔，但不能禁止我默念。我常常努力排开一切烦忧和杂念，像困兽一样在小房内徘徊，或是坐在矮凳上望向高窗外的蓝天，深夜躺在木床上面对天花板上昏黄的灯光，喃喃自语。其中不少在念一念后，抒发过感情就放弃了，但有的在反复地默念，不断地推敲后就形成了诗，在记忆中保留了下来。

现在当我重温那些小诗时，当年的许多情景就浮现了出来。那种冰冻到内心深处的孤独感，那种积压在胸腔而不能出声的长啸，那种困在笼中受伤的野兽般的呻吟，那种在无望和绝望中期望，那些单调、寂寞的白日 and 惨淡的黄昏，那些无眠的长夜。在创作这些小诗的过程中，帮我打发了许多时间，使我的生活不至于那么黯淡和空虚。通过她们，抒发了我积郁的感情，有助于我内心的平静。而且，她们安慰了我，激励了我，支撑着我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度过了漫长的灾难的岁月。

写这些诗，只是为了自己，决没有梦想发表。因而，无论好坏，她们至少具备了艺术的一个基本品质：感情的真实。我年轻时和最近十多年来终于

又回到文坛以后，也写过一些诗，不能说都不是有感而发。但我还是更偏爱这些小诗，因为她们是与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联系在一起，是更为赤裸地展露我的内心和灵魂的，她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通过她们，使我深深体会到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是的，她们是开在我生命炼狱边的小花！

美的探寻 ——《蒙娜·丽莎的启示》序

我喜爱看世界名画。

我曾面对蒙娜·丽莎，在她那被称为千古之谜的神秘的微笑前沉思；我曾倾听一百多年前在法兰西农村中响起的晚祷的钟声，为那两个正在田间祈祷的淳朴的农民祝福，怀着与他们同样虔诚的心；艾涅瓦佐夫斯基笔下的大海所涌起的巨浪曾在我胸中激荡，使我关怀着正在海上漂流的遇难者的命运；雷诺阿、马奈、德加的画使我注意到了在生活中和在大自然界的光与色……

但是，对那些名画，我所有的不过是一般的喜爱，还不能深切地领会画面所显示和其中内涵的意义，还不能真正领略那艺术的精妙之处。对于艺术品的欣赏，关联到欣赏者的生活经历、感情经验和心理背景种种因素，同时还需要欣赏者有一定的艺术素养。一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艺术欣赏者应该是具有艺术欣赏水平的人。否则，即使是再好的艺术品，也不能成为你认识和感受的对象。我们知道，艺术欣赏是欣赏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的感情的交流过程，同时也是欣赏者再创造的过程，只有当你能够深入对象，你的思想力才能活跃起来，你的想象的羽翼才能翱翔。

我深感到自己有关美术知识的不足，审美能力不强。所以我很注意阅读汤麟同志这五六年来所发表的一些对于名画进行赏析的文章。那些文章为我提供了许多有关的知识，帮助我提高了欣赏水平。据了解，还有许多读者也喜爱这类文章。现在，他将这些文章汇集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他引导我们走进了世界名画的艺术长廊，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拉菲尔一直到现当代的许多有名的画家，其中包括各个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流派的代表性的作品。他对所介绍的画，用亲切的态度作了讲解：画家的简历，风格特点，每幅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内容，还适当地穿插了一些有关的掌故、逸事，或是引用一首小诗。而且，他还从美学的角度，对每幅画构图的安排、线条的运用、色彩的处理、光暗的对比等等方面，作了艺术分析。他着重谈到的不是技巧，而是阐述这些技巧是如何为内容的需要服务的，同时，他也没有忽视形式本身的相对独立性。——他是从社会学与美学统一的角度对作品的整体性来把握的。

但他并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广博知识的讲解员，他也是一个美的探寻者。画是产生于画家对于生活的感受，他将他的感受溶化于画中。画的欣赏者则是从对画的感受出发的，那种感受往往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汤麟在这一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除了说明画的内容的涵义外，他还满怀激情，力图用生动的语言，来表达他所感受到的作品气氛、情调、内在的精神和微妙的魅力。这种探索就使他的文章区别于一般的作品简介，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他的感受未必与读者的感受完全相同，但至少他表达出了一个基调，可供读者参考。他的探求精神同时也可以给读者以启发和诱导，使他们不仅增强了对每一幅画的了解和感受，而且活跃了他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我还想特别指出，汤麟是很理解这一点的：不能用枯涩的文字去解说精美的艺术品。他的文章每一篇都是抒情性很浓的散文。

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冷落的美育问题，这几年来日益受到重视。人们认识到如果没有美的心灵，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就不可能有一个美好的社会环境。美好的心与求真的心、向善的心原是统一的。史无前例的十

年浩劫所留下的后遗症，除德育、智育、体育外，也为美育提出了重大的任务。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有关这一方面的书籍已在陆续出现。在深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的同时，还需要适应广大读者水平的普及性的读物。汤麟的这一著作就正是这样的一本读物。我曾从中受益，因而写了如上一感想，并愿推荐给别的对绘画有兴趣的同志们。

1986年6月26日

《我看斯大林》中文版序

康·西蒙诺夫在这部回忆录的开始就表明：“在最近可以看到的将来，我并不希望它全部拿去发表。我打算把它完全交给国家档案馆保存，并怀着一点希望：这种出自我这一代人的个人的见证和思考，能够使我们这个时代的未来历史学家发生一定的兴趣。”这部书写于他的晚年，可能是他的最后著作。形势发展很快，他大概不曾料到，这部书写出后不到10年，就得以全文发表了。而且这的确已成为一本历史学家和当代读者普遍感兴趣的书籍。

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他有着伟大的功绩，这是不容抹煞的。当他在世时，虽然从西方也传来了一些关于他残酷地镇压坚贞的共产党人和无辜平民等等报道，但一般人并不认为那是可靠的，至少也应该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形象。有两位法国作家所写的关于斯大林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本是巴比塞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传》，一本是布洛克的《共产主义人物——斯大林画像》。前者记述了斯大林的前半生，后者则是作者作为记者记载了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所看到和听到的有关斯大林的事迹。这两本书所刻画的斯大林的形象是光辉的。但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提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后，我们才逐渐认识他的另一面，或者说，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认识他。我当时没有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看到了一些零星的材料，特别是路易·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引起了我非常大的震动。我认为这是一本写得相当客观的书，勿宁说，作者是在为斯大林辩护，那里面所揭露出来的某些阴暗的事实应该是确凿的。这几年来，有关斯大林的材料更是大量出现，有助于我们对斯大林的认识和了解。由于斯大林在苏联有着长达数十年的统治地位，只有真正认识和了解斯大林，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和了解苏联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其中所显示的某些现象，其中所包含的某些经验教训，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众多的有关斯大林的回忆录中，西蒙诺夫的这一本有着其独特的意义。西蒙诺夫出生于1915年，是在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是社会主义培养的第一批新人。他在年轻时，就从一个工人成长为著名的作家，曾六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他几次重要的出国访问、出任《新世界》和《文学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的主编、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都是出于斯大林的授意。可见他是深受斯大林重视的，他对斯大林不至怀有偏见。他有多次直接与斯大林接触的经历。作为一个作家，他有着善于观察人的锐利眼光和勤于笔记的习惯，这部回忆录的主要部分都是出于他当时所做的详细笔记，这就保证了资料的翔实性，场面和人物性格都写得异常生动，他只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和补充。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斯大林的过去不大为人所知的新材料，特别是斯大林与文艺界之间的关系。西蒙诺夫并没有企图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只是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接触，写出他所认识的斯大林，并写出了自己当时的感想、感受，因而就显得特别亲切。同时，他也写到了他所接触到的其他苏共领导人和某些作家的情况。

在回忆录的开始，西蒙诺夫以相当大的篇幅记述了他青少年时期家庭中的遭遇和他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斯大林时代的社会背景。他的继父，苏联海军委员会的军事专家，一个正直、诚实、坚强的人，曾于1931年被逮捕，家也被抄。当时西蒙诺夫的母亲正在病中。他的继父后来虽因无罪被释放了，

但在年轻的西蒙诺夫心中不会不留下一些阴影。由于所见到的这一类事件太多，他虽然半信半疑，但也就习以为常了。同时，他参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亲见了苏联建设的伟大成就。后来，他又经历了卫国战争的艰苦战斗和伟大胜利，所以对斯大林怀着崇敬的心情。——对冤屈习以为常；有困惑而不敢说出来。这就是西蒙诺夫当年的心态，大概也是那个时代一般苏联人的心态。

后来，从 1946 年开始，他有机会多次与斯大林接触。主要是参加政治局讨论授与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会议。他感觉到斯大林有时是态度温和、通情达理的，有时又极其严厉、独断专行。他感觉到斯大林读过很多当代苏联文学作品，对文艺界的情况非常熟悉，发表过许多明智的意见，也作出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他感觉到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也是一个伟大的演员。——通过那些详尽的描绘，使我们看到了斯大林的复杂的个性、工作作风，也看到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以及那些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的态度。

有关斯大林与文学界的情况，当然是使我感兴趣的，但更引起我震动的是斯大林逝世前后的种种情景。在苏共十九大以后的一次中央全体会议上，斯大林以激烈的、严厉的言词抨击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指责他们不坚定，认为他们怯懦和有投降的倾向。那两位政治局委员就在他身后不到两公尺的位置上坐着，脸色苍白。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是面容紧张，一动也不敢动。他俩虽然后来也讲了话，作了辩白，但未必就希望斯大林改变对他们的命运已作出的决定。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内，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但我们却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斯大林的晚年，他是孤独的。因为他有无上优越感，没有可以对他进言的人，没有敢与他争论的人，他拥有的无上的权力不仅造成了许多错误，也逐渐把他自己毁掉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共别的领导人虽表示悲痛，却又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紧接着西蒙诺夫又写到了贝利亚的种种阴谋活动和他的可耻的下场。于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西蒙诺夫这部回忆录，刻画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的一些遭遇、感受，也刻画了他直接与斯大林接触中所产生的印象和感受。他的态度是诚恳的，他的记述是真实的。这些有助于我们了解斯大林和苏联的一些历史内幕。这部回忆录是口述后整理的，所以稍嫌零乱，但却保存了一种亲切感。章其同志的译文忠实地保持了原著的风格。我知道他是在今年武汉的酷暑中赶译这部书的。他的辛勤的劳动将在读者的满足中得到补偿。

独行者
——《独行者丛书》总序

在当今散文随笔热、散文随笔丛书热中，《独行者丛书》自有其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它的作者虽然既有学者，也有专长于小说、散文的作家，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在学术或创作的生涯中，将经历的个体生命的体验放在一个具有思想性、精神性追求的背景之上。因而在每一集中，都不乏对一些学术性问题的探讨，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思考，给人以启发和启示。作者们以各富个性的笔调，或描述，或议论，自如地表达，拥有一般散文随笔的特色，却更具有耐读性。

我很赞赏“独行者”这个词。

“独行者”，首先是思的一种状态，是思的一种独立特行。我们沉溺于人云亦云太久了，以致我们不敢、不会、不能思的独行，而思的入门往往是从独行开始的，非“一哄而上”所能奏效。

因而他独行，却并不孤独，因为他并不脱离人群，更不是离群索居，只是不愿随波逐流罢了。他知道，他所说的都要通过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考，通过自己的声音，而不能让自己的身体成为他人头脑的行尸走肉。

在这里——

“独行”不是逃避，不是孤芳自赏，它只是探寻更开阔的视野，更多维的生存空间。

“独行”不是霸权，不是“一言堂”，它只是在独断与喧嚣之外能倾听死亡与新生的自然节律，它是应着生命的召唤而去的，那里同样有他人新生的权利。

“独行”不是故作姿态，不是沽名钓誉，它只是独立承担自由的苦役，走自己应走的路。

……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块土地上，已有愈来愈多的“独行者”，他们独立互补，构成今天生动而丰富的格局。

这或许正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走自己的路吧，唱自己的歌，这个世界就不会单调沉寂。

往事与未来

——读梅志的《往事如烟》

《往事如烟》是梅志同志写的有关胡风回忆录的一部分（在《文汇月刊》上连载时，题名是《胡风传》）。写的是1965年夏到1966年春节这大半年的时光，时间不长。但那连接着过去的十年：胡风和梅志是1955年夏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的，他们被分别关押着，各不知对方的命运。1961年，梅志因母亲病逝停尸在医院的太平间，才被放出来料理后事。而她仍得不到胡风的消息。曾经向公安部门请求见面、送东西，都遭到回绝。那期间，他们的老朋友聂绀弩冒着风险悄悄约梅志见面，向她转达了另一位老朋友，全国人大代表熊子民的意见，要她再向公安部提出要求。熊子民气愤地说：旧社会我们为革命坐牢，还准许探监送东西呢。友人们的态度激励了梅志，在再次向公安部门坚决地提出要求后，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了应允。她得到了几次探监的机会。1965年冬季，胡风被正式判刑后，假释出来，在北京生活了一个多月。1966年春节刚过便得到公安部的通知，要他们迁居成都。他们很不愿意离开祖国的心脏北京，但不能不遵守命令。在去成都的火车上，当车轮在长鸣的汽笛中碾动时，他们哭了。他们哭，是因为对北京的感情，是因为认定这是被终身流放，是因为离开了孩子——其中一个还在中学念书，今后不得不到学校寄宿；他们哭，可能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情绪：多年郁积的痛苦、委屈、悲愤……而且前路茫茫。但是，他们即使从最坏的方面预测，大概也不会想到，今后的命运是那样险恶、悲惨，那是更值得一哭的。——这一部分回忆又是后一个更大的苦难的10年的引子。

这部回忆录在《文汇月刊》上连载时受到了读者普遍的关注。因为胡风在新文学史上留下了他的业绩，在过去的那些年中，他受到了许多人的热情的赞扬和敬爱，也曾受到不少人的严厉批评和责难。而对于不太了解过去的年轻人，历史的反复使这个名字在他们心中蒙上了一团迷雾。

1955年那场骇人的风暴中，胡风是“祸首”，并因此牵涉到难以统计的人。那是一个震动了全国的事件，并吸引了全世界的注视。对于他被捕后的遭遇，他的心情和他的表现，当然是人们所希望知道的。

梅志说：胡风在监狱中度过的前10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他没有受过严刑拷打，也没有受过车轮大战，只是关在独身牢房整整过了10年，并受到了几百次的审问”。所以关于那十年的情况她没有写，只是记述了胡风在假释出狱后对她简单说到的这样一点情况：“老是要我交代交代，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是你们应该明确地为我们做结论的时候了。但没有人理我，于是我开始了绝食。当然，他们是不能让我死的，一些细节就不谈了……这门牙就是为了灌我食物而被敲掉的。”——单独被监禁10年，绝食而被敲掉牙齿……如果这些都只需一笔带过，那么，梅志所写的有关1965年夏到1966年春节这半年间的回忆，更说不上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她终于获得了探监的权利，能够和胡风见面，送书，送东西，后来在判刑后胡风还假释回家，在北京参观……这些情况比起那10年已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为了让他们迁居成都，也在各方面作了比较妥善的安排。作者朴实地讲述着这一切，一直没有提高语调，没有放纵感情。但是，在平静的下面是激荡着心潮，在平淡的下面是渗和着血泪。我们读着，不能不感到心的沉重，不能不感叹。

让我们从梅志的眼中，从她的叙述中，来看看当时胡风的形象。

分别 10 年后，他们第一次得以见面：“一直被全家尊敬的一家之主，现在被人押着站在我面前，我真想抱着他痛哭一场。”胡风很平静地走向她，用劲地握了她的手，之后用闪着光（是泪光么）的眼睛望着她。“是他，仍旧是过去的他，他的手仍然那么有力，他的眼光仍那么坚定”。而当他被带走时，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向她摇了摇手，脸上带着笑容。“这一笑使我感到很大的安慰，这完全像过去他对我的微笑”。那么，毁灭性的打击和 10 年的磨难并没有能将他从精神上摧毁。

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呢？他对他的遭遇，对加在他头上的罪名，他不会不感到困惑、不感到冤屈的。关于他的被斥责为“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他的回答是，“……这个死结不是我能解开的！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就算是文艺思想有错，那也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而，他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何尝不知道从这大帽子底下通过的秘诀，但那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我能这样做吗？我没有做过的事我不能承认。做了的是否全错也不是一句话能谈得清的。我还得用大量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实践，才能得出结论”。

不是为了求得“过关”，求得“宽大”，将一切罪名包下来，而是要求实事求是，采取对党对人民、也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对于他将来的命运，他作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愿意接受党给我最后的裁决。希望你也这样，不存任何幻想，相信党相信群众。对我的结论可能我看不到了，但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历史会对我做出公正的结论的。”

当他被正式判刑 14 年后，他说他是“心安理不得”。他难以承认加在他头上的罪行，但他不上诉，也不愿辩解，原因是“为了维护党的威信”。

——从这些简单的记述中，是反映了极其复杂、矛盾的心情。以前，胡风在什么文章里曾说过：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和共产党，我这 20 多年来是没有安身立命之地的。即使在遭难以后，他也是坚定地相信党。但却又正是以党的名义将不实之辞和严厉的处分加在他的头上的。他无法说服自己，因为“理不得”。但他承担起了这一切，以求“心安”——令人心酸的“心安”。

他说，使他心情不安的是那些年华正茂的朋友们也因为他而受磨难。“我情愿自己一个人上绞架，而不愿他们为我陪斩”。他也为 80 岁的岳母在他和梅志都在狱中时凄然去世而泪下。他也挂念着孩子们。当他假释出来，在 10 年的阔别后和孩子们共度春节时，他让女儿念了鲁迅先生翻译的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中的一段，而后他用沉重的语调说：“这就是我的心情，我愿意将我的全身心交给你们，你们像幼狮一样吧，你们能够壮健地奋然地离开我，我就安然了。”

他还想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在狱中大量地阅读了这方面的经典著作。他还要深入实践，当他参观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英雄纪念碑……后，所写的感想是全然的赤诚和信仰。他甚至还梦想着能够再从事文艺工作，他在狱中写了大量的旧诗以抒怀；他还关心着文艺现状，阅读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他自己也可能感到这只是梦想，但这梦想是支撑他的一种力量。

所以，当他被迫离开北京，认为因而丧失了这一可能时，他是那样痛苦，那样沮丧。临行的前一天晚上，他为身居显要的几位老朋友各写了告别信。他称他们为“足下”，而自称是“阶下之人”、“面壁之人”，诉说了“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他常常瞻望他们的“红旗所向”，“遥望高旗飘扬，朝阳吐采”，而自己则感到“往事

历历，前途渺渺”，“即日远戍，后会无期”。心情是悲痛的，词句是凄楚的，因为他究竟具有“不能太上忘情的血肉之身”。

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梅志当然也会写到的情况和自己的心情。虽然十分简略，但从中也多少反映出了她自己的身影。

她整整坐了70个月监狱，因办理母亲的丧事才得以出狱。虽然后来“免于起诉”，但“帽子”还戴着。这个也是在30年代参加了“左联”的，曾协助胡风作了大量工作的作家，要与别的“五类分子”一道学习，要尽量表现得更好一些以争取“摘帽”。家破人亡，陪伴她的只有一个还在中学念书的小儿子。她惦念还在狱中的人，不知道他的生死。她没有可以谈谈心的人。没有人与她来往，她也不愿与人来往。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意识到自己的住所是受到注意的“是非之地”。她在街上遇到熟人时总是有意地回避，偶尔在僻处与熟人讲几句话，心里就感到不安。很难想象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和凭着怎样的精神力量熬过了那几年的。当她得到探监的机会后，她的生活才找到了一个支撑点，她忙碌着准备了亲人所喜爱的吃食，终夜难寐，赶最早的车去到监狱，辛苦的旅程在她是希望之路。她不能不对亲人说一些要“加强思想改造”之类的话，因为要她帮助做好胡风的思想工作是交给她的任务；但她又唯恐伤害了亲人，因为她知道他是无罪的，而他又有着“火烈的性格”。她的要求很单纯：“我所要的仅仅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所要求的，让我们一家团聚！”但是，她也认定，“家破人亡的10年都过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今后我们的生活困难重重，但我能忍受。”掷地有声的这几句话，要能付诸实现，需要多强的毅力，而且后来的情况比她可能设想的要艰难、险恶得多，而她的确忍受，不，承担下来了。

胡风在当时曾说过，他已为“人神共弃”。当时除了讨伐、批判外，也的确难以听到别样的声音。但是，也并非没有仗义之士。如前面所提到的熊子民。再如聂绀弩和周颖夫妇。在30年代留日时，因从事进步的文化活动，聂绀弩和胡风一同被日本警方监禁过。被驱逐回到祖国后，他们又在“左联”共同战斗过。1955年的那一场大风暴，绀弩自然无法幸免，他被关押审查了一年，虽没有被算作是“分子”，却被开除了党籍。1957年他们夫妇都被打成“右派”，罪名之一就是为胡风鸣冤叫屈。聂绀弩被流放到北大荒。劳动了好几年后回到北京。而他居然敢于又一次插手胡风问题，敢于又闯进胡风的家——那是非之地。而且，当胡风将去成都时，他还敢于亲笔书写条幅，以诗相赠：“武乡涕泪双雄志，杜甫乾坤一腐儒，尔去成都兼两述，为携30万言书。”至于具有北国妇女的豪爽精神的周颖，虽然自己也蒙受过沉重的打击，依然没有泯灭憨厚、正直的心，没有去适应那千变万化的情况。她自己的处境不佳，但多次去梅志家，有时和她彻夜长谈，分担她的痛苦，为她出主意，想办法，给了她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梅志还在继续写有关胡风的回忆，前不久，为了搜集材料，她曾到过胡风的家乡湖北蕲春县。她也是74岁的老人了。还在勤劳地工作，不远千里地奔波。

如果说，那一年他们迁家到成都时，她不可能想到等待他们的是那样险恶的命运；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胡风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而且受尽了折磨，使这样一个坚强的人也得了恐惧症，她自己也备受磨难；那么，她当然更不可能想到在“四人帮”覆灭后的第四年，在新的政治情势下面，他们的问题终于得到了适当的处理。胡风得以享受一个平安的晚年，并继续从事

文艺工作，从他所写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个衰弱老人还依然有着一颗健旺的心，豪气不减当年。在 1979 年 10 月 25 日，他在写给一个友人的信中这样说：“关于文艺见解，基本上如前，只因生活经历，也许多少还比以前更固执一点。借用一位英雄的话：‘观点不变’。”而在胡风去世以后，梅志也能够从容地写她的回忆录。

历史可以是一个严厉的审判者，也可以是一个公正善良的长者。他是无情而又有情的。归根结底，要看你怎样以生命来表达自己，看你心中有着怎样的光和热，看你追求的目的和朝向。

从梅志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胡风和她，是付出了多少血和泪，是付出了多少沉重的代价，是经历了怎样惨烈的斗争（包括自我斗争），在无望中又满怀希望，一步一步，一天一天，走过了那漫长的道路，熬过了那漫长的岁月，最后从烈火中飞腾而出。而从那中间，我们也看到了时代的艰难的步伐，听到了未来的嘹亮的呼唤。

呵，如烟的往事！

呵，累人的明天！

1988 年 6 月 15 日深夜

“石头”的见证 ——读《血色黄昏》

我是在个体户的摊头上买到这本书的，与那些有着美女、侠客作封面的言情、武侠小说摆在一起。新文艺书籍是很难挤进这个行列的，可见它是一本畅销书。看看印数，果然有30多万，这在当前新文艺书籍中，是极难达到的数字。另外，我从一则报道中，知道它的出版很有一翻周折。这样引起了我读一读的兴趣。

我在激动的心情中读完了它。说真的，在近几年，我阅读文艺作品很少体验到这样的心情。

不是由于它的艺术魅力。作者自己说：“比起那些纤丽典雅的文学艺术品来说，它只算是荒郊野外的一块石头，粗糙、坚硬。”我并不认为这完全是自谦。我的激动，是由于作者感情的真实，和通过真实的感情所反映的生活的真实。作品蕴藏着一种热，闪发着一种光，即使说还不是那样强烈照人也罢。

作品将我们带到“文革”时期，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到内蒙古插队的遭遇，写到了他所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他所看到的一些情况，从而揭露了那场“革命”的真实的一角，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他的确受到了“再教育”，但那效果与所要求、所预期的恰恰相反。

作品是以自述的方式写的。主角林鹄开始出现时是一位22岁的青年。在那场“大革命”的初期，他当过“红卫兵”，满腔义愤地揪斗过“走资派”。也曾企图偷越国境，抗美援朝，但遇到了阻挠。1968年，一股股青春的洪流，热血的洪流，涌向平原、山区、茫茫大野。而他由于家庭的牵累（他父亲是一位老党员，母亲是一位著名的作家，都在接受审查和批判），没有得到这样的权利，因而心急如焚。于是，他和另外三个境遇相似的朋友，经过反复的研究后，决定到成吉思汗的家乡去，不是被大野、青草、风雪、烈马所构成的画面所吸引，而是因为他们认定了将来打仗，这里是最前线。他们悄悄地离开了家，经历了艰辛的旅程，从北京来到了内蒙。由于插队的名额已满，开始没有为当地政府所接受。他们各自写下了血书，以表达“是七尺男子生能舍家，做千秋雄鬼死不回城”的决心，闯进了一位司令员的家，这才被批准分配到一个牧场。在兴奋的心情中，他们开始了所向往的新的生活。

但那新的生活——完全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牧民们对他们的到来并没有热烈地欢迎，而是冷淡、冷漠的。阶级斗争是第一课，他们参加了对三个“内人党”的批斗会，会场的气氛毫不热烈，贫下中牧有的嬉皮笑脸地斗闹，有的东倒西歪睡大觉。

林鹄，一个初出校门的高中生，稚气未泯，坦诚、冒失、逞强。由于他经常练打拳，有一副好的体格和高超的摔跤功夫，因而好斗。他初到草原，在抄家时，几乎打死一个他认为是反动的“牧主”，一个贫下中牧却鸣不平，用镐把狠狠地敲了他一下。而他的真正的厄运是从得罪了班长开始的。先是他以八比的记录，在摔跤中击败了也是以擅长武术自豪的这个狠毒、暴烈的复员军人。他因此受到了种种歧视和报复。他忍无可忍，满怀愤怒，和班长进行了生死搏斗，自己虽也受了伤，却胜利了。那时他们的牧场已为兵团接管。他被兵团以打人的罪名关了起来，不久后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升级为有“六大罪状”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这样完全意想不到的打击下，他茫然、惊惶、悲愤。

他坐过土牢，反戴过手铐。他经受过多次的斗争会，经受了各种各样的凌辱和折磨。他曾企图逃跑，在途中又被逮了回来。同伴们都不理他，连同情他的人也不敢接近他，连母亲也宣告和他断绝关系。他多次写了申请书，其中还有一封是血书，表白自己无罪，然而呼冤无门。

这是真正的地狱。他在那中间熬过了8年。

他也亲见了兵团里形形色色的黑暗现象，有些领导者“说神圣的话，做最卑鄙的事”：侮辱女知青；贪污各种东西，包括抄家来的物资；做各种违法乱纪的事。他们的领导方式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敢于顶撞他们，在整党中批评揭发他们的知青，进行各种各样的打击报复：派重活，放于深山。对他的一个敢于直言的同伴用尽了酷刑。领导之间彼此包庇，因为各自的手都不干净。

他也亲见了知青们的变化，他们原是满怀热情而来的，而现在精神空虚，常常相互斗闹，开最下流的玩笑。有些人变得谨小慎微，处处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为了一项好差事，一句表扬话，互相争夺、倾轧，不惜打得头破血流。有的女知青为了争取入党，听壁角，打小报告，甚至出卖自己的肉体。而最使他痛心的是，曾发誓要与他生死与共的朋友，揭发了他们之间的一些私语，成为他“反革命”的最有力的证明，而且给了他以最狠毒的折磨，对他嘲骂并拳打脚踢……当年发誓“做千秋雄鬼死不回城”的青年们，在几年后却用尽了各种手腕、各种花招要回到城市去。当载着第一批回城的知青的汽车开动时，牧场上一片哭声。

而且，最后他发觉，这8年中，他们艰苦的劳动事实上是一场对草原亘古未有的大破坏：大面积的开荒，使水土流失，草原严重沙化。

他经历了这一切并亲见了这一切。他自己当然也在变化。在开始的打击下他困惑、惊惶，磨损了他的锐气和傲气。他逐步学着表面上老实服贴，甚至挨打时也强忍着冲动和愤怒，不还手。但在内心他时时考虑如何应付各级领导和种种压力。他不再相信任何人。当他独自在深山采石时，在孤独中是这样自暴自弃，多少天不洗脸、不漱口，穿着破烂、发臭的衣服，内心中一些原始的兽性都暴露了出来。他也真的几乎变成了兽，在沉重地压迫着他，使他恐怖窒息的寂静中，他像狼一样凄厉地嚎叫。——我们看到，这个稚气的青年，这个逞强的小伙子，他的灵魂在被撕裂，在逐步崩溃。他当时绝望得想自杀。但我们也看到，在那撕裂、崩溃后出现的渗血的废墟上，也有一些东西在逐渐生长。那是他对现实的思考，对人生的思考，对人的价值的思考。由于他的切身的遭遇和他的亲见亲闻，这些思考是饱含着血肉的内涵的。他逐渐清醒、成熟，他要坚强地活下去。他求助于过去所知道的一些英雄们：牛虻、保尔·柯察金、车尔尼雪夫斯基、贝多芬……从他们身上吸取力量。是这些，使他得以承受了那些难以想象的打击。

同时，支持他的还有另一些因素：他对爱的渴求。他一直倾心于一个同连的女知青。对方的冷淡和拒绝，旁人的讥嘲，都没有损伤他的爱。那一往情深的爱，那纯洁无瑕的爱。事实上，他并不真正了解对方，他在想象中美化了对方。对于他，她只是爱的象征，是他在黑暗王国中的一丝光明，是感情荒漠上的海市蜃楼。即使是爱的折磨，也可以温暖他的精神上的荒寒。当她回城前，他去为她送行，受到了冷落。他将她吐出的一堆瓜子壳悄悄藏进了怀中，那是他得到的唯一的爱的果实。此外，他的好朋友徐佐也给予他许多激励。那是个瘦弱的青年，却有着无穷的精神力量，勤于读书，善于思考，

敢于说真话，因而也经受了各种打击，有一次还承受了各种酷刑，但从未屈服。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给了林鹤许多开导，并作了榜样。此外，即使是在那样的环境中，还是有一些知青保存了他们善良、淳朴、正直的个性，没有随波逐流，而且也逐渐认清了现实。林鹤永远不能忘记，当一场大雨突然降临时，知青们不惜将自己仅有的棉大衣、毯子纷纷盖在粮库上；为了抢救一场大火，60几个知青献出了生命……

这些都激励了他，无形地支持了他。

在1976年的春季，经受了长期的苦难生活后，他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他的母亲——那位著名的作家的奔走申诉，起到了作用和影响。他也将回到北京去了。面对草原，回想8年来的遭遇和所见的种种变化，他感慨万千。在这里，他流过汗，流过血，流过泪，此刻，他还有着留恋之情。一切已经过去的，即使是苦难，通过时间的过滤后，总会升华出一些值得珍惜的东西。因而，他衷心地讲：

“感谢你呵，兵团！给了我一段诗般的传奇经历，这种生活本身就是财富！”

是的，他已不是当年那个稚气未泯的青年了，他将怀着8年的青春和血泪换来的“财富”，以新的姿态，走向新的生活！

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是有些粗糙的。作者抱的是这样的想法：“写，写，缺少文学色彩，像土坷垃怎么啦？就是要写！这是一段千千万万人都经历过的生活，这是千千万万条生命！”他是有所为而写的。他要写出自己的遭遇和所见所闻；写神圣的原则是怎样变为欺骗人以至压制人的符咒；写满怀热情的青年是承受着怎样的考验，受到的是怎样的“再教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写人民的磨难，草原的创伤，写他自己在冤屈和凌辱中的挣扎，受伤灵魂的颤动，他的困惑和沉思……他是还留在草原时，在那样的处境中，在沉重的劳动后，挤出时间来写的。他没有可能从容地构思，认真地琢磨、推敲。他说：“一切都是真实的，不用编词，不用设计情节，照实说就行。”也许，也限于他当时的文学素养，所以，如果从艺术表现看，可以指出这部作品的许多缺点。如构思不是那样严谨，某些人物的性格写得比较简单，语言不是那样精炼，等等。但是，它却具有艺术的一个最可贵的素质：真实。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艺术应该是生活的复写，不需要提炼，不需要通过作者与题材相生相克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作者所写下的种种，也还是经过了选择的。那当中并没有那种虚假的精心设计，没有做作，除了某几处（如林鹤只是那么匆忙地翻看了一遍，却详尽地写出了韦小立的日记；如写了徐佐在土牢中受折磨的情况，这损害了第一人称的全书的体例等）显得有些牵强外，总体上，这部作品还是给读者以真实感。他在作品中直接用了他的母亲——一位知名作家的名字，他引用了几种不可能是虚构的关于他自己的文件，他没有隐蔽自己的某些一般人决不愿意公开的感情……这些细节也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感。

另外，由于作者是在一种遏制不住的冲动下写这部作品的，他将写这部作品当作一种精神寄托，一种情绪的宣泄，一种抚平伤口的镇痛剂，在其中织进了他的爱，他的恨，因而，这部作品就有一种迫人的激情。激情不仅是创作的动力，而且作者只有怀着激情才能进入创作对象，才能进入真正的创作过程。生活的真实与感情的真实应该是有机地溶合在一起的，一部作品所以能感动我们，不仅仅是由于题材和情节，而且也由于渗透着作品中的感情。

作家的个性和作品的风格也由此产生。

另外，可贵的是，作者不是一般地宣泄他的感情，他的这种感情是与探索和追求的精神联系着的。他不是居高临下的企图教导读者什么。他写出了他的青春的狂热；他在打击下的惊惶、困惑；他在痛苦中的沉思、观察。这当中也就闪现出一种对未来的希望、理想的光辉。开始时，我们怀着一点好奇心，甚至带着一点笑意，随着他进入了草原。看他在狂热中所表现出来的赤诚和稚气；看他在涉世中的逞强和意气；而随着他命运的变化，我们的心渐渐沉重起来，引起了我们感叹和思索。——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成长。读者与作者一道探索着前进，并通过作者的体验而体验生活，体验作者的心情。

这部作品在艺术表现方面诚然相当粗糙，但我珍惜其中所蕴含着的可贵的艺术素质。

巴金先生说：“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样的事！不过40年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随想录》合订本后记）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知道当年曾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我希望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不要忘记了那些岁月。我们需要正视，而且应该更深刻地认识那场“革命”。因为它的后遗症一直影响到今天，因为——还是用巴金先生的话：“唯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这部作品，即使是一块“石头”，也是从那个时代的地层中挖掘出来的，也是历史的见证！

1988年9月18日

一个人和他的海

我面前放着两本散文集：《海行记》和《挂在树梢上的风筝》。作者田野，也是一位诗人。——我想来谈谈这两本书，也谈谈这个人。

在一本前不久出版的当代抒情诗选中，选了田野的诗。在作者简介中他是“台湾诗人”。这里有一点误会。田野是四川人，在台湾呆过，那时也写诗。但那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他已于1955年返回大陆。引起误会的原因可能是，他回来后写了不少有关台湾的诗和散文。上面说到的那两本散文集，就大都是有关台湾的。

1955年他从台湾返回大陆已是第二次。两次都经历了风险。第一次是在1949年的5月，解放战争正激烈地进行。他搭乘一条运煤的船，回到烽火硝烟的大陆。经广州，到长沙，穿越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刚解放的武汉。当时，在海峡那边的台湾还是比较平静的。他原在海轮上当水手，后转到一所中学教书，生活还算稳定。他却冒着风险，在硝烟中奔向了革命的怀抱，在激动、欣喜的心情中等待分配工作。但他没有想到，是让他重返台湾。他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向我袒露过他的苦恼：他不正是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怀着向往，才千辛万苦地回来的么？但是，他还是悄悄地走了。当时解放军正在向南推进，广州还未解放。他必须又一次冒着硝烟，穿越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我怀着祝福的心和不久将再见的希望同他握别。那以后，就完全不知道他的消息。他平安地到达了么？在那边，能不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地？……6年过去了。1955年的元月，我突然收到一封他的来信。很简短，语气急迫，只说他已到香港，留下了一个转信的地址，要我在指定的日子前复他一封信，并说明过期就不要去信了。其时我刚从上海出差回来，已过了他约定复信的日期。他为什么到了香港？他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现在他还在香港还是返回了台湾或是另去了什么地方？……面对那一封短信，我茫然，我焦虑。只有期待并希望再能收到他一封信。没有想到，三月中的一天，我下班回家时，发现有一个客人正等着我。那是他。他微笑着说：“我终于逃过来了。”我因为完全意外而感到惊喜。安排他在我家住下，当晚作了一次长谈。他一向是比较温和的，那夜却那样激动，兴奋，谈到了他这些年的情况和他这次冒险归来的经历。当年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担当着风险，在友人的帮助下回到了台湾。改换过几次职业，最后在一家轮船公司当一名小职员。他思念家乡，那是一种难以言喻而又难以排遣的痛苦的思念和思念的痛苦。他怀想在大陆上的友人。同时，他多年就有的对理想的向往愈来愈强烈。难得这一次被派到香港出差，他决心乘这个机会返回大陆。他认真负责地办完了事，就搬进一家小旅店里。他为我们写了信，在焦灼地期待中却没有得到回音。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相当猖獗，他随时有可能遭到不测。而身上所带的一点钱也将花光了。还是再回台湾么？不！他决定冒一次风险。如果失败，他肯定会被关进香港监狱，甚至会被押解回台湾。但一个强烈的愿望压倒了一切顾虑和担忧。他坐上了从九龙开往罗湖的火车。在罗湖的前两站，他被迫下了车，因为那前面就是封闭区，需要特别通行证。他硬着头皮走进了那边的一个警察署，说他是一个从新加坡来的商人，要到罗湖去看望一个朋友。他讲的是英语，对那位英国警长显然起了作用，他得到了一张“当天往返”罗湖的临时通行证，使他顺利地到了罗湖。而最大的困难还在前面。罗湖是一个小镇，只隔着一条不太宽的河与深圳相望。河上架着一道大约五六米宽的木板桥，从那上面就可以走向他日夜向往的土地。但是，桥的正中

横着两具用木条钉成的“马扎”，中间有一条窄窄的过道。桥的这边，站立着身穿黄呢制服的港英警察；桥的那头，站立着身穿绿色军装的中国边防战士。双方相距不到10步。怎样才能跨越这10步呢？田野坐在马路边的一家冷饮小店中望向彼岸。咫尺天涯。那一座小桥可以使他通向圣土，稍有差池也可以使他坠入深渊。他一支又一支地抽着烟。他不愿回头也不能回头；他身上连回九龙的车费都不够了。他想起了为要混过昭关一夜白了头的伍子胥。伍子胥在困境中还有朋友相助，而此刻他是孤身一人。时间在烟雾中过得很慢也很快。附近车站的挂钟当当地敲了4下。几乎同时，对岸响起了一种特殊的乐曲（那是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工间操”的乐曲），似乎是亲切的呼唤，是嘹亮的进军的号角。在乐曲的旋律中，他毅然地站了起来，从容地走向桥头，将那张临时通行证交给了惊疑地望着他走近的两个港英警察。当港英警察认真地审看那张毫无作用的纸张时，他闪身往桥的那一头跑去。两个受骗的港英警察怒声高喊并伸出手来想抓住他时，他已经穿过了桥正中那条窄窄的过道，向一直注视着这一不寻常状况的两名边防战士跑去，大声喊：“我是同志！我是同志！”他终于平安地站在了他向往的土地上……

我激动地听着他的叙述。望着在灯光下的他的苍白瘦削的脸。我认识他已上10年了。他一向是温和、谦让、文质彬彬的。看来他不是个刚强的人。但是，在必要的时刻，却有一种内在的力量。1947年，我们都在南京念大学，但不在同一个学校。他是他所在的那所管制极严的大学中唯一参加了“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学生大游行的人。他加入到我们学校的行列中，走在我的身边。后来因此受到了惩罚。这一次他冒着风险从香港闯回国内，也表现了非凡的精神力量。

而此外他还有着沉重的精神负担。他在台湾已成了家，有妻子和两个男孩。他没有将出走的决定告知妻子。出于对他的了解，妻子可能隐约感觉到了他的打算，所以她在为他收拾行装时，放进了一件薄呢大衣，那是在热带气候的香港所不必要的。那两个男孩，5岁的那一个高兴地嚷着要他从香港带一双皮鞋来；小男孩还只1岁半，也跟着嚷嚷。他们决不会想到将很多年见不到爸爸了。

田野自己也没有想到一分手就是这么多年。他原相信祖国很快会统一的，他难以想象妻子独自抚养两个幼儿的艰辛，难以想象由于他的出走为妻子和孩子带来的麻烦和磨难。他像当年在海峡那边思念这边的家乡一样，又在海峡这边深深思念海峡那边的亲人。更使他内疚的是，他不知道妻和孩子能不能谅解他。他无法得知他们的音讯。7年前，我曾和他一道到过厦门。在日光岩上，我们眺望海峡那边。我不时侧过眼去看他，他长久默默地凝望彼岸，我也难以想象他此刻的心情。

一直到1982年，他才收到妻子的来信和两个儿子的照片。信很简短，略报平安。两个儿子已长大成人，他完全不认识了。——信是花了两个月时间绕了半个地球辗转寄到的。他感到喜悦和安慰，同时使他回想起许多往事，回想起离家前夜的情景。看着那封简短的信和儿子的照片，他泪眼模糊了。

一直到1984年，他才有机会与妻子和小儿子见面。妻子和小儿子参加了由台北去泰国观光的旅游团，从曼谷返台途中，将在香港停留3天。他在得到通知后，如期赶了去。分别30年，相见只有短暂的3天，而且会见是在另一块土地上——香港。田野说这是悲欢离合的3天。说是欢乐，其中也渗透着浓厚的辛酸吧。他们一家也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团聚：大儿子没有能来；还

有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两位媳妇和两个孙女没有来。当年 1 岁半的小儿子现在已是 31 岁，正是当年田野离家出走的年龄。儿子的母亲两鬓已白，表明了她在 30 年岁月中的哀愁和艰辛。但她没有流露一点怨意，小儿子也表示了对他的理解。而且他知道两个儿子都很争气，生活可以过得去。他因而稍为心安。他买了两双皮鞋送给两个儿子，实现了他 30 年前离家时的诺言。3 天很快就过去了。临上飞机前，小儿子在他面前跪下告别，他压在心底 3 天的眼泪终于控制不住了。什么时候再能见面呢？难道还要再等 30 年么？！

或者，比起分散在海峡两岸的千万人家来说，田野一家还算是幸运的吧。因为他们总算取得了联系（虽然每一次通信都要经过长久的辗转），而且其中的几个成员总算见过一面。

以上的这些情景：他在台湾时对家乡的思念；离家出走，经历风险返回大陆；回来后对家人的牵挂；与家人的短暂的相聚……他都写成了散文，是这两本集子中最感人的篇章。他还怀着诚挚的感情写了一些散文记述他所认识的台湾作家、诗人，从而使我们对这些作家、诗人进一步有所了解，也侧面了解到台湾文艺界的一些情况。

在这两本散文集中，还有一些篇章是写他 40 年代初到台湾，在远航轮上当见习水手时的生活情景。当时他很年轻，初到大海上漂航，到过一些异国的港口。他接触过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他自己也受到过欺侮、嘲弄，这使他看到了在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中黑暗腐朽的一面。同时他也从劳动人民和那些善良的小人物当中得到过温暖，帮助。他所写的种种戏剧性的小故事，具有浪漫色彩，而又血泪斑斑。这一段生活经历对他的性格形成应该很有关系。那以后，田野从大自然的海洋中又驰向了人生的海洋，经历过更多更大的风浪。1955 年他返回大陆后也有过不平凡的遭遇。他没有在文章中写到这些。田野说：“我曾经是个海员，在海上生活过。我知道，我懂得，一个真正的爱海者，决不会因为风暴，因为波涛，而和海绝交了。”历史老人将严肃地记下那些教训，而且，他终将作出公正的评判。1984 年，田野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写道：

为了这一天，我曾经走过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从台湾到大陆。

即使是，在苦难的历程中，我也没有停止过跋涉。虽然我的身上有着伤痕，我的脚也在流血。

他的独特的生命历程就是一本大书，那当中同时反映了也是在动荡和苦难中行进的伟大的时代。我曾多次劝他将这一切更详尽地写出来。他总是笑着说：“呵，我没有这个能力。”这当然不容易，而他也是过于谨慎了。

单是读这两本散文集，也还是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满足。他的那些写海员生活和异国风光的作品，故事新颖生动，语言明快俏皮，具有浪漫主义的情调。他写在海峡两岸的思念之情和与之有关的自己的经历的作品，文风则较朴质，其中《偷渡者》、《照片》、《悲欢离合的三天》、《这一天》等篇章，读来很亲切，很感人，因为那些事情本身就含着血泪，而他写时又是出于至情的。

田野也是一位老人了。在自然的海洋和生活的海洋中，他都多次经历过大风大浪。他经受了锻炼，而又依然保持爱海的心。我们有理由期望，他还将写出新的《海行记》。

1987年10月21日

笛声

柯罗连科的中篇小说《盲音乐家》里面，有这样一段情节：5岁的盲眼孩子彼得鲁思为他家里的马夫约西姆的笛声迷住了。每天晚上临睡前，他都摸到吹笛人那里去，在马棚里消磨一两个钟头，安静地倾听着柔和的笛声。他还幼小，但对音乐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的生理缺陷加深了这种敏感。他凭着纯洁的心感受到了笛声中某种质朴的、真诚的东西，虽然未能理解，却被感动了。在马棚里，在那个看来粗俗的马夫身边，倾听着笛声，成为他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了。甚至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他还出神地回忆着那些曲调。做母亲的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产生了嫉妒。她在求学时期学过音乐，她的钢琴演奏曾经受到人们的赞扬。于是她去购买了一架钢琴。她要把迷恋笛声的儿子从粗鲁的马夫身边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一个黄昏，她带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在儿子和马夫面前演奏了自己最拿手的曲子。她纤细的手指轻快灵巧，她弹奏的旋律也比较丰富。然而，意外的是，她看到儿子苍白的脸上流露出迷惘的神情，而马夫约西姆同情地望了望孩子，然后对钢琴投了轻蔑的一瞥，大步走出去了。

这次失败使母亲流泪：痛苦的眼泪和羞愧的眼泪。她，一个贵妇人，曾听过“上等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怎么会被一个马夫凭一支粗俗的木笛击败了呢？她因而憎恨那个“可恶的奴才”。晚上，当孩子又摸到马棚去的时候，她站在窗前，带着嫉恨的心情倾听着飘送过来的笛声，想从中挑出毛病。但是，逐渐地，那“粗俗的吱喳声”却引起了她的兴趣，她不自觉地沉浸到了那悲怆的曲调中。她不得不承认，由于疼爱儿子才和这个“村夫”在一个竞技场上站在平等的地位较量，而胜利者竟是这个村夫。

原因在哪里呢？

她自己解答了这个问题：因为那笛声里面有一种“特别真挚的感情”，有着一种“天然率直的、纯洁的、非矫揉造作的诗意”，那是乐谱上学不到的。而她自己所有的仅仅只是技巧。

可能有人认为这段情节只是表达了一个平凡的道理。这样说当然也可以。但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是表达了一个美学的奥秘。问题在于，一般人都知道的平凡的道理，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理解那含意的。平凡的道理往往包含着，或者说，能够生发出丰富的内容。在艺术领域里，我们往往为一些表面的技巧，为一些虚张声势、装腔作势的姿态，为一些空洞的叫喊、言不由衷的言词所蒙蔽，所欺骗，而渐渐麻痹了我们的艺术感受力。那个失明的孩子，由于他有着纯朴的心，却能够直感到艺术的真伪。虽然怀着对母亲的爱，他却舍弃了母亲用高度的技巧（仅仅是技巧）所弹奏的钢琴，奔向了那真正能打动他、感染他，也就是使他得到真正艺术享受的、马夫吹奏的有着特别真挚感情和纯洁诗意的笛声。

这个看来平凡的道理，柯罗连科是通过一种尖锐的对比提出来的，因而有着迫人深思的力量。不过，他是这样解释“诗意”的：“诗意的秘密就是由逝去的‘过往’和‘永远存在’、永远向人类心灵倾诉的大自然（大自然就是‘过往’的证人）两者之间的微妙联系”。这说得有点儿缥缈。我们不妨说，诗意产生于对生活、对大自然（那也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从宽广的角度去看的话）的热爱。连苦难的倾诉、深沉的忧郁，事实上也是

出于对生活的爱，是对生活的爱的另一种表现。

一个歌唱家不仅是用他的嗓子，而且也是用他的灵魂歌唱的。

在一切艺术领域里也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画家用色彩，雕塑家用大理石，作家用笔，而同时也都用他们的灵魂。

所以鲁迅先生说：“创作总根于爱。”

所以托尔斯泰说：“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是——作者的心灵。”

晚年的屠格涅夫有一次叹息着说：“我现在已经是什么也不能写了。以前每当我构思写作的时候，总是由于爱的狂热而激动得发抖，现在这种情形已经没有了，我已经衰老，既不能爱，也不能写作了。”这是他的悲哀。由于缺乏激情，自动停下笔来，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道德。谢德林就更加直接地说过：“我发誓：当我的心不再颤抖的时候，我就停下笔来，即使我穷得要死。”

一个看来粗鲁的马夫坐在马棚里，吹奏着自己手制的木笛。在他的吹奏中，倾注着他的痛苦和忧愁，他的期待与渴望。他的笛声里震荡着草原的气息，风的呼啸，白桦树的低语……悲怆的笛声与夜色融合在一起，又散发到草原上去。一个失明的孩子坐在一边聆听，他的稚弱、纯洁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引起了他对生活的激情，对他还陌生的生活的向往。而在临近的一座高楼里，一个少妇倚站在窗口，也感动地倾听着笛声，思索着艺术的奥秘。

我多么希望，在我的窗口也能听到那样动人的笛声，有着特别真挚的情感、有着纯洁诗意的笛声。

1974年

永远的春天

最近借到了巴金同志在30年代翻译的、匈牙利作家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这是我念初中时所喜爱的一本小书。这次重读时，我好几次有了眼泪，而且也正是当年感动过我的那几个章节。这真是有一点费解的，40多年了，难道我的感情和欣赏力还停留在当年的水平上吗？

作者在序言中说，这个“关于温和的郁悒的遇合的故事”，是他的“编织幻梦的心儿的含泪的微笑”。是的，这是含泪的微笑，但不是果戈理似的辛辣，也不是契诃夫似的沉重，它温柔而凄凉，带着梦幻的光影。作者写这本小书时已是中年了，他说：“秋天（烦恼的生活）夺去了我面颊的玫瑰色。”这是一朵美丽的、凄艳的小花，开在秋天的心境上。

主角是两个“拾得的孩子”：亚当，18岁的中学生，有一个悲惨的童年，现在在一个忠心的老保姆的照料下，过着贫寒的生活；另一个少女夏娃，比他小两岁，是被两个流浪人收养，在卖艺的帐篷中长大的，他们钟爱她，唤她“小太阳”。当这个小小的江湖班子到一个小镇上演出时，这两个“拾得的孩子”偶然地相遇而且相爱了。这个江湖班子只在小镇上停留了两天，就又奔向另一个市集。这两个在巨大热情中的初恋者不得不含泪分开了。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这里的爱情是写得如此纯洁和美丽，以致使我们不得不深深同情这两个“拾得的孩子”，为他们的分离难过。同学之间的友爱是写得如此纯朴、动人，而又带着只有中学生才会有的那种特殊的风格，使我们不得不会心地微笑着，而又深受感动。那个老艺人和那个丑角是可爱的，穷困、颠沛的生涯没有摧毁他们善良的心。那个教员巴南约席也是可爱的，他看来严肃却是慈祥，而且富有人情味，他谅解了亚当：亚当因为与夏娃会见而上学迟到，却大胆地用“因了春天的原故”作为解释，虽然那是10月10日。老教员严厉的脸上闪过了一个看不见的微笑，春天的温暖也掠过了他苍老的心。

作者深深地同情这一对小情人。然而，他在生活中经历过许多痛苦，也亲见过许多不幸，他知道他们是不得不分离的。他通过那个少女的口说过，她幼年时在一家百货商店里看到过一个又好看又会说话的小玩偶，非常喜爱。当她好容易凑了一笔钱，兴高采烈地去购买时，却看见一个有钱的小姑娘将它抱走了。店员拿出了另一个肿脸的玩偶来哄骗她，深深伤害了她幼小的纯洁的心。以后，她逐渐发觉，有许多次，当她怀抱着美丽的希望时，生活掷来的却不过是一个肿脸的玩偶。在那样的社会中，对于那些贫困的人们，严酷的现实总是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梦想，即使那是小小的、卑微的梦想。作者看清了这一点。如果他从这一点上深入追究下去，他会得到应该得到的结论的。然而，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他却走向了宿命论。他借那个老艺人的口，发出了一些虚无、悲观的论调，损伤了这本美丽的小书。

但作者毕竟有一颗温柔、爱美、向善的心，他用哀伤的调子说出了一个小美丽然而凄凉的小故事。有一个友人在读了这本小书后，在底页上写着：“这是一本感人的真挚的小书。它使人懂得爱，懂得青春的权利……”另一个友人又加了两句：“是的，或许这样说要更好些，它使人珍惜和尊重爱，珍惜和尊重青春的权利……”这都说得很好。每一个人都将有、有着或有过青春，每一个人的青春都应该是幸福和美丽的。对于那两个“拾得的孩子”，作者

为他们被损伤了的青春的权利叹息，同时也抱着祝福的心情。屠格涅夫在俄罗斯凄风苦雨的夜间，祝福过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这本小书的作者在风雨飘摇的黑暗的社会中，祝福那些贫困的、纯真的少男少女。引申一步，这里要求的不仅是珍惜和尊重爱，珍惜和尊重青春的权利，而且要求珍惜和尊重人的权利。我们惋惜作者只不过发出无可奈何的低沉的叹息，但我们也珍爱作者的善良的祝福的心情。特别是，作者在生命的秋天还能讲述这样一个虽然悲凉然而美丽的故事，说明他心里还怀着春天的温暖，还有着对春天的渴望。那个教员巴南约席安慰因恋人的离去而痛苦的亚当说：“抬起头来！春天还会来的……还有许多美丽的春天。”这是缥缈的希望，生活会掷来一个又一个肿脸的玩偶来哄骗那些不幸的人们吧。但这也是真实的希望。它所以真实，不仅因为没有希望人就不可能生活，而且总可以看到真正的出路和真正的春天的，只要“抬起头来”！

作者怀着真挚的深情讲述着，感动我们的不仅是美丽而凄凉的故事，而且也因为他的这种真挚的深情。他感动过少年时候的我，也使我现在还深受感动，虽然我也早已到了生命的秋天。可以责备我的进步太小，但我却为自己还能保持与少年时候相通的心情而喜悦，即使说那是过分的温情、软弱也罢。是的，现实的斗争是如此激烈，我面对过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也见到了剑的寒光和火的烈焰。但健壮的心不一定就不能有一点纯真的柔情。不仅真实的憎恨和真实的追求必须要以真实的爱为基础，而且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真正的强者也应该能够柔和地爱的。我不满足于自己的不够坚强，但却不必因为自己还多少保留着少年时期纯真的感情而羞愧。

在 30 多年前，我在自己排演的一个话剧的说明书中写着：“青春伴随着我们整个的生命，有一段时日，我们占有它；其余的时日，充满了对它的回忆。”这是说得太低沉了。其实，不仅在回忆中，青春应该永远与我们同在，不管面对的是萧瑟的秋日还是凛冽的冬季，只要你心中保持着春的温暖和春的希望，只要你——

“抬起头来！”

1975 年

胜利者

偶然的的机会找到了一本 20 多年前出版的旧杂志，那上面有一篇题名《胜利者》的短篇小说，我曾读过，深受感动，这次又重读了一遍，也还是心情激荡，而且引起了一些联想。

一个关于溜冰运动员的故事，一场扣人心弦的斗争。

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斯特列什涅夫，溜冰冠军，他的 1 万公尺记录保持了 6 年还没有被刷新。现在他已经 38 岁。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峰巅，今后就会走下坡路了。他原已决定今年退休。但冬天来临时，他又动摇了，一个运动员不会甘心退出运动场的。他努力练习，想报名参加比赛，但最后他终于明确地认识到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想，自己葬送自己是毫无意思的，我还是进教练学校，从另一个方面为运动服务吧。

另一个溜冰运动员库尔却托夫，几年以前还只是一个身材又瘦又高的孩子，是一个忠实地热烈得有些过分的溜冰迷，一个斯特列什涅夫的崇拜者。现在他已成为刷新斯特列什涅夫记录的最有希望的健将了。

但这个冬季他在一次 1 万公尺决赛中的成绩并不理想。虽然他有意打破记录，在场的全体观众也都热切地希望他能这样，他的成绩却使大家失望，离开记录还有一段距离。

问题不在于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有一个缺点：要是后面没有人盯得紧，他就没有劲。他是太年轻了。现在他需要一个坚强的敌手。

坚强的敌手是有的，就是斯特列什涅夫。这位记录保持者也在观看比赛。像在场的许多有经验的观众一样，他了解库尔却托夫没有打破记录的原因。他知道，如果他和库尔却托夫一道跑，就有可能激发这个青年的全部潜在力量。而这个冬季，还有一次万公尺比赛将要举行。于是，他不自觉地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参不参加这次比赛呢？

如果参加，他就要失去记录保持者的荣誉，失去保持不败的冠军头衔。他一定会败在这个青年——他过去的崇拜者的手里，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不是要用自己的失败去帮助别人赢得胜利呢？是不是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别人打破自己所保持的记录呢？

他可以不这样。他原已决定退出运动场，不是么？

他自问并不是一个胜利迷。他也理解记录不是运动员的私产——它属于国家，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不应该把渺小的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但是要做出一个决定还是太难了。他自觉不自觉地找了一些不参加比赛的理由（人们只要想原谅自己，总会找到一些理由的）。但内心的斗争没有停止，因为他自己也知道，那些理由的作用不过是用来掩盖自己内心的一种卑鄙的感情。最后，他终于决定参加比赛。

斯特列什涅夫毫不怀疑观众都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不平常。但是他想，恐怕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他是抱着怎样的心情来参加比赛，而且他是输定了的。第 9 圈跑了一半，他就向前猛冲，他的“敌手”紧跟在他后面，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他用了最大的决心和力量坚持着。在他的带动下，那年轻人心中被对尖锐斗争的热望鼓舞着，发挥了他在潜在的力量，在最后几十公尺的猛冲中赶过了斯特列什涅夫。

报告员用响亮的声音宣布：“运动员斯特列什涅夫以前创造的记录，被

库尔却托夫以缩短整整三秒又十分之八秒的时间打破了。”掌声像山崩地裂般响了起来。斯特列什涅夫感到有着说不出的悲哀，同时又非常高兴。他也很有兴趣地知道，这些年来他第一次重新达到了自己的记录速度。

意外的是，他发现人们对他的欢迎和欢呼甚至超过了对胜利者。一个教练以沙哑的声音对他说：“这样的失败等于许多次的胜利。”

这是一场艰辛的斗争，是运动场上的，也是内心中的。在前面我用了“扣人心弦”这样的字眼，这并不过分。作者从正面和侧面，直接和暗示，刻画了斯特列什涅夫内心的犹豫、矛盾、苦恼。我感同身受地紧紧跟随着他，我了解他的心情，一如我自己正在受着考验。当他终于决定参加比赛，我是这样兴奋。当他在比赛中途艰难地支撑着使出全部力量时，我肉体也感到紧张。一直到最后，他被击败了，我也感到内心的空虚和悲哀。而当人们对他的失败——他的真正的胜利欢呼时，我有了眼泪。斯特列什涅夫原来想不参加比赛的最大理由是自己青春的力量和身体已一同衰老。但是，他记起了在战争时期进攻一个阵地的情况，三次冲锋都在惨重的损失中失败了，连长要他们进行第四次进攻。一个弟兄说：“实在没有力气了，指挥员同志！”连长回答：“瞎说，你只知道自己的力气，但是除了它，你身上还有一点儿别的东西哩！”那阵地终于被占领了，如同斯特列什涅夫在这“一点儿别的东西”的帮助下终于战胜了他自己。我懂得了这“一点儿别的东西”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对集体的爱；而且，也是对作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无愧于大写的“人”的爱。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来冷静地面对自己，不要害怕深入自己的内心；我们是不是有时也遇到和斯特列什涅夫类似的情况，在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之间犹豫彷徨？我们是不是有时也企图在一些漂亮的言词下来掩盖自己的私心？我们是不是有时找寻一些理由来推卸自己应尽的责任？

更进一步，可以问一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因为害怕受到损伤，有时对于明知不合理的事情缄默无语？我们是不是有时违背自己的良心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们是不是有时会对一个无辜的人扔出石头，以表明自己的“清白”？……我可以列举许多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经常可以遇到许多这样的问题。这些也都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对我们的大大小小的考验。

可怕的是，我们往往不能认识自己内心中那些不洁的东西，而心安理得地将它保存了起来，甚至让它发展了起来。

可怕的是，我们有时虽然能够认识到那些东西是不洁的，却用一些自欺欺人的辩解将它掩盖起来。

可怕的是，我们认识到那些东西是不洁的，也想将它清除，却没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因为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往往在个人的利害得失中犹豫不决，常常是想着，下一次再改吧。而一次妥协就可能导引第二次，第三次……以至无数次，以至到最后完全丧失了斗志。

我们其实应该知道，真理、理想、正义……这些都不是空洞的字眼。对真理的追求，对理想的渴望，对正义的执著……都不应该仅仅是口头上的漂亮话。而可悲的是，我发觉，我们有些人甚至连口头上也不屑于说这些了。他们自认为是从许多痛苦中得到了教训，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心中渐渐熄灭了曾经照亮他们的火焰，不再能听到那呼唤他们前进的声音。他们用尽一切方法保卫自己，想使自己活得好一些，却没有想到，他们因而失去了活着

的意义。

我常常含泪仰望那些踏着蒺藜前进的强者，那些奉献出自己孩子的母亲，那些在风雨中仍紧紧握着自己爱人的手的妻子，那些敢于安抚被诬为“叛逆者”的尸体痛哭的吊客，那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徒，那些含笑献身的烈士……而我自己，我承认，有时却在一点私念下低下头来，有时考虑到个人的安危，家庭的幸福，而在真理面前背过脸去。

高尔基说过，即使要战胜自己的一个微小的缺点，也需要作最大的努力。现在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微小的缺点，而是隐藏在灵魂深处的一些污秽的东西，那是历史的、旧社会的影响，那是现实生活的复杂、曲折的反映，因而更需要巨大的决心和艰苦的努力。

人应该达到时代所要求的高度，即使我们离那高度还很远，也应该一步一步地攀登。而道路不是平坦的，每跨出一步都需要努力。但只要你有这样的决心，你就能够有力量跨出这一步。如果说，一次的妥协能够导引第二次的妥协，那么，一次的胜利也可以导引第二次的胜利的。你的同志、朋友，你的亲人都可以帮助你，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你自己。

斯特列什涅夫在万公尺比赛中失败了，但全场观众都向他欢呼，邀请他和新纪录的创造者一同绕场一周，走一个胜利者的光荣圈。他开始还有些羞答答地不好意思。但他想，也许他确实是有权利走这胜利者的一圈的。今天他不是取得了所有胜利中最艰难的一次胜利：对自己本身的胜利了么？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肉体的胜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灵魂中自私自利这些卑鄙感情的胜利。

“作为一个溜冰运动员，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胜利者的道路，但作为一个人，这也是他新的、光辉的道路的开端。”

而我们每一个人也是都能找到这样的开端的。问题在于你的决心。

1975年

战士·诗人·哲人

——读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

有一本书，在我处境艰难、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时候，曾经使我得到安慰和鼓舞，而且给我以很大的艺术享受。——这其实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严格地说，它甚至不是文艺作品。我所指的是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

这是一束从敌人的监狱中寄给友人的信。不是偷偷地传送出来的，而是必须经过敌人检查的信。因而，它不能够谈一些可能被敌人认为是违碍的事情和问题，只能写一些平淡的、零碎的感想和小事。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一束信札还是闪着耀眼的光芒；即使谈的是小事和片断，还是反映出了作者的人格的光辉，如同一滴水也还是会反映阳光一样。

罗莎·卢森堡（1871—1919），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的活动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威廉·皮克、梅林、蔡特金的战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坚决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的政策，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因而多次被捕入狱。这一束信是1916年7月——1918年10月，她在狱中写给李卜克内西夫人的。

她在信中谈读书的感想，谈一些往事，谈一些生活中的印象，也谈小鸟，谈动物，谈花草，谈自然的景色。当她自由的时候，她忙于革命工作，不大可能有闲情谈到这些，更不大可能将这些写下来。正像许多革命者一样，只有在监狱中，她才有较多的空闲，又被限制着不能谈别的事；而她写信的对象又是她的挚友，她才会这样随便地漫谈。这样，我们就窥见了作为一个战士的她的另一面。这对我们是珍贵的，使我们对她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她在我们心中是更亲切了。这对我们是珍贵的，也因为，在读着这些短信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的人格和心灵所感动。我常常翻阅这本小书，每一次我都沉浸于其中，引起了心的颤动。这对我们是珍贵的，也因为，这些信札是写得如此朴素、真挚、美丽，好多地方是真正的诗。

卢森堡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就参与了革命斗争，以致受到敌人的追捕。她躲藏在—辆牛车的稻草堆中，从祖国（波兰）流亡了出来。那以后，她一直坚持斗争，一直到悲壮地牺牲。她写过不少政论性的著作，就是在狱中，她还偷偷写过一些论文和传单。她还对一般人认为枯燥沉闷的政治经济学有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有专著（梅林的《马克思传》中关于《资本论》的那一章也是她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位战士，而在我们读了这些短信以后，才知道她的心灵是这样的丰富，感情是这样的细腻。

她说，在她的斗室内，“通过千丝万缕直接而微妙的细丝和外界千百种大大小小的动物联系起来”，“内心和生物自然界息息相关”。她能懂得鸟兽的鸣叫声中各种最细致的差别和感情，她的心会因鸟儿的鸣啭而颤抖。她满怀哀怜地将被—群蚂蚁围攻的受伤的小虫解救出来。她对一只半死的蝴蝶低语。她为了有些鸟类竟然默默地灭绝下去而悲痛，甚至哭泣起来。她的丰富的同情心特别表现在对—群水牛的态度上。那些水牛产自罗马尼亚的草原，是战利品，拖着沉重的货车到监狱里来，受到赶车士兵的毒打。她写着她站在—匹淌血的水牛面前的心情：

那牲口望着我，我的眼泪不觉簌簌地落下来——这是它的眼泪啊，就是一个人为了他最亲爱

的兄弟也不会比我更无能为力地目睹这种默默地受难更为痛心了。那罗马尼亚自由而肥美的绿色草原遗落到多么遥远不可及的地方去了！那里阳光普照，微风轻拂，多么和这里不同啊！那里鸟儿清脆地鸣啭，牧人富有旋律的呼啸声也和这里多么不同啊！可是在这里——这个陌生的恐怖的城市，这阴郁的厩舍，这些搀杂着烂稻草的、令人作呕的腐朽的草料，这些陌生的、可怕的人们，以及这殴打，这从新的创伤涔涔流出的血滴……

啊，我的可怜的水牛啊，我的可怜的、亲爱的兄弟，我们两个都是那样无力、疲惫地站在那里，在痛苦、无力和怀抱着热望这几点上我们是相同的。

这是被敌人称之为“嗜血的卢森堡”写的。我们可以不理睬敌人的这种污蔑，但是不是我们有的同志也会认为这是“过分温情”呢？

她是那样热爱大自然，她常常用“这是多么美啊”来赞叹一棵大的黄杨，一簇小花，一个黄昏。仅仅一朵玫瑰色的云彩就能够使她心旷神怡。

她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生的乐趣，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生活的美，甚至在单独监禁的狱中也是如此。在一个寂静无声的漆黑的夜里，她在囚房中静静地躺着，身子像是被冬日的黑暗、烦闷和不自由的黑布层层缠裹住。但她的心却由于一种无从捉摸的、奇怪的内心喜悦而怦怦跳动着，就像是在辉煌的日光下走过一片绚烂的草原一样。狱卒沉重、迟缓的步伐在潮湿的沙砾中发出的吱吱声，对于她也像是在唱一支短小悦耳的生活的歌。在黑暗里，她向生活微笑，仿佛她已得知一个魔术的秘密，这秘密能制裁一切邪恶和令人沮丧的谎言，并能把这一切化为纯然的光明和幸福。

凡是受过单独监禁的人就知道那是多么痛苦。恩格斯说，那是往往会把人逼疯的。我也有过一点这样的经验。在孤独的煎熬中，我常想到一些先辈们，从他们的榜样中吸取力量。其中有两位妇女，一位是俄罗斯的薇娜·妃格念尔，我读过她的《狱中20年》，她的从容和镇定帮助我镇定下来。但我更多地却是想到卢森堡，想到她对待生活和对待痛苦所达到的那种哲人的高度。

她不是那种“万物静观皆自得”的遁世者，也不是那种“留连光景惜朱颜”的玩世者。她对生活的美的感受，她对大自然的爱，对动物、鸟类的爱，是根源于她对生活的爱。而她能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把握住生活的美妙和奇趣，能够生活在陶醉里，能够“披着一件绣满灿烂的繁星的外衣通过人生”，这件外衣保护她不受一切细屑繁琐的杂事和一切烦恼的侵扰，则是由于她对将来、对真理的信念。——热烈地有所爱，因而强烈地有所憎，同情一切受难者，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这一切溶化在她的内心中，溶化在她的生活中，成了她的本能，像呼吸一样地自然。她不能有别样的选择，不能有别样的生活。如果让她站在斗争的一旁，将比把她关在监狱中更使她痛苦。她知道她为什么而斗争和受难，她知道她为什么必须斗争和受难，因而，她说：“不管一切如何，你仍然要平静和愉快。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也就必须这样对待生活，要勇敢、无畏、含着笑容地——不管一切如何。”与斗争融合为一体，与信念融合为一体，伟大的热情创造了伟大的人。因而，她可以说：“不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跟我同在。”

有人说过：对于真实含义上的战士，就是真实含义上的诗人也应该为之低头的。我想说，在真实的含义上，战士、诗人、哲人原是相通的。真正的战士也就是诗人——即使他一生中并没有写过一行诗，然而他的一生就是美丽的诗；也就是哲人——正是由于对生活的明澈的认识，才能使他英勇地斗争，

从容地受难，而在必要时，又壮烈地献身的，如同卢森堡。

是的，卢森堡有时也会感到很悲痛，有时也会感到疲惫无力。但这不正说明她是一个真正的人么？作为一个人，她有着人的感情。但也正因为如此，就更能显出她能超越于这一切之上的坚强了。

是的，卢森堡也有过错误，甚至不止一次犯过错误。但作为一个人，她怎么可能没有错误呢？问题在于，她的错误是认识和理解的原因，而不是由于私心。

1918年11月德国工人阶级奋起推翻德皇威廉后，卢森堡获得了自由，重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而在第二年的二月，她就被残酷地杀害了。在她生前最后写的那篇政论《秩序统治着柏林》中，她以无比愤怒的心情谴责了替资产阶级绞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叛徒，同时她也宣告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然胜利的信心。她说：“你们的‘秩序’只是建筑在浮冰上的宫殿”，“革命是永存的……革命必将通过失败与胜利，走向自己伟大的目标”，革命“将在你们发抖的音乐齐奏声中宣告：过去我存在，现在我存在，将来我存在！”——这是壮丽的诗。但是，我也为她所写的这些朴素、真挚、珍珠般闪光的短信所感动。血管喷出的是血。列宁曾将卢森堡比作是一只鹰，就在这些短信里面，我们也看到了鹰的心。这些短信告知了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应该怎样做一个真正的战士，做一个真正的人。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像她那样：

不论我到哪儿，
只要我活着，
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就会跟我同在。

1980年

无愧于“人”的人

我最初读到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是在1948年的秋天。这是一个人在死狱中的手记。他幸运地从事实上是“自己人”的看守那里得到了纸笔，有机会时就偷偷地写几行。他要说的话是那样多，而死神随时可以抓住他，所以他常常担心自己不能写完。在他写了最后一页不久，就被处决了。

这是名符其实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是激荡着欢乐的书：生命的欢乐，战斗的欢乐。作者自己就正是这样说的：“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也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也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纯真而朴实的欢乐情绪是浸润在全书中间。当我们读的时候，不能不满含眼泪——不是由于悲哀，而是真诚的感动，感到自己是在生命的祭坛前受着洗礼，一股圣洁的热流在内心进涌，鼓舞着自己向前奔去。

伏契克说：“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让我们来读一读这本书，看我们能不能以同样的爱来回答。

伏契克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法西斯占领后，作为捷共的中央委员，转入地下坚持着斗争。1942年4月24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牺牲于1943年9月8日。

在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中，他从生被带到死亡的边缘，又渐渐复生，而后重新面向死亡。在这中间，备受苦刑和折磨。

如果他被捕的当时拒捕（当时他身上带有手枪），他就可以仅仅一死，而不致遭受酷刑和折磨。但是，考虑到在场的5位同志（在敌人眼中，他们不是问题那么严重的人物）的安全，他没有这样做。他被捕后，遭受多次的毒打和重刑，眼看必死，连敌人也说：“够他受的了！”同牢的难友为他唱起了挽歌。然而，他又奇迹般地慢慢活了过来。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体质好，也因为他有坚强的生活意志。虽然这“生”，不过是使他又一次经受苦难，面向死亡。

而他原是热爱生活，渴求着日常的自由的生活的。当熬受着苦刑，一步一步逼近死亡的深渊时，在昏迷中他却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狱外的生活的节奏，想象着狱外的生活的洪流。当他从弥留中慢慢醒过来时，他说：“我希望再过一过自由的生活，再能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唱，多多地在世上游逛。要知道我现在才刚刚成熟，我曾有过这么多的力量。”而且，正由于是从死亡的边缘回来，他是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美丽和幸福，在最普通的事物和现象上都能发现迷人之处。他在黑暗的狱中感叹着：“多么想看一次日出呵！”

审讯他的特务在知道酷刑不能使他屈服后，想到多彩的生活可能对他是有力的诱惑，因而把他带到城里，坐在公园中，对他说：“我知道你爱布拉格，你看看它吧，你难道不想回到这儿来吗？”

当然想的。夏天的傍晚，已经有点秋意的布拉格被淡蓝的轻烟笼罩着，像是成熟了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样的醉人，令人想看它，拥抱它，一直到

世界的终止日……然而，回答是：“如果这儿没有你们，它会变得更美丽。”

这种力量：从生到死，死而复活又重新面对死亡，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肉体上的折磨，抵抗那种为自己所热爱的生活的诱惑——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呢？

伏契克说：“我清白地活到现在，我愿意至死都做一个清白的人。”
——力量来自人的尊严。

他说：“千百万人正在为争取人类自由而进行最后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斗争中倒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作为这最后斗争的战士的一个，这是多么壮丽呵！”

——力量来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的自豪感。

那个审讯他的特务对他说：“你们输了，你们所有的人都输了。”

“只有我一个人输了。”他回答。

“你还相信共产党会胜利吗？”

“当然相信！”

——力量来自对信仰、对胜利的坚定的信心。

是的，人的尊严，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的自豪感，对信仰和胜利的坚定的信心，这就是他的力量的源泉；这就是他面向死亡而满怀欢乐的原因。

伏契克写到在狱中与他的夫人古丝妲两次的相见。她是他艰难而不安定的生活中的忠贞的伴侣。地下斗争和经常的离别使他们永远保持着初婚的感情。在伏契克被捕后，她也被捕了。

第一次是在伏契克被捕的当晚。秘密警察领她去对质，要她承认那个人是她的丈夫。面对着已被蹂躏得不成成人形的最亲爱的人，她连眼神都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断然地说：“不，不认识！”

可以想象，她要以怎样大的毅力，才能承担巨大的痛苦，才能忍住自己的眼泪，才能克制冲向前去的激动。

另一次是秘密警察企图让古丝妲去“影响”伏契克。敌人告诉她，如果伏契克还“执迷不悟，今天晚上把你们俩都枪毙”。

古丝妲用温柔的眼光注视着伏契克，这样回答敌人：“这对于我不是恐吓。这正是我的请求：如果你们把他打死，就请你们把我也打死吧。”

两次相见中的不同的表现，表现的是同样坚贞的爱。而且这不只是一个亲爱的伴侣的形象，也是一个坚定的战士的形象。

伏契克还一个一个地刻画了监狱中其他英雄们的形象。他恳切地希望将来的人们记住他们，希望大家知道：“没有名字的英雄是没有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面貌，自己的幻想和希望。因此，其中任何一个最不著名的人的痛苦，也不比那些历史名人的痛苦更少些。”

这是一段感人至深的话。只有真正关怀人、尊重人、怀着真正同志爱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伏契克就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一个一个地写着他所接触到的难友们，这些人在平时是平平常常、默默无闻的，然而在那最黑暗的炼狱中，他们的生命发出了强烈的光辉。

叛徒也总是有的。譬如米列克，他也是捷共中央委员。伏契克曾以为他不致叛变。然而正是他，被捕后就供出了所有的他知道的同志。对于伏契克，这是比敌人最残酷的毒刑还要沉重的打击，使他感到无比的痛心。值得注意的是，谈到米列克时，他没有责骂，只是指出米列克的信仰和勇敢都同样是

浅薄的，经不住几下鞭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指出米列克不理解，懦弱能够损失比生命本身更多的东西。他的语调是平静的，然而这是最大的轻蔑——一个胸怀宽阔的战士对一个叛徒的轻蔑。

那么敌人如何呢？那个平时温顺的玛丽亚被捕的时候，带着几乎惊奇而又不无幽默的语调对那个打她的秘密警察说：“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原来是这样的野兽！”

她形容得很对，这正是一群野兽。他们穿着纳粹制服，制服袖口上卐字金板在闪光。然而他们只有人的外形，没有人的内容、人的心灵。

伏契克也一个一个地勾划了他们的形象，描写了他们的残暴、卑劣、贪婪，也描写了他们内心的虚弱和惶惶不安。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仰，随着战争局势的逆转，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狂热和傲气。譬如那个秘密警察珂克拉尔，他在布满尘土的灯罩上写着这样忧郁的话：“一切都成过去了。”甚至想要自杀。而那个绰号“野猪”的斯密唐茨，在听了一个“犯人”讲述了政治形势以后，说：“你是这样想么？……大概是这样的，我们是不会赢的。”他叹息着，从此不再耀武扬威地吼叫，也再不敢随便地殴打犯人了。

这是监狱，看来是沉闷、阴森、恐怖的，然而这也是一个沸腾着斗争的世界。

那些“犯人”手无寸铁，是任人蹂躏的被迫害者，而且看来是分散和孤立的，然而却是一个伟大的集体。一种在监狱中显得更突出、更温暖的友爱将他们联合了起来。当你受刑回来，将受到难友们细心的照料；当你走向刑场，每一个铁窗后面都有人向你招手，呼唤着你的名字，响起壮烈的送行的歌声。在这里每一个英勇的行为都受到赞扬，一闪念的动摇都会受到注意。如果你叛变，将会受到集体的唾弃，而没有比监狱里的唾弃更难忍受的了。

这是远离前沿阵地的壕堑，它被敌人四面包围，但决不投降。

在监狱中，要得到纸笔，往往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的。伏契克没有利用这珍贵的纸笔更多地写自己。然而，通过全书，表达了他对敌人的憎恨，对叛徒的鄙弃，对同志们的热爱，对事业的忠诚，对信仰的坚定：反映了一个伟大战士的灵魂。

他生长在一个很有音乐修养的家庭里，养成了对音乐的爱好。在狱中，当伤势还未复原的时候，他就开始歌唱。他的这一篇报告，也就是一首欢乐的、壮丽的歌。它曾经鼓舞了千百万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当然也能够鼓舞我们。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呵！”这是他报告的最后一句话。

在那个时代和那样的环境中，他的像警钟一样轰鸣的这句话，含意应该是：必须保持清醒，戒备敌人；必须提高自己，战胜敌人。

而在今天，对于我们，这句话应该有另外的含意。

不能不承认，这些年来，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浩劫后，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某一些精神状态是值得注意的：冷漠、怀疑、谨小慎微、玩世不恭、愤世嫉俗……最担心的是个人的平安，最关心的是家庭的幸福。有一些年岁较大、稍有经验的人，习惯于用流行的语言来应付场面；有些年轻人，不愿膜拜在神前，却连一切神圣的原则都抛弃了。造成这样一些现象有其社会因素，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对个人的要求来看，未必是应该谅解的。

在今天，就某一意义来说，我们要警惕的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身上的那些不清洁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要战胜自己，是一场长期的、艰难的斗争。此外，还存在着别的困难和阻力。前几天，一位经历过风浪的老朋友对我说：“我现在何所求呢？只想尽自己的力量做一点事，说几句真实的话。”沉默了一会，他又加了一句：“有时候，这样也很不容易。”

我理解他的心清，也理解他的话的含意。是的，有时候，即使做一点该做的事，说几句真实的话，也需要英雄的气概的。但如果我们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还有什么可谈呢？

要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要有人的信念和人的品质。

伏契克，这个真实意义上的战士说：“人啊，我是爱你们的！”

作为一个人，我们也应该自爱。

“让火燃着！”

整整两年前，1979年的3月，一位年轻的友人送我一本新版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使我很喜悦。我在那场浩劫中丢失了大批书籍，《贝多芬传》也是我有时念及的一本。友人还在书的扉页上题了几句话，谈到了我这20多年来的遭遇和处境，那最后一句是：“我欣喜地看到他面临春天了。”我很感激他的好意。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天正是我的生日，他送我这本书，于我乃是最珍贵的礼物。

有时候我们听到一支过去唱过的歌会引起很多回忆。有时看到一本过去读过的书也是这样。我最初读到《贝多芬传》是抗战中期，在重庆，是陈占元的译本。当时自己还那么年轻，生活在我是一首轻快的乐曲，生命之歌在我是大路之歌，虽然实际上是在那样贫困、动荡的情况下面。我不懂得真正的痛苦，真正的苦难，真正的斗争，真正的欢乐，因而也并没有真正读懂这本虽然单薄，分量却很重的小书。然而多少还是体验到了书中那种迫人的激情，那种对于生命的丰满和崇高的追求。我受到了感动。它是我在流浪生活中珍藏的书籍之一。后来我又得到了傅雷的译本。在生活海洋的波涛和风暴中，在某种心情下，有时就找出来翻读一下，我逐渐体会得更多一些，接受得更多一些。它安慰、鼓舞了我。对于我，它已不是一般的一本读物了。

前几天，接到诗人C的信，其中有一段说：

重读了一遍《贝多芬传》，还是像当年初读时那样激动。看看目前某些人的思想状况和生活态度，我感到我们也还是需要贝多芬——约翰·克里斯多夫式的英雄主义精神，我还是将他看作是我的兄长。虽然我们之间远隔时代的鸿沟，对人生的要求也并不完全相同……

于是，我也将《贝多芬》找出来重读了一遍。掩卷沉思，心潮起伏。我回想了自己的过去，这不仅是因为这本书引起的一些回忆，也是对自己生活道路的回顾；我也想到了自己目前的思想状况和生活态度，感到了心的沉重，这是由于知道应该飞得多高，而羽翼无力；同时想起了罗曼·罗兰在《我所认识的梅森葆》一文中的一句话：

我的年轻的兄弟们，让火燃着！……

这也是对我的呼唤么？虽然我早已不复年轻了。

《贝多芬传》不是一本学术性的著作。它没有详尽地叙述贝多芬的生平事迹，没有仔细地去分析和评论他的作品。作者在很短的篇幅中，着重地刻画了贝多芬的精神风貌和为人的品格。作者说，这个人“曾经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撑持”他，他是在“苏生与振作之后”，怀着感激、信仰和爱情的心情来写这本书的，“它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像罗曼·罗兰其他的许多作品一样，这本传记是以庄严、华彩、激情的文句写成的。对于有要求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支震撼心灵的歌，是一声亲切的呼唤，是一道破窗而入的阳光……

是这样一个不幸而坚强的人：在青年时期就开始耳聋了。对于一个以音乐为生命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呢？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避免与

人见面，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独自承担着这漫长的酷刑。一直到后来终于隐瞒不住了。他写信给友人说：“……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一切我心爱的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我却要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栖留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我们不能不为他的一位朋友所记述的一个场面所感动：有一次，他要求亲自指挥他的歌剧《费德里奥》的最后预奏。由于他的耳聋，结果全局紊乱了。但没有一个人忍心告诉他：“走吧，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但他从人们的脸上的表情和乐队的骚动上，感到出了什么事情。于是他命令的口吻呼唤在场的他的那位友人，并把谈话手册授给他。朋友在上面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呼唤朋友“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一动不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脸……谁能想象他此刻的心情和痛苦？谁又能想象他在漫长的酷刑中的心情和痛苦？而就是这个人，写出了那样大量的乐曲，而且往往是欢乐的乐曲——当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虽然那欢乐本身也蒙上苦涩与狂野的性质。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苦斗的成果，是胜利的标志。

是这样一个人“唐突神灵、蔑视天地”的“反抗的化身”，如肖伯纳所说的。有人则形容他是独自生长在无人荒岛上而一旦突然被带到欧洲文明社会来的人。他有所向往、追求，而且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从不顾及当时社会的习俗、秩序。他无所畏惧，不愿苟且，敢说，敢怒，敢哭，敢歌，一切发自内心。他是黑暗中的一道强光，死水中的一股波涛，市侩侏儒中的一个巨人。这是一个很可以说明他的性格的有名的故事：他有一次与歌德一道散步，遇到一群皇族迎面而来。歌德挣脱了贝多芬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贝多芬按了按帽子，像流星似地从人群中大步穿越过去，皇后、太子都向他招呼；而歌德却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

是这样一个人怀着爱的渴望，对于爱情抱着神圣观念的人。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地爱着，梦想着幸福，而又不断地经验着希望幻灭的悲哀，承受着痛苦的煎熬。他爱得强烈，所以痛苦深切。他的爱是纯洁的，这我们可以从《月光奏鸣曲》等为他的情人所写的乐曲中感受得到。他的密友兴特勒曾言：“他一生保着重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

是这样一个人倾向于革命的人。他信仰共和的原则，热爱“自由、平等、博爱”。他把这种信念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浸透在他许多的作品中。他曾写了一支交响音乐准备献给拿破仑。而当他听到拿破仑称帝的消息时，就将乐曲撕碎，抛在地上，愤怒地说：“那么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

是这样一个人向往着人本身的崇高的人。他说：“竭力为善，爱自由胜于一切，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有什么优越的标志。”他写信给他的侄儿说：“……我虽不曾生下你来，但的确抚养过你，而且竭尽所能地培植过你精神的发展，现在我用着有胜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坎里求你走上善良与正直的唯一的大路。”

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把创造美丽动听的乐曲作为目的，而是坚持要用音乐表现各式各样的感情。正如肖伯纳所指出的，他区别和超过他的前辈亨德尔、巴哈和他的两位老师海顿、莫扎特之处，在于他那奔腾澎湃的灵魂。而他的灵魂是充满了对人生至善的追求、对苦难的斗争和搏击、对自由和共和

的渴望……

是这样一个人，罗曼·罗兰在传记的最后这样概括了他的一生：

什么胜利可和这场胜利相比？波拿巴的哪一场战争，奥斯特利茨哪一天的阳光，曾经达到这种超人的努力的光荣？曾经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凯旋？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的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

“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罗曼·罗兰将这样一个人的传记放在他立意要写的《名人传》的首位。

他在序言中说，他立意要写《名人传》，是想冲破当时老大的欧罗巴的污浊腐败、自私自利的气氛。他疾呼：“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他称之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他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

他说：“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止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他是为了这样的受难者而写他的《名人传》的：“贫穷、日常的烦虑、沉重与愚蠢的劳作，压在他们身上，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道欢乐之光，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

他将《名人传》的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他引用了贝多芬自己的话：“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的阻碍，竭尽所能地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而能借以自慰。”

罗曼·罗兰的这篇序言是与《贝多芬传》的本文同样著名的。它记录了罗曼·罗兰的思想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他自己的形象：对人类前途的坚定的信念，对于人的至善的渴求，在探求光明的道路上与困难和苦难战斗的勇气。可以说，很少有作家像罗曼·罗兰将文学事业与人生理想那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文学事业中为他的人生理想坚韧不拔地战斗着。他自己就从贝多芬的人格和音乐中汲取过力量，得到过鼓舞，“唤醒了永久的生命的火花”。所以，他才能那样充满激情地写出《贝多芬传》。他在那里寄托了他对人生理想的追求，通过贝多芬的形象，向那些在生活的重压中苦闷、彷徨、挣扎的人们发出了真挚的呼唤，希望他们振奋地抬起头来，坚定地迎着风浪前进……

站在今天的时代的高度，我们是很容易指出罗曼·罗兰和他所推重的贝多芬的弱点的。但重要的是要看到，在他们的时代的条件下，他们曾对人生怀着怎样坚定的信念，他们曾以怎样真诚的态度去追求人所应该达到的高度，他们在困难和逆境中的大勇者的精神。这对于我们应该是一种激励和鼓舞：如果在那样黑暗的年代，还有人即使是在看不到明确远景的情况下，在孤独中，进行过壮烈的斗争，那么，我们是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更能够意识到集体的力量，对人类的前途怀有更大的信心的。

重读《贝多芬传》，我不能不有一些感慨。在我们周围可以看到，有的青年安于平庸，追求一己的幸福；有的青年缺乏信念，看不到前进的目标；

有的青年大喊大叫，否定一切；而有的战斗过来的人，现在却充满了“革命的世故”，在漂亮的言词下掩盖自己的私心；有的人抚摸着自己的创伤，祈求平安和宁静……我自己原来就没有能够飞得多高，现在有时就更感到软弱，迷惘于个人的得失之间。

无数的革命先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那些在人类历史上为争取光明而斗争过来的人，也应该可以看作是我们的兄长的。革命英雄主义不但表现在战场上和刑场上，也应该流贯在日常生活态度中。人生、战斗、理想，都不是空洞的言辞；作一个无愧“人”的人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重要的是，在心中让火燃着，永远燃着！

1981年3月

海的沉默

《海的沉默》写于1941年夏天被法西斯德国占领的法国。作者维尔高尔当时正处于地下。

它没有直接写到法西斯的暴行。我们从许多文学、戏剧作品中看到的都是冷酷残暴的德国军官的形象，作为这篇小说主要角色的那个德国军官却是正直、诚恳、热情的。小说也没有反映法国人民地下抵抗的英勇活动，只写了一个老年的绅士和他的年轻的侄女，他们几乎无所作为。但是，这篇小说秘密出版后，在正经受苦难的法国人民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鼓舞了他们斗争的热情和胜利的信心。在国外也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被认为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

现在，经受了时间河流的冲洗，我们看到，这篇小说还是一颗闪光的珠宝。它描写的生活早已是历史陈迹，但作品却没有失去艺术魅力。

小说是以一位老人自述的口吻写的。

老人和他的侄女共同生活。看来这是一个中层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法国沦陷了，他们的一部分房屋被一个德国军官征用。

平静的生活被破坏了，谁知道这个德国军官将为他们带来怎样的命运呢？

然而，那个德国军官看来是彬彬有礼的。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面对老人和少女的抗拒性的沉默，他露出了严肃的微笑：“对于那些爱祖国的人，我是十分尊敬的。”

这不是虚伪的话。他尽可能不妨碍房主人的生活。他只是在每个晚上找一点什么理由到起坐间来，开始说几句并不需要回答的客套话，然后开始了无尽无休的独白，涉及他心里存在的种种问题——他的祖国、法国、音乐。他谈得很亲切，很热情。他尊重老人和少女的沉默，从不企图从那里得到一种回答，一种赞同，甚至于看他一眼。

从他的这些独白中，我们逐渐了解了。他是生活在一个小城中的专门作曲的音乐家，脱离政治，也不喜欢国内的那些政治人物，然而却相信了元首和那些政治人物的宣传，以为他们占领法国是为了德法两个国家的团结（“那样，太阳就将普照欧洲了”）。他认为法国的精神和“飘渺的带诗意的思想”将教导德国的那些政治人物成为真正伟大而纯洁的人，而德国将把法国的伟大性和自由退还给法国。他希望德国和法国像“夫妇似地联合起来”，而这种结合是双方“自愿”的。由于父亲的影响，他热爱法国，熟悉法国的文化。所以，当他开始走进法国时，看到人们由于懦弱而欢迎德国军队，他感到痛心。不过，他说：“我后来看见它了；而目前呢，”他对严峻地沉默着的老人和少女说，“我很高兴看见它这种严厉的面孔……我很高兴在这里遇见了一位有道德的老人，和一位沉默的小姐。”但他说，必须战胜这种沉默，必须战胜法国的沉默。他相信，“真诚永远能消除阻碍”。

他在不尽的独白中表明了对法国的爱，而促使他作出这样不尽的独白的是还由于另一种爱：对那个美丽的少女的爱。他有许多话事实上是专门说给她听的。有一个晚上，他讲述了那个美人与兽的童话：一个美人被囚起来了，那个可以任意摆布她的兽每天出现在她的面前，强迫她忍受它那种无情的令

这篇小说在50年代有赵少侯的译文，曾刊载在《译文》杂志上，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单行本。1980年《钟山》杂志又登过一篇重译。作者维尔高尔现在是法中友协的主席，不久前曾来我国访问。

人心烦的嘴脸，那个美人是高傲的，有道德的。那个兽笨拙、粗鲁，却有好的心肠和力求上进的灵魂。美人终于逐渐为兽的祈求和爱情所感动。有一天，她向兽伸出了手去，那个兽立刻变成了一位很美很纯洁的骑士，他们的结合决定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他似乎是用这个童话来说明德国和法国的关系，但更主要的却是说明他自己对少女的感情。所以他说：“我尤其爱那个兽，因为我是了解它的痛苦的。”

老人和少女一直对他保持着沉默。后来，他们冰冻的感情渐渐溶解了，德国军官诚恳的善意和热情感动了他们，如同那个童话中的美人逐渐为兽所感动。然而，沉默却保持着。因为，无论如何，他是一个穿着敌人服装的军官——一个兽。

来了一个意外的转折。

德国军官到巴黎去了一趟。他久已渴望此行，他是兴高采烈地去的。他返回后，一反常态，避免与老人和少女见面。好几天以后，在一个晚上，他终于来了。情绪沉重愁怅，他是来告别的。他将参加一个正在作战的师团，第二天就要动身到东方（苏德战场）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地狱去”——那里的广漠的平原上，麦子将从德国人的尸体中摄取营养。

是他自愿提出要求的。原因是，到巴黎后，他从那些“政治家”和“战友”那里了解到，法西斯口头上所宣传的一切漂亮言词不过是谎言，他们是要毁灭法国，是要用“微笑和客气手段来腐蚀它，要让它变成一条地下爬着的狗”。他们要毁灭法国文化，要完完全全把火焰灭掉，“欧洲从此再不能受到这个光明的照耀了”。——这个可怜的理想家认清了严酷的现实，他的梦想被粉碎了。原来元首和那些“政治家”们所指示的道路不是向山上的光明高高地上升，而是通向一个愁惨的幽谷，通向一座恶臭、阴森的黑森林。这条道路是他所决不愿意走的，他宁可走那条通向死亡的道路。

这是一个善良灵魂的悲剧。这是一个“人”的悲剧，他的觉醒也就是他的灭亡。——他认识到，在法西斯的统治下，不可能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生活，不允许一个正常的人有他的理想和追求。他自愿灭亡，是表现了他因失望而来的最大的悲愤，同时也是对法西斯专制的最强烈的抗议。

然而，这也不正是法西斯专制的悲剧么？一种被正常意义上的人所反抗的统治，一种不能容忍正常意义上的人的统治，它所有的就不过是兽和鬼。因而，就只能是表面强大，实际虚弱，而终于只有通向灭亡。

老人和少女并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战士。他们是普普通通的法国人，是资产阶级文化传统好的一面所教育和熏陶出来的人。他们在不言不语和心照不宣中作出了一个决定：丝毫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哪怕是一点点小节，对那个闯入者保持沉默，而且几乎不看他一眼，就仿佛根本没有他的存在，就仿佛他只是个魔影。

这是在他们所处的地位所能表示的抗拒。这是人的尊严和民族的尊严的维护。这是有意的无视和漠视，因而也就是大的蔑视。鲁迅先生说过：最大的轻蔑就是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他们是手无寸铁的老人和少女，是被征服者，是弱者；敌人是征服者，是强者。然而，他们是人，而敌人是丧失了人性的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是强者，而敌人是弱者。

他们像大海般的沉默。海沉默着，而潜流汹涌。海沉默着，但预示着暴风雨和万顷波涛……

而作为人，他们的感情也就不可能是那样单纯的。

当以沉默和蔑视对待那个军官的同时，老人说：“不过在我心里很可能另有一种感情夹杂在这个意志里面，那就是我不能冒犯一个人而自己不感到痛苦，哪怕他是我的仇人。”他有一次对侄女说（在开口以前，他干咳了几声，因为他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把话说出来）：“像这种样子一句话都不肯施舍给他，也许有点不近人情吧。”而有一个落雪的冬夜，老人坐在火光熊熊的壁炉面前，不由自主地为那个德国军官担心，想象着他回来时满身雪花的样子。——这几个细节很能帮助我们理解老人的性格。我们可以赞扬他的善良，也可以指责他的温情。他已习惯于对人的关怀和尊重。这是人的好的品质。不过，他也意识到，那究竟是一个敌国的军官，所以他又因为的这种感情而恨自己。所以，当他向侄女说了上面引的话，看到侄女炯炯发光充满愤恨的眼睛时，他的脸红了。

侄女看来在感情上是比老人更坚强的，但在听了那个德国军官许多晚上的独白，逐渐了解了他的性格和心情以后，也不能自己地对他滋长了一种微妙的感情。只是由于那个人是一个德国军官（有着兽的外形），所以她不能也不愿向他伸出手去。她的心灵在自己建筑起来的监狱里产生了骚动和不安。

当告别的那个晚上，听到了德国军官发自内心的凄厉悲痛的告白以后，她第一次（的确是第一次）把她的一双惨淡眼睛的眼光赏给了他。而当他临走，低低地向她说：“永别了”，而且用深切的期待的眼光凝视她时，她的嘴唇终于动了一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他开了口，虽然那声音低微得几乎听不见：“永别了！”

那个军官微笑了。因为，他终于听到了他所爱的人的一句话；因为，从这一句简短的悲惨的话中，他感到的是对他过去的谅解和宽恕，是将他看作是人的同情和祝福。是的，在那个美女的眼中，他不再是兽，而是一个纯洁的人了。他微笑着，走上通向死亡的征途。

小说的思想是立足于“人”的观念。它没有直接描写法西斯的暴行，但通过那个被蒙骗的善良的德国军官的觉醒和决心走向死亡，从“人”的意义上否定了法西斯。它没有直接描写法国人民地下抵抗的英勇斗争，但通过老人和少女的抗拒性的沉默，表现了人的不可侮辱，不可征服，体现了民族的尊严。老人和少女逐渐与那个德国军官在感情上接近，是作为人的感情的接近。

小说所描写的生活是早已作为历史陈迹了，但它所表达的特定环境中应该怎样做一个人，怎样维护人的尊严的主题是并没有过时的。这主题的意义一直通向今天，而且将通向不会是太近的将来。

还可以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看。

这篇小说无疑地是为了宣传：它是揭露法西斯德国占领法国初期所采取的那些伪善措施和漂亮言词的。然而，这是通过了和服从了艺术规律的宣传。

这篇小说的德国军官的形象，不是漫画似的脸谱。老人和少女的形象没有被拔高和膨胀。他们都是真实可信的有血有肉的人。

作者满怀激情。他的激情深深隐藏在每一个语句中间。沉默的海面下激荡着潜流，作者的感情凝练成表面的冷静状态。这样，就使小说具有庄严、深隽的风格。

这篇小说没有曲折的情节。作为故事来说，它是太简单了。只有三个人物，没有任何热闹的局面。除了军官的独白以外，连对话也只有简单的几句。它着重刻画的是人物的内在感情，人物之间的感情的激荡和冲击。那扣人心弦远远超过了表面的戏剧性，超过了表面的矛盾冲突，而且它是真正感人肺腑的。

我们有一些文艺作品曾经轰动一时，但不久就从读者记忆中消失了。

反映十年浩劫的文艺作品，在开始曾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而现在读者对陆续还在出现的这类题材的某些作品，已经表示了冷淡。

这现象值得深思。而《海的沉默》的艺术经验（一切好的作品的艺术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1980年12月9日

荒野的呼唤

读着《荒野的呼唤》时，一直沉浸在紧张的心情中，有的章节真是惊心动魄。读完后，心情还不能平静，而且一时还不能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仿佛还置身在那冰天雪地的荒野中。

这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早期的使他赢得广泛声誉的作品，也可以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的场景是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时间是19世纪末。

布克，原是法官米勒珍爱的一条狗，过着舒适的生活。由于在北极圈里发现了黄金，成千上万的人都拥到那里去。这些人们需要健壮的狗作为冰天雪地中的交通工具。这就影响了布克的命运，他被法官的园丁偷偷地卖去。在新的主人手中，他受到了侮辱和虐待，而对付他的愤怒的反抗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棍子的毒打。于是，他知道没有战胜一个拿着棍子的人的可能，懂得了“棍子的法则”。生活开始对他采取了凶恶的面目。他毫不畏缩地去面对他的命运，同时用被唤醒的全部狡猾来对付它。他被打败了，却并没有被驯服。相反地，这是促使他恢复野性的第一步，他的身上原就有着狼的血液。

他被辗转卖到了奔走在北极地的两个信差手中。他很快就学会了拉雪橇，而且，像其他的狗一样，轭下的苦工似乎就是他存在的最高的责任、生活的整个目的和引以为乐的唯一的东西。

他在别的方面的发展（或者说退化）也很快。他的肌肉锻炼得像铁。对一切痛苦处之泰然。能吃任何东西：不管是怎样讨厌的和难以消化的。学会了在雪地上做窠。善于嗅风。

他的第一场生死的决斗发生在和另一条狗史笔兹之间。那是一条凶猛的雪橇的带头狗。史笔兹敏感到了布克是会危及他的领导地位的对手，因而一直敌视他，不断地向他挑衅。而布克也利用各种机会打击他，挑动其他的狗起来造反。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战终于爆发了。那场生死的决斗是在其他的狗屏息的围观中进行的。在惨烈的搏斗中，布克咬死了敌手，自己身上也满是伤痕。从此他就取得了带头狗的位置，而他的确是胜任这一位置的。他是一个胜利的战士和一个出色的领袖。

他们在零下50度的严寒里几乎没有休息地往返奔驰着，终于累垮了。布克和他的同伴作为不中用的狗被转卖给了三个年轻的主人（其中一个女的）。这是三个被黄金潮卷入北极圈的新手。他们对黄金的梦想是炽热的，却完全缺乏经验，不会安排生活，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在开始的浪漫热情过去以后，在种种困难面前，他们就互相埋怨，争吵，闹出了一些笑话，终于走向了毁灭——他们和拖着雪橇的狗一起落入结着薄冰的湖中。

布克是这当中唯一的幸存者。在那次走向死亡前，临出发时，出于对灾难的预感（那是他通过一些迹象敏感到的），他伏在地上，无论怎样的毒打也不能使他站起来。站在一边看到这个场面因而愤愤不平的一个美国人，从那三个幼稚无能的主人手中将布克买了下来。那个美国人的名字叫约翰·宋顿，是因病在途中留下来等候同伴的。他也警告过那三个新手：过湖是危险的。这好意的劝阻被嗤之以鼻。宋顿带着布克站在高坡上，一起看到那三个人和那一群狗的灭亡。从此，布克对宋顿怀着敬爱。这爱是如此强烈，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跳向深渊，只要那是宋顿的口令。他在湍急的河流中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了落水的宋顿。他竭尽全力为宋顿赢得了一次巨额打赌的胜利，那

是宋顿一次轻率的大胆的打赌，没有人相信他会胜利的。

而布克的野性也逐渐滋长。在这样的荒野中，在这样严酷的斗争中，他的狼的本性被一点一点地唤醒了起来。他经常听到狼的嗥叫——自由的呼唤，那对于他是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仅仅是由于对宋顿的爱，他才没有向那呼唤奔去。后来，他在一次和鹿的追逐后回到营地时，发觉宋顿为一群土人所杀害。他由于悲痛和愤怒而近于疯狂，勇猛地扑向那一群正在兴高采烈地跳舞的凶手，一个一个地撕咬他们……

在这个人的世界里已无可留恋，他终于走进了狼群，和那些野兄弟并肩在雪原上自由地奔驰，口中吼着一只原始的年轻世界的歌，那就是狼群的歌。

描写的是狗，作者对他们的生活、习性是那样熟悉，把他们的性格、内心活动刻画得那样细致入微，真实可信，一如描写人——作者正是以“他”而不是以“它”来称谓这些狗的。

作者在20岁时也到阿拉斯加淘过金，历尽艰苦，除得了坏血病外，毫无所获。但从文学角度看，他倒是发现了一个丰富的矿藏。他以这方面的生活为题材，写过不少作品（有名的短篇《热爱生命》就是其中之一）。

作者熟悉也细致地观察过生活，而同样重要的是他在创作过程中的体验：化身为自己笔下的那些狗，设身处地的想象着、体验着他们的思想感情。而读者则通过作者的体验而体验着这些狗的思想感情。这样，这本小说就不仅是一幅北极淘金的生活风俗画，吸引着读者的兴趣，而且是以布克这条狗的命运吸引着读者的关注，搅动着读者的感情。

在一本回忆录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记述：有一次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一道在田野上散步，走到一匹衰老的老马的面前时，托尔斯泰倾诉着马的经历和心情，这是一次即兴创作，他说得那么真切可信，以致屠格涅夫大为惊奇，似乎托尔斯泰就是马的化身，他吓得跑开了。在《荒野的呼唤》中，杰克·伦敦写狗，也同样达到了真实得令人惊异的高度。

但是，这样描写狗的作品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这里也侧面反映了人的生活。但作者的意图主要是，通过布克的遭遇和命运，显示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严酷，要对付各种各样的挫折、折磨、打击，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斗争，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弱者只能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为了生存和生活，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做一个强者。

杰克·伦敦出生在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里，他过早地肩负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做过童工、报童、水手，曾经在大地流浪，坐过监狱。他与黑社会的暴徒们打过交道，进行过较量。他看到过最底层人们的悲惨的生涯。这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残酷。他从这个人的世界里看到了兽的世界。而在《荒野的呼唤》中，他描写了兽的世界，事实上却是针对人的世界。通过了布克的遭遇和斗争历程，他歌颂了原始的强力、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歌颂了奔向自由的渴望，歌颂了强者和英雄主义。他自己的斗争经历说明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强者。

但是，这中间也流露了作者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观点，他对强者的歌颂又往往通向了尼采的“超人”哲学。由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感性认识和反抗热情，他是容易接受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使他后来能够写出像《铁蹄》和《马丁·伊登》这样比较深刻地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品。但是，他一直没有摆脱尼采超人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因而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在文艺创作中也没有能够达

到更高的成就——依照他的丰富的生活经历，他的文学才能和创作经验，他理应是能够写出更宏大、更深刻的作品的。

我们可以接受杰克·伦敦在《热爱生命》中对人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求生意志的歌颂，我们也可以接受《荒野的呼唤》中对于奋斗精神和追求自由的歌颂。即使是在新的社会中，我们也应该具有那么一种精神的，但它必须被正确地摄取，被容纳和被控制在健康的思想感情中。必须警惕那些消极的东西。在《荒野的呼唤》中，杰克·伦敦可以让强者布克成为一个胜利者，在广漠的雪原中自由地奔驰；但是，他自己虽然也是一个强者，由于那些消极东西的负担，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思想上的坚实的基地，在精神上愈来愈感到苦闷、痛苦，在40岁的壮年，就自己结束了生命。

对于他，这是一个悲剧。对于我们，这是一个教训。

在写《荒野的呼唤》的前一年，杰克·伦敦写信给一个女子，其中有一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荒野的呼唤》这本书的：

“这样看我吧，一个迷途的客人，一头在你面前飞逝的伤翼的候鸟——一头粗野的横冲直闯的鸟，一头惯于长空大漠而不惯于笼中逸乐的鸟……”

1981年4月29日

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发表于1952年，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有代表性的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来说，它未必是最上乘的，但对于了解海明威来说，它是重要的。

这个3万多字的中篇写的是一个古巴老渔民桑提亚哥在海上打鱼的故事。海明威自己说，《老人与海》如果由别的作家来写，篇幅可能要扩大到十几倍以上，他们可能写到渔村居民的生活，老人的身世经历、社会交往和家庭生活等等。他是想用以说明这篇作品的精炼和简洁。海明威的确创造了一种精炼、简洁的文体。但他在《老人与海》中没有写到渔村生活等等，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与他所要表达的主题无关，而并不是由于追求简洁的文体。他集中写的是老人在海上几个昼夜的经历。关于这场经历，他倒是写得过于详尽了。由于是出之于他这样的艺术大师的笔下，才能够写得不那样沉闷、枯涩。

关于老人的过去，作者只在故事的叙述中简略地提到两笔：他的妻子已经死去了，只留下一张照片挂在他破旧的茅屋里，他有一次看了感到凄凉，就取了下来。他曾经是一个飘洋过海的水手，到过非洲。

当年他肯定是一个健壮的小伙子。现在他老了，又瘦又憔悴。他的两只手，因为老是用绳拉大鱼网的原故，留下了很深的伤痕。引人注意的是他的一双眼睛，像海水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他是孤独的，关心他、和他来往较多的，只有一个过去和他一道出海打鱼的小男孩。他不关心世事，他看报纸只是想知道垒球比赛的消息。他的生活极其清苦，而并无怨言。

孤独，与世无争，向生活要求得极少。就是这样一个谁也不会注意的普普通通的老渔民。但是，到了海上，就显出了他性格的美好的内核。

他八十四天来没有打到鱼。这对于一个以打鱼为生的人来说是太不幸了。那个和他一道出海捕鱼的小男孩，在第四十天就被家里命令离开他搭上了另一只小船。但老人并没有丧失信心和希望。在第八十五天上，他在黎明前就出发了。他说：“85是个吉利的数目。”这只是他的自我安慰。这一次他划向远海，在三处下了鱼钩。

幸运女神终于走向了他：一条比他的船身还要长的大鱼上钩了。

而同时，他也被置于生死的竞技场上。

他无法收拢大鱼。上了钩的大鱼拖着小船不慌不忙地游着。老头儿把钓丝放在脊背上，用手握得紧紧的。他拼命地支撑着身子，抵抗着大鱼给钓丝的拉力，几乎一直保持着紧张状态。一只手抽筋了，一只手勒出了血。骨头累酸了，头脑昏晕。他吃了一点生鱼。当大鱼安静地游着的时候，他弓着腰，用整个身子去撑住钓丝，睡了一会觉。就这样在海上漂流了两天两夜。又花费了极大的气力，才杀死了那大鱼。

这是一场艰苦的搏斗。好几次，老人感到自己支持不下去了。他想起了年轻时的一件往事：在卡萨布兰卡，他跟一个力大无比的黑人码头脚夫进行抵手（掰腕子）比赛。坚持了一天一夜。到了天亮，打赌的人都要求算成和局。就在这个时候，他使出了浑身的力量，逼着黑人的手往下落，落，一直把那只手按到桌面上。从那以后，桑提亚哥断定，只要他愿意，什么人都会被他的打败。——现在他老了，身体虚弱，而他以当年同样的意志坚持着。他

说：“鱼啊，我到死也要跟你在一块儿。”这已经不仅是求生的斗争，而且是为荣誉而斗争，因为他是一个打鱼的，必须战胜鱼。而且，他要让鱼知道什么是一个人能够办得到的，什么是一个人忍受得住的。

同时，这里还有一种奇妙的心情，鱼是他搏斗的对手，他必须战胜它，捉住它，杀死它，否则自己将被拖死。然而，鱼又是他劳动的对象，他依靠它为生，因而对它有一种感情。他欣赏它那无所畏惧、信心十足的风度。人和鱼是这样抗争着而又交融在一起，是敌人又是兄弟。当老人想把鱼拽过来而鱼好像在戏耍他似的慢慢地游开的时候，老人想：

“鱼呵，你要把我给弄死啦。话又说回来，你是有这个权利的。兄弟，我从来没见过一件东西比你更大、更好看、更沉着、更崇高了。来，把我给弄死吧。管它谁弄死谁。”

当他费尽心机，精疲力竭地终于把大鱼杀死绑在船边，向回划的时候，又遇到了新的灾难，而且是更可怕的灾难。那条死鱼成了鲨鱼追踪的对象。开始来的是一条，后来是两条，后来是成群的。为了保卫千辛万苦的收获，已经疲惫不堪的老人又不得不与鲨鱼战斗。开初是用刀子，刀子折断以后，用棍棒，后来，甚至将舵拆下来当武器。但是，鲨鱼还是吃完了他捕获的大鱼。他只带着一条18尺长的鱼骨架回到了岸边。

他终于还是被打败了。

但是，他又是一个胜利者。他，一个衰弱的老人，像一个士兵那样战斗过，他无畏地面对困难、艰辛、死亡。他战胜了疲累、痛苦，最重要的是，战胜了不时冒出的软弱的心情。当老人回到岸上酣睡时，那个陪伴他打鱼的小孩来到了茅屋，他看见老头那双满是伤痕的手，放声哭了起来。这眼泪不仅仅表示同情，也是由于崇敬。

从茫茫的大海上，从死亡的边缘空手回来的老人在他的破旧的茅屋中酣睡着。他正梦见狮子——说明他还有着对力的追求，对强者的向往。

小说是对劳动者英雄气概的赞歌。它表明了，劳动者求生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千辛万苦得到的收获也往往会不幸失去。然而，他们勤劳的劳动态度和勇敢的战斗气概是值得赞扬的。

还可以扩大一点来看：人生的道路是艰难、充满坎坷的。不要向困难和厄运屈服。需要的是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搏斗精神。“痛苦在一个男子汉不算一回事”，“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要被打败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这是一篇小说，但也可以将它看作是一个寓言。海明威在这里唱出了对人类顽强战斗精神的赞歌。而且小说是以乐观的调子结束的。通过那个小男孩将再度伴着老人出海，预示了新的战斗和新的希望。

我冷静地思考过，是不是拔高了作品的主题呢？我以为并不。以上所说是作品的内容所内涵的。我也并不认为作者所歌颂的打不垮的精神，如某评论家所说的，是既空洞又抽象，“实质上也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我认为，无产阶级的战斗者也并不是完全不能从中汲取力量的，只要通过正确的理解和消化。

但是，我们当然也要认识到，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海明威的局限性。他既看不到社会的出路，也看不到群众的力量，他是在一个虚弱的立足点上来歌颂个人斗争的精神的。因而，他歌颂的英雄只能是失败的英雄。《老人与海》的乐观主义只能是广阔的暗空中的一抹微光，而且贯穿全篇的是一种

忧郁痛苦的基调。

老人是一个真实的劳动者的形象，或者如某评论者所说的不过是一个有劳动者外表的海明威式的知识分子呢？——我们认为，是一个真实的劳动者的形象，虽然，可能稍有一点理想化。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不肯将他笔下的人物简单地当作是自己的传声筒的。如果桑提亚哥只是化了妆的海明威，这篇小说就不会有这样感人的力量。桑提亚哥的思想感情并没有超出他这样一个劳动者的思想感情。他在茫茫的海上与大鱼生死搏斗时，那种将大鱼既看作是敌人又看作是兄弟的心情，应该是可以理解和体会的。海明威笔下的这个老人虽然并不是一个有着深厚社会内容的典型，但他是可信的、真实的形象。

但桑提亚哥身上是有作家海明威的影子的。他的儿子格雷戈里·海明威在一篇回忆录中写着：“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就是海明威本人，或者说他身上最好的东西。”这话是对的。我们在许多作品的某些人物中都看到了作家自己的影子。只不过，在《老人与海》中，我们感到海明威在思想感情上与桑提亚哥是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他喜爱他，歌颂他，他真正进入了“角色”，老人在大海中的感受和感情，是他真正体验到的。在某种意义上和从某个角度看，老人是海明威的化身。然而这并不与我们前面所说的老人是一个真实的艺术形象这一点相矛盾。

在1926年，海明威出版了《太阳照常升起》，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他表达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美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深刻的绝望。他因而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身份受到了注意，而有的人将这部长篇小说看作是“迷惘的一代”的宣言。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进行他的人生探索和社会探索。他参加过西班牙反佛朗哥的斗争。他在作品中暴露过资本主义的黑暗，表现过反法西斯的热情。他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他是一个严肃的有正义感的作家。但是，他始终没有能够走出个人主义的圈子，因而，也始终没有摆脱悲观主义的束缚。虽然“迷惘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进入30年代后就已瓦解，从思想上说，晚年的海明威依然是一个“迷惘者”。从表面看，海明威是一个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大作家，名誉、地位、金钱他都有。他豪放、豁达、慷慨。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海明威，没有看到人类真正的出路。而且，由于在战争中受过几次伤，这损害了他的健康。而且他老了，写作愈来愈困难。他内心是苦闷、郁悒、悲凉的。在茫茫的人海中挣扎、浮沉。《老人与海》中是表现了他灵魂深处的某些本质的东西。他不仅在老人桑提亚哥的身上寄托了他对生活的感受，也企图将老人的英雄气概作为激励自己的榜样。

据他儿子的回忆，海明威在后期写作起来已不如以前那么轻松自如。“过去是一口喷水井，而现在却不得不用抽水机把水抽出来。他已不再是诗人……他变成了一个匠人，埋怨自己的命运，叹息他的打算成了泡影。”而后来，“犹如小阳春一样，他的天才又回来了，从而孕育出了一部杰作（指《老人与海》），规模虽然不大，却充满了爱、洞察力和真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同意，由于对题材的爱，由于作者与对象无间地融合在一起，是这部小说能取得某种成就和能感动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总的说来，他在写作上是愈来愈感到困难。以致他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那本书我写不完了。我不行了。”“我整天都在这张该死的写字台前……可是我写不出来。一点也写不出来。你晓得，我不行啦。”他的儿子说：“他总是竭力要赢。输，他是受不了的。”他的一位老朋友马尔科姆·考利说：“如果他不能写

作，他就不想再活下去了。”1961年，他用一颗猎枪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恐怕不能仅仅解释为病的折磨，这应该也是他所赞赏的老人桑提亚哥英雄气概的另一表现方式。但是，我们也可以将那看作是对在茫茫大海中挣扎、苦斗的个人英雄主义者的一声丧钟，他们在个人的力量丧尽以后，就看不到更大的希望了。珍珠

从大海中捞取到一颗巨大的珍珠，对于一个采珠人来说，应该是最大的幸运了。那难道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么？然而，斯坦倍克却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印地安人奇诺，偶然捞到一颗真正的“稀世宝珠”，他和他的家并没有得到幸福，却引来了种种不幸和灾难，承受着惊惶、悲痛甚至死亡。珍珠是从大海中捞出来的，他宁可将它再扔回大海——也许大海是珍珠最好的藏身之所。他宁愿没有得到过珍珠，回复到原来贫困然而平静的生活中去，然而过去的生活已经破碎了。

这是用诗的调子讲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渔夫奇诺既年轻又结实，黑红的头发覆在棕色的前额上。他的眼睛热情、凶猛而又明亮。胡子又稀又粗。他的妻子胡安娜，黑眼睛好像一双亮晶晶的小星星，是一个顺从、愉快而又有耐心的女人。然而她有着铁的意志，几乎比她的丈夫还能耐劳和挨饿。再加上一个幼小的婴儿（他们叫他小狗子），就组成了他们的家。他们住在墨西哥的一个海湾边。生活是贫困的，然而奇诺的心中有着一支温暖的“家庭之歌”——奇诺是印第安人，印第安民族曾经是伟大的作曲者，凡是他们看见、想到、做过或听到的东西都变成了歌曲。

故事是从一个黎明开始的。这是像其他的早晨一样的一个早晨，又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早晨。然而这一天开始就为奇诺夫妇带来了不幸。他们的睡在摇篮中的婴儿被一只蝎子咬了，那是可以致命的。母亲胡安娜用古老的方法进行了抢救：用口去吮吸伤口，好将毒液吸出来。他们还是不能放心，又抱着孩子到城里去求助于一个白人医生，却受到了羞辱，由于拿不出更多的钱而被拒之于门外。

接着，他们似乎交了好运。当他们出海打捞珍珠时，奇诺在水底发现一个非常大的珠母，在那嘴唇似的肌肉里，一道阴森森的闪光，随即贝壳就闭上了。他的心急剧地跳动，慢吞吞地用力把那珠母揪了下来。上到船上后，他心中强烈地震响着“可能有的珍珠之歌”，然而又潜在地颤动着“可能失望之歌”。妻子胡安娜看出了丈夫的激动，也感染到丈夫的激动，屏住了呼吸望着珠母，然后轻轻地说：“剖开它！”

那是一颗曲线完美的巨大的“稀世宝珠”。

而当他们在狂喜的心情中望向婴儿时，发觉那肩头上的红肿正在消散。

奇诺把头向后一仰，号叫了起来。他的眼睛往上翻转，他大喊大叫，身体挺得笔直。

一个新的命运开始了。

在珍珠的耀眼的光芒中，他想到的、看到的是什么呢？

他对围聚在他茅舍里的邻居们说：“我们要举行婚礼——在教堂里。”“我们要买新衣服。”接着，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奢望：“一支枪，也许，一支来复枪。”最后，他说：“我儿子要上学……他会有知识，而通过他我

们也会有知识。我们就会得到自由。”最朴素的要求，也是最高的愿望。他在巨大的幸福前几乎昏眩了，几乎不相信那可能实现。而且，他一辈子也没有一下子说过这么多话，于是，他害怕起来了，正如一个说“我想要”而又没有信心的人那样。

而他没有想到的是，真正值得他害怕的是在另外一方面。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渔村和邻近的城里，都随着“稀世宝珠”的发现在跳动和震颤了。他没有想到的是，各式各样的人都对他发生了兴趣，每个人都跟他的珍珠发生了关系。当他在珍珠的光辉中诉说着自己的梦想时，那“稀世宝珠”也进入了每个人的梦想。只有一个人妨碍着大家，而那个人就是他——奇诺。他因此变成了每个人的敌人。

他的破旧的茅舍光临了高贵的客人。首先来的是头发花白的神父，他说的好像是一些祝福的话，但在奇诺的耳朵里，邪恶的歌和珍珠的音乐尖声地对唱着。后来的是医生——早晨拒绝为小狗子看病，现在主动地来了，对孩子的健康表现得那么关心，说蝎子螫伤将会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于是从皮包里取出一小瓶白色的粉末和一个胶囊让孩子吞下。这些药的作用在于使已经好了的小狗子痉挛，呕吐，以便于他过一小时后再来治好他。看，这条小命是他救活的！

在城里的那些收购珠宝的商人们，虽然有着各自的店铺，事实上都是为同一个大老板经营。他们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期待着奇诺的到来。当那颗“稀世宝珠”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内心在发抖，却以轻蔑的语调议论着，说它“又大又笨，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希奇的玩意儿”，想用低得只能算是抢掠的价格收买它。

而在黑夜，就来了偷盗的人，抢劫的人。在一次搏斗中，奇诺受到了重重的一击，他的前额破裂了。在另一次搏斗中，他失手杀死了对手。现在他成了一个杀人犯了。

胡安娜首先敏感到了珍珠带给他们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这东西是邪恶的……这颗珍珠就像桩罪恶，它会把我们毁掉的……我们把它扔回到海里去吧！”

但奇诺不愿意。

他其实并不是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种族几百年来是受到那个神父、医生所代表的种族的侵略、掠夺、欺骗……。而且，就在他的同族人中，他也看到了贪婪的眼睛。

他也同意他哥哥说的话：“你反抗的不是那些收买珍珠的人，而是整个制度，整个生活方式。因此，我替你担心。”

所以，他自己说：“我害怕所有的人。”

然而，当妻子背着他，在夜半想将珍珠扔回到海里去时，他赶去愤怒地夺回了。

不仅仅因为珍珠是他唯一的机会，他在珍珠柔和的光辉中看到了希望和幸福，看到了儿子的未来；而且也因为一种郁积的仇恨正在他心里滋长。他感到豺狼的包围，兀鹰的盘旋。他要斗争下去，“我是一个男人”，屈服是可耻的。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那比我的生命还要重大……这颗珍珠已成了我的灵魂，如果我放弃它，我就要失去我的灵魂。”

而且，他的茅屋，那为他们一家遮蔽风雨的破败的茅层，被人放火烧毁了。他的小船，他们一家赖以生机的古老的小船，被人砸坏了。在矮树丛里

还躺着一个死人，那是他杀死的。他将被认为是杀人犯而受刑。每一条道路都被切断了。

他只有在黑夜中走向了新的途程，和他的忠实的、温顺的、坚强的妻子胡安娜；和他们的亲爱的头生儿小狗子。他们将走向一个大城去出卖珍珠，勿宁说，去寻找他们的命运。

那座大城会是他们的天堂吗，或者，那是另一座炼狱？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并没有到达。通向新的命运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在草原和山丛中小心翼翼地走着，不愿留下一点足印，但追踪的人还是紧随在后面。三个猎户正像追猎野兽似地追猎他们。

两天以后，在金黄色的迟暮时分，奇诺和胡安娜归来了。他们并排走着。胡安娜把她的披风像个口袋一样扛在肩上，那里面有一小包软绵绵、沉甸甸的东西，那是小狗子的尸体，他被追踪者枪杀了。而奇诺杀死了那三个追踪者。现在他的胳膊上挂着一支来复枪。

在围聚着的人群的紧张、惊奇的眼光中，他们沉着、庄严地走着，像是悲哀的神，又像是复仇的神。他们走过他们的被烧光的茅屋的废墟，连看也没有看它一眼。他们来到海边，站住了。奇诺放下来复枪，用微微发抖的手在衣服里掏摸出珍珠，那丑陋的、灰黯的，像一个毒瘤的珍珠，他听到了珍珠的走了调的、疯狂的音乐。他慢慢地转向胡安娜，把珍珠向她递出去。肩扛着小尸体的胡安娜向他凝视着，柔和地说，“不，你。”

于是奇诺把胳膊往后一甩，使尽力气把珍珠扔了出去。在可爱的绿水的深处，珍珠的音乐越来越低，逐渐消失了。

但故事在我们心中所引起的音乐却还在激荡……

曲线完美的、有着柔和光辉的珍珠是丑陋的么？不，丑陋的是通过珍珠所映照出来的那种压榨、贪婪、欺骗、掠夺。丑陋的是那些人的思想感情。

不是珍珠是邪恶的，而是人是邪恶的，社会制度是邪恶的。正是在那样的社会制度下孕育出、滋生着那样的人。

奇诺斗争过，他失败了。他的四周包围着豺狼，他的头上盘旋着兀鹰。无论他个人怎样勇敢，无论他有着怎样的斗争的决心，他是不能不失败的。

杀死了那三个追踪者，他原是可以走向那个大城的。而他却没有去。因为他已失去了他的儿子，那是他的爱，他的希望和未来。他不能用使他牺牲了儿子的珍珠去换取他自己的幸福。而且，他也应当认识到了，珍珠可能为他带来更大的灾祸。

他和他的妻子带着儿子的尸体回到了故土。当着众人将珍珠扔回到大海，这样来表示他的深重的悲痛和仇恨。

他曾经说过，放弃了珍珠他就会失去灵魂。现在他自己将珍珠扔进大海中去了，他并没有失去灵魂，相反的，他的灵魂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他的理想和愿望只有一项实现了：他得到了一支来复枪，那是从追踪者手中抢来的，那是杀死了他的儿子的凶器，现在是在他的手中了。在实际上那没有很大的作用，然而可以将那看作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和启示。

作者在小说的引言中说：“如果这个故事是个寓言，也许各人都会从里面领会他自己的意义，也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读它。”是的，可以将它看作是一个寓言。然而，作者并不是编造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个生活道理。这原是一个流传在印地安人中的故事，作者加以改造和丰富了。人物各有着自己的血肉和性格，生活场景是真实的，文笔生动、细腻，充满了感情和诗意。作

者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但又不是飘浮于生活的表面，而是将生活提到了寓言的，或者说，哲学的高度。对照一下我们的某些“主题先行”的作品看看，是不难受到启发的。

约翰·斯坦倍克(J.E.Steinbeck, 1902—1968)是与海明威、福克纳等齐名的现代美国作家。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在40年代就翻译了过来。另外，《相持》、《月亮下落》、《人与鼠》、《前进的客车》、《红马驹》等长短篇小说，也都早已有过译本。不知为什么，近几年来却很少介绍他的作品。其实，我以为，比起海明威、福克纳来，他在我们是更可亲的。他在年轻时长期过着流浪生活，从事过多种职业。他常常以劳动人民的生活为题材，表现了他们善良的品质，歌颂了他们求生的反抗和斗争。斯坦倍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然而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暴露者和抗议者，对劳动人民有着同情和爱。从《珍珠》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个著名的中篇也可以算是文艺瑰宝中的一颗珍珠。

1982年1月

沉重的时刻

不是生离。不是死别。不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不是在阴森的绞刑架下。托马斯·曼的著名短篇《沉重的时刻》所描述的是：德国的伟大诗人和剧作家席勒在创作诗剧《华伦斯坦》的过程中，是以怎样的心情面对他所遇到的障碍——他无法写好一个重要场面。

一个作家，在他的创作过程中，是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的。他可能写不好一个场面，可能掌握不住一个人物的性格，可能找不到必须的细节……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每一个作家都会遇到的。席勒自己在过去创作别的作品时也必然遇到过的。但为什么这一次问题显得这么严重，以致面对那障碍的时刻，成为了他生命中的沉重的时刻呢？

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夜。周围的人们，连他的妻子绿蒂和孩子们，都已经熟睡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扫过小巷的风声和打在窗子上的雨声。席勒正在病中——还是几年来一直折磨着他的伤风。几个星期来，医生严禁他离开屋子。此刻，他倚立在已经熄灭了的冰凉的壁炉前，面对着那无法写下去的作品。他是这样看待它的：“这个负担，这个压迫，这个良心的痛苦，这个必需喝干的海洋，这个可怕的任务，它是他的骄傲和不幸，他的天堂和地狱。”他是将他的未完成的作品提到了这样的高度。那么，这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创作上的问题了。而是，写这样一部作品，是他发自内心的要求，是他的事业，是他的荣誉，也是时代赋予他的庄严的使命。无论怎样困难，他必须完成它。然而，此刻他感到自己无力跨越和征服那障碍，无法完成它。于是，他焦躁、痛苦、沮丧。

然而，又不仅仅是由于创作中遇到了一个障碍以致引起了他的焦躁、痛苦、沮丧，实际上，他的内心原就隐伏着一些消极的东西，存在着一些矛盾，一些斗争，此刻不过是在创作中遇到了一个障碍的诱因下爆发了出来。

那么，这就不是创作中的一个障碍问题，而是人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如何去克服那创作中的障碍问题，而是如何提高人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创作中的障碍却为席勒带来了沉重的时刻。

情况往往如此，在焦躁、痛苦、沮丧的心情中，容易用阴暗的眼光看问题，容易把情况估计得更坏，更严重。何况，此刻席勒又是孤独地站在一个严寒的冬夜中，而且正在经受着病的折磨。

对于那未完成的作品，他有着病态的不满足：“结构是假的，语言也是假的，它是一堂枯燥的、呆板的历史讲义，根本不能上演！……好，完了。一次失败。一个没有成功的尝试。破产……”而对于自己，他也强烈地不满。是的，过去他在创作中也遇到过困难，有的作品也是从怀疑、困苦中产生出来的，而最后证明那是杰作。他也曾经贫困，受着病的折磨。但是，他当时年轻。每一次不管他的腰弯得多么低，他的精神是高扬的。而现在呢，虽然他只有37岁，但是已经快到尽头了。他失掉了对将来的信心，那是他痛苦中的明星。因为他已经获得了一点幸福，因为他已经从天不怕地不怕的放纵无羁转入循规蹈矩，转入小市民的生活，有了工作，有了荣誉，有了妻子，有了孩子，现在他松了口气。完蛋了，失败和失败——给他留下的就是这些。

在阴暗、沮丧的心情中，他尽量将一切往最坏处看，这样来发泄自己的痛苦，从而减轻自己的痛苦。但是，他又为这些可怕的想法所惊骇，不敢停

留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中间。于是，他不再发泄他的痛苦，转而面对痛苦，思考痛苦在他生活中的意义，在他工作中的意义。他将痛苦和才能联系起来。才能——它本身不就是痛苦吗？对最伟大的人、最不满足的人来说，他们的才能就是最严峻的鞭策，促使他们去要求更高的完美。现在，他用另一种眼光来看那未完成的稿子了，如果它使他痛苦，那不是应该这样而且几乎是一种好的征兆吗？他将痛苦与理想联系起来。他想，他应该为崇高的东西，忘我地奉献出一切，牺牲自己。这就是他的野心：没有人可以比他更伟大，也没有人为了这崇高的东西忍受更多的痛苦。——正如为了发泄痛苦，他要将自己踩得更低一样，此刻他为了坚定信心而又将自己扬得太高。不过，这样终于帮助他摆脱了低沉、混乱、沮丧的感情，达到了心的宁静。

当他心情沮丧时，他叹息，用两手捂着眼睛，着了魔似地在屋子里走着。或是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两只手交叉起来放在两膝中间，眼睛无精打采地看着地板。而当他的感情昂扬起来时，他那大鼻子的鼻翼张开了，眼睛里射出威胁的光。他的瘦削的腮上升起一阵红晕，一缕火焰从艺术家的自我中心的火中喷发出来。而此刻，他在宁静的心情中走进隔壁的房间，站在床边，用爱抚的眼光看着在熟睡中的绿蒂。他在心里说：“亲爱的，你追随我的渴望吗？……上帝作证，我非常爱你。我只是有时候找不到我的情感，因为我常常由于痛苦而疲倦，由于同我授予自己的任务斗争而疲倦。为了我的使命，我不能太多想到你，我不能完全因你而幸福。”——这是一个深爱自己的妻子的丈夫的话。而他又对妻子有着歉疚的心情，因为，他不能将自己的感情完全放在她的身上。因为，他有他的使命。而且，他也不能完全因她而幸福，因为，为理想而斗争也是他的幸福，甚至是更大的幸福。那么，这又是一个战士的话。这一段话，表明沉重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他终于跃过了一个几乎陷入进去的深渊，又在他生命的道路上跨进了一步。

小说通篇都是写的席勒的思想活动，接近于“意识流”（虽然托马斯·曼写这个短篇的时候还没有“意识流”这个名词）。是表现手法上的晦涩呢，还是作者有意想表现席勒的混乱的思想感情？有一些地方很费解，但席勒的主要思想感情的脉络是清楚的。而且，通过思想活动的描写，也刻画出来了席勒的性格。

小说没有写席勒的胜利（他在年轻时就写出了那么多光辉的作品），却写了他的挫折；没有写他的坚强（专制暴政的各种手段都没有能够把他摧垮），却写了他的沮丧；没有写他的激昂慷慨、热情奔放（那是如此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诗和剧作中的），却写了他的内心的纷乱和低沉。事实上，席勒的性格也正是复杂的。在本质上，他是他那个时代为自由而斗争的一个战士。然而，他也彷徨过，迷失过。一如梅林所指出的：“他后来自甘淡泊，也不无一点苦涩的厌世之感。”他的人生道路也是艰难的，经常贫病交困，在政治上受到迫害。但是，无论如何，他终于选择了不幸然而充满荣誉的命运。这篇小说正是通过一件小事，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小说中两次写到，席勒在纷乱的心情中想到了歌德。这是必然的，他创作《华伦斯坦》时，正是他和歌德10年合作的那个时期。他们是战友，相互鼓舞和影响。然而，他们又是敌手，相互以某种妒意的眼光望着对方，也许在席勒更是如此。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是不同的。在小说中，席勒这样比较了歌德和他自己：“他也许是一个神，而并不是一个英雄。但是做一个神容易，做一个英雄却很难。”这当然代表了小说作者的看法。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

在这里分析这一看法。但可以指出，作为艺术家，歌德当然是更有天才更为博大的。但作为一个人，比起一生顺利，而且后来“在一个震撼世界的斗争时代，居然在一个袖珍版的德国小宫廷的小得可怜的铁笼子里怡然自得”（梅林语）的歌德来，一生在逆境中苦斗，多次面对“沉重的时刻”的席勒，是更激动我们的心的。

托马斯·曼（1875—1955）在写作这篇小说时，当然融合了自己对创作甘苦的体验，也寄托了他自己与生活搏斗、对理想的追求的激情。小说是为纪念席勒逝世 100 周年写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为了对人类的责任勇于与困难苦战的席勒的形象，而且，也是为了鼓舞和激励那些在生活中有着自己的“沉重的时刻”的人们的。

是的，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沉重的时刻”，困难、挫折、障碍，在人生的长途总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看到远大的目标，要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责任，要克服困难首先要克服自己灰暗、沮丧的心情。一定不要失去对将来的信心和对对自己的信心。那么，“沉重的时刻”就不会是滑向深渊的斜坡，而将是飞跃一步的跳板。

1982 年 4 月

生活的诗

——关于《太阳·老人·少女》

一个从远方城市来到西伯利亚写生的女青年画家，看到一位老人面对着落日坐在河边上。这情景使她感动。她要求为这老人画像。老人同意了。第二天的傍晚又继续画着。第三天的傍晚老人没有出现。一打听才知道老人已去世了。

苏联作家舒克申的题名为《太阳·老人·少女》这样一篇短短的，而且情节如此平淡的小说，为什么竟如此深深地感动了我呢？小说的最后，当那位女青年画家知道老人已去世后，她靠着篱笆哭了，“她为老爷爷感到难过，也为自己怎么都没能把他画好而难过。不过，她现在对人生和功勋的意义与奥秘有了更深一层的感受，因此不知不觉地长大多了。”这篇小说也同样将进一步启发我们对生活的严肃感和对于人生的深思。

老人 80 岁了。原来是一个木匠。几个儿子也都是木匠，卫国战争时期，牺牲了四个。现在还剩下两个儿子，只有一个在身边。他有许多孙子，分散在各个城市里。

他的脸上满是皱纹。他的那一双深褐色的、干枯的手上也满是皱纹。可以看出，他是饱经风霜，劳累了一生。

当他 70 岁的时候，完全丧失了视力。他经常在傍晚时，出现在急流湍湍的卡图尼河的岸边，坐在那棵长在水中的盘根错节的老树旁，向将要坠落的又大又红的太阳凝望——是的，凝望，虽然他是一个盲者。

“多好的太阳啊！……它多大啊！……你看那河水，多好看……对面岸边的……”老人对年轻的女画家赞叹着。他虽然看不见，却像看见了一样。他是通过他的记忆感受到这一切的；他是通过对于生活的爱——一个衰弱老人对生活的爱——感受到这一切的。

当少女问他：“生活很艰难吧？”他惊讶地回答：“什么艰难，我不正告诉你，我们生活得挺好吗？”事实上，在家里，儿子回来时总是疲惫不堪，百事都不顺心的样子。儿媳妇也总是有气。孙子都在城里，家里冷清得很。吃饭时大家话也不愿说（有什么话好说呢？），吃完饭就铺床睡觉。是这样清苦、单调，几乎没有温暖的生活。然而老人的话并不是掩饰或矫情。他已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他对于生活不作更多、更高的要求。

那张画还没有画好，老人就不再出现在河边了。女画家在老地方等着他，两天，三天，四天，都没见来。他不可能来，他已经去世了。

他的一生是那样平凡、简单。他眷恋这生育了他的大地，但却以恬静的心来渐渐走向死亡。而他的死也正像太阳落下去那么自然。

女画家来自远方的城市。她提着写生画箱漫步来到荒凉的卡图尼河边。她看到：将落的太阳，湍湍的急流，坐在一棵长在水中的盘根错节的古树旁的老人……这一画面感动了她。她还年轻，只有 25 岁。她的心地纯洁、善良，能够从这样一个满头白发、脸上手上都堆满了皱纹、眼睛黯然无光、身穿蓝色印花衬衫的瘦削的老人身上，发现了她在艺术上应该表现的东西。当老人推辞说“我如今可不好看”时，她真诚地说：“您很美，老爷爷，真的。”

通过两个傍晚的接触，她对老人了解得更多，因而有了更深切的尊敬和挚爱。出乎她意外的老人的死震动了她。她哭了。她为自己没有画好老人的像而难过，而且思考着人生，在这思考中成熟了起来。

老人，一生勤苦，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繁衍了后代（其中四个儿子

为祖国献出了生命)。是他和无数与他一样平平凡凡的人，创造了世界。他们流了汗，流了泪，也流了血。他们是真正的大地之子，社会的脊梁。而他们用生活中所得到的极少。他们是默默无闻的，他们共同的名字是：人民。

所以，年轻的女画家从老人简单、平淡的一生中，感受到某种不简单、某种了不起和意义深长的东西。她更深一层地理解到人生和功勋的意义与奥秘，不在于对荣誉和地位的追求，而是勤恳地工作，为大地，为别人，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生命。所以，她迫切地感到“应该工作，工作，工作……”

一个衰弱的老人。一个年轻的少女。老人走向死亡，他像黄昏时的鲜红的太阳那样渐渐沉落于黑暗的幽谷中。而年轻的少女提着她的画箱正走向生活，像清晨的太阳那样泛起火红的霞光。太阳落下又升起，一代人消逝又一代人成长，湍湍的江水奔腾，历史的长河涌向无限……少女从老人的身上得到了启发和启示，这将能够使她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坚定。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有着如女画家那样的认识 and 理解的。女画家就想到过，当她把老人的画像带到城里时，那位有才华的真正的画家，一定会生气地说：“又是皱纹！为什么要画这个？西伯利亚气候严酷，那里的人很辛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有什么？……”是的，皱纹，有些人，即使是那位有才华的真正的画家，却看不到“除此以外”的那个“什么”，隐藏在皱纹下的那个“什么”。然而女画家却为自己没有能够画好老人的画像而难过。这说明她真正具有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素质。她没有能将老人的像画好，这不仅仅是一个技巧问题：她对人生的认识和对生活的体验还不够。我们相信，她从老人身上得到的启发和启示也将使她在艺术上成熟起来。

但是，对这样纯朴、善良、勤劳的人民表示尊敬和挚爱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怀着痛苦的心情提出一个问题：对人类的发展和创造，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和牺牲的人民，为什么到了今天——一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如此单调、劳累、艰苦呢？他们的胸前可以没有勋章，但是，他们应该有他们的欢乐的歌声，有他们的爱情和鲜花。他们应该真正成为大地的主人，生活的主人。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安乐中忘记了这一点，可以说是一种罪过；如果我们的一切努力不是朝向这一目标，那就不过是庸人或市侩。

《太阳·老人·少女》在艺术风格上也是值得注意的。

它描写的是两个普通的人，情节简单、平淡，篇幅不大，然而内涵厚实。

作者没有赋予老人和少女以名字是有其用心的。老人代表着千千万万普通的劳动人民，少女象征着新的一代。作者通过简单的情节对人生的意义进行了探索，而且接触到美的观念和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然而，这里不是简单的图解和枯燥的说教，而是真正的生活的画幅。老人和少女都是生动的具体的形象，都有着真实的性格。

作者有时采用了某些象征性的手法：将要坠落的太阳，新升起的太阳。太阳平平常常地升起，平平常常地落下。湍湍的急流。生长在水中的盘根错节的古树。

结合小说的情节，这些都可以使人产生联想。然而这一切是有机地融合在整个生活画幅中，并不是外在地硬塞进去的，这里没有任何牵强、任何矫揉造作。

作者的文笔是简洁而含蓄的。他一句也没有说到老人对生活的爱，然而通过老人经常坐在河岸上看太阳，我们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一句也没有说到老人艰苦的一生，然而通过老人满脸满手的皱纹，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他没有说到老人对死亡的预感，而只是由老人说，他感到浑身酸痛，接着，他望着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安详地，若有所思地望着。作者用短短的几行白描，就使我们感到了老人家中那种冷清、贫困的气氛，而且，儿子和媳妇对老人都并不孝顺、亲热。在和儿子、媳妇同桌吃饭时，80岁的盲眼老人“挨在桌子边上喝着牛奶，小心翼翼地不让勺子碰到食盘，生怕弄得太响”。这平淡的两句话可以令人一哭。——通篇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作者不出面点明，他只是将生活的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去感受、回味、思考、想象。这些生活场景和细节写得很自然，然而都是精心选择的。

作者在文字表面也不流露自己的感情。但感情却融贯在全篇。这篇小说有着深厚的诗的素质。这种素质不表现在这里面描写了落日、河流、古树……而在于作者的感情。

在题材的选择上，这篇小说也为我们又一次提供了例证：生活有着无限丰富的宝藏，只要你是怀着真正的生活的激情，能够感受、理解生活的意义，你就可以淘炼出真金。这一点简单的道理，却往往是那些想用一個编造的情节说明一个人所共知的教条的作者，是那些带着主观的框框去看生活的作者，是那些只想在生活中猎取一些惊心动魄或曲折离奇的故事的作者们所不愿理解的。

1981年8月20日广州笕箕窝

历史的沉思

——读《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札记

我读到了苏联作家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的有些删节的摘译（听说有几个全译本，但都还未见出版），和几篇作者的访问记和有关的评论。对于雷巴科夫，我所知甚少，过去只读过他的两部小说：《短剑》和《沉重的黄沙》。仅凭这样一点材料来谈论这部书当然是冒失的，好在我只是想做一点札记，附带地谈一点感想。

共分为三部的这篇小说是60年代开始动手写的。第一部完成后，很受一家杂志主编的赞赏，但作品未能刊登出来。作者并没有气馁，继续写第二部和第三部。在70年代末，一家杂志又登了预告，也受到了障碍未能刊登。一直到1987年才得以全文发表。它本身的命运就象征着时代的变化。它的发表是苏联当前所创导的“公开性”的一个表现。它在苏联文艺界和读者群众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热烈的赞扬声中也夹杂着为数不多的严厉的批评，这现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小说也受到了国外广泛的关注。

这的确是一部令人心情难以平静的书。

它将我们带回到了遥远的1934年。《星火》杂志在发表这部小说的前言中说：“那是一个复杂的年头，像整个30年代那样复杂。那是有着伟大成就和令人痛心损失的年代，是空前热情和巨大悲剧的年代，是准备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和有许多不必要牺牲的年代。”——是的，那是一个有着巨大矛盾的年代。小说以广阔的视角，反映了1934年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刻画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从普通的大学生到党的最高领袖。其中有一些领域是过去的作品中很少涉及到或根本没有涉及到的。作者没有回避现实中存在的巨大的矛盾，而且以严肃的态度审视和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探寻如何会发展到那种状况，今天又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

阿尔巴特街是莫斯科一条有名的古老的街。小说主要写了居住在这条街上的一群青年学生（他们是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是社会主义的第一批儿女），各自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精神状态，不同的生活经历和道路。

其中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萨沙和沙罗克。

萨沙是一个道德高尚、热情、正直的大学生。他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没有经历过党内复杂斗争。凭着单纯的心和自己所信守的原则，他不窥视领导的眼色，不考虑后果，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曾为无辜受到批评的他们学院的副院长辩护，因而为学院的党委书记（他正是批评者）所不满。后来又因别的事情，被加以“反党演说组织者”的罪名，受到了开除的处分。他坚决不服，四处上告，才得以恢复学籍。他并未因此接受教训。不久后，又因为说了一句同情副院长的话，受到了更严重的打击。他的话是：“党首先应该清除的是投机钻营者，而不是副院长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因为前者给党带来的危害要比后者的全部错误都要大。”而这位副院长过去又曾经是党内的反对派。萨沙因而被捕了。他自己却也还弄不清那原因。在审讯中，要他承认与一个“反革命组织”有关系。他尽力不牵累任何人，不承认他所没有的罪过，拒绝在为他拟定的自白书上签字。他受到了流放三年的处分。他所蒙受的冤屈和打击，后来在西伯利亚流放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对现实产生了困惑，从而逐渐走向清醒。他并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也并没有失去希望。他依然保持着对党和对祖国的热爱，依然愿为苏维埃而战。他认为错不在苏维埃政权，错的是那些并没有真心实意地使用苏维埃政权的人。他在磨难中

是更成熟了。

他的中学时的同学，同住在阿尔巴特街的沙罗克则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个品格卑劣、善于玩弄手段的青年。对于萨沙的被捕，他表面关心，实际上缺乏同情。大学毕业后，他混进了保安部，使他得以利用职权，踏着无辜者的血迹染红的阶梯向上爬。同时他也为自私和贪婪所腐蚀，堕入黑暗的深渊。

从生活状况看，沙罗克比萨沙要幸运得多，但作为人看，萨沙是在烈火的锻炼中受到洗礼，而沙罗克则逐渐归于毁灭。

同住在大街上的他们几个比较接近的同学们，在跨出大学的校门后，也各自在生活的大潮中浮沉。有的贪图享受，在生活上逐步堕落；有的愤世嫉俗而自暴自弃；有的一度迷途，以后仍走上了探求真理的道路……他们大都是了解萨沙，因而同情萨沙的。

萨沙的母亲，一个善良的妇人，丈夫遗弃了她。现在，在一个深夜里，一群人突然闯进了住宅，抄了家，并将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抓走了。天啊，这是为什么呢？凭母亲的心，她知道儿子是无罪的。她一夜就苍老了许多。她冒着严寒到每一所监狱去打听儿子的消息，每一次都失望。她奔走无门，连她的弟弟，一个重要冶金基地的负责人，也不愿、不敢为她的儿子向有关方面说几句公道话（他反而认为外甥是为他脸上抹了黑），虽然他对外甥的被捕也百思不得其解。他只是劝姐姐忍耐和忍受，给姐姐一点钱以表示关怀。她愤恨弟弟胆小怕事，以冷嘲的口吻拒绝了他的关怀。她并不信仰宗教，但有些夜间，在那间显得空荡荡的屋子里，她祈求神灵使那些将要决定儿子命运的人们心软下来。但神灵并未接受她虔诚的祈求，儿子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了……

同情萨沙的上层人物也还是有的。布佳金——萨沙的一女同学的父亲，是老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曾在流放中与斯大林相处，现在任重工业部的副部长。他也了解萨沙。但他阻止了女儿和同学们上书保安局请愿的行动。他敏感到萨沙的被捕这里面肯定有复杂的原因。他暗地里打了一个电话给保安局的负责人别列金，请他对萨沙给予关照。别列金去听了一次对萨沙的审讯后，也相信萨沙是无罪的，甚至有些喜爱和器重这个正直、勇敢的青年。但他无能为力。他了解的情况更多一些：萨沙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的一个环节。这个案子将向更远更高的地方延伸，释放萨沙就等于打开其中的一环，这是决不允许的。他虽是国家保安局的负责人，也只好眼看着萨沙受冤和受难。因为，他凭丰富的经验知道，如果他说错一句话，也将遭受灭顶之灾。他能做到的只是在可能范围内暗中保护萨沙，这才使萨沙受到了流放三年的较轻的处理。

小说中以相当大的篇幅刻画了斯大林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他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因为，作为党的领袖，他的权力君临于一切之上，他的影响无处不在，一切都发生在他巨大身影的笼罩中。

苏联 30 年代的许多巨大的矛盾，可以说是斯大林自身矛盾的反映。在小说中，一方面写到了斯大林为捍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所作出的贡献；没有忽略斯大林作为一个领袖的才能：他有明确的目标，他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他善于调动人民的热情和全部力量去完成他所提出的任务。另一方面，作者也着重地写到了斯大林作为领袖的哲学观点和权力观点。他认为，“为了在最短的时间把一个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需要做出物力和人力的无数牺牲。人民

应当做出牺牲。但是，只凭热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必须强迫人民做出牺牲，为此需要有一个使人民感到恐怖的政权，要不惜一切手段来维持恐怖。阶级斗争不是日趋熄灭的理论给它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他认为，“仅仅以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是软弱的政权……仅仅以恐怖为基础的政权也是不稳固的政权。只有既以对独裁者的恐惧，又以对它的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才是稳固的。能够通过恐惧唤起人民对自己的爱戴的统治者是伟大的人物。”在小说中表现出他正是力图这样实践，而且收到了相当大的实效的。小说也写到他对自己的权力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至有时达到了过于敏感多疑的地步。即使对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即使对与他共同战斗的战友——不，他不承认他们是可以与并肩的战友，而认为自己是远高出于他们之上的——也往往采取猜忌的态度。为了扫除被他认定的障碍和可能影响他的权力的人，他可以使用一切手段。譬如在小说中就细腻地写到了斯大林与基洛夫的关系。在表面平静的亲切的交谈过程中，却隐藏着复杂微妙的斗争。斯大林对于作为列宁格勒党委书记的基洛夫的崇高的威信和逐渐增强的权力，有着猜忌、不满，用各种口实想将他调离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来，以削弱和打击对方的威信和权力。基洛夫则保持着警惕、忍让的态度，但不肯在原则上让步。斯大林是过于自信了，他将自己看得这样高，以致他是孤独的，他不愿与人，而别的人也不敢与他谈知心话。而他的权力是这样大，以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人，即使身居要职，也都是兢兢业业，只能依照他的指示，看他的眼色行事。在这种状况下，民主不可能真正发挥，投机钻营者有了向上爬的机会，官僚主义容易得到助长。萨沙以及许许多多人的类似的遭遇和命运，正是在那种政治环境和政治气候下发生的。那一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苏联电视台称之为“千古之谜”）。消息传到了西伯利亚，小说是以一个流放者的这样一句话结束的：“不管这是谁干的，我可以告诉您，黑暗的时代来临了。”事实上正是如此，基洛夫事件成了被美国作家路易·斯特朗称之为“大疯狂”肃反运动的导火线。那是作者正在写的下一部小说的题材。

我过去读过一些有关30年代的苏联小说，它们主要描述的是苏联人民英雄的气魄和建设的热情，那是由于共产党和斯大林的英明的领导和巨大的感召力。它们是以生活的真实为基础的，但其中大多作品的确包含着不少的粉饰。这种倾向在后来更有所发展，以致苏联文艺界展开过对“无冲突论”的批评（那些批评现在看来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那些小说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如雷巴科夫所写的苏联社会生活和党内生活的这一面。

我最早是从巴比塞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认识斯大林的形象的。与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结合在一起，他在我年轻的心中是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这些年来，我又读过不少有关斯大林的书和描写他的小说。随着历史的进展和一些事件真相的陆续披露，我对他的认识当然也有所变化。雷巴科夫笔下的斯大林的形象引起了我进一步的深思。他所刻画的斯大林的形象是引起争论的焦点之一。雷巴科夫说，他写斯大林的任何一个行动都通过了丰富的史料，是有所根据的。那么，小说中斯大林的那些内心沉思和独白呢？他说：“进行这样的构拟，有两种方法：从已说出的内心独白出发设想出行动；或者相反，作家了解和看到了行动，然后推测出这个行动是如何考虑决定的。如果作家所写的内心独白与事情、与人物的行为具有有机的联系，而读者也相信思想的这样活动，那么这独白是站得住的。”这说得

很好。一切以真人为对象所写的小说，都只能是这样构拟的。但人物的内心沉思和独白（也应包括行动），也都要通过作家的设身处地的体验，这里面也难免带着若干主观色彩的。连大师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以及其他人物都未免于此。但我们可以感觉到，雷巴科夫的确是力图思考和体验斯大林行为的思想根源和内心活动，力图创造一个他认为是真实的斯大林的形象。而且我们可以说，他创造了一个比较丰富的艺术形象。

作者对历史沉思，怀着沉重的心揭开了 30 年代现实中的另一面，那是在苏联当前不少文章中接触到、议论到，而在小说中则少见的。作者的视野开阔，以审视的眼光面对严峻的现实，并以严格现实主义的精神将那表现了出来。读完了这部小说以后，读者也不能不感到心的沉重，也引起了深思。

这部小说有什么意义？或者可以问：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作家认为：过去是不能忘却的，历史的教训是必须记取的，今天的现实正是从过去发展演变而来的。要敢于正视过去的某些消极的因素和血的教训。个人崇拜，缺乏民主政治，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是造成许多无辜者的牺牲和悲剧的根源。有一位研究斯大林传记的苏联教授沃尔科戈诺夫说过：“人们的裁判会是清澈透明的，历史的裁判是永恒的。”对于斯大林及其时代的探讨以至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无论如何这种探讨和争论是必要的，雷巴科夫以小说的形式参与了这种探讨。他的目的是在于要抛弃那些年代所积淀的沉重的负担，要摆脱不正常的心理气候，要净化和改善精神道德气氛，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时代前进的步伐。作者回顾过去，正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未来的。

作者还说：“通过讲真话培养出来的人，是有道德的人。社会也是这样。如果它用真理去哺育自己年轻的公民，那就是有道德的社会；如果灌输谎言，那就是不可避免地会使公民对社会本身漠不关心，缺乏责任感，玩世不恭”。那么，作者以审视的眼光面对严峻的现实，并以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将那表现了出来，除了作品本身的意义外，也是为了培养青年的道德品格和社会的道德风尚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为什么作品被压置了 20 多年，得不到发表的机会，他仍锲而不舍。那根本的动力就在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我不能评价这部作品所达到的真实性的程度，但我赞扬作者所追求的目的和他的坚毅的态度。一个作家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不能不关心他们的祖国，不能不关心人民，不能不关心现实，他应该有他的爱憎，他的追求。他是一个作家，所以要通过艺术将他的感知表现出来。当然，那应该是真正的艺术。我不大能理解“纯艺术”是什么，也不大能理解什么是“为艺术而艺术”，虽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存在，也为某些人所信奉。因为在任何艺术作品中都体现着作者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意向，我不必在这里分析那复杂微妙的情况。我只想说，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一切能带给我艺术魅力和艺术享受的作品我都欣赏，只要那是真正美的。而我更喜爱那使我对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给我以对人生的启迪，激发我生活的力量的作品。比起甜蜜的谎言和遁世的怡然自得，我更喜爱苦味的真理。

1988 年 4 月 30 日

重读《狱中二十年》

买了一本新版的《狱中二十年》（巴金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是帝俄时期民意社人薇拉·妃格念尔的回忆录。记述的是从1884年10月到1904年9月，她在一座名为席吕塞尔堡的监狱中所度过的20年的生活。

在40多年前，这部书曾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我当时就读过，很受感动。几年后，“祸从天降”，我被抓了起来，单独监禁。在孤独的煎熬中，曾想到过一些先辈们，从他们的榜样中汲取力量，其中就有薇拉·妃格念尔。所以，对她的这部书，我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的，在60年代疯狂抄家时，我冒着风险将它和另外几本心爱的书秘密地藏了起来，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前些时，看到这部书的新版又买了一册。重读了一次，如当年初读时一样，心情凝重而激动，而且又更多了一些感受和思考。

《狱中二十年》是薇拉·妃格念尔回忆录的第二部。第一部《俄罗斯的暗夜》也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在那里，记录了她入狱前的经历。她出生于贵族地主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在黑雾漫漫，苦难深重的俄罗斯，她置身于社会高层，可以安然地享受豪华的生活。但她却毅然走上了与专制制度对抗的道路，成为民意社的骨干力量。在经历了6年艰苦的工作、出生入死的战斗后，因企图暗杀沙皇而被捕。她利用法庭给她最后发言的机会，阐述了她的信仰，阐述了她参与民意社活动的道德动机，和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她被判处绞刑。她拒绝了官方要她上书沙皇请求宽恕的要求，但后来还是改判终身监禁。在受审期间被关了两年，后来又送到席吕塞尔堡囚禁了20年。她的母亲因病危想最后见见她，上书沙皇请求赦免，她被放了出来。她入狱时只有31岁，出狱时已50多岁了。她一生中的大好年华是在黑暗的监狱中度过的。

我有过单独监禁的遭遇，体验过那痛苦，仅仅两年，就几乎耗尽了我的力量，因而，我很想理解她凭着怎样的精神度过了那漫长的岁月。

席吕塞尔堡离繁华的莫斯科只有50公里，在一个荒凉的岛上，是一座石灰石建成的监狱，犹如坟墓，那40间单身牢房就像是一排直立着的棺材，是专门关押民意社人的。在薇拉·妃格念尔被关进去的头几年里，就死了15个人。其中有的是因为反抗被枪毙了。有的人自杀：或自缢，或自焚，或自己割断喉管。而有的人发狂了。——在入狱前，他们都是英勇刚毅的战士，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却难以忍受席吕塞尔堡的监禁——希望断绝的活埋。

当薇拉·妃格念尔被关进监狱的时候，她已经知道，民意社的组织被破坏了，革命组织被镇压了。人民和社会并没有支持他们。他们是孤独的。专制政治的活结拉得更紧了。而 they 与世隔绝以后，并没有接班人来继续进行未完结的斗争。——薇拉·妃格念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状，心情是悲苦的。但她绝不后悔将她引向了席吕塞尔堡的道路，因为那是她的意志选择的。现在，当她被判为终身监禁，她意识到，作为一个为人民、为社会、为后代争取安乐与福利的战士，她的爱是否坚强，她的精神是否刚毅，将接受新的检验。

头几年，年轻的薇拉·妃格念尔当然也难以忍受监狱的生活。极端恶劣的物质条件和饮食还是次要的。可怕的是，面对空空的四壁，死一般的寂静。那种深深的寂寞感，那种冰冻到内心的孤独感。……她的心情是沮丧的，她的阴郁的灵魂濒于破碎的险境，以至使她产生了一种恐惧。不是对死的恐惧，死倒是她十分愿望的，比起活埋似的生，死更容易忍受一些，而且那与殉道

的观念相联。她有的是对发疯的恐惧。她亲见狱中好几位同志陷入了这种可伶的悲惨的境况中。

但她终于熬过了初入狱后的艰苦的岁月。是同监的难友通过敲壁传话为她送来了友爱的音讯，为她沮丧的心中射入了一道亮光。同志的爱融化了席吕塞尔堡的冰壁。而且，意识到还有战友在与自己一道受难，这在精神上就是一种支柱。

而支持她瘦弱的身体熬过了那漫漫的岁月的，还有一种力量：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要求，作为一个为真理、为正义而斗争过的战士的要求。

当她初进席吕塞尔堡时，充满了对母亲的思念。过去在紧张的斗争生涯中，她没有余暇想到母亲。而在监狱的孤独生活中，她很自然地眷恋着慈母的爱心，对母亲的分离使她感到了绝大的悲痛。事实上，那里面也包含着她对一切大大小小损失的悲痛。她忍不住哭泣。邻室的一位战友没有给她以安慰，倒是批评了她，并要她以巴黎公社的一位英雄做榜样。这使她感到受了伤害而且生气了。她认为自己并不需要说教。这种被激怒的感觉遏止了她的悲痛和渴望。战友的批评激发了她的尊严感。

另一件事给了她更大的影响，那是在她入狱 10 年后了。在一次狱中难友同盟绝食失败以后，她的心情很坏。这时，她无意间听到狱中的一位同志对另一位同志谈到她：“薇拉并不单是她的朋友们的，她还属于俄国。”这句话强烈地震动了她，使她知道了她在同志们心目中的地位。她并没有因而感到欣慰，而是认为把她抬高到了她不能想象的可怜的高度。同时，她认为这也促使她为自己树立一个理想，给她的意志提出一个任务：

努力去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跟自己战斗，征服自己，要奋斗，要征服，要战胜自己，要战胜疾病、疯狂和死亡！

这种对自己的要求，给了她以强大的精神力量。然而，为了使这种要求在监狱中体现，是需要通过多么惨烈的斗争。那是比在狱外的革命斗争更艰苦的。在狱外，多少是自由的和自主的。同志们可以相聚，可以商议，慷慨激昂，刀光剑影，出生入死……激烈的斗争中笼罩着一种光华，而且怀着胜利的希望。——那是为理想而斗争。而在狱中，则是为理想而受难：承担寂寞，守着孤独，忍受狱吏的轻慢和侮辱，极为清苦单调的饮食……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像泥沼里的木头一样慢慢腐烂……而付出了如此惨重的牺牲却没有可以争取的目标。唯一的目标就是完成自己。所以，有一些在地下斗争中那么英勇刚毅的同志，在狱中却发疯或自杀。

可以想象，薇拉·妃格念尔在狱中度过 20 多年是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和多么巨大的意志。

在狱中，当然也不是没有斗争的，对象是狱吏，主要的是督察长，所要争取的，不过是起码的尊重和一点基本的权利，为此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斗争却往往未必能取得胜利，甚至是屈辱的收场。因而，薇拉决定采取这样的态度：“凡是我能够忍受的，我都忍受下去，然而，要是遇到什么值得我用生命去保卫的道理的话，我一定要出来保卫它，一直抗争到死。”且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晚上，一位名叫帕波夫的难友敲着墙壁呼唤她。她已很困倦，但不忍拒绝同志的呼唤，也就敲着墙壁回答了。接着，她听见帕波夫被闻声而来的宪兵带走。她知道，他将被带到惩戒室去。督察长说过：“那是一个

没有一个活人会听见你的声音的地方。”那是监狱中的监狱。而且，在那里，犯人常常被宪兵毒打。为了不让帕波夫感到自己是孤独的，为了当他可能受到拷打时有一个见证，薇拉挺身而出。她向督察长提出，敲壁传话是两个人都做了的，只惩罚一个人是不公平的，她要求把自己也带到惩戒室去。那是与大监隔开的更冷更脏的监房，而且没有被褥和垫子。她只有睡在沥青地上的尘埃中，脱下靴子当枕头，食物是长满了霉污的黑面包。她被关了7天，却老了10年。然而，只有当她知道难友已放出去时，她才肯走出惩戒室。

还举一个例子，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中，不管生命受到怎样的摧残，生活里也不能没有一点快乐。有一些在自由人看来是极平淡的事，如看报、读书、和一位难友一道散一会步、写写诗、在空地上种一点植物，却带给他们极大的喜悦和温暖。而且，是经过不断的斗争，付出很大的代价才逐步得到这样一些待遇的。后来，在薇拉被关的第18年里，狱方却要将这些取消了，要恢复旧日的狱规，要犯人们活活地闷死在石棺中。犯人们愤怒了。薇拉反复思考后，决定采取行动。她想通过写一封信给母亲的方式，让一定会检查信的警察总监注意到狱中所发生的事，并派人来调查。但监狱的督察长来到她的监房中，当面对她说，他不能将信送到警察总监那儿。那么，这就意味着犯人们的命运已无法改变了。怎么办，怎么办呢？薇拉一度犹豫后采取了断然的行动，用尽全力扯掉了督察长的肩章。督察长大惊地叫了，站在一旁的看守长惊呆了。这次大胆的反抗使整个监狱骚动了起来，难友们忧心忡忡地关注着薇拉的命运。薇拉自己则准备迎接严厉的处分，包括走上绞刑架。……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狱方可能怕引起更大的骚乱，没有采取行动。犯人们经过多年斗争得到的一点改良得以保留了下来。监狱生活恢复了平静。

但两年后，有一件事却深深扰乱了薇拉的心。狱方通知她，皇帝恩准将她的终身监禁减为20年徒刑。那是出于她的母亲的哀求。这引起了薇拉对母亲的不满，因为，母亲应该是知道她决不愿要求赦免的，她愿意与民意社的同志们一块儿忍受苦难，坚持到底。几天以后，得知母亲是在垂危中想在生前见她一面才提出为女儿减刑的要求后，才化解了她对母亲的抱怨和责备。女儿的心代替了战士的刚强，她滋生了对母亲的思念，想起了母亲为她做过的一切，而她一生中除了带给母亲以担心和哀愁外，什么也没有，因而，想跪在垂危的母亲前求得宽恕。

那么，出狱的日子快到了。在离开人间20多年后，她感到心灵麻木了，冻僵了，一切对于美，对于世界的渴望都泯灭了——留下来的只是一片无限的空虚。……而现在，她第二次站在生活的门槛上。她怀着生的恐惧。她想着：“我已经50岁了，也许还要再活20年。我拿它们来做什么呢？我用什么来填满它们呢？我用什么来照亮它们和净化它们呢？”

我是在一个美丽的晴朗的秋天的上午重读这部书的。放下书后，望着窗外明亮的阳光，我的心情却沉重而激动，一时还不能回到现实中来。巴金年轻时读完这部书后说：“它像火一样点燃了我的献身的热情，鼓舞了我的崇高的感情。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女人的面前，我实在太渺小了。”我在年轻时也曾从这部书中汲取力量，它有助于我度过了孤独的岁月。现在我已老去，生活平安，而这部书还是给我以激励，给我以启示。

薇拉的一位战友这样描述她：“她自然又聪明，又美丽……她很活泼，很爱戏谑，就像一个小女孩似的。”而在革命斗争中，她十分英勇，以至在

沙皇眼中，她是“一个可怕的女人”！在长达 20 多年的监禁中，她十分坚毅，与她同狱的一位难友说，要是没有她的榜样，他绝不能在席吕塞尔堡生活下去。在她离开监狱将近十年后所写的这部回忆录中，她并没有回避她有时的沮丧、郁悒、悲痛，甚至失望的心情，这一切是可以理解的，从而使她在我们的感受上更为亲切。但她为自己树立了作为一个人的准则，对自己提出了要求，并为此而进行了自我斗争。这则是一般人所不可企及的，从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我特别注意到，她不仅谈到革命的意义，而且还谈到革命的美。在《俄罗斯的暗夜》那部书中，她谈到一个与她十分亲近的战友的叛变，感叹于“碰到了这种叛变就是碰上无法比拟的不幸，它夺去了革命的美……我一下子从理想主义的高处被扔进龌龊的泥沼……”能够从美的角度来看待革命，这就将革命提到了极致。而革命的美必然与革命者的品格联系起来，所以，她也谈到人心的美。她在法庭上最后一次申诉中说：“我一贯要求人——既要求别人，也要求自己——要始终如一，言行一致。”她这样说了，也这样做到了。也是在这次申诉中，她谈到革命理想的同时，也谈到了道德理想。不仅是向往于一个公正、合理、幸福的社会，人心的美和道德理想也正是她追求的目标。我们可以认为，作为民意社人，她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并不正确（但我们也应该承认，民意社人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但她的为了一个公正、合理、幸福社会的献身精神，她的坚毅、光辉的美的性格，仍震撼着我们的心。虽然时代不同了，我们仍可从她的身上汲取很多东西。我们也应该像她出狱时那样，问一问自己，在我们生活着的岁月里，我们用什么来填满它们呢？我们用什么来照亮它们和净化它们呢？

1995 年 5 月重改

鼓手查罗的报复

最初读到挪威作家托尔博格·尼德列奥斯的小说《乐队中的小角色》是在60年代初，从一本斯堪的纳维亚作家的短篇小说选集中。当时留下了较强烈的印象，几十年来还未能忘情。不是由于在艺术上有特别精彩之处，那是写得很朴实的。吸引我的，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个人物。

他的名字叫查罗，在小说中，他是主角。在社会上，他是一个小人物。在他所在的乐队中，他也被人称之为小角色。虽然他自己并不这样看。

查罗在乐队中担当的是“打击乐器手”。他掌管着一组鼓，和那两旁的许多大小铜钹和槌子。他对这些乐器异常珍爱，三两天就揩拭整理，然后又把它们当作婴儿似的包起来。他也珍惜自己在乐队中的位置，他甚至认为只有鼓才能代表交响曲。

他只是个业余鼓手。他住在房租便宜的小房中，室内寒伧而零乱。有一个煤气炉，桌上净是面包屑。满房熏肠和生葱的气味。他没有结婚。他认为“一旦爱情成了老调，失去新鲜，房租和牛奶帐就后来居上了。那时候，你就会变得庸俗不堪，艺术也就失去生命，爱情也往往跟它们同归于尽了”。他家里没有鼓，但他照样练习。他坐在总谱面前，嘴里数着拍子，头按着拍子摇来摇去。他的手耍着无形的鼓槌和铜钹。无形的交响乐只为他自个儿鸣响，使他那寒伧的小房间变成富丽堂皇的音乐厅。当他在乐队中排练时，更是兴高采烈。当其他的乐师们在指挥的严格要求下，反反复复排练四五个钟头因而感到疲劳、厌倦，以至憎恨时，只有他还在对身边的乐师啧啧赞美：“天啊！这主题真妙！真出色！”或是“了不起，真了不起！”

他的生活是贫困的，而他在精神上却富足。在社会上，人们可能认为他无足轻重，但是，他却是一个充满灵感的音乐家，自信而且自豪。

因此，当发生了这样一件在一般人看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由于触犯了他的尊严和信念，他作出了惊世骇俗的反应。不，应该说是反击。

事情发生在一次宴会上。

为了庆祝乐队的纪念日，乐队将初次演奏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一首新的交响乐。为此，请来了一个新的指挥。那人名气很大，水平很高，而脾气很暴躁。他在排练时要求严格，以至乐师们都怨气冲天，低声诅咒：“鬼东西！刽子手！虐待狂！”只有查罗宛若置身仙境，兴奋地擦着脸上的汗，嘴里直嚷：“了不起的天才！多么热情的心灵！活像一座火山！”

就是他所钦佩、赞赏的这位大指挥家当众侮辱了他。

乐队在那次纪念音乐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为此举行了宴会。美酒佳肴使大家都有了醉意，气氛格外活跃。话题接触到他们所表演的那支交响乐。那位指挥家以洪亮的声音攻击这支交响乐的作曲家西贝柳斯，认为他太放肆了。“他怎么敢把老一套的民间田园诗硬塞在纯洁豪放的乐谱线里，这就像在大教堂的墙壁上画芍药花一样要不得！”

众人沉默。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乐师都同意指挥的意见，而只有查罗霍地站了起来。他的胡子颤动，嘴唇哆嗦，声音发抖。他不能赞同指挥的见解，这样的见解出之于他所钦佩的指挥之口使他失望。也显然因为有了一丝醉意，他几乎是喊着说：“大师！大师！对不起！对不起，大师，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请允许我说，听我说吧！”于是，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这部引起争议的作品来。他大谈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乐器法和色调，作曲法的发展……他越说越激动，结结巴巴，双臂伸开，脸上平添一种庄严的神气，眼

睛闪闪放光。

四座肃静无声。人们用惊诧的目光投向他。那位素负盛名的指挥抱着手，也端详着小个儿的查罗，活像端详燕尾服上的一个新油渍。他想表现得若无其事，但他不自觉地拿拿破仑式的小帽掉在了地上，暴露了他内心的激动。他仰起头来，傲然地问：“这位先生是谁？”当他得到答复后，他说：“唔，查罗，真有你的！敲鼓的，嘿，查罗先生，你最好还是管住你的槌子吧。敲鼓还不能算是音乐。可你居然还跟我解释什么叫交响乐！你只是乐队中的小角色！”

他说完后就把背转向查罗，和别人继续争论去了。大伙的兴趣也还是很高。被奚落的查罗木木地站在那里，然后独自走出厅外，在大理石楼梯的台阶上坐下，两膝间夹着一瓶香槟酒。他在哭。

显然，他的自尊，他的心，是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指挥在离别前，还得参加一次交响乐的演出。在排练中，查罗完全失去了过去那种兴高采烈的神情，只是数着拍子，机械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的脸色惨白，腮帮瘪了下去，如同在病中。当有人劝他注意身体时，他答非所问地说：“你听见他说的没有，‘乐队中的小角色’，这就是我——查罗。”友人劝他不要过分把这件事放在心里，说那指挥当时已在醉意中。他不吭声，但他闪着泪光的眼中含着仇恨。

是的，他的内心正酝酿着愈来愈浓厚的风暴。这风暴在正式的演奏会上爆发了。

那是一次隆重的演出，舞台上布满了鲜花。查罗安静地坐在乐队中。但是，在序曲中，鼓点错了八分之一拍，搅乱了破坏了音乐的和谐，使观众感到困惑，指挥不得不重新开始。在乐板转入柔板时，指挥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查罗身上，鼓声应该扣人心弦地响起来，它却毫无动静。音乐声照旧流泻出，由于没有鼓声的伴奏，显得平淡呆板，没有轮廓，没有光彩，没有魅力。指挥低声地咆哮了，他向查罗转过身，满脸怒容。而查罗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多少天来第一次的微笑，有如一个临刑前的人面对枪口的微笑——战胜死亡的微笑。接着，他挥舞起了双臂，急促的鼓声隆隆地响了起来，有如雷声在滚动。乐师们被杂乱的响亮的鼓声震得发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抛在地上，摔成小块。听众们纷纷站起来。整个大厅在悲鸣，在颤栗。查罗又突然丢下了鼓槌，在沉重的寂静中，向惊慌失措、呆若木鸡地站在前面的指挥随意点了点头，又向听众深深一鞠躬，然后大步地走了。

这是仇恨的爆发。查罗要证明的是，他，这个被轻慢地称之为“乐队中的小角色”，可以将一支乐曲破坏成碎片，从而从反面证明了他在乐队中的作用。他，鼓手查罗，不要求舒适的生活，也可以不追求爱情，艺术就是他安身立命的王国、他命运的支柱。否认他在乐队中的价值，也就摧毁了他的生活，否定了他生命的意义，因而他决心以生命作赌注来进行报复。他，贫困的查罗，在社会上可能只被看作是一个小人物，然而，他也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当他感到这一切受到损害时，是会奋不顾身地进行反抗的。

在那次演出后，查罗就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了。由于这一次的任性，也许他将潦倒终生。然而，他一定会永远快意地回忆起他在这次演出中所造成的轰动效应。

那是他平淡生活中的一次闪光。

我很感动于他对艺术的执著，在我们周围，这样的人不多了。我也很钦

佩他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维护自己的尊严所作出的决然的反击，并且想到，即使是一个小人物，当他的仇恨成熟起来、爆发开来时，会产生怎样惊人的力量……

斯芬克司之谜 ——读《六人》

在灰暗的天空下，在无垠的沙漠上，躺着斯芬克司。她的朦胧的眼睛注视着荒凉的、没有尽头的远方。她那冷傲的缄默的嘴唇露着笑容，微笑中带着永久的沉默。

她向每一个从她身边走过的人提出同一个谜语。

六条路通到斯芬克司的像前。每条路上都有一个困倦不堪的流浪人在走着。他们身上都笼罩着命运的残酷的诅咒，头额上都印着不是由自己支配的力量。

这六个人是——

浮士德博士。他埋头在书斋里度过了许多烦闷不安的夜晚，探求着人生的奥秘。他要窥测事物的核心，想得到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为此，他甚至牺牲了灵魂的幸福，将自己出卖给撒旦，甘愿为一个短暂的理解而永受天罚。他随着撒旦在人世漫游，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最后他醒悟到，他不过是一个受着撒旦怪想支配的玩具。撒旦并没有使他知道生命的意义，却给他女人，引诱他拿平凡的调笑来消遣，煽旺了他的情欲，麻醉了他的心智。他醒悟到：“上帝和撒旦是同一个种族的，是我们生命所绕着旋转的两极。……人就在这个圈子里生活。我们永远从一个极趋向另一个极，可是始终逃不出那个用魔法把我们拘住的圈子。……只要我们的心灵一直在这个圈子里绕行的时候，它是永远受不到理解之光的。因为理解是在上帝与撒旦的圈子的外面；而且远得没有路通到它。”然而他依然艰难地跋涉着，寻找那一条路。

唐·璜，一个有名的浪子。他的血里面有罪孽的激情，这激情使他充满了魔鬼的欲望。他认为一切真理不过是官能的陶醉，而一切陶醉也只是个梦。他最嗜好的是那种疯狂的爱情的游戏。为了爱情，最卑鄙的手段都可以使用，再大的渎神罪也不算什么。而他不断地抛掉了那些曾使他动心的女人。使他感兴趣的是征服，而不是占有。他像一个魔鬼似地飞过最深的渊谷，任何眩晕都不会使他退缩。他带着疯狂的激情沉溺在永不休止的纵欲生活中，勇敢地高高举起风吹雨打的罪孽的大旗。同时死亡和地狱就跟在他的脚步后面。他终于有一天从自己浓密的黑色的鬃发中发现了一缕最初的白发。他知道，那个漫长的秋天就要来了。“老年也许会把欢乐变成痛苦，可是秋天绝不能驯服我的傲气”。他仍然坚决地走他的命中注定的路。

哈姆雷特，一位王子，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当他在城墙上散步时，从雾中走过来他父亲的鬼魂。父亲告诉他，他是被自己的兄弟，也就是哈姆雷特的叔父阴谋杀害的，而且那人还将哈姆雷特的母亲霸占作妻子。——哈姆雷特得知这些真情后，他的血沸腾起来，在他的心底立下了复仇的誓言。凶手和他生活在一起，复仇的机会经常都有。但是，每一次到了最后关头，他的勇气就失去了。他犹豫着，考虑着，永远下不了决心。他责备自己胆小，称呼自己为懦夫。他佯狂，他痛苦。于是在思想的国土里去寻求安慰：思索人生，并剖析自己。他的思考是深刻的。然而，无论是他的自责还是他的知识、智慧，都不能使他那无力的臂膀增添一分力量。他一直在犹豫和痛苦的道路上跛行。

唐·吉诃德，一个枯瘦的武士，腰上挂着长剑，右手拿着一根长枪，骑

在一匹像他一样枯瘦的马上。他满面愁容，怀着勇毅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要去完成他的事业，就是解除生存的不幸和不平。其实，他是高高坐在自己的幻想所产生的梦之国里面。他并不知道现实世界与他内心世界的距离。他也不了解，人们并不欣赏他的梦，也不会为幻想牺牲现实。他的侠义行为使他吃尽了苦头，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效果，反而落下许多笑柄。也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行动感谢他，反而给他以戏弄和嘲讽。最后，连一直陪伴着他的仆人都离开了他，回到旧日的世界去了。只有他依然怀着梦想，骑在瘦马上，孤独地向前走去。

麦达尔都斯，一个年轻的和尚。当他开始走进寺院的安静的围墙中来，他的心的确得到了和平，他的精神深深地沉溺在上帝的圣谕中。然而，他的世界却突然地毁灭了，出现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形影，在他的感官面前跳舞着，给他指出好几道通向另一个世界去的门。他迷失了，在自己的心里漂游。他觉得似乎有两个灵魂住在他的身体里面，一个拉他升向天空，同时另一个却推他降往地狱。他经常自我斗争着。而邪恶的力量是更强的，他终于离开了寺院，在外杀人、奸淫。他在自己的罪恶前不能不感叹：“我的可怜的自我，你这永远的影子！你只是一个违背理性损害理性的幽灵，你是一团鬼火，一直在湿地的上空跳舞，诱惑我，引着我走进深渊里去。”是的，有一天一个鬼影扑到他的身上来，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低低说着：“现在我要跟你永远在一块儿，我就是你的另一个我！你永远没法弄掉我！我要过你的生活，做你的梦，并且有一天还要死你的死！”于是他拖着疲乏的身子，慢慢地走着他的那条长长的路。

冯·阿夫特尔特丁根，一个诗人之王，一个世间罕见的歌手。他有一颗纯真、善良的心，他愿意普遍地爱着全世界的人。他用他的优美的歌声去抚慰人们，并鼓舞他们去追求一些遥远的新的事物。为了大众的解放，他愿意牺牲自己。他听说有一个山谷中生长着蓝花，那是一把魔法钥匙，可以为他，也为他的那些在黑暗中走着的同胞们，打开一道通向新的未来的门。他不停步地从—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去寻找那蓝花的山谷。然而一个老人称他为“傻瓜”，劝他不如去做生意赚钱，放弃追寻那跟世人不适合的奇迹的念头。有一个士兵嘲笑他，要他找一把刀来砸碎他的琴。告诉他：“公理便是力量，而力量却只有在刀上。你必须把手染满鲜血，你才会觉得在这个世界里你有一个位置。”他并没有为这些劝告和嘲笑而动摇。幸运的是，经过千辛万苦，他终于在一个月光照耀下的安静的山谷中，寻找到了那蓝色的花。他把它连根拔起，并唱出了一首庄严的歌，这是他一生中唱过的最美丽的歌了。他满怀幸福欢乐的心情返回故乡，他要—将喜讯告诉同胞们。然而，他看到的是荒凉的田园和破损的村庄，到处是男女的尸首。他的灵魂痛苦地颤栗着。他急急地逃避开去，却又来到了正在进行战争的战场上。他看到了千千万万手执武器的兵士，听到了尖厉的军号声和狂暴的呐喊声。他以巨人的力量和勇气，冲到两边队伍的当中，叫双方停止残杀。他大声喊着：“折断你们的刀——时候到了！世界不会再受谋杀的支配了！正义要统治大地！开启新国土的钥匙在我的手中！”他从怀中取出手帕，要将奇迹展现给世人看。但笑容突然从他脸上消失，而—声痛苦的呻吟从他胸中迸发出，原来蓝花已在他手中枯萎了。他悲痛地带着他的断弦的琴流浪，找不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这里是六种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怀着不同的人生理想。他们都在生命的道路上流浪着，想去寻找新的国土，结果都先后走到了沙漠上来，走到了斯芬克司的石像前。他们都无法解答斯芬克司的谜，因而都躺在她的脚下了。

那谜底是：人。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怎样是一个人和怎样做一个人；怎样才能走向自由、幸福的国土。

事实上，在这本书内，走向斯芬克司的流浪者中，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作者洛克尔自己。而且他以嘹亮的声音，回答了斯芬克司的谜。

这里的“六个人”都是世界文学名著的主人公。——如译者巴金先生所说的：“在《六人》中洛克尔使这六个人复活了，他一点也没有改变他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可是却利用他们来说明他的人生观，来说明他的改造世界的理想。”作者在叙述这六个人的历程时，他分别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与他们一道经历苦恼、欢乐、矛盾、斗争。同时他又从现实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俯瞰他们，赞扬了他们各自性格中的闪光点，又惋惜于他们各自性格中的缺陷和不足，他在这六个人的灵魂和生活中漫游，并进行思考、探索和追求。

他这样回答了斯芬克司的谜：他让他的主角们先后被黎明前的一颗闪亮的星的光芒唤醒了，而且，让浮士德与唐·璜对话；让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对话，让麦达尔都斯与冯·阿夫特尔丁根对话。这每一对都有着迥然不同的生命的道路，都是强烈的性格的对比。现在，他们都已能站在一个更明彻的悟性上反省自己，并审视对方。他们已能认识到为什么他们对幸福、自由国土的追求，通过艰难的跋涉，却都走到了沙漠上，而且被斯芬克司的谜难倒了。他们在黎明的星光下一同凝望他们所向往的新的国土——由于他们的醒悟，那已不再是渺茫的了。

博士浮士德和浪子唐·璜共同认识到：在新的国土里理智和冲动是分不开的，肉欲反映在理性中，黑暗的激情里出现光明。肉的欲求跟灵的渴望符合一致。现世里反映出永恒，转瞬即逝的事物和永生长存的事物携手并行。王子哈姆雷特鼓舞受挫的武士唐·吉诃德，帮他认识现实的世界。而唐·吉诃德则把他的坚强的意志借给犹豫不决的王子哈姆雷特。通过他们的互助，就会从认识中产生出行为来，而每一个行动的后面都会有智慧力做它的指导。智力和意志在它们的工作中结合为一体。和尚麦达尔都斯则和诗人冯·阿夫特尔丁根在探讨“自我”与“大众”的关系。麦达尔都斯通过自己的遭遇体会到，“凡是只顾到自己的人，他的痛苦是多么可怕，他永远感觉不到别的灵魂的温暖，永远感觉不到慈爱的‘大众’。只有在‘大众’中‘我’才能够找到他自己。”而冯·阿夫特尔丁根通过自己的遭遇体会到：“我们的镣铐不是一个特选的人所能打碎的，人应当是他自己的救赎者，应当给他自己脱去奴隶制度的束缚。那个建造通向新世界的桥梁并且高高举起自由旗帜的行为，是从万人的心中发出来的。”他们共同理解了这一真理：“凡是始终只想着自己的爱，是次等的爱；然而完全牺牲自我也绝不能给地之子孙带来拯救。只有在联合中我们才会有繁荣。”

觉醒了的这六个人一块儿走到斯芬克司的面前，他们手牵着手，表示坚强的团结。僵硬的斯芬克司轻轻颤栗了，她的冷冷的嘴唇微微张开：

“六条路把你们引到我的国土门口，每条路都有一个不同的线索，然而

全都引到同一个目标。要是每个人一直跟着他自己的线索走，那么他永远解答不了我的谜。可是现在六个人已经联合在一块儿了，各人都感觉到他自己是全体的一部分。各部分结合起来便成了一个整体。”

“我隐藏了无数年代的古谜语现在给解答了——时候到了。新的人在建筑他的新国土。正义与自由联合在一块儿了。”

古石像轰然崩裂粉碎。一朵美丽的蓝色的奇花长在她曾经坐过的地方。

这是一本散文诗。它虽然充满了哲理，对斯芬克司的谜的回答却并不是那样完满的。我们也不会这样去要求它。谁的回答又能够是完满的呢？因为现实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人”的内涵也随着实践的要求而日益丰富。这本富于哲理的散文诗向读者提供的主要是：人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应该有怎样做人的态度，应该有怎样追求的精神……如果从这些方面去看，那就会发现这一本书的每一页上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辉，有着不少的格言警句，它们溶合在对于具体的性格和生活现象的分析探讨中。而且它们是为作者清澈的理智和对理想的激情所贯穿、所融化的。我们听到了他的心在书页上跳动，听到了他热情的呼唤。这与通过象征来说理的散文诗有着质的区别。再加上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生动、优美、具有节奏和旋律感的文笔（我们应该感谢译者巴金先生，虽然他自谦为“试译”），这就使这本散文诗能够给我们以许多启发，也使我们感动，并享受到艺术的美。一个认真的读者定会因而沉思：应该怎样从自己的角度去解答斯芬克司的谜。

1987年5月17日

“天国”和“圣殿” ——读茨威格的《走向天国》

斯蒂芬·茨威格在一个题名《走向天国》的短剧中，赋予了自己一个奇特的、也是艰难的任务：为列夫·托尔斯泰一个未完成的剧本《在黑暗中发光》写一个尾声。从艺术观点看，在托尔斯泰的剧作中，它不是很出色的。但从研究托尔斯泰晚年思想来说，它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为那是一个自传性的剧本，剧中的主人公尼古拉·米杰拉耶维奇·萨雷左夫可以看作是托尔斯泰本人的化身。萨雷左夫的生活十分优裕，但内心极端痛苦。经过了长期的思考、反省，他深刻地批判了自己过去的的生活，想重新作人，以适应他所创建的信仰。他认为自己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从老百姓手中掠夺过来的，应该分给周围的穷人。然而，他的思想不为他的亲属所理解，从而引起了家庭矛盾。——这与晚年托尔斯泰的状况极其相似。通过萨雷左夫，他表达了对生活和宗教道德的观点，而且，他想探求剧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探求自己生活的结局。但是，如茨威格所指出的：“不论是在这部作品中，还是在真实生活中，不论是在 1890 年（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还是在十年后的 1900 年，托尔斯泰都没有找到下定最后决心结束这一切的勇气和方式。正是由于这种意志不坚的将就态度，使这个剧本的创作中途搁笔，成为残稿。最后的那个片断中，主人公完全无能为力了，只是哀求着，双手伸向苍天，祈求上帝帮助他结束这自相矛盾的生活。”

但是，托尔斯泰终于以他的实际行动为这个未完成的剧本，也就是为他自己的生命，写出了一个悲壮的结束：在经过长期的思考、犹豫、自我斗争后，在 1910 年的 10 月，毅然离开了他生活了多年的、心爱的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仓皇地弃家出走了。几天后死在一个小火车站里，一个陌生人的床上。

托尔斯泰的出走已成为人们多次探讨过的课题：从事实真相到他晚年的思想状况，家庭状况，特别是他和妻子的关系——茨威格则以一个独特的方式接触到这个课题。托尔斯泰为《在黑暗中发光》这个未完成的剧本最后两幕留下了一个提纲。他多次想完成终于没有做到。茨威格并不是依照这个提纲去补写这个剧本，而是直接以托尔斯泰作为主人公，描写了他的出走到他的死，作为这个剧本的“尾声”。他说：“我在这里所做的，不能看成是对剧本的完成，而应当看成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和一个未解决的冲突的独立的尾声，仅仅是要使那个未完成的悲剧有一个庄严的收尾。”他的确是以严肃的态度，力图忠实地表达托尔斯泰当时所面临的矛盾，他的苦恼和追求。

这个“尾声”的第一场，写到了两个大学生对托尔斯泰的访问，这两个大学生都是由于受托尔斯泰著作的影响而认识了现实的不合理，并促使他们投入反对黑暗势力的战斗的。但是，他们现在对托尔斯泰不满，由于他宣扬“勿抗恶”，宣扬“为着一种信念去忍受苦难，要比为了一种信念去杀人要好上 100 倍”。其中一个大学生激愤地反驳他：“假如受苦受难是这么美好，这么有益，那么为什么您不身体力行呢？……为什么您总是喋喋不休地宣讲，而不能亲自去实践您的学说呢？为什么您不做出榜样呢？”这一质问深深刺伤了托尔斯泰的心。他痛苦地说：“我应当完全照您所说的，像一个朝圣者那样走到大街上去。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才好。我在灵魂的最深处感到羞愧，我为自己的卑劣深深内疚……也许我还是受苦的……由于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诚实当众实践自己的主张，我也一样备受折磨。也许因此我在良

心上所受到的折磨要超过肉体上的苦楚，也许主给我铸造的恰恰就是这个十字架，还有使我遭受无穷痛苦的府邸，我好像是被禁锢在监狱中，戴着沉重的镣铐……”

这两个去拜会托尔斯泰并与他争论的大学生当然是虚构的，但他们确实代表了当时某些激进的青年，他们曾是托尔斯泰艺术的热爱者，从中受益，激发了他们向黑暗势力作战的激情。现在又不满足于托尔斯泰所倡立的教义，也不满足于他的态度。托尔斯泰对于他们责难的回答也是完全合乎实际的，从中暴露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接触到了托尔斯泰出走的真正的核心原因。他与妻子和家人之间的关于对于他的书籍的版权的争执和其他的一些隔膜和纠纷只是在这一矛盾中派生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托尔斯泰果然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放弃了自己的财产，那结果又将如何呢？那完全不可能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只是会使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生活陷于难堪的困境。在那样的社会里，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家庭是难以生存下去的。我们也很难想象，托尔斯泰自己去种地，修炉灶，做皮靴，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心的安宁。显然他的教义是不现实的，是谬误的。他的毅然弃家出走似乎使他实践了自己的教义，其实并没有解决任何矛盾，虽然他自以为是得到了解脱。结果，他死在一个小火车站里，一个陌生人的床上。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但我读到茨威格的这个“尾声”时，还是感到了心的震撼。我不仅为托尔斯泰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所感动，而且，对于这样一个82岁的老人，已经有着崇高声望的艺术家，却依然怀着对生活的激情和探求生活真理的精神，不惜放弃一切，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使我不能不在他伟大的人格前低下头来。他是一个真正的“殉道者”。

如果说，他虽然有着对生活的激情和探求生活真理的精神，但在对人生的认识上，在社会学的领域中，却只是误入了歧途的话，他的这种激情和精神却是使他创造出伟大的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他的教义也曾在他的作品中投下了阴影，留下了裂痕。

他的作品能够那样深刻地反映现实，具有那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是与他精湛的艺术素养和他的生活经验分不开的。而同样重要的是，跳动在其中的作者伟大、仁厚的心，和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爱憎。他自己说过：“在艺术作品中主要的是作者的灵魂。”“作者对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各种描写，对读者来说至为重要，最有价值，极有说服力。”罗曼·罗兰在比较福楼拜和托尔斯泰的创作态度时说：“福楼拜竭力要不爱他书中的人物，故无论这种态度如何伟大，它总缺乏光明的存在！太阳的光明全然不够，必须要有心的光明。”他指出正是由于爱，托尔斯泰才能够参透生命的根源。同时，托尔斯泰对生活的探求精神一直贯穿在他主要的作品中。他说：“思想家和艺术家并不总是像我们习惯想象的那样安详地端坐在奥林匹斯山巅，思想家和艺术家应该同人们一起受苦受难，以便找到解救和得到慰藉。”他指出：“为了影响别人，艺术家是个探索者，他的作品便是探索。倘若一切真理都被他发现干净，倘若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从而教训人或者故意安抚人，那么他就无力去影响别人了。唯有当他在探索之中的时候，观众、听众、读者才会跟他在探索之中心心相印，携手共进。”这种探索精神包括他在作品中无情地解剖自己。以他三部著名的长篇为例，《战争与和平》中，在彼埃尔身上；《安娜·卡列尼娜》中，在列文身上；

《复活》中，在聂赫留道夫身上，都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的身影，他和他们一道在生活的激流中经受锻炼，和他们一道在困惑中思考，承担烦恼、痛苦、疑虑，一道探求人生的意义。那些篇章读来是如此亲切，而且激发读者的思考。

我无意在这里去研究托尔斯泰的艺术观点和艺术实践，那是一个浩瀚的海洋。我只是在读了茨威格的《走向天国》这个短剧后感到在这个老人悲剧性的行为中，还是可以看到他的仁厚的心，他的对生活的激情、对人生的执著，他的真诚，他的探求真理的精神——一句话，他的伟大的人格力量。作为自己的教义和信念的“殉道者”，他并没有能走向“天国”，但是，凭着这样的人格力量，在文学的道路上，他却通向了“圣殿”。他在这方面所留下的许多宝贵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意大利作家皮奥维尼曾经谈到过，当代西方的批评家和活跃艺术家们，在19世纪的俄国灿烂的小说家星群中，基本上只提出了两个名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大部分西方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譬如从卡夫卡到贝尔纳诺斯。而要在新一代的小说家中找到托尔斯泰的文学传人，就不那么容易了。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数不清的支流，乃是我们的现实，而托尔斯泰却是理想。对我们来说，按照托尔斯泰的方式，如果不是形似，写满一张纸，要困难得多。而要做到在我们身上也具备足以容许我们真诚地写下这张纸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力量，那就更难了。”——这谈的是西方的情况，但恐怕也是值得我们的作家想一想的。

托尔斯泰的出走和他的死，当时是震动了俄罗斯大地的一件大事，也使全世界瞩目。茨威格通过戏剧的形式，在浓缩的篇幅内，再现了这一历史事实。因为究竟是文学作品，这里面有一点虚构。但从总体看，它是真实的，对于托尔斯泰，茨威格当然是崇敬的，而他并没有“拔高”他。这种严肃、认真、力求符合真实的态度，也值得我们传记文学的作者们参考。

悲剧与赞歌

——关于卓别林的《舞台生涯》

不能将《舞台生涯》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悲剧。——它是一个悲剧，但也是生的赞歌。

在这部影片里，卓别林不是以他已为全世界所熟悉而且喜爱的流浪汉的形象出现，而几乎是以他本人的形象出现的。也不像他过去的影片，它不是喜剧。它在风格上更严肃，而且带着一种悲怆的气氛。比起他的别的作品来，卓别林在这里进行了更深入的人生探索和更强烈地表现了他的人生信念。因而，对于了解卓别林，它是重要的。影片在艺术上达到了诗的高度；但是，也表明了由于作者的思想的限制而来的艺术成就上的限制。

这是关于一个年轻的舞剧女演员和一个年老的丑角的故事。影片描写了这两个萍水相逢的艺人的不幸的遭遇，他们的相互帮助和他们之间的纯真的感情。

舞剧演员梯丽是令人同情的。她由于贫病交加而企图自杀。她还那么年轻，而对生活却那么绝望。那个丑角卡伐罗也是令人同情的，他曾经是一个名震一时的伟大的演员，而今他老了，潦倒了，连争得一次演出的机会都这样困难，在演出的中途又被撤换了下来，他终于只有混迹在街头艺人中。一代伶人的下场竟是如此。

卡伐罗将自杀的梯丽从垂危中救活了过来。为了替她治病，他忍痛卖掉了心爱的小提琴。他细心地照料她，使她恢复了健康；他想尽一切办法鼓舞她，使她恢复了再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正是由于卡伐罗的帮助，梯丽又重新走向了舞台，而且获得了成功。于是，她又想尽一切方法去帮助卡伐罗。从这中间，我们看到了“天涯沦落人”之间的动人的情谊。

但更使人感动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关系。梯丽成名以后，提出要和卡伐罗结婚。卡伐罗感到温暖而且深受感动。他对她当然也是有感情的。但正因这样，他不能接受她的感情。他认为梯丽只是——仅仅是——想爱他。不是么，他是太老了，而且身体这么坏。他知道梯丽过去悄悄地倾慕过一个年轻的音乐家，机缘使这个人现在正和梯丽同在一个剧团中，而且是她的舞蹈的钢琴伴奏者。在一个夜半，醉酒的卡伐罗无意中听到了那个音乐家对梯丽倾诉他的爱情。那么，他也是爱她的。卡伐罗喜悦（因为梯丽将有一个可以为她带来幸福的伴侣）而又痛苦（因为他不得不离开梯丽），为了成全他们，为了使梯丽忘掉自己，卡伐罗孤独地走进了茫茫人海中。

梯丽没有接受年轻音乐家的爱情。卡伐罗的出走真正伤了她的心，使她大病了一场。她对卡伐罗的爱可能只是感激的升华，但她提出要和卡伐罗结婚并不是虚伪和矫情。她的名声遍及欧洲，她更惦挂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的卡伐罗。她跑遍伦敦全城，终于在一家小酒店里找到了他——他穿着街头艺人的服装正在卖艺。少女含泪微笑着，坚决要与老人生活在一起。她说：“只要能使你幸福，我做什么愿意。”而老人说，正因这他才痛苦，才不得不离开。他们之间的纯真的、高洁的感情使他们的灵魂发出光辉。卓别林自己在未成名前也经历过穷困的生活。他深知沦落江湖的艺人的辛酸和痛苦。他是带着深厚的挚爱和同情来刻画这两个受着生活重压的小人物的。

但影片更可贵的是表现对于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对于命运的不屈的精神。卡伐罗向躺在病床上，对于生活已感到厌倦和畏缩的梯丽说：“幸福，它是存在的。为幸福而搏斗——这是壮丽的事。”他说：“不要对不幸和死

亡步步迁就。当然，死亡是免不了的，但是，也还有生活！生活！生活！想想那蕴藏在宇宙中的力量，那使地球旋转、使草木生长的力量……这同样的力量在你内心也是有的呀！只要你能鼓起这种力量、勇气和决心。”卡伐罗自己，虽然潦倒了，还保持着人的尊严；虽然衰老了，还追求着胜利和荣誉。在梯丽的帮助下，他终于得到了一次为他而举行的隆重纪念演出。梯丽的心情兴奋、激动、紧张，她了解卡伐罗，她知道这次演出的成败对卡伐罗是生死攸关的。而在卡伐罗自己，当他这次重返舞台，只是一个选择，他需要的不是观众的宽宏大量，不是同情和哀怜（他的自尊心使他决不能接受这个），而是真正的成功。在演出前，他偷偷地喝了一些威士忌，他知道这对于他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他有心脏病；但是，为了演出的成功，这却是必需的，他要得到刺激和灵感。

演出真的得到了极大的成功。卡伐罗在舞台上恢复了青春。前台后台都轰动、沸腾了。——他达到了他的艺术的顶峰，同时，他也堕入了死亡的深渊。他在听到了观众的雷鸣般的掌声和彩声后，在舞台的侧幕边死去，如同一个胜利的将军死在战场上。

这是一个悲壮的象征：为了艺术的胜利，不要害怕死亡；用艺术的胜利去征服死亡。——不，这不仅仅是为了艺术。人，为了真正的幸福，为了尊严和荣誉，要作出最大的努力，要不惜任何代价，去攀登应该达到和可以达到的高峰。

当梯丽软弱的时候，卡伐罗鼓励她站起来。当梯丽病后第一次正式参加演出，临出场前，她惶乱，恐惧，觉得自己的瘫痪病又要犯了。在这关键时刻，卡伐罗对她猛击了一掌，使她奔向了舞台——人生的战场，而卡伐罗自己，虽然他也灰心过，颓唐过，甚至绝望过，现在又用他的胜利和死，表明了艰苦、勇敢的搏斗精神。我们（我的意思是，包括那些经受过无产阶级战斗洗礼的人们）不能不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而且，我们也不是不能从那当中汲取力量的。

所以，我们说，不能将《舞台生涯》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悲剧。它赞美了生，表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追求，对人的荣誉和尊严的渴望，歌颂了不屈不挠的搏斗精神。——这应该是这部影片所想表达的真正主题。

然而，《舞台生涯》又不能不是一个悲剧。在繁华而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处于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不能不笼罩在阴影中。他们的个人搏斗虽然惨烈然而无力的。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获得成功的只是少数。有几个登上了艺术宝座的卓别林呢？而无数的梯丽在青春年华就走向了毁灭；无数的卡伐罗还流落在街头，度过他们凄凉的晚年……

这部影片的片头上写着：

迷人的脚光之下……

年老的死去，

让年轻的登场。

卡伐罗弥留时，梯丽正在舞台的明亮而柔和的灯光下舞蹈。她跳跃、旋转……她正当艺术的青春。——就这样，卓别林通过卡伐罗歌颂了老人的悲壮的死，而对年轻的梯丽们表露了衷心的祝福。

然而，悲剧是不应该延续下去的。卡伐罗的潦倒的暮年，不应该是将来

的梯丽的命运。而为了这一点，那些小人物应该有新的理想，新的搏斗方式。——但这却是卓别林没有想到、在影片中没有探讨到的。这里就正显露出卓别林的思想限制。

同情那些小人物，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命运；赞美生，赞美不屈不挠的搏斗精神。这都很好。从这中间表明了卓别林的人文主义精神。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放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面。他借卡伐罗对梯丽所说的那些鼓励的话，如前面我们所引的，虽然好像很豪壮，却是空洞的。仅仅只是争取个人成就的搏斗，并不能改变卡伐罗们和梯丽们的命运。那样，生活延续下去，搏斗延续下去，而悲剧也同时将延续下去。卓别林有一颗善良的心，但他对梯丽们的祝福，只能是美丽的泡沫。

有人指出过，《舞台生涯》带着一些自传的性质，在卡伐罗身上可以看到卓别林自己的影子。这话是有道理的。当然，卓别林不同于卡伐罗，他在年轻时就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和声誉。然而，卡伐罗的那种对生活的信念和搏斗精神，应该也就是卓别林自己的。卡伐罗说：“年龄愈大，愈想活得热烈些。”我记得卓别林晚年也对人说过：即使拄着拐杖，也要拍好最后一部影片。这种“壮心不已”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在《舞台生涯》中，卡伐罗最后的演出是成功了。那是卓别林为了鼓舞人们，也为了鼓舞自己，不能不叫他成功。但卓别林的最后几部影片却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水平，那不是由于年老才尽，而是因为他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没有达到这个时代应该达到的高度。

卓别林不愧为一代艺术大师。他受到全世界千千万万观众的喜爱和赞扬，这不仅由于他卓越的辉煌的表演艺术，也由于他对小人物的同情和热爱，人文主义的精神渗透在他的许多作品中。然而，我们也看到，不是安身立命于坚实基础的人文主义，有时又会反过来成为他艺术追求中的限制和负担。

1979年北京

阴影中的《凯旋门》

《凯旋门》的主要情节是：恋爱与复仇。作者雷马克在另外一部小说《流亡曲》中，借一个人物的口说过：“恋爱与复仇是人生最快意的两件事。”但读完《凯旋门》后，却没有使人感到快意，充溢和笼罩着全书的是低沉伤感的气氛。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雷维克是作者的英雄。他是一个德国人，一个有名的外科医生，善良，正直，勇敢，慷慨。在纳粹初上台时，他帮助过几个受通缉追捕的人，因此自己被关进了监狱，经受了酷刑。妻子遭牵累也被捉了去，受尽折磨后自杀了。雷维克经过极大的艰危越狱出来，逃亡到巴黎，没有护照，非法地过着极不安定、毫无保障的生活。他从前曾经有过的很多东西——安全、希望、信仰、抱负……现在都没有了。他自己说：“至少有一点儿绝望，一点儿勇气，否则便是内在和外在的生疏。”他只能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也从一些还算正直、善良的人那里，从一些与他处境相同或类似的人那里，得到一点儿温暖和帮助。他将这样生活下去——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在他的非法处境中，这种意外出现的可能是太多了），一直到他的暮年，到死。不，连这些都是他很少想到的：没有明天。

但一个女人闯进他的生活中来。在寒冷的黑夜中，在赛纳河边，他同一个刚到巴黎的女子邂逅。一个偶然的意外，使这个意大利籍的女子孤独无依。雷维克出于同情帮助了她，一如他帮助任何人。那个女子琼恩，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受过一点教育，凭着她的美丽和一点小的才能，在繁华而又黑暗的大都市中出没，在人生的海洋上浮沉。她渐渐地爱上了雷维克。雷维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一向将爱情当作负担，却也渐渐爱上了她。琼恩对雷维克有着真实的感情，在生活上却是比较随便的。雷维克并不追究她的过去，但当他发觉，彼此相爱后她还与人同居，他的心灵就受到深重的损伤了。不过，也不能完全怪罪于她，这是由于雷维克在一次意外的放逐中所引起的。谁让他在街头去抢救一个因偶然事故受伤的老太婆呢。他被带到警察局去做见证人，却暴露了非法的难民身份，以致被驱逐出境。琼恩焦急地等待了几个月，毫无音讯，以为他不会回来了。

雷维克真心爱着她。在动荡的艰难的生涯中，能够真正为人所爱是一种幸福，一种慰藉，一种温暖；是夜行中的星光，是风雪中的茅屋，是沙漠中的清泉。那个女子虽然过着放荡的生活，却有着的一颗还算是纯洁的心。而雷维克在玩世不恭的掩盖下也还有着的一颗热切的心。由于他是认真爱着。因而对那个他认为是损伤了他的女子就采取了抗拒的态度。这不是嫉妒。他自己也有过露水似的情谊，随风而逝的爱情。只是由于他现在是认真地爱着，于是他要求完整的爱：全或无。

几乎与这一场惨淡的恋爱进行的同时，他遇到了那个在德国曾审讯他，对他施过毒刑，逼死了他妻子的纳粹军官。那个人肩负着秘密任务被派到巴黎来。这次偶遇使雷维克热血沸腾，复仇的渴望甚至超过了恋爱的激情。鲁迅先生在他译的契诃夫的小说《坏孩子》的后记中就说过，复仇的欢乐是大过爱情的欢乐的。爱情是对寂寞的心的一种安慰。而复仇也是一种安慰：对带创的心，对屈辱的灵魂；而且不仅对受难的生者，也对含冤怀恨的死者。

他将爱的纠葛推在一边，集中全部精力，作出种种努力，经过煞费苦心的安排，经过坐卧不安的焦躁的期待和守候，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终于将那个纳粹军官暗杀了。

他享受了复仇的欢乐，但这不是兴奋和狂热，而是心灵得到了某种平静。也许，他甚至感到有一点茫然和空虚吧。事情往往是如此的，奔赴目标时的激动，甚至超过了到达目标以后。对于雷维克来说，他亲手杀死了敌人，却在生活中失去了目标。而另外，他还没有——至少暂时没有别的什么目标可以奔赴。

而这时，给予他复仇的胜利以嘲笑似的，在乌云翻滚的欧洲，纳粹德国将战神的车轮转向了巴黎。他杀死了一个纳粹，但依然没有逃脱纳粹的魔影。杀死了一个敌人，但一个强大无比的敌人又逼近了。

不久，又一个人死在他的怀中。这一次是他的情人。琼恩被与她同居的那个男子开枪打伤了。琼恩带着伤打电话请雷维克。雷维克以为她又和以前一样在玩鬼把戏，想骗他到她身边。但是，当他一知道情况属实以后，就立即改变了冷淡的、抗拒的态度，显得十分慌乱了。他急急忙忙地赶了去。爱者在血泊中。他是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曾经救活过许多人，在这最需要他的能力的时候，他却束手无策了，情况实在太严重。在垂危中，她喃喃地说：“我还不够好——配你。我爱你。”雷维克一向是不大透露自己的感情的，而此刻在深深的悲痛中也向她倾吐了自己的爱。他说：“你使我活着。我本来只是一块顽石，是你使我活着的——没有了你，我什么都完了。你是一切的光明、甜蜜和苦涩——你震撼了我，你给了我你自个儿和我自个儿——。”他经历了死别。在他的飘泊、艰难、寂寞、无望的生活中，他失去了曾经温暖过他、他虽然抗拒着但却震撼了他的生活的爱。

雷维克和琼恩的爱情是与一般的爱情很不同的。在浮华的巴黎，两个飘泊的异邦人，他们的爱情不可能笼罩在诗意的光华中，不可能是充满欢快的小夜曲。它的滋味苦涩，情调凄凉，气氛哀愁，但却比一般幸福的爱情更触动人心，因为它更能引起同情。事实上，即使琼恩不死于意外，他们的爱情也不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的。不仅因为飘流不定的生活不容许他们有一个真正的家，还因为他们不同的性格。琼恩不能够，也不会安于作一个家庭主妇。她是一个从生活到灵魂都受到大都市腐蚀的女子，她只能自得其乐地沉醉在、也自我毁灭地浮沉在糜烂的生活中。只是她总还算是比较单纯，即使她做出不对的事，似乎也完全出于自然，使人不忍深责她。正因为她的这种单纯，她才爱上了雷维克。她感觉得到与她所遇到的那些花花公子比起来，雷维克是不同得多的人。她对雷维克的真实的爱是她破损的心中的一线生机，一片光辉。至于雷维克，他的思想修养和人格修养都达到了一定高度，虽然那当然也带着资产阶级的烙印。由于他的遭遇，他愤世嫉俗，而这种态度对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多少是一副防腐剂。他在无可执著中执著于爱情，在对于爱的抗拒中体验着爱的激动。雷维克不仅与琼恩所遇到的那些花花公子不同，而且与她本人也很不同吧。如果他们真正生活在一起，他们会渐渐地彼此厌倦的，除非雷维克能使琼恩提高一步，或者是琼恩拖累得雷维克下降一步。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将是另一个悲剧，一个平凡得多的悲剧。而现在，雷维克虽然失去了她，却得到了她的真正的爱。他将感到孤独，但有着爱的回忆。这对于他可能更幸福一些吧。

恋爱与复仇，这是雷维克在这一段生活中的主要内容。现在，他的情人

和他的敌人都在他身边死去了。

面对着雷维克看，他是勇敢而坚强的：他忍受和承担了多少东西！在最危险、艰难的情况下，他也并没有垂下头来，没有灰心丧气。但是，站在高处看，他又是孤独而无力的，他没有找到可以照亮他的人生道路的理想，他没有找到可以充实、丰富他的生活内容的事业，他远离真正的战斗集体。他只能带着一种深刻的颓唐甚至绝望的心情，得过且过而又愤世嫉俗地活着。偶然地、两个人几乎同时闯进他的生活中来，搅乱了他的心。一个人带来爱的欢欣和苦恼，一个人激起了他复仇的渴望。他的生活似乎充实了起来。但是，这是因为不幸才显得美丽的爱情，这是看来果敢却显得虚弱的复仇。

善良、正直、勇敢的人受到迫害，这是可悲的。在受到迫害以后，找不到自己的道路，只是依靠个人的奋斗和反抗，愤世嫉俗、得过且过地活着，这是更可悲的。

但恋爱与复仇至少搅动了他，使他热烈的内心从外表的冷漠中显露了出来，如同火焰从灰烬中升腾了起来。一个人复活了他的感情，另一个人珍灭了他的往事。他已经“没有一件未了的尘缘”。过去的过去了，现在，他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当然，他也可能又回到他原来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不，甚至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在思想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时代没有允许他这样。由于德国进攻波兰，法国对德国宣战了。作为一个从德国集中营里逃亡出来的反纳粹的难民，雷维克却又被送进法国的集中营里。

集中营是一个受难所。雷维克又必须忍受和承担许多东西，这是我们相信他能够有力量做到的。集中营也是炼狱和熔炉，他终于将被锻炼成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的战士吧。从他的性格来看，从许多与他有着类似遭遇的善良、正直、勇敢的人的例子来看，他应该是这样的。而且作者在书中已经暗示过，雷维克已经认识到被他暗杀掉的仇敌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军官，也认识到暗杀这个渺不足道的人，“不复是他个人的小事情”，而是与更大更重要的斗争有联系的，“这是一个开始——”。那么，他将参加到当时已经浩大的反法西斯的行列中，成为一员真正的战士，应该是他必然的道路——也是他唯一应该走的道路。

不过，那还只是想象中的壮丽的篇章。至于《凯旋门》本身，那调子总还是太低沉了。无力的个人，飘泊的生涯，无保障的生活，不幸的爱情，虚弱的复仇……。而作为背景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骚动、惊惶、对灾难的预感的那种沉重的气氛，再加上巴黎底层小人物不幸生活的穿插，和对于从德国流亡出来，过着动荡、艰难，几乎走投无路的难民生活的描写，就更加重了全书的悲惨情调。就是作者后来对雷维克将有一个战斗的新的开始的暗示，也没有能够使全书的收尾转为比较高昂的调子。

作者带着深深的同情和爱抚对待他所创造的雷维克——他的英雄。而且我们有理由可以设想，这个英雄在许多精神方面是他的化身，他通过这个英雄说出了自己的生活感受、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这当是这本书有着许多隽语、哲理，震荡着幽深的抒情调子的原因。

作者与他所创造的雷维克一样，是在纳粹上台以后逃出德国的。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他当然不会见容于法西斯的德国；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他当然也不能忍受法西斯的德国。而他显然也不满意于苏联。在《凯旋门》中，雷维克最好的朋友、夜总会的看门人莫洛索夫，是一个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出来的贵族。他洞察人情，老于世故，表面淡漠而富于同情，地位卑微而品质

高尚。几十年了，他也怀着复仇的渴望。——这是一个看似真实，其实不可信的被作者大大美化了的人物。一个是从纳粹德国逃亡出来，另一个是从苏联逃亡出来，两个人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两个人都怀着复仇的心。作者这样的安排决不是偶然的。

从作者对于巴黎的描写来看，从他对于那些生活于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的描写来看（那个被汽车撞伤后，宁愿锯断大腿，只是为了多得一点赔偿费的少年季诺；那个为了维持职业，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非法堕胎的送货女郎罗茜妮；那些强作欢笑、受尽凌辱的妓女……），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也是有着深刻的感受的。

痛恨法西斯，又不满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也感到绝望。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呢？作为一个个民主主义者，作者在精神上显得彷徨无依。他只能将同情和爱抚寄托在雷维克这样的人身上，教导人们去做一个善良、正直、诚恳的人；他只能让他的人物去经历苦难，在暗淡的爱情和真诚的友谊中去得到一些温暖；他只能让他的英雄去进行一点惨烈而无力的个人斗争——他只能用低沉的、多少有些伤感的调子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用以抒发自己的悲哀、痛苦、愤懑和内心的寂寞。他深爱他的英雄，他将全身心都沉浸到了他所创造的世界中去，这是《凯旋门》有着感人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也使《凯旋门》的艺术成就高出于我们所看到的他的其他几本小说之上（如《流亡曲》、《生死存亡的年代》。至于《西线无战事》那是他最早的作品，虽然轰动一时，在艺术上就更差些）。但也正因为是这样，作者彷徨无依的精神状态也大大损伤了这本书的艺术价值。他只能使读者感到心的沉重（虽然和作者精神状态相近的人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慰藉和温暖），而缺乏鼓舞人心的激情，缺乏教育人的积极意义。

特别是，这本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写的。反法西斯的烽火在全世界燃烧，千千万万的人横遭迫害，千千万万的人壮烈牺牲；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多少英雄的诗篇。我们无权责问作者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这在作者当是孕育成熟了的，觉得必须一吐为快的。但我们有理由对作者表现在作品中的那种精神状态表示困惑。

作者是当代著名的德国作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是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杰出的作品，使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凯旋门》出版后，也受到了广泛的注意，成为一时的畅销书。作者是有艺术才能的，他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经验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同样值得我们借鉴的是，通过《凯旋门》我们又一次认识到，艺术才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好的艺术才能还要看是在怎样的思想感情的支配下面。

作者缺乏理想主义的光芒来照亮他自己、也照亮他的人物的道路，这是《凯旋门》成为一个悲剧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作者的悲剧。

我想说，这也是许多资产阶级作家的悲剧。

1975年

高龙巴——复仇女神

梅里美的中篇《高龙巴》虽不像他的另一部中篇《嘉尔曼》那样有名，也是他重要的著作之一。这两部小说都是以女主角的名字作为书名的。这是两个国籍不同，有着各自独特性格的女性。她们的性格我们未必完全能接受和喜爱，但同样闪耀着令人目眩的光彩，不能不引起读者的赞叹。

故事发生的地点在法国的科西嘉海岛。那是拿破仑的故乡。发生的时间是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拿破仑失败以后不久。当时资产阶级文明还远远没有能够越过大海征服这个海岛。那里保留着古朴的、带点中世纪野蛮的民风。岛上当然也有法律。但人民往往不顾法律，而凭着他们的良心和古老的遗风行事。这古老的遗风之一就是“愤达他”，意为复仇。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复仇，还有着特殊的涵义，即一人受辱，及于近亲，所以近亲也有报复的责任；报复的对象也不限于仇者本人，也及其近亲。——这部小说叙述的就是，高龙巴如何促成了一次“愤达他”，如何导演了一曲惊心动魄的复仇的戏剧。

高龙巴，从外表看，是绝伦的美丽，而且端庄、大方。但她是在这座海岛上生长的，是海岛的真正的女儿。平时她是温顺、有礼的。而当她激动，特别是当她面对仇人时，眼中就闪耀着奇异的火焰。她没有受到什么正式教育，在一些涉及文明的常识方面惊人的无知，但她能够对所接触到的人事说出最准确的意见。她同情那些绿林中的土匪——在科西嘉，土匪并不是一个坏的名称，她说宁可出卖自己的面纱，也不能不以面包和枪弹接济他们。而对那些民兵们，她有时倒加以嘲弄。她从小就东抹西涂地写诗，她是一个有名的挽歌女，善于临时编唱出动人的挽歌。

就是这样一个村姑，她发誓要为被暗害的父亲复仇，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她终于达到了目的。

她家的家世，可以追溯到700年前，一直在岛上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有一个仇家：巴里岂尼家族。由于年代久远，结仇的原因已弄不清了。高龙巴的父亲台拉·雷皮阿曾在拿破仑军中当过上校，后来因拿破仑倒台而被迫退伍，隐居在乡间，经常受到当了村长的仇家瞿弟斯·巴里岂尼律师的刁难。后来有一天，雷皮阿被暗杀了。有证据证明，那是当地一个著名土匪干的。那个土匪在几天以后为巡逻兵打死。人们认为这件凶案已经了结了。但高龙巴则认为那证据是巴里岂尼伪造的。就在父亲的尸体前，她编唱了一首“巴拉太”（即挽歌），当众指出真正的凶手是巴里岂尼家，并表明了复仇的决心。这首“巴拉太”流传开来了。一种紧张的气氛笼罩在这有着旧恨新仇的两个世家之间。

当地的习俗使她——一个女子不能与她的仇人血刃相见。她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军队里当上尉的哥哥奥索身上。她等待了两年。奥索终于退伍回来了。

奥索是很年轻时就离开了家乡参军的，长期受到了资产阶级文明的熏陶。他勇敢，重视荣誉，只是在他身上已很少具有他妹妹的那种野性。他不相信巴里岂尼家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所以当他得知父亲的凶讯后，并没有急急从部队赶回家乡。这次退伍回来，也并没有怀着复仇的要求。而且，他

《高龙巴》有傅雷和戴望舒的两种译本，前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后者最近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已不太习惯于岛上的那些野蛮的民风了。使他谨慎行事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已倾心于和他同船上岛的一个名叫丽弟亚的英国少女。那少女再三劝告他不要为岛上的野蛮的风习所左右。她还送了他一枚戒指，要他时时记住她的劝告。不过，这一枚戒指可能还有她没有说出的涵义吧。

然而，他终于不能自主地沿着他妹妹所布置的复仇的道路走去了。高龙巴精心策划所产生的效果压倒了丽弟亚小姐赠送的戒指的魔力。

高龙巴初与哥哥见面时，她一句也没有说到复仇的事，虽然奥索在她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中都觉察到了她的意图。她的避而不谈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和气氛。几天以后，高龙巴将哥哥带到父亲的坟前，为亡父的灵魂祈祷。她又让他看了父亲遇害的血衣和两颗致命的枪弹。她充满激情的悲痛的倾诉使他感动而且搅乱了他的心。已被压服的科西嘉人的本性在他的血液中翻腾了起来。高龙巴又设计将州长和村长瞿弟斯律师与他的两个儿子诱到了家里来，拿出了有力的证明，指出原来的罪证是瞿弟斯伪造的。同时她还大胆地请来了两个绿林土匪作证。奥索不得不相信父亲的遇难是出于巴里岂尼家的阴谋。当瞿弟斯的两个儿子恼羞成怒，企图杀害他时（是高龙巴及时地扭住了行凶者的手臂救了奥索的），奥索终于立下了复仇的决心了。

但他还想以比较文明的方式，通过一场光明正大的决斗，而不是以野蛮的暗杀来解决问题。然而，当他独自一人去迎接将到他家作客的丽弟亚小姐和她的父亲时，遇到了巴里岂尼两个儿子的埋伏。他在左臂受伤的情况下，用丽弟亚小姐的父亲赠送给他的长枪，以快速的两次射击结束了那一对兄弟的生命。

奥索成为了人们夸耀的英雄，高龙巴也以有这样一个哥哥而自豪。其实，这更是高龙巴的胜利。她的决心，她的智谋，她的勇敢，使她成为了这一次复仇事件的真正的主角。与奥索比较起来，她更是一个强者。她实现了她自编的“挽歌”中的话：“我要那只放枪的手，我要那只瞄准的眼睛，我要那颗起这个恶念的心……”

穿插在这一幕戏剧中的英国少女丽弟亚和她的父亲奈维尔上校，只是陪衬人物，增加了一些色彩，一些情趣，也帮助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丽弟亚与高龙巴是一个强烈的对照。一个是资产阶级的贵小姐，一个是带着野性的村姑。她们都美丽、聪明、热情。然而，丽弟亚颇有一点娇气、任性，相当浓厚的虚荣心。在高龙巴闪闪发光的形象面前，她要黯淡得多。

在小说中，还出现了两个生活在绿林中的土匪。其中一个曾经在拿破仑手下当过兵。另一个是更奇妙的人物：在学院里研究过神学的大学生，他懂得好几国语言，能随口引经据典。他希望得到的礼物是荷拉斯的集子。他粗犷、豪迈、而又温文尔雅。他们都有命案在身，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公开反抗社会，过着随心所欲，但也是动荡、危险的生活，遵守着他们自己的荣誉观念和道德观念。他们受到群众的掩护和帮助，高龙巴就经常接济他们面包和弹药。而在必要时，他们也肯为了帮助高龙巴，冒着风险挺身而出。他们的形象和高龙巴的形象是互相辉映的。

一个美丽、端庄、热情、而又勇敢、野性未驯的少女，一个惊心动魄的复仇的故事，其中还穿插着一场奇异的爱情，背景又是在一个有着野蛮古风的海岛上，这样就使这部小说具有很大的吸引读者的力量。梅里美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但内容却富有浓厚的浪漫色彩。他极善于安排情节，制造情势，从而表现出人物的性格。正像一切艺术大师一样，他能够用寥寥几笔

就使一个出场不多的人物栩栩如生，而对那些主要人物的性格则更是精心刻画。他是通过了自己的体验去创造他的人物的，因而读者也能够体验到人物在各种情势下的心情，虽然他并没有过多地去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卢那卡斯基谈到梅里美的创作方法时说：“这些作品表面上极为冷静。……在他那整个精湛的艺术里，作家们的感情不是短缺，便是被深深地隐藏着。”我倾向于后一判断：他的表面的冷静下面是隐藏着激情的。这一点在《高龙巴》里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他的文笔又是那样洗练、生动，还掺杂着一点幽默感，就更使这部小说成为了艺术中的珍品。

不过，这部看来并没有什么浓厚的社会内容的小说，除了为我们带来了一幅动人的风俗画，给了我们一些艺术享受以外，有什么更多的积极意义呢？

可以借用卢那卡斯基的话来回答：“如果说他喜欢描写凶狠的男男女女，如果说他醉心于作奸犯科的事情，如果说他不顾道德的话，那么这首先是为了用他的优越感做鞭子，从远处去抽打心怀偏见的庸庸碌碌的俗流；他了解的近在他身边的俗流，由中上层阶级代表构成的俗流。”这是十分精辟的见解。梅里美是一个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学者和作家，长期在法国政府中任官职。但他从幼小时起就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资产阶级腐败的社会风气是不满的，对那些虚伪、浅薄、骄奢淫欲的资产阶级的绅士、淑女是鄙视的。不过，他也并没有为自己寻求一个可以追求的理想，并没有向现实斗争的决心。他过着优裕的生活，内心却是寂寞、苦闷的。他在直接描写资产阶级人物的小说中，都带着批判和嘲弄的语调。他更多的作品却都充满异国情调，他赞赏那些淳朴、勇敢、生气勃勃、带着野性和反叛精神的人物，用以发泄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高龙巴》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那么，在今天，这一部作品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除了是一次很好的艺术享受以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教育意义。但我还是想谈到一点：我们可能觉得高龙巴的野性稍稍重了一些，甚至于感到她稍稍冷酷了一些。然而，她那种为了复仇而全力以赴的精神，为了达到目标不避任何阻挠和艰险的勇气，还是激荡着我们的心的。

1982年11月30日鄂城墩

美的寻求者 ——关于巴乌斯托夫斯基

在和一位友人的谈天中，议论到小说中的“美”的问题，使我想到了苏联的一位老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在 50 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印行过他的选集，后来，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又印行过他的文艺短论《金蔷薇》，当时都很受读者的欢迎。

他是一个带牧歌情调的诗人，但以小说家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的作品大都浸润在一种诗意里面。

他不以艺术为神明，他是一个生活的赞美者。只是，他如此的善良而温情，以至血与火、人世的纷扰和苦难，似乎是他柔和的心所无力承担的，因而往往为他所无视或回避。他所追求和喜爱的，是他的心所能感应的东西，而他的心是过于柔和了。他的作品单纯、明净，有着诗意，然而在题材的选择上就有了很大的限制。他寻求美、发现美和歌颂美，在他的标准和他能达到的范围内。

他并不想粉饰现实，但当他在表现和描述他的世界的时候，有时就不能自己地将他心境中的色彩和情调去涂抹在上面，使之闪烁着浪漫的光辉。可以设想，他曾深受过去时代的那些优美的艺术的影响和熏陶，他的作品往往有一种古朴的牧歌风味，即使他歌颂的是新的生活和新的人。

他的作品在情节上几乎没有波澜壮阔地开展，人物的个性生动但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一般说来，他的作品没有深刻地反映现实，也没有强大的思想力量。不过，他所追求的原也不是这些。他表现的往往只是一种情调，一种气氛，一种微妙的情绪，企图从这中间去体现性格的美和生活的美。这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的长篇（就我所看到的说），虽有一些片断的闪光，总体看来却是散漫无力的。有一些短篇，由于情节的平淡和人物性格的简单，也显得肤浅和腻味。但当所要表现的题材与他的心完全交融无间，可以让他的想象奔驰的时候，他就能达到艺术的峰巅。《一篮枞果》、《雨蒙蒙的黎明》，特别是《夜行的驿车》，给人如此深的艺术感染，有着这样强的艺术魅力，那是可以与任何第一流的短篇比肩的。

他不是伟大的作家，但我觉得他作品中的某些素质，正是我们的许多作品中所缺少、然而应该具有的。我所指的是对生活的美的追求，洋溢着的对生活的激情。他的作品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的美，加深了我们对生活的爱。我喜爱那些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的作品——在那些作品里面，也达到了诗的高度，如契诃夫的《第六号病室》、莫泊桑的《羊脂球》、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等，但我也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形式的诗篇。

我想抄引一段话在下面，这是他的小说《一篮枞果》中的主角、作曲家爱德华·葛利格写一支送给一个守林人的女孩的乐曲时，想向她表达的思想感情，我觉得这也正是巴乌斯托夫斯基自己向年轻的一代说的话，从这中间可以感受到他的心灵，也可以看出他的风格：

“你像太阳，像柔和的微风，像清晨一样，你心灵中开放出一朵白色的花，使你身上充满了春天的芳香……我经历过，见识过，而且也懂得生活；不管谁对你讲什么话，永远要相信生活是美妙和珍贵的东西。我是一个老人，但是，我把我的工作，我的才能，我的生命都献给了青年……我毫不吝惜地献出了一切，因此，也许我比你更要幸福一些。

“你是黎明的光辉，北国夏夜迷人的幽光。你就是幸福，我的心弦随着你的声调而颤动。

“祝福造成你的生命的一切，祝福你所接触到的一切，或是一切接触到你的东西，祝福使你欢乐的一切，以及一切使你沉思的东西。”

这实在说得很好，也说得很美。如果我是一个青年，我将衷心地感激他。而在我这样的年龄，则很喜欢其中的这一句话：“我毫不吝惜地献出了一切，因此，也许我比你更幸福一些。”这使我感动，也得到了启发。

1975年小阁楼

最好的礼物

守林人的女儿达格妮 18 岁了，她第一次离开了挪威西部的海港卑根近郊的森林，来到了首都克利斯提尼亚（奥斯陆的旧称）。这座美丽的雄伟而宁静的大城市，处处让她感到新鲜，发出赞叹。几天以后，她去参加一个在公园举行的露天音乐会——她热爱音乐，也喜欢唱歌，但是参加音乐会，这在她也是第一次。

6 月，正是“白夜”的时节。她穿着一件柔软的黑丝绒长袍，那是她的在大剧院管服装的姑妈借给她穿的。周围的人们望着她微笑着低语，赞叹着她的惊人的美丽，而她一点也不知道。公园菩提树间的灯光，庄严而华丽的舞台，交响乐的美妙的旋律……这一切都使她沉醉，使她感到有如在一个梦境里面。

忽然，她很快地坐直了身子，睁大了眼睛，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那个穿着礼服的报幕人微笑着的确是这样说的：“下一个节目是爱德华·葛利格的得意作品：《献给守林人哈格勒普·彼得逊的女儿达格妮·彼得逊，当她年满 18 岁的时候》。”

她竭力抑制住喉咙里引起的呜咽，弯下身子，把脸埋在双手里。

这是真的么？是怎么一回事？爱德华·葛利格，那个有名的音乐家，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而且将一支他最得意的乐曲献给她呢？

由于心情的激动，起初，她无法静听音乐。后来，她不由自主地沉浸到乐曲中去了。她听到了森林被风吹动时的喧哗声，海的咆哮声，小鸟的颤音鸣唱，清晨牧童对他的羊群吹奏的笛声，小孩们游戏时的呼叫，少女在她情人向她的窗口投掷石子时的歌唱……这一切都是她从幼小时起就熟悉的，而在乐曲中又是那样的动人和美妙。

呵，她明白了。她想起了当年的那个人——也就是为她作了这支曲子的音乐家爱德华·葛利格；想起了 10 年前的那次邂逅。那时，她还是一个 8 岁的金发的小姑娘。秋天，带着篮子到森林中去捡枞果。在林间小道上，遇到了一个穿着风衣的人在那里散步。一看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本地人她不会不认识的。但她一点也不惧怕他，因为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高贵的城里人，却异常和气，眼睛里也含着微笑。那个人说：“咳，真糟糕，我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给你。我口袋里连一根丝带也没有，更不要说会唱歌的洋娃娃了。”那个人答应送给她一件很好的礼物，“但不是现在——大约 10 年以后。”

这使她目瞪口呆：“啊，10 年，那可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呢。”那个人帮她提着装满了枞果的篮子，送她到森林边她住的木房子门口，然后就向海边走去了。

当她渐渐成长的时候，她有时微笑着想起这次偶遇，“那个人真会哄我——哄一个 8 岁的小姑娘。送我一件很好的礼物，在 10 年以后！就算他有这样的心吧，他将怎样把礼物送到我手中呢？”

现在她知道了，那个和气的人原来就是大音乐家爱德华·葛利格，而且他信守了他的诺言，用这样奇妙的方式将礼物送给了她。是的，这是最好的礼物——对于一个 18 岁的少女来说，这是比华美的衣服，比手镯和项链更珍贵无比的礼物了。

她流着感激的眼泪。这时，音乐响彻了大地与悬在城市上空的云彩之间的空间。她觉得音乐已不光是在演奏曲调，它在发出邀请，邀请人们到一个地方，那儿人们的脸上没有愁容；那儿谁也不会夺去你的幸福；那儿的太阳

像仙后的王冠一般照耀着……那音乐也是一个嘹亮的呼唤，呼唤人们向奔腾的大海、向开花的草原、向雄伟的高山奔去。

而且，她从音响的洪流里感到了作者对她的祝福：“你是黎明的曙光，你就是幸福。”

达格妮听着乐曲，眼泪流满了她的双颊。她梦游似地从音乐会中走了出来，在落漠的街道上徘徊。她要走遍天涯海角，去寻访那位音乐家，吻他，向他说出她的感激。

她走到海边，望着还在沉睡的大海。她觉得有一种什么她所陌生的感情在她心中萌芽了。

“生活啊！听我说——我爱你！”她面向着大海说。

于是，从这个美丽的白夜起，她带着无比的热情和勇气走上了人生的长途。

在我所读到的爱德华·葛利格的传记中，没有看到这段轶事，我是根据苏联老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短篇小说《一篮枞果》转述这个故事的。

我好多次翻读这篇小说，每一次都像初读时那样受到了感动，一个美丽的旋律在我心中回荡。

我转述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音乐怎样影响人的心灵，说明音乐能够使人热爱生活——有什么比这更神圣的呢？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为了使人热爱生活，音乐家心里首先要有对生活的爱，他要有丰满的心灵，能够敏锐地听到生活中、大自然中的音响。

而且，他要能够爱那些勤劳的人，爱那些平凡的人——即使她是一个 8 岁的守林人的女儿。

1980 年 10 月

爱的童话

我喜爱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短篇小说：《夜行的驿车》。这是诗。而且它引起我思索一些问题。

—

18××年。一个秋夜。在从威尼斯通往味罗纳的驿车上，一个男子爱上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

那个男子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当半途因他的允诺和帮助得以搭上车的一个农家姑娘感激而又好奇地问他：“您真的是一位外国王子吗？或者只是一个普通的旅客？”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是一个预言家，我能预测未来，能在黑暗中观察。可是我不是骗子，我只是一个诗人。也许，我是那个国家里一个特殊的、可怜的王子的王子，汉姆莱特就曾经在那个国度里住过。”——原来，他是著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

那个女人是怎样的人呢？

安徒生应那三个农家姑娘的要求，预测着她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事实上，是对她们的赞美和祝愿，鼓励她们勇敢地面向生活。他对其中的一个说：“有一些女人具有真正使人震惊的美丽。这几乎总是些性格孤僻的人。她们孤独地忍受着能使她们自己焚毁的热情。这种热情仿佛是在内部烧灼着她们的面颊。您，玛丽亚，就正是这样的人。这种女子的命运往往是不平凡的。或者是很悲惨，或者是很幸福。”

这话似乎不仅是说给那位农家姑娘听的。所以同车的那位太太问了：“您曾经在什么时候遇到过这样的女人吗，先生？”

“正是现在，”安徒生回答说，“我的话不仅是对玛丽亚说的，而且也是对您说的。”

那位太太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想，您讲这些话并不是为了消磨长夜，对这样一个美丽非凡的姑娘来说，这未免太残酷了。对我也是一样。”她低声补充说。

答复是：“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肃过，夫人。”

这是一段简短的对话，然而有弦外之音，有内在的含义。可以将这看作是一个渴求着的灵魂的呼唤，一个期待着的灵魂的回声。

二

安徒生的爱是怎样突然发生的呢？

他当然不是那种轻佻无聊的人。在旅舍中，那些年轻、活泼、好闹的侍女们是这样看他的：这是一个奇怪的诗人。他既不和着吉他唱那些裂人肺腑的船歌，也没有一个一个地欣赏她们这些女人。他也不是那种仅仅注意外在的美丽的人，他曾经把一朵红玫瑰，送给一个最丑的洗碗盏的小女孩。

他说自己是一个游荡诗人，他热爱旅行，在生活中到处寻求美。他爱上了这一位太太，是因为他的心中满溢着爱情。

旅程的开始，在车上只有三个人：除了他们两人外，还有一个神父，他道貌岸然，满身陈腐的气息，是这首夜曲中的不谐和音。他带着责怪的语调说：“太太们旅行应当找个亲戚护送。或者，至少也要带个仆人。”

“我的护送人，”那位太太说，并且狡猾地笑了起来，“就和我并排坐着。”

她说的就是安徒生。

异国的大地。驿车的轻脆的铃声和得得的马蹄声，在林梢流走的轻微的风声……山上湿润的空气和甜美的花草的气息，星星在深蓝色的天空中闪耀，和三个纯朴的农家姑娘的生动的对话……这一切诱发了他的激情，他不自觉地开始编造一个以他自己为主角的故事。而坐在他身边的、在朦胧的烛光中的俏皮女子，就成了他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角。看来这位有着精致的感情的贵妇也正是适合于当这一主角的。——一粒种子在他心中迅速地开出了美丽的花。

三

驿车在黎明时到达了味罗纳。梦幻似的一夜过去了。

安徒生一整天都怀着隐秘的不安想着那位同车的女子，他狂热地爱上了她。

然而，黄昏时他怀着坚定的心情来到一所古老的房屋前，揪响了门铃。他是来向那个女子（现在他知道了她的名字：叶列娜·格维琪奥莉）告别的。

因为，他想，如果他让这样的爱情燃烧起来的话，他的心是无法容纳的。

而且，谁知道呢，也许，由于这样的爱情，他那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童话说不定会变得默然无光，并会离开他一去永不复返了。

而且，他骇怕，终于会有这么一天，在一个黯淡的日子里，叶列娜·格维琪奥莉将发现，他原来是一个畸形儿。他知道自己长得很丑，他自己就是自己的敌人。而他知道像叶列娜·格维琪奥莉这样的女子都是任性的。

那位贵妇亲自为他开门。她认出了他是著名的童话作家和诗人安徒生，而从他的眼睛和神情中猜着了心里所想的一切。她微笑着但凄然地说：“看来您在自己的生活中却骇怕童话。您缺少爱的力量和勇气。”

安徒生承认这是他沉重的十字架。

她将一只手搁在安徒生的肩上，悲伤地说：“噢，怎么样呢，我亲爱的游荡诗人，走吧！解脱吧！让您的眼睛永远微笑吧！不要想我。但是假如以后您由于年老、贫穷或疾病而感到苦痛的话，那时只要您说出一个字，那么我立刻就去，徒步走过积雪的高山和干旱的沙漠，到万里之外去安慰您。”

安徒生扑倒在她脚边，跪下。她含着泪吻了他，轻轻地说：“去吧，愿诗神饶恕您。”

安徒生在全味罗纳晚祷的钟声中走出了她的家。他是在向她告别，也是向一个青春的幻梦告别。

萍水相逢，心灵上偶尔的闪光。这样的爱情只能是一个幻梦。他们的分离虽然飘荡着忧郁和惆怅的调子，然而美丽的，是恰到好处的落幕，是这支梦幻曲的久久回荡着的尾音；他们终生彼此思念着。

是不是如叶列娜·格维琪奥莉所说，如安徒生自己所承认的，他缺乏爱的力量和勇气呢？可以这样说，但也要看怎样说。在那样的社会里，往往是通过悲剧的形式（如玛格丽特与阿芒，罗密欧与朱丽叶）来显示爱情的力量和光辉的。而安徒生（如作者所刻画的）是一个在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沿路抛洒花朵的诗人，却未必是一个为了爱情勇于跃马操戈的骑士。他满怀爱的心，却又畏惧爱的波折、烦恼和失望的痛苦，怕因而失去了一个童话作家所必需有的纯真、欢乐、和谐的心境。

安徒生在临终前不久对一个年轻的作家说：“我为自己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甚至可以说是无可估量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拒绝了自己的幸福，

并且错过了这样的一段时间，那时，尽管想象是怎样有力，如何光辉，它还是应该让位给现实的。”

不要以为他是不珍爱自己的艺术。这是一个垂危的老人强烈地对青春的缅怀和对生命的留恋。

不过，他的确为自己的艺术付出了巨大代价（想想看，在那样的社会中，有多少艺术家为了自己的创作而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幸福和家庭），因而我们就应该能够感受到他如下的话的分量：“要为人们的幸福去想象，而不是为了悲哀。”

四

我是根据《夜行的驿车》所提供的情节来谈安徒生的。也就是说，我所谈的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所理解的和想象中的安徒生。

如果有人认为这篇作品并没有深刻的社会内容，他是有理由的。不过作者所追求的，是表现性格的美和生活的美，是那样一种境界，在那当中使读者得到感情的净化和灵魂的澄清。这一旅途上的过眼烟云的爱情，没有使我们感到轻佻和无聊，而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而且喜爱了安徒生的诗人的性格，我们在一点淡淡的惆怅中却体会到了爱的美丽和人生的严肃。

我感到巴乌斯托夫斯基与他笔下的安徒生在气质的某些方面是相近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在生活中寻求美。他在创造安徒生这一形象时，显然也将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和追求融合了进去。正如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一样，他也可以说“安徒生就是我”的。

正是由于他有着美好的心灵而又将自己的激情融合在作品里，再加上他的美丽清新的文笔，因而这篇作品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读后感到一种难言的喜悦，一种轻微的心的颤动。在如何探索和表现人的心灵中的那种微妙的感情，如何将作品提到诗的高度方面，我们的作家们是应该可以通过这篇作品学习到一点东西的。

我不是说要用玫瑰、白云、大海……华丽的语言和诸如电影慢镜头之类的东西将作品装饰起来。真正的诗是不需要装饰的，那样就反而破坏了诗。诗只能是将一切有机地融合在自己里面。

我不是说只有像巴乌斯托夫斯基这样的风格才是诗。果戈理将他描写丑恶的地主生活的《死魂灵》也称为诗篇，而且那的确是诗篇。问题在于作者有没有纯洁、丰富的心灵，能不能将对象提到诗的高度。

1980年10月

生活的美和生活的爱 ——关于《雪》和《雨蒙蒙的黎明》

我在好几年前写的一篇介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短文中，曾经这样说过：

他的作品在情节上几乎没有波澜壮阔的开展，人物的个性生动但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一般说来，他的作品没有深刻地反映现实，也没有强大的思想力量。不过，他所追求的原也不是这些。他表现的往往只是一种情调，一种气氛，一种微妙的情绪，企图从这中间去体现性格的美和生活的美。

现在，我来谈谈《雪》和《雨蒙蒙的黎明》，这是很能代表他的风格的两个短篇。

两篇都是以卫国战争为背景，写的都是人生中一次偶然的邂逅而引起的心灵的颤动，一个朦胧的爱情故事。

《雪》的简单情节是：海军中尉波塔波夫从医院里养伤出来返回部队的途中，绕道回到了他的家乡。他想去看看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也还常常想念着的小镇和有着一个小花园的他的住宅，想去看看常常想念着的父亲。但是，一下火车，他就听说父亲在一个月以前已经去世了。从莫斯科疏散来的一位青年歌唱家和她的女儿住在他家里。在沉重的悲痛的心情中，他感到自己回来得太晚了，而且感到他曾经那么熟悉和那么想念的市镇，似乎对他都有些生疏了。在苍茫的暮色和轻轻飘飞的雪花中，他慢慢地朝着家宅的方向走去。一想到跟他和他父亲毫不相关的陌生人住在他父亲的房子里，他心里就觉得很难受。他决定不进里面去，只在古老的凉亭里站一会儿。他摘下帽子，凭依在栏杆上，望着在暮色中的寂静的小花园。他觉得肩膀上有谁轻轻地触摸了一下。转过头来，看见了一个头上缠着一条头巾、面容苍白的庄重的少妇，她的双颊上有雪花在融化着。他猜到了这就是那个女歌唱家。她柔和地说：“进屋来吧，不要着凉了。”她拉着他的手，穿过已打扫干净的小径，向屋里走去。不久前在医院里他曾写信给父亲，告知他可能回家一趟，并回忆和想象着屋里的情景。现在，他发觉，一切都如他预期看到的那样：钢琴上仍旧摆着从前的乐谱；同样的黄色的蜡烛照亮着他父亲的小书房……他被一种奇异的感觉纠缠着，仿佛生活在一个影影绰绰、却很真切的梦境里。后来，他看到了那一封自己最近写给父亲、显然已被女歌唱家拆看的信，在感动的心情中明白了一切。女歌唱家那样亲切地接待了他。那一夜，书房里的躺椅当作了他的床铺。他睡不着。他原来不想进到屋子里来，而现在他感到在这屋子里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每一分钟都舍不得白白过去。他从门底下看见了隔壁房间的一缕光线，听到了翻书页的沙沙声——显然是那位女歌唱家在看书。她不睡是为了准时唤醒他，让他赶上了黎明五点钟的火车。穿过晨光中的市镇，她将他送到了车站。在第二遍铃响以后，他们才告别。“给我来信，”她说，“我们现在差不多成亲戚了，是不是？”几天后，她果然收到海军中尉从途中写来的信，告白了他对她的感情。信的最后说：“如果一切事情结果都很顺利，你愿意要我的生命的话，我的生命当然就属于你。”

我们再来看看《雨蒙蒙的黎明》。

养好了伤，从医院出来的军官库兹明，在乘船去某地休养的中途，一个落着细雨的夜间，来到一个小镇上，为的是把同病室一位军官托自己转交的

一封信送给他的妻子。库兹明雇了一辆马车从码头来到一所带小阁楼的屋前，敲醒了沉睡的门。受信者是一位年轻的妇人，一双既深邃又带点儿朦胧的眼睛闪耀着光辉。她将那么珍重地转交来的信没有看就随手放在了钢琴上。而且说：“您别生气。有邮局，也有电报局，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麻烦您。”库兹明从那位同病室的军官交给他这一封信时的郑重态度和所说的几句话中，知道那位军官是如何深恋着他的妻子。而他从这位少妇对待这封来信的冷漠神情和不满的语句中，感到这中间是存在着某种悲剧：她并不爱她的丈夫，对她的丈夫没有相应的感情。他对少妇说，特为送信来并不算什么麻烦，相反，这倒挺好。少妇问：“为什么？”他的脸红了。当少妇又一次追问他时，他沉思着回答说：“怎么对您说呢？……一切好的东西，总是在身旁一闪就过去了。”于是他叙说了在人生的长途上，一些转瞬间一闪而过，但一生都会记得的情景。“在我的一生中，我永远期待着有像这样意外而又单纯的事情。每当我找到它，我就觉得幸福。幸福的感觉不长久，可是常有。”年轻的妇人问他：“现在也是这样么？”他回答：“是的。”但他无法说清他此刻的幸福的感觉。他看着少妇，心里想，要不是有同病室的那位军官，他就绝不离开这座小城到任何地方去了，他就会留下来直到假期结束，怀着激动的心情来生活，由于有这位可爱的、此刻显得非常感伤的女人生活在近旁。黎明在雨蒙蒙中来到了。他们像古时那样，在临出门前默坐了一会。女主人送他到码头。他现在就要同这位素不相识却又这样亲近的女人告别。他的心都紧缩了。难道说在这时候，在这一分钟，一切都将成为往事，无论在他的或她的生命中，都只成为一个沉重的回忆么？他吻了她伸过来的手。当他抬起头来，少妇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话，他没有听清楚，好像是两个字：“徒然。”船在雨蒙蒙的黎明中开动，愈走愈远了。

在这样简短的叙述中，是无法传达出原作那种幽美的抒情的格调和气氛的。但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短篇（都是以卫国战争为背景，男主角都是在战争中受伤的军官），并没有去反映严酷的斗争现实，没有去刻画英勇的战士的形象，却讲了这么两个近乎爱情的故事——这样的作品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它是不是冲淡了战争的严峻的现实，歪曲了战士的形象呢？

作者在本质上是一位抒情诗人，他有着一颗柔和的心。在这两个短篇里，他没有写到战争的苦难和严酷，也没有写到英勇的斗争。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到的，他所探求和企图表现的是一种情调，一种气氛，一种微妙的情绪，从这中间去体现性格的美和生活的美。应该承认，作者相当成功地达到了他的意图。我们读完这两篇小说时，也引起心灵的颤动，激发了对生活的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雪》中的那位女歌唱家，在拆看了海军中尉给他父亲的信以后思索着，说不定哪一天一个沉着勇敢的人，从前线到来，一看到他房子里住着一些陌生人，各种东西都和他预期的不一样，他会难过的。她因而依照信中所说的布置和安排了一切。这是体现着对战士的崇敬的感情。海军中尉归来后，从她对待他的亲切的安慰和照顾中，从她为他所布置的一切中，看到了一颗美好的心灵，因而使他滋生了一种感情和想象。

女歌唱家在海军中尉归来之前，有时候仔细端详着写字台上的他的照片，并且思绪万端地皱了皱眉头，觉得在她不遂心的婚事以前，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可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呢？她见到海军中尉后，问他记不记得？海军中尉承认他也有这样的感觉，接着他又说：“不，我不记得了。”

然而，在他离开以后写给女歌唱家的信中，写着：“我们在什么地方相遇时，我当然没有忘记。但是我觉得在家里不愿意谈起那件事。”于是，他说到了1927年秋天在克里米亚海边，他遇到一个16岁的姑娘的情景。“那位姑娘就是你。我不会弄错的。……那时候我心中想道：一个可以使我一生毁灭，或者使我得到幸福的女子，从我身旁走过去了。我觉得我可以对那个女子爱到神魂颠倒的地步。我祝福她的每一个脚步，她的每一句话，她的每一个微笑。我那时就知道，不惜任何牺牲，我一定得找到你不可。……人生对我是仁慈的，我又见到了你。”他说得如此恳切。然而，女歌唱家读完信以后，喃喃自语：“我的天哪！我平生从来没有到过克里米亚，从来没有！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值得把真情告诉他，让他失望，或者使我自己失望吗？”

那么，他们以前究竟见过面吗？谁能说清呢！我们记得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见面时，两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在想：“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这是由于气质相近，由于一种愉悦的感情波动所引起的心灵感应，它是微妙的，但并不是神秘的。

《雨蒙蒙的黎明》中的那位军官库兹明，是一位富有感情的人，他已经40多岁了，一直还过着独身生活。当他受伤后躺在医院里时，同病室的所有的人都接到过信，但没有人写信给他。他躺着，想象着自己战后未来的生活，那一定会是幸福的，不寻常的。现在当他伤愈后去休养的旅途中，在雨蒙蒙的夜间，一辆马车把他拖到一所带阁楼的小屋里，面对着一个可爱的，然而因为不幸的婚姻而有些感伤的少妇，有了一种异样的，而又使他感到幸福的感情。可以说那是一种朦胧的爱。

他们的感情是不健康的或是轻佻的么？不，无论是那位海军中尉还是军官库兹明，都并不是真正地沉入了爱情的漩涡中。海军中尉少年时在克里米亚海边偶然见到一位姑娘，狂热地爱上了她，那不可能是真正的爱情。那只是刚刚走向生活的少年对爱的向往，也就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他认为现在的女歌唱家就是当年的那位姑娘，事实上并不如此，然而他是真实地这样想的。因为在女歌唱家身上，他看到了一颗美好的心灵，因而也寄托了爱的向往。他的美丽的梦想是他少年时的梦想的继续和发展。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他不自觉地将当年的那位姑娘与现在的女歌唱家联系起来。军官库兹明对那位少妇的朦胧的爱的感情，则是由于他从战场、医院来到了一个如此宁静的和平环境中，面对着如此可亲的而又感伤的少妇，而他是一向珍惜那些在他身边一闪而过的美好的事物的，他的朦胧的爱的感情，事实上是对和平的生活的珍惜，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爱。

我们的解释并没有能够真正说清他们的那种微妙的感情。有时候，人的复杂的感情真也是难以说清的。但是，我们却能够体会。因为，不妨冒昧地说，虽然情况不同和性质不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微妙的感情。在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以及许多文学大师的作品中，也接触过和描写过这一类的微妙的感情。杜勃罗雷波夫曾经说过，没有诗人，人类“许许多多美妙的感情与高尚的愿望，都会被我们遗忘”。我觉得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这两个短篇中所描写的那种微妙的感情也可以说是“美妙”的。它可以激发我们对生活的爱，对美好事物的爱，而且能培养我们对生活的感情的敏锐性和丰富性。它们并不是单纯的爱情故事。这当是这两篇小说为许多读者喜爱的原因。

那位海军中尉是单纯而热情的，那位女歌唱家对他也有着相应的感情（她说：我何必使他失望，或者使我自己失望呢？）。他们的邂逅可能是他们真正恋爱的序曲。而军官库兹明已40多岁了，阅历丰富一些；那位少妇则是深沉的。而且，她的丈夫是他同病室的战友。因而，他不会向她倾吐感情，她也不会接受他的感情（她说，或者他以为她是这样说：徒然……）。他们的邂逅好像是飘泊在人生海洋上的两只小船，偶然相遇又离开了，留下了一点怀念，一点回忆。《雪》多一点温暖和亮色。《雨蒙蒙的黎明》则漂浮着淡淡的惆怅。两篇都是美丽的，而《雨蒙蒙的黎明》更美一些：在人的感受上，美好事物的失去或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比美好事物的获得，要更美一些，因为它更激动人心。

要表现和传达这样微妙的感情是不容易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这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他并没有细致地去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没有写到感情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只是写出那气氛，那情调，让你沉入了进去，因而也就体验到了人物的心情。而且，对人物的经历和身世也写得极少，甚至没有写。他只是顺便提到了女歌唱家曾有过不遂心的婚事；他只是写到那位少妇对待她丈夫那么郑重地带来的信的冷淡态度，因而我们想到她的婚姻是不幸的。什么原因我们却无从知道。作者也无意让我们知道，因为作品的重点并不在这方面。在别的小说中可能是缺点的东西，在这两篇小说中却是优点。也许只有在朦胧的色调当中才能更好地烘托那微妙的感情。主要的是依靠读者的体验和想象，容许读者有体验和想象的余地。

当然，在这两位军官身上都有着巴乌斯托夫斯基自己的影子，他自己没有那样的感情是不可能表现那样的感情的。而且，可能他将他们“诗化”了，将过多的想象和自己的气质放在了人物的身上。但作者是以真诚的态度拥抱了他的人物，沉浸到了他所创造的天地中去，作者的情绪和描写的对象溶化在一起，作品虽然有些“诗化”了，却还是有着生活的实感。

巴乌斯托夫斯基是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他有着他的喜爱，他的憧憬。他怀着柔和的心在生活中去追求美和发现美，在他的标准和他能达到的范围之内。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没有为我们带来时代的丰碑，生活的浪涛。他是一个（如同他说苏联作家普里什文那样）“被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他为读者献出了许多美丽的花朵，那上面晶莹的露珠是他对生活的爱的泪珠。有许多作家的作品使我们在激动的心情中对生活产生了沉思。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作品——如这里介绍的《雪》和《雨蒙蒙的黎明》，则使我们的的心灵轻轻颤动，使我们在愉悦的心情中激发了对生活的爱，认识到生活中的美。他的作品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82年5月1日 鄂城墩

艺术家的悲剧

——关于果戈理的《肖像》果戈理的中篇小说《肖像》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狄康卡近乡夜话》中洋溢着由于对生活的热爱而发出的青春的欢笑。《外套》、《鼻子》中则闪烁着由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同情而发出的含泪的笑。《钦差大臣》、《死魂灵》中响彻着对官僚、地主们猛烈抨击的辛辣的笑。《肖像》却是沉重、暗淡的，而且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小说描写了一个青年画家的悲剧，其中流露着作者自己思想中的一些消极因素。这些因素后来的发展，也导致了果戈理自己的悲剧。在小说中，果戈理以作者的身份，有时是通过人物的口，表达了许多对艺术的卓越的见解，虽然其中也夹杂着需要加以分析的意见。小说的第一部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在第二部中，却明显地可以感到思想中消极因素对创作方法的影响，使作品偏离了现实主义的轨道。

《肖像》分为两部，并不是一个相互衔接的故事，使两部贯穿起来的，是一幅人物画像。画的是一个穿着南方服装，有着紫铜色的脸，颧骨高耸、形容瘦削的老人。看来肖像没有完工，笔力是令人惊奇的。最奇特的是一双眼睛。艺术家似乎在这双眼睛上用尽了他的全部才能和全部心血。那完全是一双活人的眼睛，像是从活人身上剥下来，嵌在画上的。

青年画家恰尔特科夫为这一双有着奇异的泼辣神气的眼睛所打动，掏出了他仅剩下的 20 戈比购买了这一幅肖像。

夜间，在简陋的画室里，在朦胧的月光下，青年画家偶然接触到那一双眼睛时，不寒而栗，脸色陡地发白。他从床上跳起来，拿一床被单把肖像蒙住。然而，他的心情并没有恢复平静，一夜为恶梦所扰。

这幅肖像却为他带来了意外的财富。在那偶然被折断的画框的裂缝中，落下了一个装着 1000 金元的纸包。从此，他的命运改变了。他欣喜若狂。他没有想到的是，最终却导致了他的毁灭。

他搬进了涅瓦大街华丽的住宅。开始有顾客来光顾他，逐渐地他的名声愈来愈大，财富愈来愈多。然而，在艺术的道路上却愈走愈偏。他放弃了对艺术的追求，迁就顾客的低劣的口味，只要对方希望把自己画成什么样子，他就画成什么样子。以至他的作品连最普通的优点都看不到了。真正的鉴赏家和画家看到它们只会耸耸肩而已。他却陶醉在上流社会的一片赞扬声中，吹嘘自己，以轻蔑的口吻谈论那些古代的艺术大师。

但是，他的艺术良心和艺术鉴赏力还未完全泯灭。有一次，当他去看一个青年画家的画展时，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在那些像处女般纯净、完美、秀丽的画像前，茫然失神。他在一瞬间觉醒了过来，仿佛熄灭了的才能的火花陡地又燃烧起来。

他的醒悟应该使他回到正常的艺术创造的道路上来。但他已糟蹋了自己的青春，再开始是艰难的。而且，他在浮华的生活中是陷得这样深了，简直没有再复生的可能。失望、嫉妒和痛苦使他萌发了最邪恶的念头。他开始收买艺苑中的精品，不是为了欣赏和珍藏而是为了消灭它们。不久，他终于在这种半疯狂的状态中发病致死。

果戈理描绘了这样一个年轻的画家——他远离人群、财富、纯洁而无私，孤寂地在一间破陋的小画室里默默地工作着，他是有才能也有所追求的，但

无力也无法实现他的抱负。意外的横财使他从贫困的深渊中飞腾了起来，同时也诱发了他所有尘世的俗念。他享有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却失去了一个艺术家所应有的素质，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艺术匠人。果戈理对他这时的心理状态有一段很精彩的描述：

他的生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一切热烈的冲动都萎缩了；有力的琴弦很难打动他的灵魂，他的心也不再被锐利的声响所盘绕；接触到美的东西，已经不能使纯洁的力量勃发为熊熊的火焰；可是，只要一听见金洋的声音，烧残的感情就会死而复燃，就会留心倾听它的诱人的音乐，慢慢地，在麻木中让这音乐完全把自己催眠。……他的全部感情和冲动都转向了金洋，金洋变成了他的情欲、理想、患得患失的对象、享乐、人生的目的。

他的成就和声誉令人眩目，事实上，那只是闪光的泡沫。他似乎达到了一个顶峰，事实上，却是陷入了一个泥潭。那幅肖像为他带来的不是幸运，而是灾难。

果戈理深刻地刻画了这个有才能的年轻的艺术家一步一步堕落的过程，他的心理变化，从而对那个摧毁艺术家的腐朽的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揭发和强烈的抗议。同时，也对浮沉于拜金主义浪潮中的艺术家们，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

在小说的第二部，果戈理企图解决腐朽社会与艺术家之间的矛盾。隐藏在思想深处的弱点使他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看清艺术家应该走的道路，他只能求助于“理想”，而那理想是违背了历史的方向的。因而他从现实主义的大师一变而为苍白无力的说教者了。

在这一部里，写了那幅画像的来源。那画的是一个来历不明的高利贷者。他为人似乎是慷慨、平和的，但向他借钱的人都遭遇到了不幸的命运，以致人们很难把这看作是偶合，而从这中间感受到了某种神秘可怕的玄机。

一位画家为了要在一幅画上描绘一个魔鬼而想到要以那个高利贷者做模特儿，奇妙的是，那个高利贷者这时主动来找他画像了。画家兴奋地画着，为对方魔鬼般的神色所倾倒。可是，当他的画笔一接触到那双眼睛，他的心里就涌起一种古怪的憎恶，一种不可名状的慌乱。以致他终于扔下画笔，实在不能画下去了。

那幅未完工的肖像第二天被送到画家家里，因为那个高利贷者已经在头一天夜间死去了。那以后，画家就感到莫名其妙的不安和烦恼，而且性格也起了显著的变化，他原是一个正直、诚恳的人，却变得妒嫉、粗暴，耍起各种阴谋权术来了。

而且，他创作的画中，开始流露出一种邪恶的感情。一位牧师批评他画的一幅宗教画：“人物的脸上没有圣洁的表情，恰恰相反，眼睛里倒有一点儿鬼意。”他自己也发觉，几乎给画中所有的人都装上了一双高利贷者的眼睛。他在气愤和疯狂中想将那幅高利贷者的画像焚毁，一位朋友拦阻了他，将那幅肖像要走了。画家的心理逐渐恢复了平静，而且为过去的行为悔恨。但是，那画像却为他的朋友和后来辗转成为画主的几个人都带来了不幸。知道这一情况以后，画家感到了强烈的震动。他认真沉思起来，整天神思恍惚。最后，他完全相信他的画笔做了魔鬼的工具。接着发生了三件不幸的事：他的妻子、女儿和小儿子接连不断地暴死。他认为是上天对他的惩罚，于是下

了决心离开尘世，将仅剩的一个儿子安置在美术学校，自己隐遁到一个冷落的修道院里，不久削发为僧。后来又遁迹到荒山野地去，完全离群索居起来，历尽了各种程度的忍耐和只有圣徒传记中才找得到先例的自我牺牲。终于有一天，他回到修道院，又拿起了画笔，在禅室里关了一整年，以耶稣降生为题材画了一幅画。修道僧们不大懂得绘画，可是都被画中人物的异乎寻常的圣洁感动了。

画家对到寺院来探望他的儿子提出了一个要求：“你可能会在什么地方遇见我对你讲过的那幅肖像。光看那一双异乎寻常的眼睛和非人间的表情就可以把它认出来——无论如何你得毁掉他……”他儿子终于在一个拍卖场所找到了那一幅画。他向几个竞争者说明了他必须得到那幅肖像的理由。但是，故事刚刚讲完，他和听众把眼睛移到墙上时，发觉那幅肖像已经不在——它被偷走了。

就从这简短的叙述中也可以感到，这故事是笼罩着浓厚的神秘气氛。在小说的第一部里，也飘浮着一种神秘性，那主要表现在对肖像的那双眼睛的描写上，和在深夜里那双眼睛在恰尔特科夫精神上所引起的强烈的反应。在第二部里，这种神秘性加强了：凡向那个来历不明的高利贷者借贷的人都落得一个可怕的命运。而那幅高利贷者的肖像，影响和改变了画家和每一个画像的持有者的个性，并为他们带来了不幸和灾祸。在第一部里，对于那双眼睛的描述还可以看作是为了烘托气氛；恰尔特科夫因那双眼睛所引起的反应，还可以看作是为了表现他的性格。这样是加强了艺术效果和艺术魅力的。但在第二部里，神秘性却带着宗教气息，是作者为了宣扬他的教义的一种需要，一种渲染。事实上，整个第二部都可以看作是为了宣扬一种教义而编造的一个故事。它不是从现实出发的，生活气息淡薄。

在这篇小说里，果戈理阐明了许多关于艺术创作的见解，其中有着他自己的宝贵的经验和体会，值得我们注意。他指出，艺术应该忠实于现实，然而，“在创造和单纯模仿之间横隔着怎样不可估量的距离”。他指出，“画家是先把从外部世界吸取到的一切蕴藏在自己的灵魂里，然后再从灵魂深处，把这些东西谱成一支和谐的庄严的歌。”“艺术创造者即使描写低微的事物，也像描写伟大的事物时一样伟大；在他笔下，卑贱的事物已经不显得卑贱，因为无形中已被创造者的美丽的灵魂所渗透；卑贱的事物获得了崇高的表现，因为流过了他的灵魂的炼狱。”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艺术家们还是应该虚心地倾听并认真地思索的。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他所指出的道路：脱离现实，在苦行和对上帝的祈祷中去求得“宁静的高尚的激情”，要求艺术“发出奇妙的抚慰的声音……永远像祷告似的奔向上帝”。作为作家果戈理自己的道路和《肖像》第二部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小说第二部里那位画家的形象，远不及第一部那位青年画家恰尔特科夫的形象那样丰满。恰尔特科夫是一个有血肉有性格的人物，我们可以理解和体会他的思想感情。那一位画家是一个“理想的人物”，他高超脱凡，不能为我们带来生活的实感。在第一部里，果戈理对那个腐朽的社会如何摧毁一个艺术家的揭露是深刻的。在第二部里，果戈理所指明的艺术家的道路却是虚浮而错误的，他将古老的宗法制度美化了，宣扬了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由于作者不是着眼于现实，不是从生活中去发掘和提炼，作品在艺术上也是失败的。

读着恰尔特科夫的悲剧，我们不由联想起果戈理笔下的另一个画家的悲剧，我指的是《涅瓦大街》中的庇斯卡辽夫。这个短篇与《肖像》的写作是同一时期。庇斯卡辽夫真诚、热情、纯洁，追求着善和美。他的生活是贫困的。由于理想的破灭，在深深的失望中自己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他的才能没有可能得到发挥。恰尔特科夫年轻时也一如庇斯卡辽夫，他是被那个社会所腐蚀，丧失了艺术生命，才能也没有可能得到发挥。他们两个人象征着艺术家的两种不同的命运，然而都是一个悲剧。

而果戈理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人物呢？他以有着浓烈的传奇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开始了文学道路。在那里带来了乌克兰的绚烂的色彩，和劳动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同时震荡着青年果戈理由于对生活的热爱而发出的青春的欢笑。但是，当他逐渐成长，深入地面对现实时，他看到的是一个黑暗的俄罗斯。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历史使命。他说：“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节日和宴席被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被叫到这里来是为了战斗。所以，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了战斗而来的，因而也不会选择危险少的场所。好像好的士兵一样，非把我们的一切向战争激烈的场所投去不可。”他将他的长剑的锋芒主要指向了残酷、腐化的官僚们和鄙俗、贪婪的地主们。他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第一部）是暴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的黑暗、悲哀，并发出了痛切的控诉。但是，在思想上，他却匍匐在沙皇脚前，——而沙皇本人就正是最大的官僚和地主。而且，他美化古老的宗法制社会，认为那是俄国最理想的社会，认为封建农奴制是不可废除的。他提倡信仰主义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以为这样就能够消灭这个社会制度所带来的种种罪恶。他的这一切观点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与友人书信集》中。他对于官僚们、地主们的愤怒的揭露，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当时进步文艺界的一致好评，却受到了反动集团的疯狂的攻击。而他的《与友人书信集》，在上流社会中引起一片喝彩声，却受到了别林斯基的严厉的批判。果戈理在自己的思想的矛盾当中，也在社会对他的全然相反的评价当中，感到深深的疑虑、不安。他说“我已经痛苦到极点了。我的精神和肉体都感到十分痛苦，一切都陷在彷徨中……工作就是我的生活，不能工作了，也就无法生活了。”在他43岁的壮年，在应该是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他却结束了生命，而且很可能是绝食致死的。

果戈理世界观的矛盾的复杂的内容，一直是文学史家探讨的一个问题。我们只想在这里指出，他原是对生活充满了乐观，对劳动人民满怀同情的开朗的人。他理应成为一个真正的抒情的歌者，为我们带来灿烂的阳光和美丽的歌声。但是，严酷而黑暗的现实却扭曲了他的性格，使他的灵魂上沾染了一些庸俗的和错误的东西。在批判、攻击丑恶的现实时，他不愧为真正的战士。当他想指明通向将来的道路时，他却是一个浅薄而无能的说教士。

这一点，在他的力作《死魂灵》中表现了出来。小说的第一部，他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黑暗、腐朽的俄罗斯的现实，在辛辣的笑声中揭发了地主们的贪婪、猥琐和寄生性。但在第二部里，他却想臆造出几个正面的地主形象，“想要复活或救活那整个地主阶级”（阿垅）。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他不能不感到，这是艺术的堕落和虚假，因而，他在死前，焚毁了多年来惨淡经营的手稿。火光照亮了他受伤的靈魂和艺术家的良心。

谈到《死魂灵》的第二部，我们就容易联想到《肖像》的第二部，在思想根源上，它们有相通的地方，而且都是由于屈从于错误的思想而损害了现

现实主义，因而都失败了。

在《肖像》的第二部里，果戈理创造了这样一个“理想人物”，一个认为自己是充当了魔鬼的工具的画家，到人迹罕见的荒野中去苦苦修行，终于达到了人的圣境，由于他已得到了不是混糅着世俗欲念的，而是宁静的高尚的激情，他在艺术上也达到了高峰。——但是，果戈理自己，却一直没有能够摆脱人世间带给他的痛苦和烦恼。而当他想在作品中发出“奇妙的抚慰的声音”，表现出“神圣的崇高的力量”时，他的作品却失去了光彩。

果戈理的悲剧应该引起我们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的强烈的憎恨，而且也应该引起我们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深思。

1981年12月2日

雨果的沉思 ——读《九三年》

《九三年》中有一节的题目是：《沉思中的郭文》。事实上，那也是作者雨果自己在沉思。在他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中，雨果提出了一个问题：人道主义（他所理解的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他自己作出了回答。

他所提的问题是有着某种重要性的，而且他是通过比较丰富的艺术形象和生动的情节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因而在思想上和感情上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也引起了读者的沉思。由于读者不同的立场、态度和看问题的不同的方法，关于这本书一直有着一些争论。

《九三年》是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这次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它不仅使法国的封建社会彻底崩溃，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整个欧洲封建体系，开辟了一个资本主义更加广泛发展的时期。《九三年》指的是 1793 年。从 1789 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经历着复杂尖锐的斗争，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这一年的一月，挣脱了封建枷锁的法国人民，愤怒地将路易十六的头颅像手套一样抛掷在全欧洲君主的脚下，向专制政体和贵族政治挑战。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封建王朝结成了反法同盟，派出几路大军向法国逼近，想将不满一岁的共和国淹没在血泊里。在国内，反动分子与国外的敌人相呼应、相勾结，阴谋活动日益猖獗。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纷争和矛盾也更加深化。在这种情势下，共和国确立了雅各宾专政，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这是著名的“恐怖时期”。

旺岱地区是共和国不得不带着忧心注视的地区。它在海边，交通闭塞，城镇很少。在广漠的大地上散布着贫穷的村庄和大大小小的森林、丛林。它像是一个孤岛——一个阴沉、险恶的孤岛，法国各地澎湃的革命浪潮只能在它的岸边激荡。当地最有权势的人物依然是贵族和神甫。长期在封建思想和宗教影响下的农民，保卫着压迫、剥削他们的主子，而与要解放他们的共和军血战。——在反革命分子眼中，这是一个最好的基地；对共和国来说，这是藏在肚子里的一条毒蛇。

《九三年》反映了当时法兰西的整个形势，而以旺岱地区惊心动魄的斗争作为情节的中心。

有三个主要人物：共和国联队指挥官兼远征军司令郭文，政治委员西穆尔登，叛军领袖朗德纳克。这三个人物都是非凡的。

先来看朗德纳克。他是一个随着皇族流亡在英国的侯爵，现在受命潜回旺岱领导叛乱。他从前是一个好色之徒，沉溺在花天酒地之中，而今老了，但身体健壮。他是一个极其顽固的保王党，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叛军领袖所肩负的重任。他坚毅、沉着、勇敢，而且富有军事才能，反动集团挑选他担当这一重任是有眼光的。而且，他还有着叛军领袖所必需具备的两个因素：他的领地在旺岱，在当地有着巨大的声望和号召力。当他冒险从海上登陆的当天，就有 7000 人投奔，在一星期内就有 300 个教区揭竿而起。他又是冷酷、残暴的。他下令焚烧村庄，杀死伤兵，屠杀俘虏。他的残暴不仅是由于他的本性，也由于他对革命的刻骨仇恨。他是共和国的最凶恶的敌人。

他的对手，共和军年轻的司令官郭文，也出身贵族，而且是他的侄孙。郭文在一个有着共和思想的家庭教师的教育和熏陶下，成了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无比纯洁、善良，而又勇敢。现在，这两个贵族：祖父和侄孙，成了

不共戴天的仇敌，各自为了自己的信念，在战场上兵刃相见。两个人都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不过，在惨烈的斗争中，几乎总是郭文占上风。

但公安委员会对郭文还是不太信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贵族，又与叛军领袖有着这样的亲属关系，而且，他是过于温情、手软的。在公安委员会的领袖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对敌人的宽大将造成革命的损失，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损失。因而，指派了西穆尔登作为他的政治委员，帮助他同时也监视他。

公安委员会的这一指派是正确的。西穆尔登早年当过乡间的本堂神甫，后来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属于激进派。他生活俭朴，工作勤奋，全心全意献身于理想的事业。他理解革命暴力的意义和作用，以惊人的慈爱关心受难的人民，对共和国的敌人则是绝不容情的。

但公安委员会不知道西穆尔登是郭文幼年时的家庭教师。他没有家庭，将全部爱情倾注在他的学生郭文身上，将郭文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儿子。他和他的学生的分离曾使他异常痛苦。他没有想到革命的浪潮又将他们涌在一起。他以十分喜悦的心情看到自己教育的学生成了共和军的一个杰出的军事领袖，同时也满怀忧心忡忡地注意到郭文对敌人过分的、有时甚至是无原则的宽大。他明确地对郭文指出过这一点，而且郑重地提出过警告：“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仁慈可能成为卖国的一种形式。”

这是三个强烈的性格的对比。这是三种强大力量的较量。在它们相互猛烈地撞击、斗争中，迸出耀眼的火花，那当中又飞溅着血和泪。

使他们之间的纠葛和矛盾深化的原因中，关系着三个天真可爱的小孩。《九三年》是以描写这三个小孩作为序曲的。

一个善良而又几乎是愚昧无知的农妇带着三个小孩在森林中流浪。她的丈夫是一个已阵亡的叛军。她的家园毁于炮火。共和军的一支联队在发现他们时，他们由于饥饿已濒于死亡。联队出于同情收留了他们。后来，在一次叛军的袭击中，农妇连同三个小孩与一些士兵一齐被俘。朗德纳克下令枪决俘虏，农妇也包括在内。三个小孩则被当作人质带走了。通过几次大的战斗，溃不成军的叛军只剩下朗德纳克和 19 个人被围困在他自己的城堡中，进行绝望的顽抗。一个意外的机会使朗德纳克和残存的几个叛军得以通过一条秘密的地道逃走，那三个小孩却被留在叛军放火焚烧的城堡里面。那个曾被枪决的农妇侥幸只是受了重伤，死里逃生。当她能够走动时，她疯狂地到处寻找小孩。她来到城堡跟前，看到了在烈火包围中的孩子，发出了撕裂人心的惨叫，而孩子们也用弱小的声音在呼唤妈妈。在场的共和军用尽了他们当时能够用的方法和力量。但城堡是坚固的，铁门是紧锁的，眼望着三个无辜的幼儿，三个可爱的天使就要被烈火吞噬了。在这紧急、绝望的关头，出现了奇迹：已经逃向旷野的侯爵，那个叛军领袖，竟又从地道中折返，出人意外地在共和军的面前，用钥匙打开了铁门，并且奋不顾身地穿过烈火，将三个小孩救了出来。他自己因而被俘。

当夜，郭文因朗德纳克的行为而陷入了沉思。他面临着一个使他不胜苦恼的问题：是处决朗德纳克，还是救他？

他的沉思是那样的深沉。从良心来说，他认为应该放走舍身救那三个小孩的老人。他在这个老人身上看到了“神圣的光辉”。如果处死这个老人就是“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一种慷慨的行为。……这是革命的弱点，这对

共和国是一个贬值”。从革命的责任来说，他认为应该处决那个叛军的首领，因为他曾经犯下了那么多的罪行，今后也还将是共和国的凶恶的敌人。——在激动、痛苦的心情中，他反复深入地思考、衡量。每一面都有强大的、不可辩驳的理由；每一面都有它的严重的缺点和后果。每一个选择都似乎是对的，而每一个选择对他都是深渊。人道主义的良心和革命的责任感在交战。最后，他终于服从了人道主义的良心。像那个老人救那三个小孩一样，去救那个老人；像那个老人毫未考虑后果一样，他决定坦然地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深夜走进了土牢，让朗德纳克披上自己的斗篷混了出去，而他自己来代替那个敌人坐牢。

第二天早晨，西穆尔登十分震惊地发现了这件事，当即由革命法庭对郭文进行审判。西穆尔登投了决定性的一票，判了郭文的死刑。作为政治委员，他亲自监斩。在晨光中，郭文从容地走上了断头台，最后高呼：“共和国万岁！”正当郭文的头颅滚进篮子的时候，一声枪响，西穆尔登也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郭文的沉思就是雨果的沉思。雨果年轻时，由于母亲的影响，曾是一个保王主义者，后来才转变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他参与过 1830 年的七月革命和 1848 年的 2 月革命。虽然他从 1862 年就开始搜集《九三年》的资料，动手写作却是在 1872 年，即在巴黎公社成立和失败以后。他所亲见和参与的革命斗争，引起了他的沉思。通过沉思，他虚构了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故事，在这中间寄托和表达了他对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的看法。故事曲折动人，又充满着激情，我们深深地被吸引了，在紧张的地方几乎要屏住呼吸来阅读，在感动之余，也引起了我们的沉思。

但是，我们沉思的结果与雨果的沉思的结果却是不同的。

当我们放下书本来冷静地考虑，首先对小说的艺术真实性发生了怀疑。

朗德纳克去救那三个小孩的行为是感人的。而且，他对西穆尔登说的那句话也是庄严的：“我允许你逮捕我。”他可以骄傲地说这句话。但是，在我们的感受上，他的这一行为太出人意外了。这种感觉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向残暴、毫无怜悯之心的朗德纳克，怎么会由于那母亲的一声惨叫（那母亲还是他曾经下令枪决的），就去援救那三个小孩（也是他下令要把他们烧死的）呢？这样一个思想十分顽固、反动，而且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的叛军首领，怎么会为了三个小孩而背叛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职责呢？

我们不否认，一个恶人有时也会发出一点善心，一个坏人也可能会转变。然而，那应该是完全地合乎人物性格的发展，应该有内在的根据。在朗德纳克由一个“魔鬼”变成一个“上帝”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这种发展和根据。雨果对于朗德纳克为什么会去救那三个小孩丝毫没有作一点心理描写，他回避了一个困难的课题。

那么，是朗德纳克的一时冲动么？但从作者对他的各种行为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个容易冲动的人。就算他是一时的冲动吧，那也太偶然了。艺术创作中当然可以有偶然性，但那种偶然性是为了表现必然性，应该提高到必然性的水平上来。

雨果只是作过一点简单的说明：恶人的内心也会残留有一点慈悲心。雨果在这一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虚构了这一情节，而且在本书中是关键性的情节，以证明他的观点（“一个枪炮不能征服的魔鬼被摇篮征服了”），宣扬了所谓人道主义精神的胜利；同时，也是为了通过这一情节去引起郭文的

沉思，以表达他要表达的主题（革命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种使人物的性格屈从作者的主观意图，使故事情节简单地迁就主题需要的做法，在艺术创作上是致命的弱点。在这里，说得婉转一点，至少也是一处败笔。

同样，西穆尔登的自杀也使读者感到意外。雨果对他的人物的这一行为也未作一点心理刻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投票决定郭文死刑时的极大的痛苦，可以想象得到他望着自己亲爱的人站在断头台上时的极大的悲哀。但我们想象不出他是在怎样的心情下作出决定和在怎样的心情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是因为失去了唯一亲爱的人，自己就无法生活下去了么？是因为感到郭文是圣洁、高贵的，判处了他的死刑，自己良心上不安么？是郭文临死前和他的一次长谈中将他打动了，甚至说服了么？我们很难揣测。而在我们的感受上，像西穆尔登这样一个有原则性的坚毅的革命者，是不容易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就动摇自己的信仰，放弃自己的职责的。

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主题，雨果却不能不让西穆尔登自杀。因为如果西穆尔登在判处了郭文死刑后还活着，那就削弱了郭文牺牲的重大意义，郭文的牺牲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悲剧。西穆尔登的殉葬，却会大大显示出郭文的胜利。

雨果钦佩西穆尔登，却更喜爱郭文，对他充满了同情和爱抚，在他身上赋予了各种各样好的品质。他既是一个勇敢的英雄，又是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一个年轻的圣人。他既能英勇地献身革命，又能维护人道主义的原则。雨果再三强调了仁慈和宽大：他释放那些反动的修女，因为她们是女人；他不肯将一整队狂热老教士送上革命法庭，因为他们是老人；如果可能，他还要把王太子从碉堡里释放出来，因为他是小孩；当一个手执刀枪的俘虏冲过来时，他命令他的士兵闪开一条路，因为他不愿用 1500 人去对付一个人，如果不是西穆尔登的挽救，他几乎因而送了命。在他看来，“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在他的心目中，“恕”字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一个字。郭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朗德纳克的善行震动了他，使“他的最坚定的决心，他的最虔诚的诺言，他的不可挽回的决断，这一切都在他的意志的深处动摇了”。从他的性格来看，这倒是可信的。他救朗德纳克，是他的性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郭文就刑前的两次谈话值得注意。

一次是在审判他的革命法庭上。他承认“一件好的行为，离得我太近了，使我看不见一百件罪恶的行为，一方面是一个老人，另一方面是几个孩子，这一切站在我和革命之间。我忘记了那些被焚烧的村庄，被屠杀的妇女，我忘记了法兰西被出卖给英国，我放走了祖国的凶手”。他把自己的错误思想完全亮了出来，我们要批判他，大致也只能说这样一些话（另外只需加上一点：那个祖国的凶手将继续作恶，给祖国和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事实上，在郭文决定救朗德纳克前的沉思中，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是光明磊落的，勇于承担罪行，主动请求给自己判处死刑。

另一次是当夜他和西穆尔登的一次长谈，事实上是一次思想交锋。西穆尔登到土牢去看他时，他正在熟睡。一个第二天早晨就要走上断头台的人能够安然入睡，这正说明了他的从容和镇定，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品质。但是这也说明了他并没有因为认识到他对革命所造成的恶果而有所不安。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些话并不是虚伪的，在雨果笔下的郭文是太高贵了，他决不会欺骗。那是他在对革命的责任发言和认罪。他的从容和安然，则是由于他相

信自己是献身于一个更高的真理：人道主义。他在和西穆尔登的交谈时就说：“既然我有了指南针，风暴对我有什么关系！既然我有我的良心，事变对我又有什么影响！”这里的“风暴”和“事变”指的是革命和现实斗争，而“指南针”和“良心”则意味着他的人道主义原则。

在郭文看来，革命只是一种短暂的手段，人道主义则是永恒的真理。革命是绝对正确的，但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它之上。因而在革命和人道主义发生矛盾时，他当然就必须站在人道主义那一边。

不过，使我们困惑的是：这种损害和背叛了革命利益的人道主义算得上什么人道主义呢？这种为了报答一件善行而宽恕一个曾犯下百倍罪行的敌人，让这个敌人去继续作恶、造成更多无辜者流血的人道主义，算是怎样的人道主义呢？

无论郭文用了怎样动人的美丽的言辞，他并没有能说明这一点。

那个孤身一人，几乎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乞丐退尔马克，曾经营救刚刚从海上登陆的朗德纳克，因为朗德纳克过去对他作过施舍，他觉得应该回报；也因为他看来朗德纳克是一个“人”，出于同情，他应该予以帮助。但是当他后来看到朗德纳克杀人放火的行为，曾两次痛心疾呼：“我要是早知道啊！”——在他朴素的感情和真诚的悔恨中，要比郭文的那些漂亮的言词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孤立地看，郭文为了救朗德纳克而牺牲自己的行为是感人的；正如孤立地看，朗德纳克为了救那三个小孩而情愿牺牲自己的行为是感人的。而且，我们早已看到郭文是一个那样纯洁、善良的人，那样可爱可敬的人。看到他因而被判处死刑，看到他从容地一步一步走上断头台时，我们很容易产生同情。这正是作者雨果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郭文救朗德纳克和他的死，是一个悲剧，我们可以从中汲取重大的教训，然而却不是如雨果所期望的那样的教训。

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常常引起讨论的题目，特别是在一场大革命进行的当中和那以后，这个问题就常常被提了出来。不但是敌人用人道主义的名义对革命进行攻击，就连某些善良的，甚至为我们所尊敬的人，也都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对革命进行了批评，乃至否定。雨果在《九三年》中，也认为人道主义与革命不能两全，他将人道主义置于革命之上，指出了它们的矛盾，宣扬为了人道主义的原则可以放弃革命和背叛革命。

但是，雨果是同情革命的，而且，也认识到革命暴力的作用和意义。在《悲惨世界》中，他借一个老共和党人的口说过“法国革命自有它的理论根据，它的愤怒在未来的岁月中会被人谅解的。它的成果便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进步的暴力便叫做革命。暴力过去以后，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人类受到了呵斥，但前进了。”在《九三年》中，他又借西穆尔登的口说过：“革命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旧社会，革命对这个敌人是毫不仁慈的……革命在文明身上割开一道很深的伤口……”郭文在临死前也说过：“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指革命——引者）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有别的办法吗？它所担负的是那么艰巨的清洗工作！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这些话说明了革命的意义，采用暴力的必要性和不得已性，也说明了革命的成果“是一个改进了的世界”。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革命不正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吗？然而，雨果没有从这一点深入下去得出应有的结论。看到革命有那么多的流血和牺牲，他的良心总

还是有些不安，有些不忍。也可能革命暴力中某些偏差和某些过火的行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和假借革命的名义所犯下的一些罪恶（这是应该避免的，但历史的错误有时也会重复），使他有些不满。于是，希望用他所理解的人道主义来唤醒人们的良心，希望用他所理解的人道主义来代替暴力。由于他的思想上的矛盾，他并不是那样雄辩的。从艺术上看，他编了一个多少有些牵强因而也就是不够真实的故事，不得不有意无意地违背了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在主题思想上也是无力的，经不起深究的。雨果所宣扬的人道主义胜利了么？否！英雄郭文的高贵的灵魂连同他的神圣的理想，在他的教师的灵魂的陪伴下面，飞升到无极的天上去了，在还充满着苦难的尘世的大地上，让他们过去的战友（他们已损失了两个优秀的领袖）去同敌人（其中有被救的朗德纳克）进行血与火的斗争。郭文不仅背叛了革命，也背叛了真正的人道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郭文的死连同西穆尔登的死，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它对我们的教训是：浅薄的人道主义一超过某一种限度，就暴露了它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但是，对于雨果这种浅薄的人道主义，或者说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我们在给予必要的批评的同时，也须作出具体的分析。我只想指出一点，在认识这种人道主义的浅薄，有时还是虚伪和反动的实质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完全抹煞它对受难的人民的同情和对暴政压迫的不满。雨果用仁慈、博爱、道德这样一些药方来改革旧社会的想法，其本身是幼稚的，可笑的，但他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批判旧社会的罪恶，还是应该加以肯定。他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不过，在那些作品中，他的人道主义的批判对象是旧社会，而在《九三年》中，和人道主义发生矛盾的却是革命，所以，这种人道主义就大大减弱了它的光芒，而显出了更浓重的暗影。

雨果的一生几乎占据了整个 19 世纪。在他的晚年，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已广为传播，无产阶级已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而登上了政治舞台。雨果却还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思想上还有着很深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不过，他终究还是一个有着进步理想的政治斗士，他对受难者和被压迫者怀着浓厚的同情，对人类的将来有着巨大的信心，而且在探索着人类前进的道路。他的思想、性格上的弱点和进步的方面，都明显地反映在他最后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它还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它反映了那个重要的时代。问题在于，我们对它所宣扬的那种人道主义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1979 年 10 月 小阁楼

在大海面前

——从《迷人的海》谈到《老人与海》

看完邓刚的《迷人的海》，我很自然地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在这两个中篇里面，都写到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少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角：海；都写到了人与自然的搏斗，与生活的搏斗。《迷人的海》在写法上和《老人与海》是有些相近的，都极省略地写到人物的身世、社会关系，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却又带着强烈的寓言色彩，表达了人生哲理。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1899 - 1961）晚期的作品，发表于1952年，那时候，他早已是一个享有盛名的大家了。这篇作品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由于他长期以来在文学上的贡献，和他在当代文学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邓刚，用我们当前的标准来看，还算是青年作家：37岁，在文学事业中刚开始他的道路。《迷人的海》不是他的第一篇作品，却是他最初引起广泛注意的作品。我设想，他写这篇作品时，是多少受到了《老人与海》的影响的。

然而，这两篇作品又是不同的。题材不同，人物性格不同，那是当然的，我主要指的是，作品本身的主题意义和蕴含的感情的不同。那原因，不是在于两位作家年龄的差异，而是根源于作家本人的精神状态，他们对待生活的理解和对待生活的态度。

海，是多少古往今来的诗人、作家歌颂的对象。我们可以将许多美丽的形容词放在她的身上：辽阔、庄严、温柔、奔放、深邃、壮丽……然而，有时她又是凶恶的，有着狂风、暴雨、巨浪、暗礁、漩涡……我曾在一首小诗中说：

多少人，多少人
在海的风浪中苦斗
在海的怀抱中沉没
在海水的咸味中融合着多少眼泪

但是，海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她的美丽，而且也在于她的凶恶，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更在于她的凶恶。如果仅仅只能欣赏海的美丽的一面，那么，这样的人是并没有理解海，也不能真正地爱海的。

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记述过，在某一处的海岛上，渔夫们在一块巨大的圆花岗石上刻上了一行题词“纪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这题词使巴乌斯托夫斯基感到忧伤。而另一位作家却认为这是一行非常雄壮的题词，他是这样理解那意义的：“纪念那些征服了海和即将征服海的人。”

这位作家的理解是对的。

许多水手、渔夫决不因为畏惧风浪就不到海上去；决不因为畏惧死亡就不到海上去。当然，他们需要在海上谋生。但是，也因为他们对于大海有着深厚的感情。即使在岸上休息时，即使因年老不能再出海时，他们也常常向往着海，听到大海的呼唤。他们的雄心，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生趣，就在于和风浪搏斗，和大海搏斗。在这搏斗中，显示出他们生活的力量，也显示出他们对自己的信心。

而大海，也正是生活的象征。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生活的海洋中。我们欢喜阅读描写海的文学作品，不仅是由于对海本身的喜爱，也是由于往往能从其中获得对生活的启示和激发在生活中搏斗的力量。

《迷人的海》写了一老一小两个“海碰子”。他们从事的是这样一种行当：凭一口气潜入海水的深处，捕捉海珍。这是辛苦的，要在冰冷的海涛里浸泡，然后，爬上岸来，点燃事先准备好的柴草堆，让冻僵的身体在几尺高的火苗堆上反复烧烤，再跳进冰冷的海涛中去。这也是危险的，海上不时有风暴，海下有刀锋箭簇般的暗礁，而且还有着凶狠的狼牙鲛和鲨鱼……海碰子，那是将生命抛进大海碰大运的人。

那个老海碰子身形魁梧，有岩石般坚硬的骨架，牛筋般扭紧的肌肉，伤痕累累的身躯，黑胶板一样富有弹性的皮肤，那是五六十年来他在冰冷的海水里和灼烫的火烟中锻炼出来的。关于他，流传着一些传奇式的故事，在这一带海岸线上享有盛名。

而那个小海碰子看样子不到 20 岁，几乎还是个孩子。翘起的鼻头和红嘟嘟的小嘴，脸蛋上还毛茸茸的，像一个注满汁水的小香瓜。他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家伙。

《迷人的海》是在这两个海碰子的关系上展开的。

这一带有两个海湾。在山那一面的，叫半铺坑，是一个平静的海湾，即使风起浪涌，也伤不了筋骨。在山这一边的，叫大石湾，这里的景色雄伟、壮阔，只是海上海下都有着更大的危险。然而，这里有着更多更好的海珍，还有传说中的神物——为有着钢刀一样的身子，一公一母交错立在那里的错鱼守护着的神物。老海碰子一向是独自在这边——在这他认为是男子汉的海中活动。而这一天，一个年轻的海碰子闯了进来，他也舍弃了那温柔的海而选择了这男子汉的海。

这一老一小两个海碰子开始是冷淡、疏远、相互轻视的。老海碰子不满意小海碰子的服装（穿着那样一身小挽领、紧贴身的摆浪的衣服，来逛海么？），也不满意于小海碰子手中的亮铮铮的鱼枪（世世代代的海碰子都使鱼叉，叉的鱼还少吗？那可是腕上的硬功夫，练不出来，便想新花样，懒人懒招儿）和窄窄的小脚上套着的大胶皮鞋之类的“新式武器”（什么玩意儿），更不满意于小海碰子的傲慢态度（不先来拜上两句，就随便地摆开了架势，立了门户，真是太放肆了）。而小海碰子初次见到久已闻名的老海碰子时，也感到很失望：人们把老海碰子说得那样威风，那样神能，原来只是一个使着锈斑斑的鱼叉和可笑的葫芦头的老头子，他断定自己比老海碰子强一百倍。

但是，他们的关系终于逐渐转变为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结成了通过生死考验的情谊。

小海碰子虽然富有进取精神和勇气，装备了具有更大威力的新式工具，却究竟缺乏经验，在多次失败后，使他不能不像一个见习生那样向老海碰子学习。而且，有时是依靠了老海碰子的帮助，他才得以从困难和危险的状况中摆脱出来，他从内心滋生了对老海碰子的钦佩和感激的感情。虽然，他一方面还是在暗暗地与老海碰子较量。

不管怎样，老海碰子对小海碰子是怜惜和关心的，他不满意于小海碰子的自负、冒失，却也喜爱他的朝气和勇敢。所以，即使是开始的那种冷淡、疏远的关系中，他也还是在必要的时候帮助他，用威严、简单的话语教导他。

他知道小家伙正在暗暗地与自己较量。这是一种挑战。于是他拼足了全部气力。他是不会让小海碰子超过自己的，他要永远是强者。但他从观察中终于知道不能小看对手。小海碰子的火枪的确比自己的鱼叉有着更大的威力和准头。虽然他是深深地爱着那生锈的鱼叉的，那上面有着他祖父和父亲的血，他拿着它战斗了一生。但它显然是落后了。而他自己也显然一天天衰老下去，小海碰子虽然嫩稚，却正是开始。当他意识到这些，一种痛苦的绝望的情绪就涌了上来。

而同时，在他的内心渐渐滋生着对小海碰子的一种愈来愈强烈的全新的感情。那原因是，他知道了小海碰子也正在寻求着、向往着那为错鱼所守护着的神物——那也正是他的先辈和他自己所寻求和向往的。当他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少年，就常常跟在村里送葬的队伍后面胡乱哭啼，后来，他自己也还是勇敢地扎进了这个浸着先辈的血水，凶险而迷人的海湾。现在，与他抱着同一愿望的青年出现在他的身边了，而且，是带着全身新的武装。他感到了两代人之间的联系，他在小海碰子身上寄托了希望，看到了希望。

所以，在那一天早晨，当他发觉小海碰子没有接受他前一天的警告，冒失地投入到风暴席卷的海中，面临着灭顶的危险时，他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危，跳进了噬人的激浪中，救出了小海碰子。而且用自己的身体去温暖小海碰子的冰块一样僵冷的身子。

后来，他们又经历了一次为箭鲨追袭的危险。是小海碰子绑在脚蹼上的两块红布吓退了箭鲨。老海碰子原本是瞧不起这胆小者发明的玩意儿的，在那次经历以后，当小海碰子也在他的脚蹼上绑上两块红布时，他却觉得那像两股火焰在他脚脖上燃烧，他的整个身子发热了。

这一老一小两个海碰子，在一个共同的追求下，有了血肉的联系和通过生死考验的情谊。他们并肩战斗在浪涛滚滚的大海中……

这是一曲嘹亮而雄壮的赞歌。

这是对大海的赞歌。听说作者在少年时就从事海上生涯，对大海熟悉而且热爱。他细致、生动地刻画出了海的性格：美丽、温柔而又凶恶——因而是迷人的。

这是对为错鱼守护着的神物的赞歌。神物，永远闪耀着神秘的光辉，吸引着、鼓舞着世代的人去寻求它，去获得它；它引导人们永远凝望着前面，为人们开拓了无限宽阔的天地。

这更是对大大小小的海碰子们的赞歌。他们以寻求和获得神物为希望，在蓝色的大海——那浸透着先辈们的血水中搏斗着。面对困难，是那样勇敢；面对危险，是那样无畏；面对将来，是那样充满了信心。前一代人哺育和教导着后一代人。他们都是强者，一代又比一代强。因而，他们总有一天会达到他们的希望——获得那“神物”。

用不着解释，这是对生活、对理想、对在生活的海洋中为理想而战斗的人们的赞歌。海碰子的那种精神是能够也应该体现在一切在生活的海洋中遨游的人们的身上的。这曲赞歌也是对人们的热情的呼唤和激励。

《老人与海》也是一曲赞歌，在调子上就要低沉得多。

海明威也歌颂了一个老人，他衰弱、孤独，几乎为一切人所遗弃。他独自驾着一叶小舟在茫茫的大海上，先是与一条捕得的大鱼搏斗，后来又与一群追食着大鱼的鲨鱼搏斗。他失败了，鲨鱼吞食完了他捕得的大鱼，留下来

的只是一副鱼骨。他也胜利了，因为他能承担各种痛苦，因为他以坚韧的精神与困难、艰辛、死亡战斗过，他失去了一切，却并没有被打垮。

这个老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但比起老海碰子来，他就缺乏那样一种昂扬的气概。老海碰子对自己的力量、对将来都充满了信心，无论情况是怎样困难，他永远在一个希望的召唤下抬着自己的头。而这个老人，在茫茫的大海上，却时时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和渺小。在一个紧接着一个出现的困难中，他常常渴望休息，渴望得到好一点的“运气”，而且常常不自觉地呼喊上帝，这不仅是出于一种宗教习惯，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和无力感。并没有任何美丽的希望激励着他，他所要求的仅仅是起码的温饱而已，而这也是如此不易。

《迷人的海》中写了一老一小两个海碰子。在《老人与海》中，除老人外，也写到了一个少年。那两个海碰子寻求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都是强者。小海碰子从老海碰子的经验中学习很多东西，而他有着更新式的装备，因而将是更强的，他将沿着老海碰子踏着的浪头干下去，更接近于那个目标。

《老人与海》中的那个少年只是老人的陪衬。他是老人最亲近的伙伴，和老人一道出海打过鱼。他关心老人，给予尽可能的照料。他敬佩老人，看到老人的失败和那双满是伤痕的手，他哭了。当他长大后，他也会像老人那样在海上斗争的。然而，可以预感到，他的命运也只将是老人命运的重复。

《迷人的海》和《老人与海》都是带着寓言色彩的小说。在那中间，各自体现着作者对现实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态度。在海明威的眼中，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困难、厄运和危险的。他歌颂那些坚韧不拔地搏斗着的人们，用以激励读者，也激励他自己。然而，他又感觉到，即使个人是强者，在茫茫的海洋中，总还是太渺小、太无力了，他可以承担一些痛苦，克服一些困难，他在精神上不会被打垮，但终究是不可能战胜生活的。他命定只能做一个失败的英雄，做一个有顽强精神的弱者。海明威的心情是沉重的。而我们年轻的邓刚对于生活是充满了乐观，他相信人的力量，他相信理想的力量。他满怀希望地眺望着将来。——与那个老人和那个少年比较起来，一老一小两个海碰子是真正的强者。我们也可以说，与海明威比较起来，邓刚是更开朗，也更幸福。

这是两篇带着强烈寓言色彩的小说。它们都没有展开主角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也极少接触到人物的身世，而是将中心放在人物与大海的搏斗上。因而，我们无法谈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只能比较体现在作品中的作家的精神状态。那是由他们的世界观决定的。同时，这里面也还有社会因素：海明威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家，看不到他笔下的英雄在他们生活在其间的那个社会中的出路，他的迷惘的心情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个社会的否定，虽然是一种消极的否定。而邓刚则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祖国光辉前途的坚定的信心。

当然，在艺术手法上，海明威是比邓刚成熟、老练。我只想指出一点，在《老人与海》中，生活气息是更浓厚一些，老人的性格也较丰满，而《迷人的海》在情节的安排上有点过于追求寓意的表达，那两个海碰子的性格是稍嫌单纯了。但是，邓刚对待生活的激情和昂扬的精神是可贵的，他使我们更热爱那迷人的海，使我们也向往那为错鱼所守护着的神物……

1984年3月9日鄂城墩

深沉的灵魂 ——读休士的《黑人谈河流》

我熟悉河流：

我熟悉那些像地球一样古老的河流，比人类血管里流的血液还要古老的河流。

我的灵魂成长得像河流一样深沉。

我在幼发拉底河中沐浴，当朝阳还是年轻的时候。

我在刚果河畔盖小茅屋，河水抚慰我进入梦乡。

我眺望着尼罗河，在河边建起金字塔。

我倾听密西西比河的歌唱，当亚伯·林肯顺流而下新奥尔良，我看见它的浑浊的胸膛在夕阳中闪着金光。

我熟悉河流：

那些古老的幽冥的河流。

我的灵魂成长得像河流一样深沉。

这是美国著名黑人诗人休士(1902 - 1969)发表的第一首诗，题目是《黑人谈河流》。写这首诗时，他还是一个中学生，不到20岁。而这是他著名的诗篇。

我初读这首诗，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当时不大能领会诗的涵义，但感觉到了诗的美，感觉到了流动在诗中的真挚的情绪，受到了感动。几十年来，我曾多次重读——这是一首经得起多次重读的诗，而由于多少地接触到一点黑人的历史，对于这首诗的感受逐渐更深刻了一些。

近200多年来，一部黑人史是血泪斑斑的受难史。黑人受到侵略、镇压、剥削，而且成千上万的人被强迫离开了他们的故土，主要是运到了美国，成为奴隶，像牲口一样地被拍卖。他们的悲惨的命运在小哈里特·比彻·斯托的著名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近几十年来，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状况逐渐地有一些改善，但还是受到歧视、迫害。

但同时，黑人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了一部斗争史。他们在受难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斗争，还爆发过几次震动了美国的起义。在黑人文学中，就有着不少号召黑人起来斗争、反对种族歧视的作品。休士自己也写过不少这一类的诗篇。其中著名的如《让美国重新成为美国》、《我也歌唱美国》等。

在《黑人谈河流》中，作者没有接触到黑人的受难和斗争。它只是通过黑人种族与几条河流的联系，象征性地然而又是形象地表达了它的历史行程。但是，这首诗却是有助于激发黑人的斗志的。

诗人所要表达的是：黑人是一个古老的种族，曾经有过比较平稳的岁月，在大地上辛勤地劳动，对人类历史也作出过贡献。作者用充满了诗意的形象和深挚的感情叙说着黑人的过去，可以说，年轻的休士是有些将那美化了。他不是故意这样做的，而是由于目睹了当前的黑人的悲惨的命运，使他在眷恋的心情中回顾了去还没有沦为奴隶时的黑人的生活，而且不自觉地赋予了它以诗意和色彩，用以来同惨痛的现实相对照。诗里面还写到了为黑人的解放斗争过的林肯从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新奥尔良时，“我”倾听密西西比

河的歌唱，而河流的“浑浊的胸膛在夕阳中闪着金光”。这里闪耀着——虽然是朦胧地——斗争和希望的光波。

诗人通过具体的形象将黑人的历史与几条古老的河流联系起来，这构思是巧妙的。而全诗的重点更在于表达这一点：

我的灵魂成长得像河流一样深沉。

短短的十几行诗中，两次重复了这句话，而且是将它作为全诗的收束：一个回荡着的余音……

受到歧视，受到迫害，然而，我的灵魂是你不能摧毁的。事实上，诗里的河流我们还可以赋予它另一个含义：生活的河流。我是在那些古老的河流中，也是在生活的河流（那里面浸透着我的血水）中成长得更为深沉的。

这首诗，没有直接号召斗争，但对于黑人，这可以起到启发和激励的作用，使他们觉醒起来，增强自信和尊严感。这正是为了进行斗争所需要的。而对于迫害他们的人，这是一个庄严的宣告：虽然受到这样的歧视和迫害，我们还有着像河流一样深沉的灵魂，因为我们没有被征服、而且不可能被征服的。

诗里面的“我”，是指的黑人种族，年轻的诗人所表达的情思，凝聚着个人的独特认识和感觉，但那的确同时表达着广大黑人的思想感情。通过抒发自己的认识和感觉，达到将自己与“大我”融合在一起的境界，这正是诗人最可贵的品质。

记不起是哪一个美国诗人，当人们要他解释他的诗时，他说：你要我用笨拙的语言将诗复述一次么？而我在这里，确实是用笨拙的语言复述着休士的诗，其中还可能有一些牵强附会甚至歪曲了原意的地方。但是，我表达的是我自己读了这首诗后的感受。至少，我的感受有一点应该是对的：遭受过无数苦难和有着悲惨命运的黑人，有着人的尊严感，是永远不会屈服的。而且，他们一定会有他们的光明的将来，一如休士在另一首诗中所歌唱的：

我们应当有一个太阳的国土而不是这个生命寒冷的地方

《黑人谈河流》这首小诗，是单纯的，然而并不简单。在诗里面，单纯是力图将丰富的生活体验通过凝练的方式传达出来。而且，既然是生活体验，那当中当然也就流贯着真实的感情，这感情表面舒缓、平静，却蕴含着深不可测的力量，显示着深沉。这诗的节奏是并不强烈的，而在这并不强烈的节奏中，内在情绪的回旋却达到了一种超出一般的力度。它像一条河缓缓地、缓缓地流进读者的心中，在读者的心中激荡着……

